

三
耳
关

生活®

2017.11.27
2017年第48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南渡的星辰

西南联大八十周年

964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时代》(美国) 2017.11.27

2017 年 25 项最佳发明

在过去几年《时代》杂志评选出的年度最佳发明中，包括桌面 DNA 实验室等推动时代进步的新科技。今年的年度最佳发明则呈现出更亲民化的特征，既有 Jibo 私人机器人、盲人眼镜这类人工智能领域的新探索，也有低卡路里的“无罪”冰淇淋、蕾哈娜推出的更适合有色人种的化妆品等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物件，并且可以轻松购买。



1 《经济学人》(英国) 2017.11.18 气候变化的真相

假定能找到从大气中“回收”温室气体的办法，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回收二氧化碳的方法包括安装二氧化碳吸收装置，种植森林、开发土壤回收二氧化碳，人为加速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盐岩的过程。但 these 方法成本高、推广难，也未必能真正起到“回收”效果。总之温室气体“回收”面临着需求大、技术不成熟、经济刺激不足的难题。

3 《新闻周刊》(美国) 2017.11.24 老牌新闻媒体如何自处？

美国老牌新闻频道福克斯新闻正在面临严重的媒体道德谴责和公众信任危机。频道的某些主持人是特朗普的狂热宣传者，缺乏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尊严。有线新闻网也不断涌入了不少右翼错误信息，充斥着不真实的言论。面对不断出现的网络诉讼、老化的收视结构以及新的竞争者，福克斯新闻还能在特朗普时代回归被大众喜爱的有良知的媒体吗？

2 《旁观者》(英国) 2017.11.18 社交媒体和选举

英国政府高层总是天真地认为，保守党的民意调查结果只是稍逊于工党，尽管每天有各种负面新闻曝光，但一切终会变好。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大多数人不相信传统媒体，而更信任朋友在 Facebook 上分享的内容。工党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大批年轻支持者，他们的生活离不开网络。保守党需要认识到，如果不重视网络社交媒体的风向，几年后的大选将是工党的胜利。

4 《新科学家》(英国) 2017.11.18 男性生育危机

长期以来，生育率一直被看作是女性的问题，比如我们对大龄产妇格外留心是担心超过 35 岁的产妇会带来生育健康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并未对大龄生育的男性做出过多关注。如今，我们正在面临着男性的生育危机，最近的研究表明男性精子数正在普遍下降，这与现在的社会结构、生育的年龄结构以及男性自身健康状况都有所关联。



P30 封面故事

西南联大八十周年

南渡的星辰

- 32 西南联大：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选择
- 48 求学之路，战火中的诗篇与论文
- 62 大师与通才
- 69 联大最重要的特质是自由
- 72 西南联大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

P84

锡安重生之路：从《贝尔福宣言》到巴以分治



P94

福建商人冤案：一个企业家的生死沉浮



社会

- 时事：锡安重生之路：从《贝尔福宣言》到巴以分治 84
 热点：福建商人冤案：一个企业家的生死沉浮 94
 人物：尤里·米尔纳：亿万富翁的科学梦 100
 调查：美国明星学校 AltSchool 关闭风波 108

经济

- 商业：可转债的机会与风险 112
 商业：“战火”烧到了办公室：无人货架的厮杀 116

文化

- 电影：《暴雪将至》：被一场凶杀案改变的命运 124
 电视：《心灵猎人》，罪案美剧的学术范儿 128
 艺术：“艺术至少为终极自由提供了一种错觉” 130
 人物：恐怖鬼才伊藤润二 134
 设计：不是每个人都将进入未来 138
 时尚：鸡尾酒的行走地图 144
 思想：技术时代的人文学科 154

专栏

- 邢海洋：保护投资者的诉讼试点 16
 袁越：穷碳水，富蛋白 150
 宋晓军：阿布卡迈勒的“三国杀” 152
 朱伟：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6） 156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封面摄影：张祖道）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48期，总第964期，2017年11月27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字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院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面拉页 · 奥迪

封二~扉1 · 一汽大众

3 · 德国柏林交响乐团

17 · 美赞臣

45 · 三联全媒体

99 · 话剧《父亲》

107 · 生活周刊

115 · 松果生活

122~123 · 一汽大众软文(人物)

143 · 世茂软文

148~149 · 一汽大众软文

151 · 瑞尔齿科

153 · 三联中读

159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IWC万国表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中移动 头条 今日头条 手机百度 百家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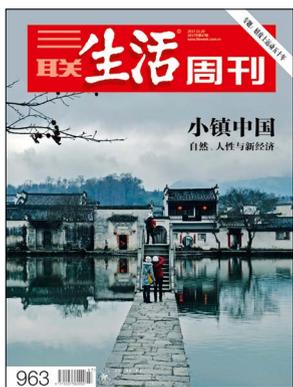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小镇中国

马不停蹄的城市生活让人想逃离，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过一种温情淳朴、能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小镇生活。这期的封面故事对中国小镇进行了解读，美丽的宏村、如梦如幻的乌镇，以及与互联网一同成长的云栖小镇……在中国当下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小镇的发展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希望这些特色小镇在发展经济、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能保留当地的民俗文化与自然风情，避免过度商业化，成为超越城市的理想居住空间。

(@小风)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微信平台 (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农村娃迷恋手机

“双11”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听，原来是甘肃秦安老家亲戚家的小孩，他一开口就央求：“帮我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小饭店洗碗也行，扫大街也行，只要挣点钱就行。”他才上初三啊，15岁，得准备明年中考，怎么突然要外出打工？他说上学不自由，不能好好地玩手机，到外面打工就能随便玩手机了。哦，又是一个农村娃迷恋手机想辍学。

我是国庆长假回甘肃农村老家的，待了七天，几乎天天听到大人唠叨：“现在的娃娃迷上手机，不好好念书了，怎么办？”有些家长干脆拿“毒瘾”比喻小孩迷恋手机，他们满脸的无奈，满脸的忧伤。

三婶家的儿子现在上初二，平时租住在乡上，离学校二三百米。他本是学习的“好苗子”，从小学到初一一直是班上前10名，现在跌到40名，只因迷恋手机游戏。三婶平时在家种地，孩子就一个人在乡上。上半年的一个晚上，三婶跑到乡上看孩子，一开宿舍门，小家伙竟然玩手机呢。三婶说她的头“轰”的一声犯晕，没给孩子钱哪儿买的手机？

经过一番拷问，孩子从实招来，说是三个同学合伙买的手机。现在政策好，国家给每个农村孩子一天3元午餐费，在学校附近租住的孩子一学期还补助四五百元，住宿补助费交给了家长，但孩子省吃俭用，午餐常常不到学校食堂，而是自己在宿舍生火煮面条，一个月省下饭票66元，另外两个同学也是这样省，一个月下来，三人凑了200元饭票，然后到乡上的商店换了一个手机——偏僻农村一二百元的手机多的是，并且可以拿学校的餐券当钱抵用。

三个孩子商议手机轮流用，每人玩两晚上，然后转交下一个同学。但事实上，仨孩子住得近，游戏瘾大忍不住，常常跑到一起玩手机到半夜，然后分头各回各的宿舍睡觉。

三婶嚷嚷着训孩子，孩子却拿起手机夺门而出，十几分钟后再跑回来已是两手空空，三婶没收手机的计划落了空。又过了几天，三婶晚饭后跑到乡上突查，推开宿舍门，却不见儿子的影子。她是打着手电筒在乡上一家家地敲门呼喊，足足半个小时，才找到孩子——小家伙和另外两个同学在一户人家房背后的树下拿着手机玩《王者荣耀》呢。说来这家人有宽带，小孩是跑来蹭网的。

今年秋季开学，公家补助的住宿费孩子没上交三婶，而是直接买了手机，以前是偷着玩，现在是明目张胆地玩。小家伙还威胁家长：“你没收手机，我就立马退学；你让我玩手机，我才上学。”三叔在外打工，三婶已经管不了孩子了，任由他带着手机去上学。

我每次回老家，都给弟弟的俩小孩每人200元，这次刚把钱递到俩侄子手里，我的母亲就跑过来催促孙子把钱上交弟媳，说是万一小孩到乡上买手机沾上游戏瘾就麻烦了。说来弟媳正是怕孩子玩手机，晚上都是翻过一座山跑到乡上租的宿舍陪住，监视孩子只许学习。

还有成本更大的呢。北京的一个老乡毅然辞掉工资8000元的工作回家，就是因为孩子迷恋手机，媳妇一个人管不住，他只好前去助阵。唉，因为手机，现在需要两个家长盯着孩子。

十年前，老家村里的人看电视，总是看到城里的家长抱怨孩子进网吧荒废学业，以为这是城里人的问题，挨不着偏僻山村，想不到现在轮到自己家里了。上个月我从老家回到北京，在朋友圈发了一段文字：“现在农村家庭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孩子对手机游戏的美好向往和家长对手机供应不及时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北京 李成义

监考秀

最近，应一家单位邀请，我连续

参加了两场某市举办的安全生产管理员考试巡考，整个过程，感觉在作秀。

每一场考试，参考的安全员还不少。一个地级市，一场考试的人数达到了四五百，十多个考场都坐满了。考场门口贴有醒目的标语，拉起了警戒线，少数忘带身份证的与一些代考人员混杂在一起，不时在考场外徘徊，想伺机蒙混过关，被监考员挡在门外。每间考场安排了两名监考员，还有摄像头、屏蔽仪。不过，开考铃响过，转进考场内，却是另一幅景象了：考生交头接耳的现象层出不穷，几乎每个人都带手机入场，接电话、查题目忙个不停，监考员对此视而不见。还有几名年轻的考官陪着考生一道玩手机，见到巡考人员，才有所收敛，象征性地提醒大家遵守考场纪律。再看考场内的摄像头，多数是坏的，屏蔽仪一台也没有开。

翻开主管部门给我的《工作手册》，要求赫然醒目：“闭卷考试，严禁带手机及相关书籍入场。”我问主考官是怎么回事。主考官解释说，这是上级文件上的要求，到基层不能那样做的。我很不理解：“既然允许作弊，干脆就搞开卷考试，何必浪费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主考官说：“那不一样，开卷考试不能促进考生认真学习，那样也没人来参加我们的培训了。”另一名工作人员接着介绍：“这些安全员都是经过培训的，题目不难，只要听过课，及格应该没问题。成绩及格，就能拿到安全员上岗证了。”

可就是这份“及格没问题”的试卷，却难倒了不少人。考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记忆力应该不错，但无一例外都是手机控，从他们的状态看得出，不少人并没参加培训，也没认真看过书。

按照规定，考场舞弊试卷作废，并且计入个人不良行为记录。一见我要动真格，主考官终于说了实话：“如果监考一严，这些人就不愿在我们这儿报名了。但到别的地市，他们照样可以参考，上岗证在全省也能通用。现在各地都在抢生源，考生太少，收不到培训费，我们请不起老师，连场租都保证不了，完不成培训任务，还得挨上级批评，这是没办法的事。”

安全生产事关地方发展百年大计，对安全员业务素质及责任心都有特殊要求。作为安全生产的主管部门，理应从严把关，为国家培训一批业务、思想双过硬的基层管理队伍。疏于统筹、恶性培训竞争造成的监考秀，使得把好安全员的入口关流于形式。而让这些不合要求的安全员过关，会无形中破坏建设市场的保护屏障，给社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湖南一读者

当妈不易

怀二宝，头三个月，先兆流产，医嘱吃药卧床半个月；后三个月，先兆早产，住院挂水推针；临生产，胎心加速不佳，住院，果断剖腹产，手术台上听

到接生的医生说：“唉呀，脐带扭转。”后来才知道“脐带扭转”是多么凶险的情况，分分钟能要了胎儿的命。躺在手术台上，蓝色的布遮在我的面前，不去想打开的肚子血乎拉碴的模样，就等着医生从肚子里把娃捞出来。娃出来了，啼哭有力，医生放心了，我哭了。

生老大的时候，我也哭了，躺在产床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产房里放着玛利亚·凯莉的 *Bye Bye*，我哭得不能自己，那时觉得生孩子就是一场告别仪式，是人生的隐喻——拼尽全力，为的却是一个“分离”的结局。这样想着，满脸泪水地被推进病房，娃在床边的小车里喝奶，我恍惚觉得空空的肚子里还有胎动。

生老大时，肚子疼得紧，尽管吵着要无痛和剖腹产，最后一咬牙也就自己生了；到了二宝，之前的经验竟让我失去了自己生的勇气。医院还是执意拉我到产房“催产”，挂上催产针，马上就开始肚子疼。护士们说，这个人的用药效果好，可能催出来，快让家属送饭给她吃。我与先生约定，生的时候要给我买肯德基的鸡翅，先生赶紧买来。我挣扎着坐起来，在疼痛空隙和护士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大快朵颐。滑稽的是，吃完后，肚子不疼了，我又被推回病房。这叫“钱花了，罪受了，孩子还在肚子里”。事后我想，有经验的护士应该能看

出来，生产过程中像我这样食欲这么好的，肯定是生不出来的。

怀二宝的过程，比怀大宝“丰富”得多，住院就有两次，所以也认识了些不容易的妈妈们：高龄产妇A，从知道怀孕就在医院里保胎，丈夫为了孩子，辞掉工作，日夜守在病房，所幸，孩子平安出生，是个男孩；高龄产妇B，大排畸的时候就知孩子不好，抱着侥幸的心理一直等到七个月，孩子还是不好，引产，丈夫未到场；产妇C，孕晚期胎盘功能不好，被要求住院，挂了一个星期水，指标好了，出院，一个星期后复查，指标反复，又住院，抽血就花了8000块；产妇D，怀孕七个月，丈夫家暴，引起先兆早产，深夜在我们病房里家人差点打起来……和我同一天进医院的小E，疼了一天一夜，才开了三指，家属跟医生大吵，最后医院同意给她剖。我隔壁床的小F，在顺产之后，突然不会自己排尿了，护士怕她大出血，无奈插上尿管，她的肚子，还大得像怀孕三个月。

都说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是完整的，也许这句话是对的，为了做母亲，忍受诸多痛苦，忍忍，痛也就不痛了，从公主变成了女皇。“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生产，让女人被迫学会了坚强，而这一品质，可以撑起整个人生。

江苏无锡 宋纯





英国 | 阵亡将士纪念日

11月12日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英国各地都举行仪式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次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图为突击队现役和退役人员结伴前往苏格兰突击队纪念碑参加纪念活动。突击队纪念碑是英国最著名的战争纪念碑之一。



英国 | “躲猫猫”

(右图) 11月15日讯, 英国伦敦里士满公园内, 一只成年牡鹿从大树后面伸出脖子在树干上蹭痒, 被摄影师抓拍到这一幕。看上去它似乎在和人类玩躲猫猫。



德国 | 斑比奖

(左页上图) 11月16日, 德国一年一度的媒体和电视大奖“斑比奖”颁奖典礼在柏林举行。图为德国歌手海伦娜·菲舍尔在颁奖礼上演唱。“斑比奖”是德国最负盛名的媒体类大奖, 是由德国布尔达传媒集团每年颁发的媒体和电视奖项。通过媒体记者评选, 旨在表彰那些鼓舞、触动和感染德国观众的全世界各领域的杰出人物。

法国 | 新酒节

(左页下图) 11月15日是一年一度的博若莱新酒节。按照传统习俗, 人们在博若莱新酒发售前, 聚集在里昂沃土广场排队品尝第一桶博若莱新酒。博若莱新酒是用当年当季葡萄酿造, 每年11月第三个星期四全球同步上市销售。

美国 | 风暴

(右图) 11月15日讯(具体拍摄时间不详), 美国堪萨斯州斯塔福德附近的超级单体风暴。这张令人震惊的照片显示了超级单体风暴的威力。超级单体风暴包围了数英里广阔天空, 创造了大自然最令人敬畏的原始力量。这些超级单体风暴可持续长达10个小时, 并且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日本 | 选美

(下图) 11月14日, 第57届国际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在东京举行, 印尼佳丽凯文·莉莲娜艳压群芳夺冠。





保护投资者的诉讼试点

文 / 邢海洋

11月8日,兴业证券发出最后的召唤,召唤不到1%的尚未领取因欣泰电气造假退市获得赔付的投资人。一次保荐上市的过失,令兴业证券公司不仅名誉受损,也先行赔付了两个多亿。这也是证监会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引入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以来,业内首个先行赔付的案例。

赵薇因万家文化杠杆收购被证监会市场禁入、随之而来遭遇众多投资者索赔之时,《人民日报》发文,强调一切为了中小投资者。这其中包含着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即加强投资者权益救济。这其中又包含两种办法:一是通过积极探索先行赔付机制,在司法途径外,促成违法主体主动承认错误,弥补投资者损失;另一个则是开展支持诉讼试点,2016年首次通过投资者服务中心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免费法律服务,支持投资者提起诉讼。

这使人联想到A股市场虚假陈述第一案,东方电子旷日持久的索赔。自1997年上市至2001年8月间,明星上市公司东方电子,先后将内部职工股套现所获收益和炒股所获收益的15.95亿元用于虚增主营收入。股价因虚假业绩而飙升,一度高达60元,而随着业绩不济、案件披露,成千上万投资者被深度套牢。2005年A股市场最低迷时期,东方电子股价只有1.66元。2003年1月,因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东方电子原多位高管被判处有期徒刑。此前一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了法院可以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等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近7000名中小股民们从此走上了漫漫索赔路。历时7年,98%的股民与东方

电子大股东才陆续达成和解,获得了4亿多元的赔偿。

A股的历史中,面对上市公司欺诈,投资者大多数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就是因为官司打起来太难。不过近来随着监管持续重拳出击,涉案上市公司累计数量增多,由此衍生出来的中小投资者索赔诉讼案件也在增加。在监管部门加大力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国内投资者维权意识开始觉醒。今年8月,大智慧发布股民诉大智慧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第九次《民事判决书》公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令大智慧赔偿原告1名自然人投资差额损失52927元、佣金损失118.81元。据悉,这是自去年7月底启动诉讼索赔以来,股民取得的首份胜诉判决,意味着大智慧收到的上千份股民索赔案件,涉及的2.5亿元的索赔额有了依据。并且,由于受损股民大部分都在观望,本次胜诉判决之后,预计索赔人数和索赔金额还会急剧增加。

大智慧只是数十家被告中的一家,还有90多家上市公司因涉及虚假陈述立案调查而面临大批投资者的索赔诉讼。从每家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过去几十人、最多一两百人的索赔规模所涉及的金額只有几百万元、最多两三千万元,现在,索赔人数和规模都在不断被刷新。

在美国股市,当一家上市公司通过作假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时,很容易引起集体诉讼。不需要每个股民都告,只要有一人提出诉讼,只要告赢了,利益就归大家所有。这是律师们最爱打的官司,他们甚至怂恿投资者打官司,官司一旦打赢的话,和解费的30%左右归律师所有。因诉讼太多,还有人质疑集体诉讼被滥用。在中国,消费者民事案件中没有美国式的集团诉讼,也没有德国式的示范诉讼,也没有法国式的团体诉讼,但我们有代表人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的试行,极大地节省了诉讼当事人的成本,节省了国家的诉讼资源。

如果说兴业证券的先行赔付和大智慧的赔偿还只是证券市场内部的事件,那么千万万家文化的小股东向赵薇的索赔无疑将在更广更大范围内传播,成为中国股市走向法制的标志性事件。有了《人民日报》的正告,大佬大鳄们虚假陈述欺骗小股民前,恐怕得三思而行。☑

万家文化(后改名为祥源文化)股价走势图

(单位:元)



5大优势 汇聚这一瓶

美赞臣 配方液态奶



美国
原装进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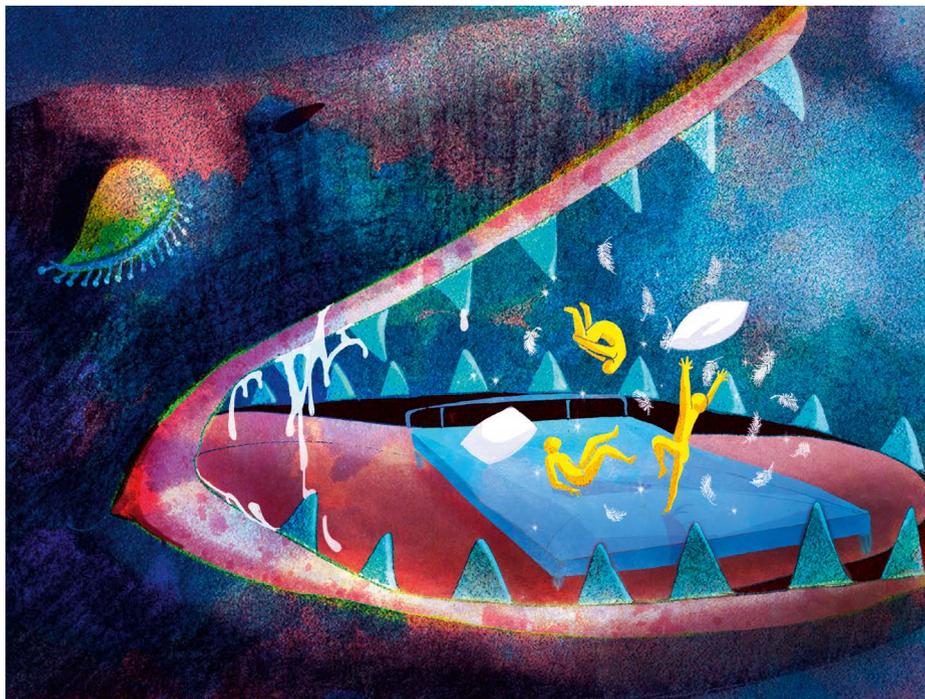
最小销售规格是盒（不供拆零单瓶销售）

- 01 每一滴都是精配营养
- 02 美国俄亥俄州纯净的水源
- 03 真空负压，灭菌锁鲜
- 04 无添加防腐剂
- 05 加个奶嘴，即开即饮

京东

美赞臣配方液态奶





栏目插图 | 范薇

末日未至

每个人都关心长达8年的市场扩张会否一朝崩盘。摩根史丹利认为，经济仍处于扩张阶段，周期接近尾声，在从扩张转入衰退前，美股仍有上涨空间。在每一类大类资产中，大摩找出了可以用来“预测”股市崩盘的“领先指标”，如美股中的小盘股、材料和工业股相对市场触顶；铜价触顶，或相对于金价触顶；澳元、加元、拉美地区货币、韩元触顶；信用利差触底，尤其是新兴市场信用利差等。在宏观指标中，可能预示美股表现恶化的信号有：非农就业人数触顶、个人收入或零售销售增速触顶和美国产能利用率及耐用品订单触顶等。

比特币避险

津巴布韦军方控制了国家电视台和机场，并“出于安全考虑控制了总统穆加贝”。当地比特币盘中大涨10%，触及1.3499万美元，几乎是国际价格的两倍。津巴布韦没有自己的货币，2009年恶性通胀使当地货币几乎一文不值。除了对政局的恐慌，该国对比特币的需求较为强劲。在比特币还不流行的时候，黄金是很多战乱地区的避险品种。

硅谷的担忧

美国税改或改变对股票期权征税的方式，这令初创公司担忧。股票期权当前在行权时被征税，或者能以固定价格出售。而参议院法案将对这些获得股票（期权）的雇员征税，甚至在这部分股票期权的潜在收益实现之前征税，雇员们可能只承担交税的义务而不能真正拥有股票利益。众议院共和党人的税收改革法案则只会在权票期权流动的时候对其征税，而不是在员工行使期权的时候。





基建画风突转

总投资规模高达 300 亿元的包头市轨道交通项目被叫停，呼和浩特的 3、4 号线地铁项目，以及呼和浩特到鄂尔多斯的高速公路项目也被叫停。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发改委，在审批地铁项目时，都更加关注金融风险，国内地铁建设正迎来大改变。地产繁荣之后，国家经济的另一动力转至基建。可对地铁项目的从严审批预示着基建拉动也将减速，让位于风险防范。

P2P：掠夺性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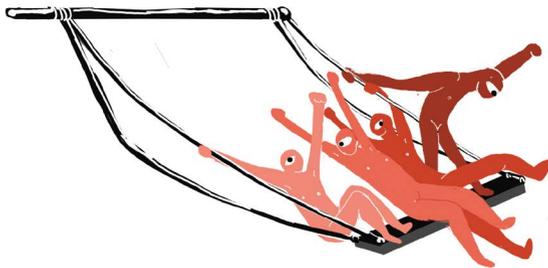
曾被认为促进了普惠金融的 P2P 贷款，如今被美联储拿来和 2007 年前夕的次贷市场类比。克利夫兰联储认为，贷款人可能在获取 P2P 贷款之前，就已经过度使用杠杆。掠夺性贷款以不了解信贷市场，且信用记录较低的购房者或借款者为目标，是具有误导性或欺诈性的。这种贷款商通常不考虑贷款者的信用记录，直接向少数群体的贷款申请人收取更高的利率。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外来移民以及老年群体是其主要目标。

三板破基点

11 月 13 日，三板做市指数下探到 999.18 点，2015 年 1 月引入做市指数后的投资人整体亏损。目前新三板上做市股票只有 1388 只，较年初已经减少了接近 300 只，很多做市股转为协议交易，还有部分做市企业由于寻求上市、并购而停牌，因此被剔除出做市指数成份股。企业在用脚投票，好的企业离开了，留下了质地差的企业。数千亿套死，券商公募私募逃离，中国版的纳斯达克因为资金枯竭近乎崩塌。

10 月之冲高回落

10 月经济数据呈现出整体回落趋势，“消费、投资与出口”三驾马车相继低迷。进出口总值 2.24 万亿元，增长 10.2%；贸易顺差 2544.7 亿元，收窄 20.3%。投资方面，2017 年 1~10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1.78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比 1~9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10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4241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0.0%，创 8 个月新低。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2%，比 9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点，且为今年以来次低。





不平等的起源

在对遍布欧亚大陆、北美和两河流域的 63 处新石器后期遗址的发掘数据进行系统分析后，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经济不平等的主题贯穿了从公元前 9000 年到公元 1500 年的漫长人类历史，而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一次又一次地导致社会急剧动荡乃至崩溃。研究者发现，在狩猎—采集社会中，虽然总体财富不多，但中位基尼系数却只有 0.17。随着农业的兴起和人类逐渐转向定居，一部分拥有牲畜的农民积累和转化财富的效率开始变得越来越高，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富者益富而贫者日穷，中位基尼系数也逐渐从 0.27 上升到 0.35，甚至在旧世界的某些地方达到 0.59 的峰值。

好消息



男女搭配，学着不累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了 20 多万名 15 岁的中学生后发现，在女生人数超过 60% 的班级中，男生的阅读成绩显著提高。发表于《学校效能与学校改进》上的论文指出，女生对好成绩的追求和更强的专注力有助于确保良好的学习环境，而男生的成绩受环境影响更大。



快乐牛养成记

养牛场中为牛称重或注射疫苗时要将其关入畜栏，而这对牛来说常常意味着惊恐不安。巴西塞尔唐济纽畜牧学研究所日前发现，去掉畜栏上的鲜艳颜色、避开水塘和阴影、降低噪声和不用牧犬及电棒帮忙，牛体内的压力激素水平会显著下降，而快乐的牛也会是更健康高产的牛。

坏消息



有其父必有其子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小组分析了 1.38 万个家庭的青少年成长数据后发现，那些童年时曾目睹父亲受抑郁症折磨的孩子，自己长到十三四岁时被青春期抑郁症困扰的风险更高。虽然通常认为母亲的精神状态对子女影响更大，但事实上，中年男性更易抑郁且较少寻求帮助。



迟没到好报

绝大多数鸟类奉行一夫一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头到老。德国马克思普朗克鸟类学研究所的研究者对 100 对蓝山雀进行了长达 8 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虽然保持老夫老妻的固定关系有众多优势，但如果雄鸟在交配期经常迟到的话，雌鸟会毫不犹豫地说不守时的伴侣说拜拜。

跟种族主义者和性别歧视者一样，年龄歧视者根据他们感知到的差别排斥他人。但是年龄歧视很独特，因为它针对的是年龄歧视者将成为其中的一员的一个群体。因此年龄歧视者侮辱的是未来的自己。

——《纽约客》谈年龄歧视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诗歌是这个世界未被公开承认的立法者。现在，这一身份落到了科技公司的身上，而且是更加未被承认，因为它们本身就希望不被承认。

——《每日电讯报》记者劳伦斯·多兹说，社交媒体是一个会让人上瘾的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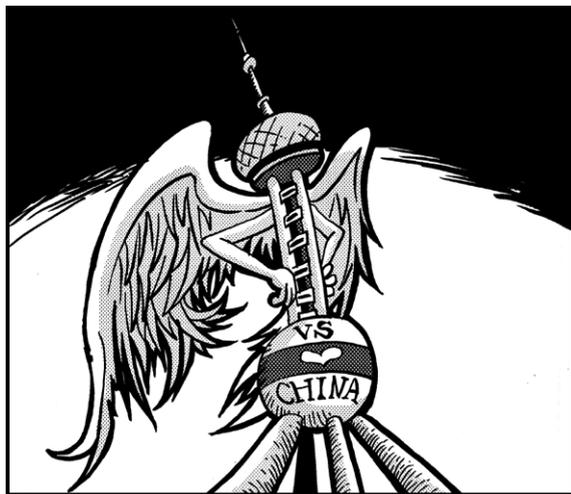
我们都喜欢抱怨生活节奏的加快，但这么做多数都是为了炫耀——快节奏的生活表明你很忙碌、很重要、很有价值。每当面临快与慢的选择时，我们都会选择更快的节奏——尽管我们总会保留发牢骚的权利。

——BBC 说，不断加快的工作节奏其实也可以带来一些好处

亚马逊新版电子书阅读器浸入两米深的清水后仍可使用。现在有了能应付浴室和沙滩的“口袋里的书店”，书虫们还会忠实于他们潮湿的平装书吗？

——《经济学人》纪念 Kindle 问世 10 周年

+/-
数字



(插图 山洋明)



任何一件事——一个评论、一次告别、一次邂逅、纸牌的一个有趣的阿拉伯图案——都能激起美感。诗人的使命是用寓言或者韵律反映这种亲切的情感。

——博尔赫斯，《夜晚的故事》

62
%

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有 1279 万澳大利亚人参与邮寄投票，其中约 62% 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在调查结果宣布之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承诺在圣诞节前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草案提交给议会表决。

800
公里

特斯拉汽车公司发布纯电动卡车，这款卡车充电一次可行驶约 800 公里，而且能以编队模式自动行驶，三辆特斯拉卡车组成车队行驶，每英里的总体运营成本能击败铁路。

8000
万美元

盖茨的卡斯凯德投资公司花费约 8000 万美元，在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带购买了约 100 平方公里土地，准备在那里打造一座智能城市，其设计以高速数字网络、自动驾驶汽车为中心，可容纳 8 万居民。

机器的陪伴

文 / 夏兰

图 / 谢驭飞



新一期《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说，人们喜欢把机器和电子产品拟人化。“现在有许多能够接受我们的语言指令的智能设备，起初是你的手机，然后是你的汽车，现在你可以命令你的各种家用电器。小孩子一般以为一切东西都是有感知能力的，或至少是会跟他们互动的。但即使没有那些会说话的各种电子助理，在一定的情况下，人们也会把日常物品拟人化。”

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时，我马上想到一位朋友，他们家原来有一辆普通轿车，后来换了一辆灰色越野车，就一直叫它“大灰”。这个爱称很直白——因为它是灰色的，它比他们原来那辆车大。还有人会把汽车的轮子称为它们的大脚，把发动机称为它们的心脏。但是给物品取名这种做法很普遍吗？真的有很多人给自己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取一个昵称吗？有一款笔记本电脑被称为“小黑”，一种笔身黄黑相间的圆珠笔被称为“小蜜蜂”，但这只是人们根据它们的外观而来的统称。我们倒是一直把门锁叫“铁将军”，但是谁会觉得闹钟像是叫你起床的人？对于它我们清楚地知道，是我们自己设置了它每天何时响、用什么样的声音响、响几次。

存在主义哲学里有一种说法：一个工具如果你用得很顺手，你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只有当它出问题的时候，你才会明确意识到它的存在，

比如笔写着写着突然开始漏水，车开着开着突然坏了。《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说，人们赋予一种物品人格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努力去弄懂它们。研究发现，四分之三的人会骂他们的电脑，电脑越容易出问题，他们越觉得电脑有它自己的信念和欲望。我倒觉得我们其实骂的是电脑软硬件的制造者。我的苹果手机这几天特别不好使，如果电池没电它自动关机，待充电再次开机之后，会收到许多一两百天前的新短信通知。因为短信通知不断，这期间手机干不了别的。我会骂手机吗？我会觉得这是手机想穿越到几个月前吗？我只会觉得这是编程的人没弄好，很长时间内还没人发现问题并加以纠正。

《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说，有时我们把物品看作人，是因为我们很孤独。一项实验发现，感到孤独的人更有可能认为各种电子产品有自由意志和意识。相应地，感到跟物品亲近能够减轻孤独感。当我们把物品人格化之后，就更难丢掉它们，这么做往往跟囤积的倾向有关。我觉得这么说也有些牵强，就电子产品而言，更新换代太快，你跟它再亲近，也无法长期持有，旧款的东西留着基本上没什么用。总之，好像给物品取名字不是什么好事，最好不要当着别人的面那么做——要么显得你很孤独，要么显得你幼稚，或者太把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对于物品，喜新厌旧并不为过。☑

善待你的身体

文 / 李春杰

图 / 谢驭飞



朋友，你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吧？其中一个桥段是说，康熙于弥留之际，将大位传与四阿哥胤禛，语重心长地留下话儿：“……善待你的兄弟，善待你的臣民。”

康熙大帝英明盖世，此时却百密一疏，少交代了一句“善待你的身体”。——结果是，工作狂人雍正爷戴着金丝镜、端坐龙案前，每天看上几十篇满汉奏章、写下数千字御笔朱批，生前辛苦身后名、日夜操劳十三年，驾崩了。

我知道，你和雍正爷差不多，戴近视镜、坐办公室，既看方块字，也读蝌蚪文，电子邮件每天收几十封、发几十封，而且参加工作也有些年头了，对不？想一想：这些年来，你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还加班熬夜成习惯，你的身体还“架”得住、确保不“崩”吗？你先别起急，听我三个小故事。

那一抹嫣红：日内瓦是个好地方，莱蒙湖湖光旖旎，萨勒山山色如娥。跳跃在湖光山色中的最美音符，是酷爱户外与健身的日内瓦人。20多年前第一次出国，就是来日内瓦。傍晚时分，一个人在湖边随便走走。走着走着，迷路了！这时迎面恰好过来一个跑步的金发少女，豆蔻年华，红衣热裤，玲珑纤秀。上前开练我蹩脚的法文，反复追问以求听懂；人家呢，是热情友好、耐心细致。然后？没有然后了，只有一个回头张望的小伙子，看着那一抹嫣红融入人群。

那一瞥眼神：日内瓦山多。工作之余，三五好友，一起登高望远，也是乐在其中。第一次去

爬萨勒山，从步履轻盈到两腿灌铅，从说说笑笑到气喘吁吁，一个半钟头后疲态渐露。路边一冷饮店，小老板正忙里忙外。大家贪凉买冰，顺口问：“到山顶还要多久？”小老板瞥了我们一眼，“Vingt minutes maximum”（顶多20分钟）。

好，胜利在望。45分钟后，这几个常年坐办公室的大老爷们儿一致认为：人家所谓的20分钟，是按当地人的平均体质算出来的。夕阳映红的归途上，再次路过冷饮店和它的小老板。臂肌健硕，古铜透亮。当时有没有赌口气我也举铁的冲动？

那一番宏论：刚到日内瓦时，买了一台博世的洗衣机。前些天我操作错误，它罢工了。打电话请负责售后的师傅来，稍微摆弄摆弄就修好了。开价160瑞郎。“拜托！这洗衣机也不过是499瑞郎买的好不好？”

“你最近看医生，花了多少钱？”

“干吗？这跟修洗衣机有关系吗？”

“你身体病了，花多少钱你都认了；你洗衣机坏了，160瑞郎你却嫌贵。你的洗衣机是带说明书的，但你没好好看；你的身体呢，也是一台电器啊，还不带说明书。所以我觉得，你在看医生上，花的钱肯定更多！”

时时留心，处处学问。此时有没有瞪大眼、为之一怔的触动？你所有的心动、冲动、触动，最好都能化作你的行动。你要学我，及时开悟、尽早举铁；你不要学我，时至今日还到湖边，追忆当年那抹嫣红。☑

千奇百怪的编辑们

文 / 欧阳宇诺

图 / 谢驭飞



我喜欢码字，因此结识了一些编辑。这些人千奇百怪、绝妙纷呈。有一位每天不跑5公里就绝不开工码字。还有一个写作之余在网店卖二手汽车配件。我给一家杂志投稿时结识了该刊的两位编辑。第一次投稿就被刊登了，我非常开心。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前往报摊，把那期杂志余下的十几本悉数买光。一周后，我又投了一篇稿子，在邮件中顺便对编辑表达了深切的感谢。编辑L很快就回复说，不如一起吃饭吧。

我让她挑选餐厅，她选了一家烤串店。这家店在一条小巷里面，生意异常火爆。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我们才得以入内。她不看菜单，先对服务员说，来一打啤酒，见我露出惊奇的神色，她改口说，要不先来半打吧。很快，6瓶啤酒被拿到桌上，每瓶500毫升。L吃得很少，但不停地喝酒。在酒精的作用下，她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话也多了起来。半打啤酒当然是不够的，中途我们又加了半打。我喝了一瓶，剩余的悉数被她吸收了。这顿饭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

此后我们常常约饭。每次我都让她挑选餐厅，她也毫不客气，但只选择烤串店或者火锅店。同时，每次吃得都不多，重点在于喝酒。并且每次只喝啤酒，数量在一打以上。L有一个宏伟的梦想：靠她负责的栏目的作者们吃遍全国。后来我发现那个栏目还有国外的投稿者，不知道她的梦想是不是可以

变成：靠着她负责的栏目的投稿者们，吃遍全世界。

后来我结婚生子、旅行、工作，写字频率变低，和她的饭局渐渐稀疏。但是对写作的热爱不曾改变。等我再次向L负责的栏目投稿时，她已经换了岗位了。接替她的是一位男编辑。我信心满满地投了两篇稿子，都被这位新编辑无情地拒绝了。他告诉我，单纯写自己的一些经历没人爱看，美国随笔作家E. B. 怀特说过：“随笔作者都是些自我放纵的人，天真地以为，他想的一切，围绕他发生的一切，都会引起大家的兴趣。只有天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才会如此旁若无人、锲而不舍地去写随笔。”

这位编辑只身住在郊区，没什么朋友，也很少进城。我问他每天待在家里会不会感觉抑郁。他说，会的。那如何缓解呢？他答，开滴滴和学英语。那时候他已经拉了十来单生意，说最奇葩的一次是，叫车的是邮局的工作人员，让他把几捆报刊送到一个小区门口——并没有人跟车。他问邮局工作人员，你们自己不是有车吗？对方答，装不下了。他很不解：如今邮局竟然如此财大气粗？难道他们不能多跑一趟？因为我平时用瑜伽和拳击缓解疲劳，我建议他找个教练去练拳击，有助于缓解忧郁。他说他没有运动细胞，前几天陪孩子玩蹦床，就把脚扭了。滴滴的生意估计得等脚伤好了才能继续。☑

哭泣的水平线

文 / 孙欣

图 / 谢驭飞



如果他是一个豆荚，已把自己哭裂。如果他是一根香肠，已把自己哭爆。如果他是一根香蕉，已把自己哭黑。如果他是一个橙子，已把自己哭出了汁。如果他是一个番茄，已把自己哭脱了皮。我家的宝宝两个月大时，我常常这样想。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他爸要把他放平换尿布而已。婴儿痛恨平躺，这个“生活小常识”，没当父母的时候不知道，当了父母以后每天都复习好几遍。抱在怀里的婴儿，明明安稳地合着眼，呼吸细细，睡得又熟又沉，把他慢慢往床上放，一点点从倾斜调节为水平，在小身子与床单还有一毫米距离，与水平线夹角小于0.5度时，婴儿准会“哇”的一声哭起来，犹如笨贼触到了防盗警铃。在家尚且如此，出门更加惨烈。伦敦的餐馆洗手间常常在楼下，狭窄逼仄。一次孩子他爸在男洗手间给他换尿布，我吃着面包条，听到宝宝的哭声自楼下升起，有如烟花。

新生儿的父母在无数个疲惫的白天和夜晚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人类的婴儿生出来如此弱小，不会抬头翻身，不认得自己的手脚，倒对自己的体位很敏感，一躺平就哭呢？可能在远古人类还处于狩猎采集阶段时，婴儿只能时时刻刻被父母带在身边，奔走劳碌。婴儿平躺，说明母亲把他/她暂时留在了什么地方。如果是人类聚居地还没有什么危险，如果是在远离安全地点的草丛中或树林深处，食肉动物很可能会发现

婴儿，把他/她叼走吃掉。婴儿静止平躺就会大哭，可能是为了引起母亲的注意，提醒她不要忘记自己的孩子。

要让婴儿安静入睡，新手父母很快会学到一字真经：“颠”。扛在肩上，抱在怀里，兜在肚皮上，上下左右颠啊颠，踏着迪斯科音乐的步伐更好。哪怕是电音震耳，锣鼓喧天，婴儿也能很快安静下来并入睡。可能因为婴儿出生以前一直待在妈妈肚子里，大多是头朝下，习惯了妈妈白天行走坐卧上下楼梯，在羊水里颠着，温暖又舒服。子宫也是个嘈杂的地方：妈妈的心脏咚咚，肠脏咕噜咕噜，大动脉哗啦哗啦，对婴儿来说都是白噪音。我家的宝宝出生以后，一直在Daft Punk的音乐中入睡，睡沉了才放进小床里，一夜到天明。还没有人开发出可以把新生儿头朝下挂在身上的婴儿背带，不知效果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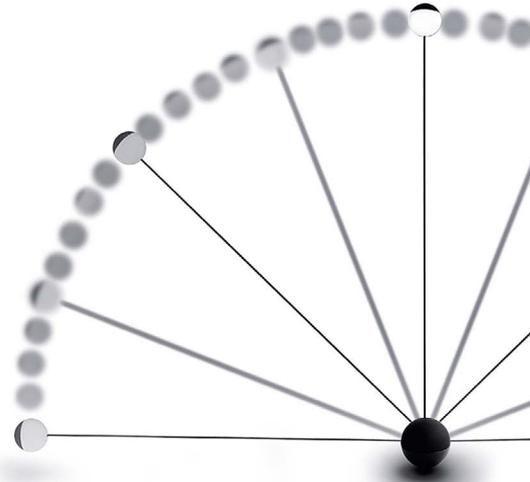
躺在婴儿推车里的婴儿常常是安静的，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移动，伴有轻微的颠簸。可是婴儿车一旦停下来，他们的双眼就会立即睁开，好像责备父母不够卖力。如果停下来的时间太久，熟悉的哭声就会再次开始。我家宝宝的爸爸总结道：“这就是婴儿版的《生死时速》。不想惊动各位亲爱的邻居吗？请保持匀速前进，奔向未来。”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咖啡拉花机

以色列科技公司睿谱推出的咖啡拉花机使用少量的天然咖啡萃取物即可将精美的图案或诗句打印在如奶泡咖啡、氮气咖啡、鸡尾酒等富含泡沫的饮品上。通过手机上传图片至睿谱花纹库，并对上传的图片进行剪切、缩放，添加滤镜和文字，仅需 14 秒就能将其呈现在饮品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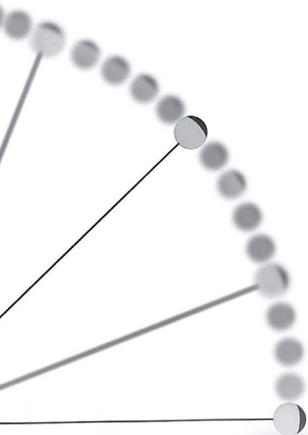
无线摇摆灯

墨尔本设计师 Nick Rennie 设计了一款无线落地灯 Sway，用一根灯杆连接两个球体，底部的球体被加重，可以防止其被推倒或者撞击时掉落。底座由极具分量的钢制成，灯头由硅胶制成，隐藏在灯罩内的 LED 由电池供电，当需要充电时，灯可以插入电源。用户只需轻敲灯杆或灯头即可开灯。



童趣设计

宝格丽高级珠宝系列 Festa 欢筵享宴用珉琅、碧玺、绿松石、珊瑚及碧玉材质来表达塔兰泰拉 (Tarantella) 狂欢活动的欢乐气息，戒指被设计成了开心果蛋糕、柠檬蛋糕或树莓蛋糕，还有由黄金、钻石与宝石制成的缤纷气球项链。



创口自动缝合器

AIM-SUTURE 是一款用于创口缝合的自动化机器，它的操作性质像订书机一样简单快捷，并且快速无痛，哪怕是一个对缝合完全不懂的人也能操作，适用于存在失血或开放伤口污染风险的紧急情况。AIM 装有红外线走线标识，当红外线标识对准创口的准确位置后，即可按下缝合按钮准确缝合。

杂志惠
zazhihui.net



旅行箱音箱

西班牙艺术家 Angel Muñoz 决定找回手提录音机的风潮，专门找来各种复古旅行箱，将其改造成音响。他的原件来自世界各地的跳蚤市场，之后根据每个旅行箱的特点为其装配各种电子元件。每一台都是纯手工制作，支持 3.5 毫米插孔和蓝牙音频输入，充一次电可以放音 12 个小时以上。

“猫王”纪念版腕表

汉米尔顿 Ventura 探险猫王 80 周年纪念版腕表，表壳沿袭了标志的三角盾形，平滑拉丝和抛光两种打磨工艺使外形更加流畅，镜面是一块大弧度切割的凸面蓝宝石，表盘设计为复古风格的拱形。在“第五届汉米尔顿幕后英雄盛典”上被赠予获得最具突破精神奖的新生代导演兼编剧曾国祥。



犀皮漆器

被大英博物馆列入永久收藏的上下品牌“犀皮漆天地盖盒”以黑檀木制胎，内含五副黑漆格盒，并配有红金菠萝漆盖和南红玛瑙手柄。盒盖里用金漆书写了东晋王羲之的书法《兰亭集序》集字联“临水知惠乐，因风骋列游”。



工业吊灯

It's about Romi 品牌“纳什维尔”吊灯是受工程技术启发而设计，铰接式的黑色金属灯臂令人联想起工业管道和机械部件，模块化的结构允许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改变灯臂的方向。



管子时钟

LEFF Amsterdam 的 Tube 石英钟采用特殊的制作方法，像是普通的时钟被拉伸了一样，作为外壳的铜金属通过挤压模具，形成一个长长的、不同寻常的管状。

艺术餐盘

Third Drawer Down 品牌与路易丝·布尔乔亚 (Louise Bourgeois) 基金会合作的四件套骨瓷餐盘，餐盘上的图案来自艺术家的织物书籍，主要是用旧衣服和家用织物创作的拼贴画。





印花双肩包

Prada 彩色印花双肩包采用品牌标志性的超薄尼龙面料 Tessuto Vela 制作，经典双肩包造型中加入多种色彩及印花图案，形成轻盈活泼的运动风格。

桌面收纳

Still Alive 品牌的桌面收纳用品使用了木头、玻璃、黄铜、陶瓷等多种材料，系列中包括铅笔盒、黄铜罐、放大镜、花瓶、水罐等，它们可以独立使用或者相互补充。



护身符项链

Franck Muller “护身符”系列 7 号项链，钻石和玫瑰金构成一个线条灵动的数字 7，如同书法一样，在细微的笔画处改变着钻石大小和排列行数。



微绘蓝孔雀

BOVET 1822 蓝孔雀 Amadeo Fleurier 39 腕表在表圈及表耳上镶嵌 94 颗钻石，18K 红金表盘上用大明火珐琅微绘出精美的孔雀图案。在希腊神话中，孔雀是女神赫拉的象征。

(西南联大博物馆供图)



在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中，联大有数百名同学投身军旅，图为1944年，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同学



南渡的星辰

西南联大八十周年

文 / 刘怡

这是一所八十年前成立于战火中的大学，它仅存在了八年，但承载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人的光荣与梦想。

在今天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块外形和质地完全一致的圆拱形纪念碑：高5米，宽2.7米，正面碑文1178字，背面刻录着834个姓名。碑文最初的起草、书写和篆刻者，曾是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字：冯友兰，罗庸，闻一多。而在1937到1945年整整八年的岁月里，他们和纪念碑背面那834个最终投笔从戎的年轻人一样，都属于同一所学校：西南联合大学。

这不是一次心甘情愿的内迁。当侵华日军在1937年夏天鲸吞华北，使得平静的书桌再无可立之地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数千名师生开始了他们的长征：先赴长沙，再转昆明，历经大半年时间，最终在西南一隅站住脚跟。与此同时，来自近百所其他高校的师生也从东北、华南和华中出发，辗转抵达大后方。

这不仅是一次空间意义上的迁徙，也是战时中国知识人为了保全学术独立、自由品格和整个民族知识的火种，毅然实施的一场精神自救。从日军铁蹄下转移出来的，不仅有看得见的师生、书籍和仪器，还有关于中华文明不坠、“南渡衣冠”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信念，以及抵抗者终将胜利“北归”的信心。那些不着戎装、以笔为矛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进行着他们的抗战，其意义不亚于对领土的光复。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8年底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战前中国100余所高校中，有2/3以上被迫走上流亡之路；西南联大的八年办学历程，正是这段集体记忆的缩影和折射。在空袭之下坚持进行学习和研究的一代师生，灿若星辰，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些师生共同造就了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华彩篇章。

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在1941年撰写的专文《学术与政治》中写道：“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

本期封面图片说明：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四校领导合影。左起：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西南联大：国难当头，知识分子的选择

记者 / 吴丽玮



南湖是联大师生在云南蒙自办学时常去散步的地方，这里让很多人联想起故都北平



(黄宇 摄)

战火中的西南联大作为中国高校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也在时代背景下见证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选择。

西迁昆明

1938年4月，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院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走到了继续西迁的最后一程。

为了躲避战火，挽救教育，国民政府决定内迁各校，三所高校的学生定于1937年10月赴长沙报到，但仅仅一个学期之后，长沙也开始面临战争的威胁，1938年1月，继续西迁的工作列入日程。经过65天3500里的长途跋涉，三所高校部分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终于抵达昆明，他们从昆明城东南的迤西会馆出发，经过市中心的金碧路。这条路当时是广东人和越南人的居住区和贸易区，路上有昆明标志性的“金马”“碧鸡”两大牌坊，相传每60年，碧鸡坊的影子与金马坊的影子会交汇在一起，那分别是太阳和月亮的光影。

如今这里仍是昆明的地标建筑，以复建的两大牌坊为核心，形成了以市民广场为中心的步行购物场所。而在它南侧的巷子里，则掩映着蔡锷将军的故居，这位曾在昆明发动起义，推动民主共和进程的云南都督，开办了云南全省工钱局，次年改名为富滇银行，位置就在金马碧鸡广场的北侧。富滇银行在龙云执政期间，依靠发行滇币的优越地位，一直扮演着云南地方央行的角色，是地方军阀统治云南的重要金融工具。地方经济的稳定也成为西南联大做出西迁选择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当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搬迁的消息公布后，很多地方都表示了欢迎，广西政府邀请临时大学去桂林或者其他城市，但经济系教授秦瓚主张迁往昆明，他了解云南，父亲秦树声在清末时担任过云南学台，秦瓚曾随父前往，而且在当地有很多父亲的关系可以利用。临大常委采纳了秦瓚的建议，1938年1月任命他为先遣队长，与迁校筹备委员杨石先、王明



1



2



3

之赴昆明探勘。秦瓚到昆后，他的关系果然起了很大作用，不仅教育厅长龚自知极为支持，云南省主席龙云也表示甚为欢迎。

但迁滇的决定在校园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闻一多曾回忆说：“同学中一部分觉得应该有一种有别于平时的战时教育，包括打靶、下乡宣传之类。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长沙临时大学围绕是否迁滇的争论，不仅是战事爆发以来学校关于如何对待战争的第一次大讨论，也是当时教育界关于怎样投身抗战讨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这一时期的舆论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都发表了许多不同意见。”闻一多的孙子，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闻黎明向本刊分析道。

截然对立的意见并没有动摇长沙临时大学的搬迁决心。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曾阐述迁校的初衷，选择云南“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分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选择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到”。

滇越铁路这条在当年对云南异常重要的铁路线，它进入云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这个小站距离联大文法学院上过一学期课的小城蒙自约有半小时车程，从越南境内西迁过来的联大师生，就是从碧色寨下车，再换上从开远到昆明的列车而到达目的地。地方政府有意将碧色寨车站打造成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时，当地村民正在复建站台和铁道两



4

1. 位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旧址
2. 昆明师范大学教授余斌
3. 位于蒙自的联大文学院女生宿舍旧址



5

4. 昆明市内保留了少量老房子
5. 滇越铁路进入云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联大师生当年就是从碧色寨下车，再换上从开远到昆明的列车而到达目的地

侧的民房，在墙面上刷着法式风情的淡黄色油漆。一个来自法国的考察旅游产品项目的团队在导游的带领下正在站台里参观“云端上的铁路”老照片展。这些照片拍摄于1903～1908年，拍摄者是当时参与修筑铁路的法国会计师乔治·奥古斯特·玛尔伯特，图片里展示了当年沿着陡峭的山崖修建铁路的不易。而在已经修缮完整的宽铁轨旁，还有几段尺寸较小的窄铁轨残段，法国团队的导游对此并没有做什么介绍，但这两轨间距仅为600毫米的“个碧石铁路”其实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是当年在蔡锷的批示下，由个旧锡矿商人集资修建的一条铁路，目的是为了抵制法国人对个旧的锡矿资源掠夺，用一种小尺寸的铁轨将个旧的矿藏经碧色寨直接运往石屏。尽管这条铁路已废止多年，但这段历史仍旧闪耀着云南人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决心。

临大决定西迁时，蒋梦麟为了说服同学，特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陈诚在演讲中说道，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但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这种表态多少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况且继续学习与投入抗战并不矛盾，只是救国的方式不同，有些同学“听某一人说话以后，觉着救国对，然而当与另一个人辩论以后，

立刻改变了主见，于是觉得读书对了”。

但搬迁的过程异常艰难。从长沙临大赴滇路线有三种：一是从湖南途经贵州到云南的步行路线；二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至昆明；第三条路线是沿刚刚竣工通车的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至河内，同样沿滇越铁路从越南到达昆明。在这三条路线中，最值得纪念的是湘黔滇旅行团的3500里长途跋涉。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大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道：“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可见，即使在当时，这段湘黔滇长征已令世人钦佩不已，而作为保存国粹、延续文脉的文化大迁移中的一部分，它的意义更自不必言。

最开始大家把步行入滇的队伍称作“步行团”，在1938年2月长沙临大发出的步行路线报告里，第一次将队伍命名为“湘黔滇旅行团”，为这趟艰难的冒险之旅增添了一些轻松的色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的路线共分成七段：从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船；芷江至晃县，65公里，步行；晃县至贵阳，390公里，汽车；永宁至平彝，

232公里，汽车；平彝至昆明，273公里，步行。原先彼此互问的“去昆明乎”迅速变成了“步行乎，海道乎”，甚至有三位首次体检未能通过的学生，在坚持要求复查后，才得以进入湘黔滇旅行团的队伍。

政府指派50岁的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还有11位自愿加入的教师：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通、助教李嘉言，生物系教授李继桐、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学校请闻一多、李继桐、曾昭抡、袁复礼组成旅行团辅导团，由黄钰生教授担任辅导团主席，这些教师中，除黄钰生途中因公几次离开外，其余皆步行到昆明。

在旅行团成员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沿途的惊险，除了大自然的震慑，还有来自草莽的威胁。旅行团进入湘西山区时，传言土匪猖狂，“公路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左右前后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云雾吞没，加上丛丛密密的树林，给人一种强人随时可能出没的感觉”。

联大学生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一文中回忆：“把铺盖摊好睁着朦胧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逼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而出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旅行团始终没有与土匪正面接触过，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先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大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请求放行。

战时环境下的思考，给教育界的“小长征”增添了不寻常的意义。抗战爆发后，从前线和东南地区避居内地的人成千上万，西南地区已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腹地，认识西南、开发西南，已是坚持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团员们深思着，西南地区虽然“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将来开发，前途远大”，却也“高山峻岭，急川涌流，只利于自守，而不宜于向外方发展”。一些团员不由心情沉重，国家已经失去江浙、华北及沿海地区，若只是固守西南“而不思收回失地，则生命上所受的威胁，便无解脱”，“蜀汉的往事，可引以为鉴”。

向长清写道：“三千多里走完了，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罌粟花，

(庄灵摄/新华社供图)



约1938年，故宫博物院第三批南迁文物在川陕公路运输途中



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他颇有感触地说，对于抗战而言，边远地区还远远没有动员起来。“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者！乡村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联大师生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这次长途跋涉中得到了升华，正如团员马伯煌所说：“在西南联大的精神结构中，也有徒步 3500 里的因素在内。”

1938 年 4 月 9 日，距旅行团第一次长沙码头集合恰好两个月，成员们终于抵达通往云南的关口。这时距离昆明还有 100 多公里，在开始最后一段旅程之前，旅行团于早上 8 点集会。黄钰生教授报告了学校的最新消息：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为了能给迎接他们的师长、同学及昆明市民一个好印象，所有人换上干净整齐的衣服。



（张中敏）

行至金碧广场时，学生们不禁感慨起来：“走到城中心区，抬头一看，金碧辉煌地立着‘碧鸡’‘金马’两座大牌，不禁使我忆及那已沦陷的可爱的古城——北平！太太小姐公子哥儿们，大家也想想北平是怎样丢的呵！”接着，丝绸横幅展开，上面写着“欢迎湘黔滇旅行团”几个大字，从其他路线来到昆明的师生们，唱起了语言学家赵元任谱写的歌曲：“It’s a long way to Lianhe Daxue. It’s a long way to go.”队伍穿过昆明城到达北侧的圆通公园，黄师岳将军对梅贻琦说：“我在长沙从你手里带走了 200 多人，现在我把他们还给你。根据名单，所有人都在这里。”

三校合作与教授治校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围绕着一些保存下来的遗迹，云南师范大学建起了一座西南联大博物馆。当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匾额和西南联大纪念碑留存了下来，另有一间由梁思成和林徽因设计的铁皮屋顶教室也加固完好。除了位于室内的西南联大校史展览外，庭院的深处矗立着李公朴、闻一多的衣冠冢，以及“一二·一”运动四烈士墓，代表了西南联大最悲壮的一面。

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告诉本刊，现在每年参观的游客超过 17 万人，除了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文化机构和高校外，港澳台地区及海外游客的数量也占了相当的比重。“当年西南联大去台湾的有 300 多人，这些人成为了台湾当时的核心教育支柱，西南联大在台湾的影响力非常大。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来参观博物馆的游客普遍都有种‘朝圣’的心理，西南联大是一座丰碑。即便是我这里的讲解员也觉得这份工作特别光荣，我们在每年的新生里都会招募志愿讲解员，他们的培训时间是三个月，之后经过考核才能上岗，同学们都非常踊跃。”

给我讲解的女孩是 9 月份刚入学的“大一”学生。走进铁皮屋顶教室里，她为我介绍墙上挂着的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罗庸作词，张清常谱曲。“我给你唱一遍吧。”她自告奋勇，“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青涩的嗓音在教室上空回响。

抗战期间，迁走合并的高校有很多，但只有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坚持了下来，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三位校长能够精诚合作。

最开始，三校合作并不是一拍即合的。担任过西南联大外语系系主任的叶公超回忆说，当年他到了长沙以后，才知道蒋梦麟先生仍在杭州。蒋回来以后，叶公超问他南开和清华的两位校长什么时候来，蒋梦麟并不乐观。“不过他说，假使他们两位不来，我们也要把大学办起来。那时候的情况很微妙。北大一向是穷惯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规模，只要有教员、有学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课。清华是有家当的学校，享受惯了‘水木清华’的幽静与安定。南开好像脱离了天津的地气，就得不到别的露润似的，总觉得政府要在后方办大学而要他们来参加，他们当然不能够把家当挖出来。清华有稳定的基金，但是恪于条文不能随时动用。”当时蒋梦麟和叶公超以及清华、南开的几个教授在一起，没事的时候聊天，大家总要打听张伯苓先生的消息，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到长沙来，梅贻琦也迟迟没有确实的消息。当时有人主张蒋梦麟回南京一次，甚至说，假使张、梅两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梦麟当时的反应很见他的性格：“你们这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我们多等几天没有关系。”后来张伯苓、梅贻琦两位校长都到了昆明，联大时期总的来说合作是很成功的。

叶公超说：“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1915年，梅贻琦从美国留学回来，到清华任教。20年代初，清华早期的留美学生陆续回到母校教书，他们回校后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号召“反对由少数行政寡头治校”。因此，1926年清华大学教务长改由教授会推荐，梅贻琦由教授会选出兼任教务长一职。1928年他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这一年国民政府推翻了北京政府，校名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由教育部长李书华推荐，1931年12月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左图：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刘宇

右图：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

此前一段时间，随着时局的变化，清华大学校长一度更换频繁，梅贻琦临危受命，至1948年底，其间包括长沙临大在内的联大九年。

“联大时期是梅贻琦治校实践中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其教育方针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中显现成效的时期。”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刘宇告诉本刊记者。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曾就《梅贻琦日记（1941～1946）》指出：“今天我们研究这本日记，很希望知道当时针对那些困难的局面是怎样考虑的，最后怎样做出决定。这方面，可惜他留给我们的太少了。……这本日记包括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也是先父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从日记里可以看出当时国家的形势和学校事务对他精神上的重大压力。”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出任校长后，先后从全国罗致了数十位有才识的教授，他认为“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项关联的。”

梅贻琦尊重教授，在校内树立了教授的威信。“他在校务会议、评议会和教授开会讨论问题被问及校长意见时，常常说‘吾从众’，以尊重教授发表各自意见。”刘宇说，“他将自己在校内的位置比喻成

京剧中的‘王帽’一角，表面上看着很好看，但实际上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教授群体。”对于此，朱自清在联大时期发表的《清华的民主制度》一文中写道，大学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的话”，“梅贻琦校长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陈岱孙也曾回忆说，“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和“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这两件对清华大学迅速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事，都和梅先生的伟识、宏量分不开”。

“清华大学1925年在原有的留美预备学校里设立大学部，1928年正式建立清华大学，只用了十年时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已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可以从它的成功中找出许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它在开始时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告诉本刊记者，“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账。西南联大时期，陈序经先生一度做过法商学院院长，这位当年挑起全盘西化论战的学者，身上有股浓郁的西方知识分子气质。他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学校里或社会上从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对政治上的是非他心里非常清楚。1941年前后，国民党想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淡淡一笑，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后来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而且当时许多教授也是这么做的，也有一些教授入了国民党，但多数教授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以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那时的联大不能说完全实现了大学独立，但作为一种理念，在西南联大里是扎下了根的。”

1940年，教育部颁布训令，要求全国高校统一科目、统一教材，这激起了联大教授的不满。联大召开校务会议，由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商定抵制策略。会议通过了一份文件，由冯友兰撰写，既义正言辞又文辞雅驯。“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又言，教育部乃行政机关，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作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

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这份函文经梅贻琦审阅后抄呈教育部，教育部无可奈何，只好默认联大对相关训令可以变通执行，此事不了了之。

同时，梅贻琦性格温和，在三校教授云集的西南联大也化解了不少矛盾。“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的好，或我看如果那样办，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郑天挺曾在文章里这样回忆梅贻琦。

抗战与文脉

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主要是靠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的。抗战前的中国学术精英，在战争爆发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里，30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

“从三位校长的年龄上看，他们基本上是19世纪末出生的人，大致比北大、清华、南开初创的时间早15年左右，这决定了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传统的，而大学教育则是现代的。”谢泳说，“从清华1909年首次制度性派学生赴美国留学到抗战爆发，30年代前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回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比较适合他们生存，这批人除少数在政府做官外，绝大多数成为大学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恰好是由30年代前完成中西方两面教育的三代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于19世纪末的一批人，以陈寅恪、傅斯年、刘文典、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为代表；第二代人是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如王力、唐兰、浦江清、钱端升、叶公超等；第三代则是1910年前后出生的钱钟书、费孝通、吴晗等人。“这三代学人的共同特点是在抗战前基本完成了学者的准备阶段，开始迎来自己学术上的丰收期。他们的年龄结构恰好是50岁、40岁、30岁，这个结构是学术繁荣的最佳梯队结构，可以使三代学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形成互补。

“以1909～1929年清华留美学生为例，在这期间几乎每一年度都有人成为西南联大教授，而且



蒙自分校后面的老街

人数越往后越多。通过以上观察，我们大致可以说，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抗战前中国第一流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主要都集中在西南联大。”谢泳说。

而在战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西南联大的一些纯学术研究也自觉地增添了现实需要的内容。

为冯友兰带来极高荣誉的《贞元六书》动笔于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一直到蒙自后，才终于完成了《新理学》一书。在颠沛流离中他不断思考民族兴亡与历史变迁。“抗战时期，本来是中、日两国的民族斗争占首要地位，这就更加强了我的民族观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国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能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

与国防关系密切的学科，在抗战中受到格外重视。曾昭抡在抗战期间撰写了大量军事科普文章和读物，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各种武器，目

的就是为了普及军事知识，唤醒民众武装抵抗意识。1938年秋季，西南联大成立了航空工程学系，其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实验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而它的航空风洞实验更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

西南联大师生把支援抗战作为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抗战戏剧演出是联大师生文人抗战的一个重要方面。

“皖南事变”发生之前是联大话剧演出氛围最浓厚的时期。1938年10月，云南省抗敌后援会发起为前方将士征募棉衣运动，省政府也决议募集棉衣20万件。15日《云南日报》刊登启事：“目前第三期抗战，已入重要阶段，我前方将士，为保卫大武汉，正用血肉与敌人搏斗，而我三迤健儿，亦已磨砺准备加入前线，惟因冬令将届，气候渐寒，单衣蔽体，实难抵御。”启事说，“近接前方部队来函，委托代为发起捐募寒衣，为此特号召‘后方民众，本爱乡爱国之精神，抱与前方战士痛痒相关之心，慷慨捐助’。当时正是‘九二八’日本对昆明实施第

一次大轰炸后不久，昆明民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响应省府号召，支援在前线与日寇鏖战的滇军子弟。西南联大一些同学和教师联合起来，于1939年春排演四幕话剧《祖国》，以演出收入作为捐款。

这出话剧是外语系年轻教授陈铨根据国外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而成，剧情描写的是：“北平爱国男儿秘密从事抗日救国工作，不屈地与日寇及傀儡斗争，唯因有迷恋爱情之荒淫少妇泄露机密，致使收复北平之伟业未成。”话剧围绕着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男青年刘亚明如何摆脱美丽姑娘佩玉给他的爱情羁绊来展开。注重文艺效果的陈铨，没有把故事结局写成胜利，而是有意表现“光荣的牺牲和光荣的失败”，但这种“严肃悲壮的氛围”，并没有“减低它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1939年2月18日，《祖国》在光华街云瑞中学礼堂首次公演。首演当天，联大剧团发表《敬谢赞助本团的人们》，向孙毓棠、闻一多两位教授表示感谢。孙毓棠担任舞台监督，在他的邀请下，他的妻子凤子担任了剧中佩玉一角；在繁重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的闻一多则全权负责舞台设计，这令剧组和观众们都非常感动。

《祖国》的上演引起了相当轰动。每晚不到7点，所有坐票就全部售完，甚至有些观众要求买站票观看，但出于安全考虑，剧团对此没有破例。原本定于22日结束的演出，在观众的不断要求下决定加演三天，一时，《祖国》成为当时昆明人民热议的话题。

“昆明远离前线，天长日久，疲惫的人们不免存在着某种与战时气氛不很协调的现象。”闻黎明说，《祖国》的剧情，便带有对这种现象的批判性质。正如一位观众在评论中所说：“在前线或邻近的后方，敌人的炸弹，正是我们的宣传品；可是在这距离前线远远的安适后方，除了一些书报外，很少有什么去刺激在做着甜梦的人们，并且有部分的设施直接间接地减少入梦的困难和推动着入梦的波浪！”而这个时候的《祖国》，“适应着客观的需要而产生了”，“它要深深地刺激着安乐里的人们，并且指示出一条光明的大道”。《祖国》成功之后，“联大话剧团”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后来常常下乡宣传，相继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等著名抗战救亡独幕剧。

更直接的是投入到抗战的最前线去。西南联大博物馆里矗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联大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这座纪念碑的背面，刻着832位从军学生的名单。回溯西南联大短短八九年的历史，竟相

继掀起过四次从军热潮：从抗战初期的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41～1942年为了配合美国空军来华作战及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甸对日作战时期；1943～1944年印缅战区盟军反攻时期；1944年底响应国民政府号召组织知识青年从军时期。

云南生活苦与乐

抗战前，教授们在北平的生活相当优越。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的脚步来到昆明，之后除了上大学几乎再没离开，但他仍对北平的老宅记忆犹新。“父亲买了北池子大街的一幢两进的四合院，除了家人，佣人、厨师、司机等等加起来有七八个，家里还有黄包车和汽车，那时父亲的工资每月有800块。”

“根据日本资料，日本早在侵华以前就对中国的水文地貌以及各种社会动向进行过深入调查，他们对北京知名学府的教授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不太相信生活条件这么优越的人，会愿意选择到云南这样的边陲地区去过清苦的日子。”刘宇说。刘平章回忆，周作人曾多次向刘文典发出留在北京的邀请，均遭拒绝，于是日本宪兵上门搜家，“把一家人赶到客厅里，宪兵去后院里搜，并没有搜到什么，最后也对我们一家很客气。这件事之后，父亲通过蔡元培的帮忙，搭上了南下的火车”。

长沙联大迁昆明后，校舍一时未及建盖，只能租借大西门一带的昆华农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校和昆华中学的部分校舍以及拓东路的迤西会馆和全蜀会馆来用，但仍不够，只好将文、法两学院暂迁滇南的蒙自上课一学期。

陈寅恪是孤身一人从香港转道滇越铁路抵达云南的，他的夫人患心脏病，和子女们留在了香港。陈寅恪赴滇途中损失了很多藏书，先是寄存在长沙亲戚家的书被大火烧光，走滇越铁路时又被窃书两箱，里面装的多是他自己的中文古籍批注本、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等。1938年春抵达蒙自后不久，他又染上了疟疾。半年后随联大法学院迁回昆明时，右眼视网膜已脱落，仅剩左眼视力。

陈寅恪在昆明的时间为抗战前期，当时日本飞机频繁轰炸昆明。他视力不好，又多病，家人不在身边，跑警报都成问题。他当时和傅斯年住在靛花巷3号，楼高三层，傅斯年住一层，陈寅恪因为有午睡和早觉的习惯，为了图清净住在三层。警报一响，大家都争着往圆通山脚下的防空洞里跑，傅斯年怕

陈寅恪睡着了听不见警报，或者因为视力不好下楼危险，每次都要上三层搀扶着陈寅恪一起跑防空洞。教授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昆明师范大学教授余斌对西南联大师生在云南的生活情况进行过深入研究，他告诉本刊：“抗战的头两三年，云南物价还是比较平稳的，加之‘外省人’用的是中央法币，而新滇币和中央法币的比值为10：1，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回忆说，用法币计算，当时一角钱可以买100个鸡蛋，很占便宜，所以联大师生在云南的头两三年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但随着日本敌机对昆明轰炸日益加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日子也难过了，大家为了养家，都得找门路创收。”

人们熟知的有闻一多刻图章养家糊口，以及几位教授夫人卖自己制作的定胜糕贴补家用的故事。更普遍的是教授去大学或中学兼课或当家教，也有政治系教授开律师事务所的，或者中文系教授为人撰寿辞、墓铭，也有教授在房前屋后种瓜种菜改善生活的。

叶公超当时住在昆师宿舍后面的孝园里，那里是金家祠堂所在地，叶住的是祠堂的享堂。1939年他的家眷从香港来到昆明后，他的夫人开始在花园里种菜。吴宓当时在叶家搭伙，他在日记中记录，曾“在超园中盘桓，看二水牛耕园地”，足以想见花园之大。孝园的位置在现在昆明学院昆师路校区内，余斌通过现存的一张《叶公超花园》照片找到了早已湮没在岁月里的教授旧宅，祠堂整体格局早已不在，在曾经阔大的需要两头水牛耕种的花园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建起了教师宿舍楼，中央唯独留下了叶公超曾住的享堂。余斌说，享堂后来被用作昆明师专离退休工作处的办公室，原本的平层中间隔出一层，又分出若干间，变成了一座二层小楼。

不过，云南舒适的自然环境还是给了联大师生不小的安慰，令他们回忆起在北平的岁月。在昆明时，翠湖就在学校附近，陈寅恪和吴宓常去湖边散步。“照影桥边住小车，新妆依约想京华。”陈寅恪在湖边发出对故乡的思念。文法学院在蒙自时期，陈寅恪看到哥胥士洋行旁边的南湖，也不禁吟出“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诗句。教授浦薛凤在文章里写出刚去蒙自时的印象：“初到时，南湖里段涸干见底，及雨水充满，景致益佳。沿湖右望，石桥方亭，长堤满树，又具些微什刹海光景。此盖因吾侪流亡者念念不忘最美丽之旧都至可爱之清华，故触景生情，动辄联想动辄比拟，正如李青莲诗中‘华阳青树似新丰，行人新都若旧宫；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云云也。”

蒙自当年在市区里种着很多高耸的桉树，联大学生周定一回忆说：“桉树的叶子修长而中部稍宽，老了就变成红色，可选做书签，在上面题字，还寄给远方友人。”如今因为城市改造，市区里已难觅桉树的身影，但联大师生的教室和住所却较昆明保存得更为完好。在南湖的南北两侧，分别是男生和单身教师居住的哥胥士洋行和用作教室的法国海关、领事馆等等，哥胥士洋行仍刷法国黄色漆，其中一部分改造成了蒙自分校博物馆。闻一多当年因为读书不肯下楼和师生们一起参加课外活动，被郑天挺劝说，“何妨一下楼？”于是他住过的房间现在挂上了“一下楼”的牌匾。

在联大师生到来之前，蒙自相当封闭。那些从香港转道过来的女学生衣着时髦，走在大街上非常



(黄宇摄)

刘平章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刘文典的脚步来到昆明，之后除了上大学几乎再没离开

引人瞩目，甚至有苗族妇女掀起女学生的裙裾，想看看她下面是不是穿了裤子。联大到来时，发现当地苍蝇非常多，于是联大联合当地驻军和其他部门，掀起了一场灭蝇运动，给每人发一个苍蝇拍，到苍蝇最多的饭馆、菜场、豆腐作坊等地去打苍蝇。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还给当地老百姓办了夜校，不但学文化，也讲时事，宣传抗日，教唱抗日歌曲。

哥胥士洋行背后的小街上居然还能找到当年在师生回忆录里提及的那家越南咖啡馆。周一写道：“咖啡豆现炒脆现碾碎后，放入双层金属杯的上层，用开水一冲，沥到下层。这种咖啡味浓香烈，而且可以一冲再冲，我们总要喝到一点咖啡味都没有了才算完。店里还有颇为精致的洋点心，成瓶的啤酒，但吃得起的人不多，现做的西红柿鸡蛋饼，物美价廉，倒也实惠。”这家小门脸仍旧是当年浅绿色的墙漆，里面住着的老人就是当年店主的女儿，她不愿多言，只是指指牌位上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照片，当年随着滇越铁路的开通，他们一家从中越边境迁到蒙自开咖啡店。这所房子在1949年后被国家收回，后来又把其中一半归还给了他们。

整体上来说，在云南求学基本免除了战争的侵扰。最大的威胁便是跑警报，对此汪曾祺曾有过非常有趣的回忆：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授课内容烂熟于心，每次下课讲到哪算哪，下次上课前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的笔记记得非常详细，有一次课前他照例发问，女同学打开笔记本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由此可见当时昆明警报之多。

“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作‘跑警报’。‘跑’和‘警报’连在一起，构成一个语词，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这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在汪曾祺的笔下，习以为常之后，跑警报便成了一件轻松有趣的事。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的蓝

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丁丁糖’即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刀形的铁片楔入糖边，然后用一个小小铁锤，一击铁片，丁的一声，一块糖就震裂下来了——所以叫做‘丁丁糖’，其次是炒松子。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饱，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鳞瓣，一颗一颗地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一嗑就开了！”

刘平章也向本刊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站在街上看昆明市的制高点五华山顶发出的信号灯，“五华山顶的水塔上挂了红灯笼，说明今天有预行警报”，赶紧跑回家通报，全家一起躲到郊外去。“有一次有颗炸弹投下来，强大的气流把屋顶都掀了，瓦全落在了床上。”刘文典像很多教授一样，选择搬离了市区，他们家住到了官渡，在那待了五年。

官渡驻扎着国民党一个炮兵团，有三个联大学生在炮兵团服务。“周末的时候那三个学生就开着炮兵团的吉普车带我们到处去玩。他们身上装着两种信件，一种是中文的，一种是英文的。见到中国人就拿英文信，见到外国人就拿中文信，反正对方都看不懂，通通都会放行。”联大学生在炮兵团的任务是为美国教官做翻译，当时还是孩子的刘平章对一个50多岁的美国教官印象极深：“他很喜欢唱歌逗小孩子玩，每次开车经过时，我们都翘起大拇指喊：‘老美顶好！老美顶好！’他就伸出手来撒一把糖给我们。”在刘平章的印象里，美国人非常友善。有一次有座楼失火了，一个中年人被困在二楼，“那个人无亲无故，决定不逃了，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准备等死。那个50多岁的老美披着被子冲进去，把那个人背了下来”。

而美国大兵与联大女学生之间也生发过不少浪漫的故事。前几年，报社的朋友来找余斌帮忙，一个曾在昆明服役的美国退役老兵带着夫人回到昆明寻人。他当年曾和一个中国女孩谈恋爱，只知道她的小名叫做“彬彬”，父亲是一个学校的校长。“一听到这样两个信息，我马上就想到这个人是梅祖彬，梅贻琦的大女儿。辗转找到了梅贻琦的侄女，最后获得了梅祖彬的联系方式。其实梅祖彬也在美国好多年了，两个曾经的恋人又在昆明互相联络到了彼此。”余斌说。☑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松果

节气

中读
ZHONGDU

新知
WISSEN

三联爱乐 PHILHARMONIC

抗战时期的大学迁移

实习记者 刘婧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筋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时至今日，再次读到80年前西南联大学子吟诵、传唱的校歌，字里行间充盈的离愁别绪、铮铮傲骨和家国情怀仍动人心魄。

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9年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七七事变”后至当年8月底，此108校中近九成受敌人破坏，临此局面，迁往西南大后方迫在眉睫。

总体来看，往西南方向内迁的高校，以国立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为代表。往西北方向内迁的高校中，由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除此之外，一些西南本地原有的大学则没有迁徙，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也有省内迁徙的，如厦门大学、河南大学。

值得一提的事实是，抗战不仅没有消灭大学，反而繁荣了大学。据史料记载，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

本文将列举主要的大学迁移路线：

国立中央大学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现为南京大学。

由于战争、迁移，众多大学财务损失严重，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中央大学幸免于难，学校硬件保存较为完整，甚至饲养的家禽、家畜也安全转移。因此，饱受战火摧残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感叹说：“抗战开始后，中央大学和南开大学都是鸡犬不留。”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迁往昆明，同年4月改称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7月三校迁回原址。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

昆独立设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迁至天目、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直到1940年初，迁至贵州遵义、湄潭；

1946年秋，浙江大学迁返杭州，现为浙江大学。

浙大在抗战中“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在广西宜山办学期间遭日军投弹118枚，仅停课三天，并专门记录在案。据史料记载，浙大在整个迁移过程中都不曾停课。

国立交通大学

战前国立交通大学分为上海本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唐山工程学院。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交大总部迁往上海法租界，并在重庆小龙坎设立分校。后辗转至重庆九龙坡、贵州平越古城（今福泉市），设立分校，后分校再次迁到四川璧山。唐山工程学院迁往湖南湘潭，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与之相并，5月迁往湖南湘乡杨家滩。随后，再次被迫西迁。

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现为西南交通大学，定址成都。

分设于上海、西安的两部分，现发展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发展为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

部分师生迁至台湾后，复办交通大学，现为台湾交通大学。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7年9月10日，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三个月后，西北联合大学解体，成为五个独立院校：西北大学、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1946年，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



1

(老部提供 FOTOE)



3

(新华社供图)



4

(戴骏供图)



2

(东方IC)



5

(吴雅提供 FOTOE)

1. 原国立中央大学大礼堂（在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内），建于1931年
2. 广州中山大学校园
3. 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昆明）
4. 1938年，浙江大学迁至宜山后，在东门外标营搭建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
5.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时期的武汉大学

1946年7月，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复校，现为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迁回东北，现为东北大学。其余力量留在陕西，现为西北工业大学。

国立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946年春，西北师范学院师生部分迁回北平，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部分留在西北，现为西北师范大学。

国立同济大学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立同济大学迁往浙江金华，后经江西赣州、吉安，广西贺县八步镇，云南昆明，最终于1940年10月，迁往四川宜宾李庄。

1946年4月，迁回上海。现为同济大学。

国立中山大学

1938年10月，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澄江，后迁往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学校一分为三，分别迁往粤东各县、连县、仁化。

1945年8月，迁回广州石牌等原址复课。现为中山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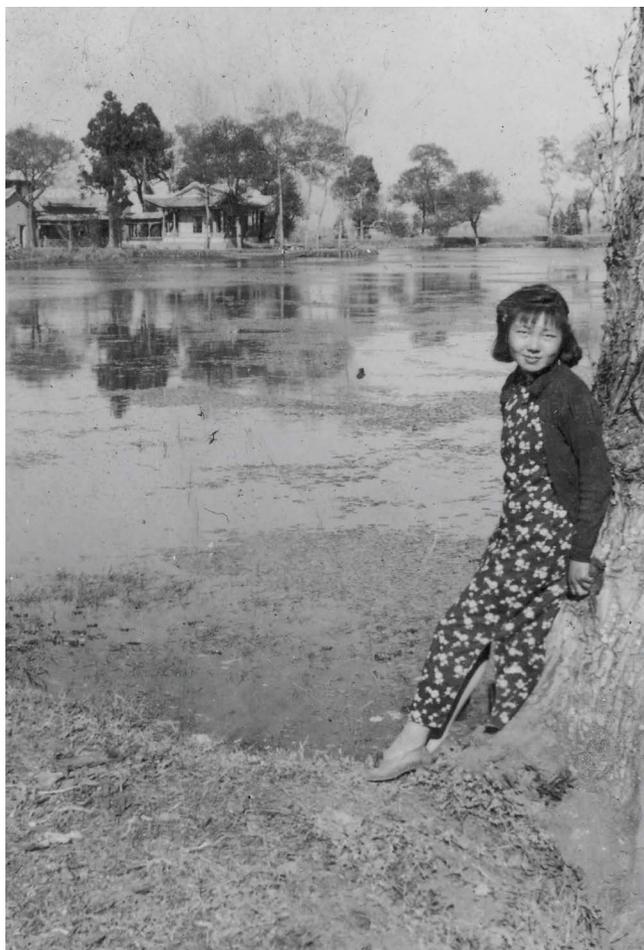
国立武汉大学

1938年2月，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

1946年6月，从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现为武汉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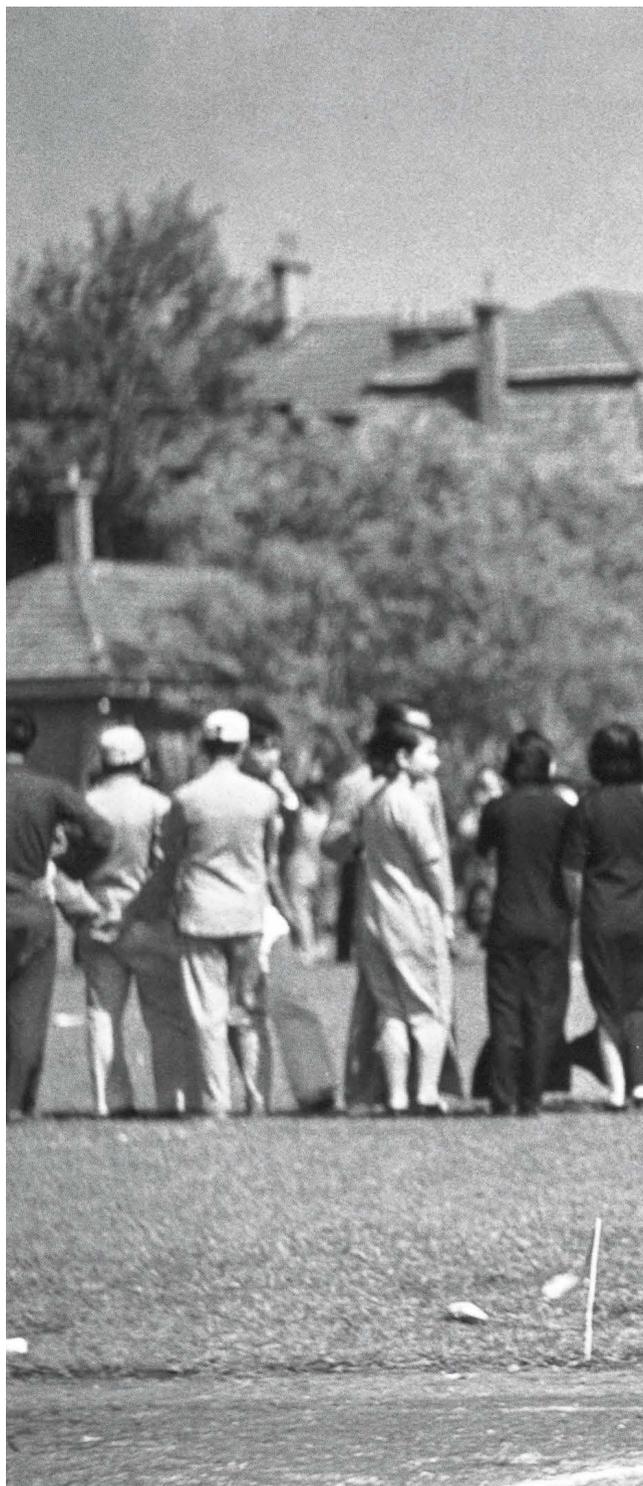
求学之路，战火中的诗篇与论文

记者 / 刘周岩



左图：外文系学生杨苡在西南联大附近的翠湖留影

右图：1935年，上海同济大学运动会上观看赛事的学生。彼时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大学尚得以正常运转，但部分学校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当杨苡眼见涂着太阳旗的飞机从远处呼啸飞来，当吴大昌踏进昆明工厂看到让他震惊的景象，当张世英从闻一多手中接过沉甸甸的《海上述林》……这几位西南联大的年轻人在多年以后回首往事时将会意识到：从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从此不同了。

战时大学是联大的根本属性。自身学业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是贯穿那一代人大学生活的核心问题。抗战救亡、流血牺牲……是每一位联大学生深刻的记忆。



(金石声 摄影 FOTOF)

昆明图景

1942年，昆明，文林街整条街上全是茶馆。前来光顾的几乎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茶馆的墙壁上挂着几个大字：“闲谈莫论国事。”学生们做什么的都有，人声鼎沸。一会儿从打桥牌的桌上冒出来“just make”“他妈的”，一会儿从闲聊的座位上冒出来“四大家族……”“孔祥熙，飞机运洋狗！”“朱家骅，什么玩意儿！”。还有几桌是谈恋爱的情侣。

哲学系学生张世英走进一家茶馆，要了一壶茶，摊开书和笔记本，开始了一天。这天他带的是巴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这是他转入哲学系后认真读的第一本原著。他念这本书入了迷，发现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存在就是被感知。”张世英忽然觉得“很好玩”，“我对茶馆里的喧嚣声、议论声都置若罔闻，也似乎是，既然我不去感觉它们，它们也就都不存在了”。茶馆读书由此获得了理论依据。

75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茶馆情形，张世英仍然记得一清二楚。“早晨一起床，吃过早饭，就夹着书本到文林街‘泡茶馆’，一杯茶从早上八九点‘泡’到12点，然后回食堂吃午饭，午饭后又去‘泡’，晚饭后又去，一天‘泡’三次。”联大校友汪曾祺毕业50年之后也写了一篇《联大忆旧——泡茶馆》，一一细数了各家茶馆的掌柜和经营特色，可见记忆之深。

以茶馆为学习和社交场所，看起来自由任性，实有无奈的成分。图书馆座位极度匮乏，寝室里则因为昆明电力不足而光线昏暗，大家除了茶馆无处可去。这所战时情况下的特殊大学，物质条件可谓艰苦。机械系校友吴大昌记得，北平的清华体育馆有热水淋浴，更衣柜配备密码锁，与现代体育馆几乎无异，到了昆明，就只能在土操场上跑跑圈打打篮球了。

算学系（数学系）校友万哲先印象深刻的是上课时的“味道”。“数学系对面就是敞开的厕所，一刮风，教室里马上就能闻到味道。”上学期间，万哲先的宿舍还发生了多起“铺盖失窃案”，有同学睡着觉身上的被子就没了。“宿舍窗户是纸糊的，小偷弄破之后，用钩子一钩就把被子偷跑了，最后也不知道小偷是谁。丢一套铺盖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是不小的损失。”

环境虽然困苦，但并不影响在这所充满活力的大学中同样有丰富的校园生活。因为教室及宿舍为

多方租借、拼凑而成，加之学生活动范围广泛，就有了“昆明有多大联大就有多大”的说法。天津来的外文系学生杨苡享受着悠游闲逛的自由。“昆明的云、树、山和水，西山上的‘龙门’，‘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租界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联大师生还常光顾南屏大戏院看外国电影，因不满意翻译粗糙而亲力亲为，外文系教师吴宓由此译出《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经典译名。

最受欢迎的地方是翠湖，是联大师生共同的美好回忆。起初本地人看不惯学生情侣在湖边谈情说爱，还曾抛石子抗议，没过多久，昆明本地年轻人也如此效仿了。张世英和夫人此后一生在北大工作，被问及翠湖和未名湖哪个更美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当然翠湖更美！”

今日大学生的小聪明，也都存在于昔日的联大。“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主持联大的体育课，偷懒的学生不在少数，不少人在跑步时躲在树后以“逃圈”。一次，领跑的老师忽然转身，发现全班同学都不见了。另有很多同学慕名去听陈寅恪的课，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然而并不能听懂，往往过了学期前一两节课之后，教室也就空了大半，只剩下少数真正听讲的学生。

联大的特别之处，在于特殊背景下全校患难与共，由此而造就的尤为亲密的师生关系，这也为校友所深深怀念。

杨苡和几位同学一度 and 沈从文、朱自清、杨振声等老师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大家相互串门，无长幼尊卑之分。沈从文知道杨苡爱好写作，常为她引荐来找自己的访客。“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徐芳！你这个女诗人快来看看大女诗人好漂亮！”“杨小姐，来见萧乾了！”……这并非个例，据校友回忆，闻一多给学生的题词也都称呼“某某兄”。此种融洽场面的另一原因在于，当时联大的教师都非常年轻，能够与学生亲近。1938年联大开学时沈从文36岁，闻一多39岁，钱锺书28岁，人们印象中一向是胡须全白的冯友兰当年也才43岁。

这样一所学校，环境优美、人数不多，师生亲密无间，偏居一隅而构成关系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从形式上看，或许更接近今日西方的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而非动辄数万人规模但人际关系高度原子化的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不过正像西南联大研究者、美国历史学家易社强



【美雅 摄影 / FOTOE】

“清华体育之父”马约翰教授指导学生练习体操跳跃，其曾在西南联大期间主持学生体育工作（摄于1958年）

(John Israel) 指出的，尽管西南联大确实在形式上更接近教学型学院，但它有着远比单纯的教学型学院更深远和沉重的身份：它是危急时刻组建的国立联合大学。

战争来临，侵略者必定要控制乃至断绝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西南联大和其他高等院校承担的使命就是绝不让他们得逞，要把独立自主的学术和教育延续下去。

进入1935年，北方的大学就已开始做最坏的打算。清华1935年斥巨资在长沙修建校舍和研究所，同时叫外出实习的师生不要再把仪器设备带回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京津大学南迁则成定局。当年的清华外文系三年级本科生赵俪生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卢沟桥炮声一响，学校加紧将书籍、实验器材装箱。“每当夜深人静之时，砸钉之声响彻在大楼里，好像小时候听大地主人家入殓的声响。”

国难当头，不甘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有就此投身抗战的，如赵俪生，“卢沟桥事变”后12天前往山西打游击，学历永远停留在了“大学肄业”。也有宁愿一死以终结此生的，如陈寅恪的父亲、“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拒绝日本人招延，在北平城内绝食而亡。更多的人决定把自己的事业继续下去，学生继续上学，老师继续教书，为中华文化留下种子。

但他们再不会拥有恬静的学园了，而是要在战火中艰难生存。

战火中的蜕变：杨小姐长大了

1937年，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杨毓璋的千金杨苡从教会学校毕业，获得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入学资格。但南开已经和北大、清华合并南迁，她在天津

左图：1937年7月28日，日军多纪队长在听取航空兵空袭天津的报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

右图：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合影



（故宫中国供图）

无学可上，滞留家中。租界的家里有她的宝贝：唱片、收藏的各种画片、大大小小的洋娃娃和十余封巴金的来信——她发现自己的家就像《家》中所描绘的一样，可自己又没有觉慧的勇气冲破“金丝笼”，感到苦闷，从而与这位最崇拜的作者开始了通信。

时局日益动荡，她既感到恐惧又渴望自由，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哥哥杨宪益此时提供了关键的支持。正在英国牛津大学读书的杨宪益来信，支持杨苡去昆明入学西南联大。“我们家大小事情都听哥哥的，于是妈妈就放我走了。”1938年7月7日，“七七事变”整一年后，杨苡登上了离开天津的轮船，经香港、越南海防前往昆明。这是令杨苡兴奋的旅程。“不安全的预感迫使家长不得不同意把子女送到被认为是安全的地区，而我们所向往的是自由，因此我们兴奋甚至于相当开心地向码头上含着眼泪的母亲们挥手，大声说：再见！”

从天津到昆明的这段旅程也成为她一生中“最后的贵族生活”。她和堂弟一起上路，堂弟的父亲，也就是杨苡的七叔是北平中国银行行长，中国银行

给他们姐弟俩买了天津至香港的头等舱船票。船上有西餐、办舞会，下船后杨苡还在当时香港富裕的铜锣湾地区住了十天观光。然而从香港到海防，杨小姐第一次坐了二等船舱，在河内，第一次住进普通旅馆，从越南入云南，第一次坐了没有座位的“闷罐车”（四等火车）。坐在闷罐车的地板上，这只飞出“金丝笼”的“小鸟”和其他平津流亡学生一起高唱爱国歌曲，和大家打成一片。“条件是艰苦的，但我却觉得好自由！”

抵达昆明，杨苡以南开学生身份“复校”，学号N2214。杨苡回忆：“我这人数学很糟，可是就记得联大的学号。当时的玩笑是‘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三个字母P、T、N，分别代表了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学籍身份。到联大后期，便不存在这种区分，学生进入的只是“联大”而不再是三校之一。不过学生还能凭作风大致判断老师们的来源：西装革履、严格守时的来自清华，长袍马褂、上课迟到的来自北大。

在边陲小镇，杨家千金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我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锯琴，没事就拉，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我尽情享受从小没享受过的自由自在！”

沈从文是杨苡在联大的第一位引路人。师生二人在来昆明的路上相识，和朱自清等人租住在同一个院里。沈从文常督促杨苡认真读书，时常拿来许多世界名著，叫杨苡读后写笔记，还叫她注意看自己屋里的灯，告诉她：“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要用功！”调皮捣蛋的杨苡也不让沈从文省心，一次她正和两个朋友大谈特谈各类飞机武器，模拟战场作战，沈从文突然掀开门帘：“杨小姐！朱先生和我都在工作，你们不要这样吵！”快80年过去了，杨苡至今记得这件事，也至今记得那天的两位朋友。他们是空军学校的学生，那次在屋子里吵闹地模拟战场是杨苡和他们最后一次相聚。没多久，其中一个随教练作空中训练时，飞机撞上屋顶，结束了他20岁的生命；另一个从空军学校毕业后投入战斗，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

恰恰是教中文的沈从文劝杨苡不要按原计划进中文系，告诉她：“还是进外文系好。进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捆住你的。”沈从文还告诫她，少写文学价值不高的口号式的抗战诗，踏踏实实读原著。杨苡遵师命念了外国文学，加之哥哥杨宪益和巴金等人的影响，从此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呼啸山庄”四个字就是杨苡定下来的，直到现在，《呼啸山庄》仍以杨苡的译本为最佳。

联大的外文系可谓阵容强盛。系主任是叶公超，他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学期开学时他会在黑板上写下“I am very well”，请每个学生大声读一遍，由此能马上判断学生的籍贯。两位诗人冯至、卞之琳，分别讲授德语文学和英语文学。其他为人熟知的教师包括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等。还有若干外教，如美国人温德（R. Winter）、英国人白英（R. Payne）和燕卜苏（W. Empson）。学生在外文系可以上英、法、德、日的文学与语言学课程，偶尔能赶上不定期的俄文、拉丁文、希腊文、梵文课程。毫无疑问，这是当时全中国最高水准的外文教育，尽管有人批评由于与外界的隔绝和人员的紧缺某些课程的水准实际相比战前清华有所下降。相似的欧美留学背景，使得教师中颇有趣味相投的气氛，但钱锺书离开联大后所写的讽刺小说《围城》，也同样揭示了不和谐音符。

良师之外，还需益友。西南联大有一个著名的民主墙，贴满了讲座信息、社团活动的海报。杨苡靠着民主墙上的海报，在“高原文艺社”中收获了友情和爱情。“我参加时也没想到它是哪一派的，就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欢。”98岁的杨苡仍清晰记得她加入高原文艺社的情景。“那是秋冬的一个晚上。门是开着的，但我出于礼貌还是敲敲门，问：‘这是高原文艺社吗？我能加入吗？’里面的人就说：‘欢迎！欢迎！’”在这个文学青年社团里，杨苡最好的两个朋友是赵瑞蕙和查良铮。查良铮，以“穆旦”的名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新诗作者之一。赵瑞蕙，日后成了著名的法语文学专家，《红与黑》就是他翻译的——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杨苡的丈夫。

“那时候都是男生追女生，我走到哪儿赵瑞蕙就跟到哪儿。我去看话剧他跟着去，其实他最不喜欢看话剧。他来我的班上听课，其实他已经学过一遍了。”杨苡打趣说，“（自己写起诗来）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蕙还能比。”杨苡很快和赵瑞蕙结婚、生子，两人就此陪伴一生。这样的生活，几乎像联大校友鹿桥创作的小说《未央歌》所写一般：“那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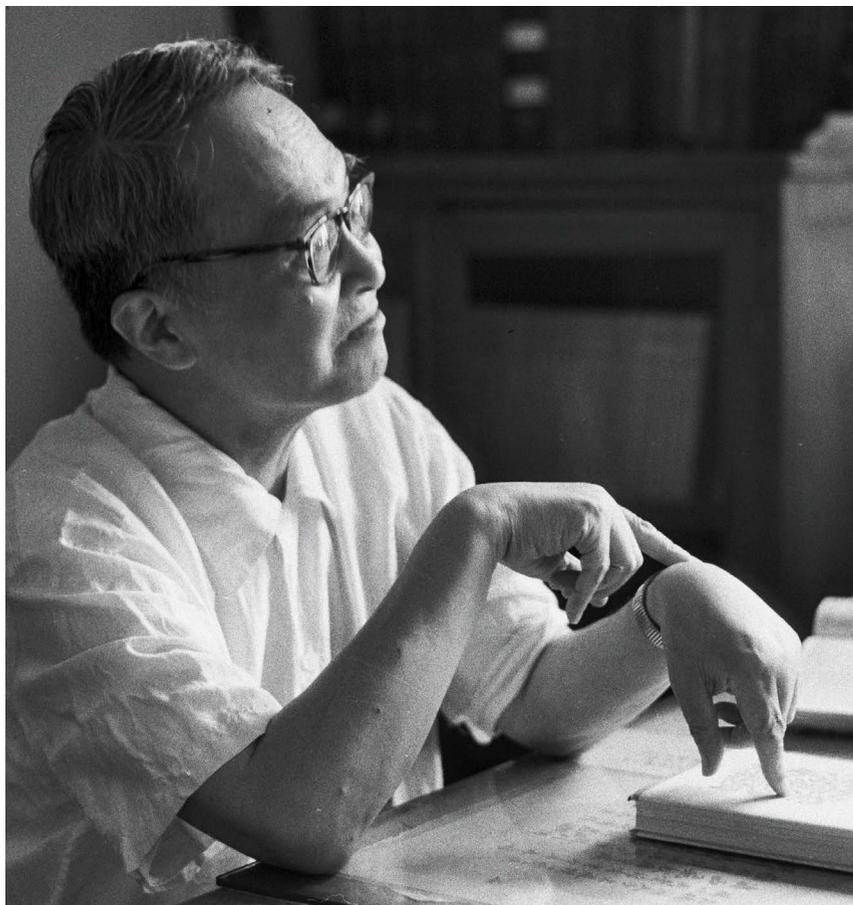
可惜真实中的联大并非乌托邦，学校南迁数千里至昆明，不是为了四季如春的气候和风景如画的环境，而是为了躲避战火，但亦未能如愿。

1938年9月28日，杨苡住的院子里热闹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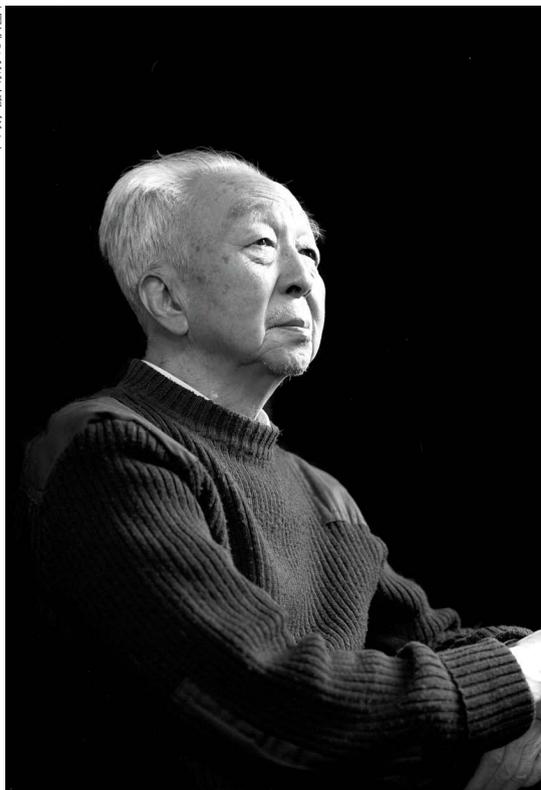
（宝盖头摄影/FOTOE）

(李江树摄/FOTOF)



1

(刘峰摄/东方IC供图)



2

1. 钱锺书曾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摄于1984年)

2. 杨苾哥哥杨宪益(摄于1994年),杨宪益为著名翻译家,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将全本《红楼梦》翻译为英文。在他的支持下,妹妹杨苾入学西南联大

3.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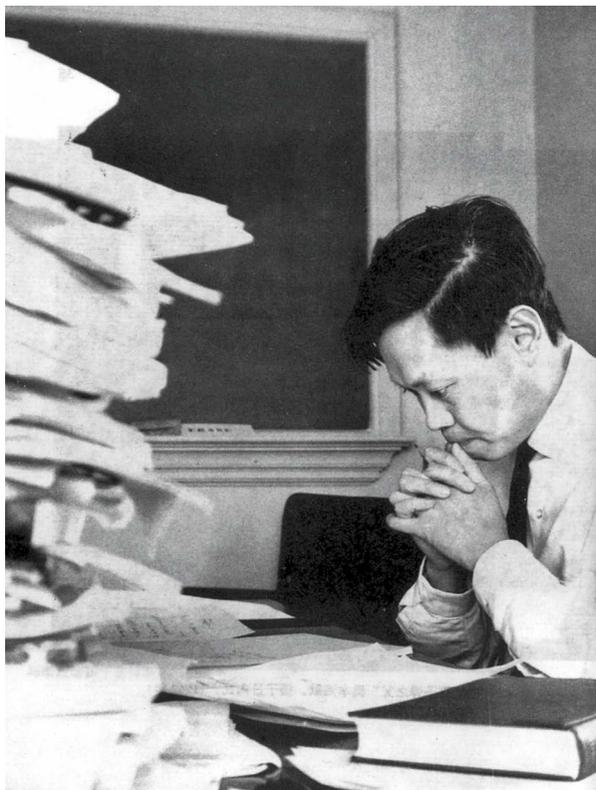
她正和几个北方来的“哥们儿”商量到哪里去逛逛,空袭警报响了起来。“跑警报”已经历多次了,他们并不当回事。日本军队虽尚未推进至云南,但空军会不时地轰炸昆明,主要针对市区内的重要机构和设施。昆明地下水位较高,无法建造防空洞,躲避空袭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防空警报响起后跑到市区外的安全地带,这就是“跑警报”。

杨苾和同学们发现这不过是让他们“例行郊游”：“路上买一把胡萝卜,用手绢胡乱擦一下就一路啃去。看看昆明的云、山和开着油菜花的田野,唱起抗日歌曲,再带一本《101首世界著名歌曲集》,唱够了,吃光了,就‘摆驾回宫’。”其他同学跑起警报来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空袭警报一来就去洗澡,因为这时人少热水管够,还有人专门在撤离路线上沿途捡钱,因为离开时大家总会带上值钱物件,有人带就有人掉。如此几次相安无事,杨苾早就“跑腻了”。

正巧这天“女侠”施剑翘带着来联大上学的弟弟也在,大家就请她讲当年枪杀孙传芳的传奇故事。

刚要开始讲,杨苾头上就响起震耳欲聋的飞机引擎声,飞行之低让她可以看到三架飞机上的日本太阳旗。“眼见明晃晃的炸弹,伴随着哨子一样的声音落下,爆炸声把我们震得宛如石柱钉在地上。”杨苾愣在原地不知所措,被尘土和浓烟笼罩了起来。只有“女侠”身手矫健、反应迅速,用天津腔喊了一声“我的妈呀”就奔向后院去了。

等一切复归平静之后,大家看着严重受损的房屋,才意识到自己侥幸逃过一劫。据统计,日军在这次空袭中扔下十颗炸弹,落在联大租用的昆华师范学院校舍,两名联大学生在空袭中不幸遇难。自此以后,“跑警报”成为联大学生不得不认真对待,同时也花时间最多的一门“必修课”。联大生活被“跑警报”深深影响。校方重新制定了作息时间表:上午6、7时开始上课,10时下课随即所有人离开学校躲避空袭,下午再恢复上课直到晚上。很多在昆明城区有家室的教师也搬去了城外,只在上课时来学校。1940年11月,受日益严峻的轰炸形势和入不敷出的校舍经费影响,联大宣布在更偏远的小城叙永建



(高延智摄/视觉中国供图)

3

立分校，安置新生。

有一天警报解除得较早，杨苡和同学们都很高兴，一起大吃了一顿。可是下午杨振声教授的女儿就跑来说，沈从文吃饭时喝了点酒，忽然哭了起来，把大家都吓坏了。杨振声女儿告诉杨苡：“沈先生说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还没说完就哽咽不止。”一整天杨苡和朋友们都非常安静，只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沈从文。

1941年，随着丈夫赵瑞蕪毕业到重庆中央大学教书，杨苡中断了联大的学业，到中央大学借读，不过仍拿联大毕业证书。虽然学业继续精进，但那种完全自由自在的氛围却没有了。同样从联大到中大的老师陈嘉告诫她：“这儿不是联大，说话要注意。”

后来的人生里，杨苡又遇到无数艰难险阻，回想往事，她每每觉得联大几年是人生中最美好也是成长最快的一段时期。在一些近乎绝望的日子里，她总会想起沈从文在联大对她的教导：“勇敢些！吃点苦没什么了不起，生活是大本书！”

科学救国：延续“赛先生”的火种

2017年11月1日，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到会的最年长校友，99岁的机械系36级校友吴大昌，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一生投身于科学事业，为中国早期车辆工程学科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右边是物理系学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左边是机械系学弟——“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杨振宁再右边是机械系学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

几人在会场上亲切寒暄的画面展现了西南联大至今为人称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所存在仅9年的学校培养出了众多举世瞩目的科学人才。西南联大师生中，173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8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5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回忆起80年前在联大机械系学习的时光，吴大昌仍清楚记得参观昆明一家工厂带给他的“震撼”——那里的机器既不是用电机带动，也不是用柴油机带动，而是工人用手摇！“可见动力多么匮乏，人工又是多么廉价！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的落后。”这一幕，让吴大昌坚定了要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现状。

吴大昌是极少数目前尚健在的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前就已入校的“元老级”校友，1936年考入清华，在北平清华园上了一年学，随后同学校一起南迁，其间还参加了著名的“湘滇黔旅行团”，由长沙步行至昆明。吴大昌同时体验了战前清华与战争中联大的科学教育。

1936年的清华园给吴大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时候的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都非常先进。如果能一直在清华园上下去当然是很好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有数万名学生，清静、优美的校园环境广受赞誉，而吴大昌上学时清华每年仅招生300人左右。到了昆明，生活条件坠崖式

西南联大师生中，173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8人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5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王思华摄】

吴大昌，99岁，西南联大机械系1936级校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上世纪5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国，为中国早期车辆工程学科的创立做出重要贡献

下降，“清华的本科生宿舍一间两人，联大三四十个人住在一个屋子里”。

更严峻的情况在于简陋的条件对教学的影响，尤其是工程学科。吴大昌的一个印象是，从北平到昆明之后，实验课程明显减少以至于没有了。据易社强的研究，战前清华有顶尖的仪器设备，工学院的3个系拥有14个实验室和4个工厂。以水力实验室为例，它是仿照德国大学的实验室而建造，被称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在炮火中迁移几千里让这些硬件基础荡然无存，纵使校方努力运来部分仪器也无力回天。昆明拓东路上的联大工学院简陋到可笑的地步，甚至有时连纸、墨、丁字尺都缺乏，使得机械制图作业无法完成。

艰苦的条件反倒使工程教育获得了两个意外的好处：一是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基础课的教学和教材的编撰上——因为研究无法开展；二是学校以考察工厂的方式弥补实验的缺失。这二者都让吴

大昌和他的同学们受益匪浅。

吴大昌至今都记得在昆明两年参观的几个工厂：水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纺纱厂、电工厂、中央机器厂。“这些参观大有好处，让我们觉得读书真是有用的。”吴大昌说，战前不少同学学工科也是为了“好找工作”，战争一旦打起来，自己国家落后的局面深深刺激了大家。他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自己朴素的想法就是“要让中国实现现代化”，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知识能派上用场。

吴大昌最怀念的两位老师吴有训和刘仙洲，都以严格著称。吴有训的物理课上，一个同学忘了关实验用的煤气被批评。第二堂课他又忘了，吴有训不留情面地告诉他：“你不要再进实验室了。”这意味着实验成绩是零分，物理总成绩于是无法及格，而必修课不及格意味着这个学生只能转系离开。刘仙洲则总是准时走入教室，关上门开始点名。迟到

的人要么站在门外听，要么满脸羞愧地走进来接受一顿训斥。这样的作风，和联大其他“自由”的院系大相径庭。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老师和国际前沿相当接轨，他们本身是中国引入现代科学之后的最初一批人才，又大多在欧美最顶尖的院校接受了前沿的科学教育。吴大猷、周培源、华罗庚、陈省身等联大知名教师的道路莫不如此。11月1日的纪念大会上，杨振宁回忆：“吴大猷先生带我走进了‘对称性在分子物理学的应用’这一领域，王竹溪先生引我进入‘统计力学’的领域。这是我后来一切研究的基础。”联大教师对物理学前沿有着相当准确的把握和前瞻。

老师们的眼光和尚能维系的购书渠道，让联大学生总可以读到前沿的科学书籍，极大弥补了设备上的不足。吴大昌忆起的一件趣事颇可佐证。联大化学系学生朱汝瑾赴美深造，极为罕见地仅用两年就取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学位。朱汝瑾和吴大昌等同学在美国聚会时透露了奥秘：“是因为精读了一本教科书，把那本书注释里引的其他书也都读了。他到麻省理工的导师正是那本书的作者！导师对他说：你比我还熟悉这本书。”朱汝瑾后来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儿子朱棣文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出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不过从研究层面看，联大的理工科因战争陷入了停顿。无论是蔡元培以洪堡大学为模板用以改造北京大学的现代大学理念，还是今日世界主流研究型大学的实践，大学都该以创造新知识为己任，前沿研究必不可少。限于客观条件，联大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理工科中，即使是师资雄厚、最负盛名的物理学系，9年之间也仅发表了30篇论文，其中仅一篇是实验物理，其余均为理论物理。1943年，科技史家李约瑟访问联大，他对中国科学家所处的简陋环境同时感到震惊和感动：“中国科学工作者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极其乐观、豁达。”

但联大的理工学院在另一个层面取得了成功，它用基础扎实的本科生教育为中国孕育了科学人才的种子。吴大昌用朴实的话总结了这种本科教育富有成效的原因：“教师水平高，学生愿意学。”对如数学这样的特殊学科，联大优势更明显，因为聚集了更多的老师。日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数学系校友万哲先1944年入学，1946年联大结束复校清华，1948年毕业。他对比复校前后：“联大的数学

西南联大校友小传

邓稼先 1941级物理系

1924年出生。父亲邓以蛰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1936年，邓稼先考入北平崇德中学，与高他两班的杨振宁成为好友。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杨振宁时也在联大物理系，两人相交甚厚。在西南联大，邓稼先还加入了“民青”（共产党外围组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48年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读书，195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6年与于敏等人合作发表一系列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1957年开始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从此隐姓埋名工作28年直到去世。在邓稼先及其团队的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探亲，经周恩来批准，与邓稼先见面。1986年，邓稼先去世，享年62岁。1999年，邓稼先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穆旦 1935级外文系

原名查良铮，1918年出生。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10月随清华南迁至长沙、昆明。在校期间加入“高原文艺社”。1939年开始系统接触西方现代派诗歌、文论，创作发生转变，并走向成熟。1940年毕业，留校担任助教。

1942年2月，穆旦报名参加中国入缅远征军，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同年5月至9月，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侥幸逃出。1945年9月，根据入缅作战的经历，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现代主义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1949年穆旦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1952年毕业，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次年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致力于俄、英诗歌翻译。1976年去世，享年59岁。1979年其“历史反革命”冤案平反。

去世前，穆旦写下《冥想》：“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

殷海光 1938级哲学系

原名殷福生，1919年出生。殷海光在金岳霖的鼓励下，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又入哲学研究所，在西南联大度过7年时光，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曾一度赴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投身抗战。

1946年秋，经陶希圣介绍加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1949年随《中央日报》迁至台湾。因多次批评国民党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斥责，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转变成自由主义者。

殷海光曾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反攻大陆问题》社论，称“反攻大陆”是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假把戏，预言台湾终将和平统一。殷海光激烈批判岛内政治的同时，大力引入西方哲学思潮并参与多次文化论战，培养出李敖、陈鼓应等弟子。1969年9月，殷海光因病去世，享年50岁。

王汉斌、彭珮云夫妇 1942 级历史系、1945 级社会学系

王汉斌，1925 年出生，1941 年 2 月在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1942 年，王汉斌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学习，任“民青”第一支部委员，地下党第一支部委员，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彭珮云，1929 年出生，1945 年入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同年 11 月经王汉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二人结为夫妻。二人积极参与革命工作，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王汉斌任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彭珮云任清华大学党总支副书记。改革开放后，王汉斌领导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曾任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珮云领导文教卫生妇女工作，曾任国家教委副主任、计生委主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抗日战中因公牺牲的部分联大从军学生

戴荣钜（1939 级地质物理气象系，飞行员，1944 年 6 月在长沙空战中殉职）
 王文（1941 级机械系，飞行员，1944 年 8 月在衡阳空战中殉职）
 吴坚（1940 级航空系，飞行员，1945 年在陕西空战中因机件失灵失事殉职）
 崔明川（1941 级机械系，飞行员，1943 年在美国飞行训练时殉职）
 李嘉禾（1939 级物理系，飞行员，1943 年在美国飞行训练时殉职）
 黄维（1938 级外文系，翻译官，随第五军军部撤出缅甸抢渡怒江时牺牲）
 缪弘（1943 级外文系，翻译官，1945 年 7 月 31 日在广西平南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时牺牲）
 朱谌（1940 级物理系，翻译官，1942 年随第五军入缅作战在撤退时牺牲）
 朱晦吾（1940 级外文系，飞行员，在飞越驼峰的航行中牺牲）
 沈宗进（1941 级机械系，飞行员，在飞越驼峰的航行中牺牲）
 吴若冲（1939 级外语系，联大纪念碑注明为“殉职”）
 杨大龄（1940 级机械系，翻译官，1944 年入缅作战时被日军狙击手击中牺牲）
 曾仪（联大纪念碑注明为“殉职”）
 何懋勋（1936 级历史系，南开学籍，鲁西北游记总司令部挺进队参谋，1938 年 8 月在济南牺牲）
 雷本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记载“牺牲”）

（据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整理）

教育更好，因为老师更多，学生能学习的方向就更多。回了清华有些课反倒开不出。”

当战争结束，联大学生获得了海外留学的机会，在欧美学校接受系统的研究生培养后，才得以成为成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纪念大会上几位老校友的道路莫不如此：杨振宁 1945 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王希季 1947 年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郑哲敏 1948 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吴大昌 1946 年进入伊利诺伊大学。杨振宁以一句话总结了自己，同时也是联大同学们的成才之路：“我在中国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在美国受到了最好的研究生教育。”

最近，吴大昌在电视上看到了联合收割机工作的场面，他颇为兴奋：“梦想成真了。80 年前我们读书是希望中国现代化，今天实现了。”

哲学还是政治：“走出象牙之塔”

1944 年，在联大的第四年，张世英做了一个“逆流”的选择：他终于从经济系转到了哲学系。毕业时那一届经济系学生有 200 多人，哲学系算上张世英，只 4 人。“我完全是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没和任何人商量。”家人身处沦陷的武汉，通信本也不易，几个月才能联系上一次，他自己也觉得无商量的必要。

成绩单上，张世英的表现颇不均衡，有零分的如化学，也有优等的如国文、英文，审核转系申请的哲学系主任汤用彤评价：“看你的成绩，是个有偏爱的人。”知道张世英已开始读黑格尔，汤用彤嘱咐：“你对黑格尔有兴趣，将来可以好好在这方面做些研究。”一语成谶。毕业时张世英在贺麟的指导下做了《论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的哲学思想》的论文，此后一辈子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黑格尔专家，是《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主编。

转系之后，原来经济系的同学问张世英：“哲学是讲什么的？”他解释了一通“无”和“有”、“存在”与“感知”之后，同学颇为担忧：“学这些有什么用呀？你可别学成个神经病。”96 岁的张世英笑着回忆当时的场景，补充道：“不过哲学系也确实有两三个神经病。”

哲学系对今日人们心中的“西南联大”形象的建构至关重要，一系列人文大师都出自哲学系：冯友兰、汤用彤、贺麟、金岳霖、洪谦……哲学系人物也为联大传说贡献了颇多奇闻逸事，如逻辑学教师沈有鼎，从哈佛、海德堡归来后，这个才华横溢又举止怪诞的教授常做出人们意料之外的举动，有传闻说他从不洗澡。更根本的在于，哲学系象征着联大的精神——在战火中继续研究非功利的纯粹学问，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

然而对当时的学生而言，哲学系被重视程度远不及今天人们的叙述建构，从学籍档案记载的学生人数可见一斑。在选系自由的联大，哲学系毕业生仅占全体毕业生的 2%，最多的一届有 16 人，9 年间毕业总人数不足百人。相比之下，经济、商学两科

毕业 1200 余人，其中经济是全校学生最多的专业。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所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做了如此解释：“旧社会大学毕业生求职较难，常有‘毕业即失业’的感叹，但财经、商业人才例外。”

张世英却无所谓，他早已认清了自己不问政治、自命清高的志趣。高中毕业时，受时局刺激他也想“救亡图存”，望文生义地选择了“经济学”。“我以为‘经济’就是讲‘经世济民之道’的，入学后却发现竟是些会计、统计之类的‘生意经’！”这个从小被同学们叫作“老夫子”的书呆子，觉得自己还是回归本性比较好。

联大自由的环境提供了空间，他开始“流窜”各系旁听。化学零分就是这么来的——选了课之后，张世英弄不懂那些“乌龟壳”一样的分子式，又去其他课旁听了，实验课一共去了一次，自然是零分。一度转入社会学系，却被老师带去妓院做调查，张世英又觉得厌烦。直到走进贺麟的哲学概论课堂。“贺先生讲课从不念稿，深入浅出，从思想情感上打动人。”讲到黑格尔辩证法时，贺麟以中国的荷“出淤泥而不染”为例。“贺先生说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清高’的最流行成语，也是对黑格尔‘对立统一’和‘扬弃’的辩证法的最生动、恰切的诠释。我一下子觉得这段讲解为我从小的清高思想做了理论上、哲学上的说明。”张世英从此进入哲学之门，“我终生无悔”。

转系后，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等人的课程让张世英进入了哲学的不同领域，回首联大哲学系读书时光，96 岁的老人颇有些激动地感慨：“那绝对是我人生中的黄金时代。”1949 年之后，张世英长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一直在中国哲学界的中心，经历了学界各种变迁。他对联大哲学系下了判语：“西南联大是中国哲学学界发展的顶峰，毫无疑问。大师荟萃的盛况只有 1952 年院系调整后的北大哲学系可以相比——但那时是聚到一起写检讨。”

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哲学系教师的研究工作不仅没有受到战争太多的影响，反倒因为人才的会聚在这一时期结出了最丰盛的硕果。冯友兰完成于抗战期间的《新理学》，体现了他日后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陈康在联大期间用德文所作的《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以新观点推进了柏拉图研究，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重视。

正当张世英以为自己找到了终生的归宿可以一心向学时，“一二·一惨案”发生了。抗战胜利后，

国共对峙形势日趋紧张，联大师生举行集会反对内战，要求组建联合政府，当局以鸣枪、掐断电线等方式阻挠。事态逐渐扩大，学生组织抗议、罢课。1945 年 12 月 1 日，政府当局竟派出特务使用手榴弹袭击学生，包括两名联大学生在内的四人牺牲。惨案刺激了全国范围反内战运动的爆发。

同学们在民主墙上贴出了一张漫画，以表对部分同学的不满和嘲讽：几个哲学系学生戴着高度近视镜，排成一队汗流浹背地爬梯子，梯子顶端是一座庙，正中是一个祖师爷，是冯友兰的头像，满脸大胡子，头发如云雾般缭绕，云缝间布满了“本质与现象”“思维与存在”“一与多”一类的哲学名词。“我看了这张漫画，忐忑不安，自觉身在其中。”张世英被这张漫画深深触动。1945 至 1946 年，正是昆明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联大“民主堡垒”的称



(朱磊摄)

张世英，96 岁，1941 年入学西南联大经济系，后转至哲学系。张世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

左图：郑哲敏，西南联大 1943 级机械系校友，爆破力学专家，2012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右图：穆旦，西南联大外文系校友，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新诗作者之一。1942 年穆旦加入中国入缅远征军，担任翻译官



(小陈摄/视觉中国供图)

号正由此而来。张世英回忆：“对比四烈士的鲜血和我个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冷漠，我汗颜无地。是继续孤芳自赏，还是投入现实，这是我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

女友彭兰和恩师闻一多引他做出了选择。彭兰是联大中文系学生，闻一多的干女儿，与张世英在茶馆中相识。二人写诗唱和来往密切，进而互生钦佩和爱慕之情。“当时的联大同学之间，政治思想分野明显。她属‘左’，我属‘中’，彼此心照不宣。”在彭兰的影响下，张世英的交往圈子扩大到了“进步人士的边缘”，对地下党和延安的情况也渐渐了解。

二人确立婚约之前，闻一多进行了“面试”。长谈之后，闻一多认可张世英的头脑，促成了这个

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篆刻在正面，碑阴则是校志委员会列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计 832 人。

他所称的“文学与哲学的联姻”。闻一多是彭兰的主婚人，冯文潜是张世英的主婚人，汤用彤为证婚人，二人在昆明结为夫妻。婚礼一共就这八个人参加，新郎新娘，三位老师及其夫人。

闻一多郑重其事地告诉张世英：“现在的形势，我想你也清楚，希望你走出象牙之塔。”“走出象牙之塔”的口号早已在联大学生中传播，为张世英所熟悉，“我第一次从闻先生口中亲自听到，更感其意义之沉重”。闻一多同时送了他一本《海上述林》，这是瞿秋白编译的马、恩等人的论文集，张世英至今记得那本书的样子，“黑绒面，烫金字”。

张世英试着迈出象牙塔。国共内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还为许多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提供避难场所。终究本性难移，1949 年前后，张世英拒绝了“做官”的机会，选择回到学校教书。夫妻二人都回到北大，张世英任哲学系教师，彭兰任中文系教师并参与党务工作。

回首一生，张世英感叹：“我最终还是适合待在象牙塔之内。可一多师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46 年 7 月 15 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正在离开昆明返回家乡路上的张世英、彭兰夫妇听闻消息无比震惊。就在 7 月 10 日，二人还前往闻一多处告别，此见竟成诀别。张世英记得，闻一多那天谈了很多很多，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我将来等到那个时候，还是要回到书斋里一心做我的学问。”

“那个时候”，是闻一多期许的国家安定繁荣的时候。

不该被忘记的群体：从军学子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矗立在顺利复校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冯友兰撰写的纪念碑文篆刻在正面，碑阴则是校志委员会列出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计 832 人。还有若干未被统计入内，参军学生实际应达 1100 人左右。前后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学生一共 8000 余人，参军比例高达 14%。

早在抗战初期，是继续念书还是直接参与抗战救国，就成为许多青年面临的艰难选择。三校先行迁至长沙后，一篇题为《反对文化逃避政策》的文章广为流传，其中写道，除非“我们愿意做卖国贼、当亡国奴”，不然“就没有资格躲到安全的象牙塔里”。

国共两党要员徐特立、张治中均到校演讲，号召学生走出校门抗战。教育界不少人士则要求学生坚守课堂，表示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士兵，缺的是学知识的人，更何况抗战之后还要建国，学生们是“国宝”，绝不能放弃自己的学业。

就在这样激烈的思想冲突中，每个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有学生1400人左右，当学校决定进一步搬迁至昆明时，有820人表示愿意前往云南，其余流散学生大多在军政机构任职，投身抗战。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已去联大就读的学生中又出现了若干次从军高潮。除抗战初期的第一次高潮外，还包括1944年应征翻译官，即为来华协助作战的美军做翻译，应征飞行员，以及抗战末期的青年军。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这是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入口处的对联，一共有12位联大学生走入这个大门。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军队占尽空中优势，中国飞行员大量牺牲，当局决定从大学生中录取飞行员，联大学生积极报名，最终有数十人通过严苛选拔成为飞行员，驾驶战斗机参与对日作战，或驾驶运输机穿越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运送战略物资，其中至少七人壮烈牺牲。

联大学生翻译官的足迹更是遍布中国内外。美军在印度缅甸的X-Force部队、云南的Y-Force部队以及湖广一带的Z-Force部队，均有联大翻译官前往协助。“二战”胜利后，美国政府为一批中国军人授予自由勋章，表彰其对盟军的帮助，16位联大学生译员名列其中。长期担任联大校友会会长的是——一位没有获得联大毕业证的“肄业”学生——梅祖彦。这位梅贻琦的独子正是因为从军所以未能按时毕业，他是荣获自由勋章的16人之一。从军学生们或传奇或辛酸的故事，在联大1944届同学会的努力下，已集结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一书，不过由于涉及历史再评价等诸多复杂问题，至今未能正式出版。

从军与求学，并非两个截然分开的群体，亦非两种冲突的志向。杨苡当年的外文系同学里，就出了两位有名的美军翻译，一个是社团里的好朋友穆旦，一个是“上课坐在后排，从没仔细注意过的男同学”许渊冲。穆旦随中国远征军亲历了野人山战役，踏着累累白骨侥幸逃生，许渊冲以“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为陈纳德翻译“三民主义”的事迹广为流传。这二人从战

场归来，又在中外文学领域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印记。

联大9年，前后8000余人来此，仅3000余人顺利毕业，由此可想见战时求学环境的莫测和残酷。联大学生中诞生了无数知名人士，但完整的联大不仅是由他们组成的，那些姓名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人也都曾鲜活的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未能亲眼看到胜利就永远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缪弘，就在胜利的前夜，1945年7月31日，在收复广西平南附近丹竹机场时，勇敢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被敌军击中，壮烈牺牲，时年19岁。缪弘在学校时也是位诗人，他的遗诗集中留下了这样一首《血的灌溉》——

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你们的血已经浇遍了大地，
也该让我的血，
来注入你们的身体，
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
你，我，
谁都不曾忘记。☑

（感谢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秘书长曾骥才先生、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总编导张曼菱女士对本文的帮助）





1955年5月，在中央民族学院，潘光旦（左）和费孝通（右）在研究古籍，中立者为费孝通夫人孟吟

大师与通才

记者 / 何潇

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潘光旦

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存活了八年，却是现代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教员是“教授中的教授”，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其学术之自由，思想之包容，令后来者感到高山仰止。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

“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拥有如此崇高声望，很大程度上，因其拥有一大批“大师”。他们对内治校，对外议政，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这是怎样的盛况呢？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在其被赞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样畅想：

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四十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四十三

岁的冯友兰在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四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拐杖，步伐却很矫捷。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十三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她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家及其妻子赵萝蕤。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

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仁’，你把所有讲‘仁’的话，归纳排排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仁’了吗？”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来管窥一下西南联大彼时的师资。在历史系任教的教师有：陈寅恪、姚从吾、毛子水、刘崇鋈和钱穆；哲学系有汤用彤、冯友兰、贺麟；中文系有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王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杨振声；外语系有梁实秋、钱锺书、吴宓、王佐良；经济学系有陈岱孙、陈达、李卓敏、赵迺抟、秦瓚；政治学系有张佛泉、崔书琴、王化成、张奚若、钱端升、王赣愚；法律学系有燕树棠、蔡枢衡、费青；社会学系有潘光旦、费孝通。

灿若星河，不可具表。

群星闪烁

此时上课，可谓“躬逢盛典”。后来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方龄贵，在回忆中所述颇为详尽：“在我所上的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常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了一（力）、浦江清、许维遹、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极一时之选。记得当时刘文典先生讲的是《典论·论文》，罗庸先生讲的是《论语》，闻一多先生讲的是《楚辞·九歌》，朱自清先生讲的是《古诗十九首》，许维遹先生讲的是《左传·鞌之战》，余冠英先生讲的大概是《诗经》，魏建功先生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

教师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开在早晨六七点，依然广受欢迎；刘文典讲《红楼梦》，

200多人跑来听讲，听众被挤到教室门外，演讲只得改为露天进行；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亦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更甚的是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讲。

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点‘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汪曾祺在名为《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文章中写道。但没有人将“京派”二字挂在嘴上。中文系系主任实行“轮流坐庄制”。朱自清当过一段，闻一多代理过一段。罗常培当的时间较长，背后被学生叫作“罗长官”。“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系相近，民主、自由、开放，却似乎比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先生们上课各具风格。钱穆穿一身中式蓝布长袍、布鞋、黑边眼镜。上讲台不带讲稿，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道来，配合手势和肢体语言，“讲所有课都很有感情”。在方法上，他与王国维一路，将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任继愈是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回忆钱先生，“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教育的好老师”。当时有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去参军，钱穆劝谏说：“你们不要认为在后方念书就是贪生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书读好了，才能报国。”

冯友兰讲课慢条斯理，“如果笔记记得快，跟不上他的说话速度，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然而他讲课很有条理，没有废话，因为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清晰。晚年冯先生全靠口授，助手记录下来，稍作修改即可，基本上出口成章。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很有趣。比如他说大学就是自学为主，当研究生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过来的，你把着他的手，那是教不出来的。

罗庸讲杜诗非常“叫座”。罗先生上课不带讲义，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译注都背出来。教古文字学的唐兰，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讲词的方法是“不讲”，用无锡腔调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一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过了。沈从文在联大开了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讲



1



2

创作的精义，归为一句话：“贴到人物来写。”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带一张纸。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均信手写来；讲中国通史，对于历史人物如数家珍。雷海宗先生拥有至情至性的爱国热情。和别人辩论苏联出兵东北的正当性时，这个待人处事镇定冷静的人，会因为热忱压倒了理性，流下眼泪来。

闻一多讲《楚辞》，是联大里的一桩风景，他的起头总是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先生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汪曾祺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唐诗不拘一格，讲中国晚唐诗歌和西方的印象画派一起讲，还特别爱讲“点彩派”。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闻先生会将手绘在毛边纸上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烦琐的考证讲得生动有趣。

抗战后期，闻一多被视为联大的“完人”——他是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遇刺令他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同事白英（Robert Payne）认为，闻一多“能够敏锐地把握联大整个群体的思想”，把他对中国学生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相提并论。闻一多的告别演说，言犹在耳：“‘五四’过去二十六六年了，我们

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被视为“教授之教授”的是陈寅恪。赵元任将他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列，为“三大导师”。他是一个受到同行尊敬的学者。加入清华时，许多同事去听他的课，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其学生孙毓棠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后，立即免试，让孙进入东京帝大研究生院。因为身体羸弱、患有眼疾，陈寅恪闭眼授课，时常转身对着黑板疾书，不回头看学生。辗转西南联大后，因医疗条件不佳，陈先生的眼疾一误再误，最终失去了光明。

陈寅恪出身宦宦世家、书香门第，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等十几种欧洲语言，亦懂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有一门课“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几乎没有学生能够获得选修资格。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材料，他不得不降低了这门课的授课标准，即便如此，懂得的人依然凤毛麟角。陈寅恪在联大有一首诗，抒发了古来中国文人的“南迁”忧思：“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可待来生。”

（高延智 摄 / 视觉中国）

（新华社 供图）



（据谈中国群图）

1. 1959年，陈寅恪在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寓所楼上北阳台留影

2.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3. 1935年，国立北洋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学生在上实验课

3

刘文典为人率直、洒脱，是一个有如庄周般狷介的先生。“上课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年他讲《庄子》，开头一句是这么说的：“《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天南海北，经常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有一学期讲《文选》，只讲了半篇《海赋》，却用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法文单词。他的“喜欢骂人”也是十分闻名的，比如他说巴金：“春天里的秋天，狗屁不通！”他也骂闻一多：“我们文学院某教授，他就不识字。”

这个老牌知识分子对于同行怀有苛求，鄙视学识水平不佳的人，尊重有学问的人。关于他的轶闻也比较多。比如在《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提到的，他“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十分看不起沈从文。沈从文被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如果沈从文都要当教授

了，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另一次，刘文典跑警报时，适逢沈从文擦肩而过。刘便停下来不跑了，对沈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学生跑是为了未来，你跑又是何为？”这段轶闻，在张曼菱采访而成的《西南联大行思录》里亦有提及。也有人认为此段故事演绎成分大，大概因为刘文典个性狷狂之故，人们附会在他身上的故事比较多。

被人称作“浪漫至尊”的是吴宓。他曾经抛下妻子，公开宣布自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毛彦文，却又与毛女士失之交臂，在诗作里哀叹自己的“错过”。除了这位毛女士，在留下来的《吴宓日记》里，还可以读到其与一位素未谋面的女演员的柏拉图之恋。联大教授贺麟先生说：“吴宓先生讲授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他本人就是拜伦、雪莱，他这个人的生活就是一首浪漫的长诗。”年轻女士向他坦承与已婚男子坠入情网，吴宓劝她：“勇敢去爱吧！”看到年轻夫妇服毒自杀，赤身裸体死在床上的新闻后，吴宓热泪盈眶，感叹：“美啊，美啊！”

吴宓的个性里有一个“真”字，他对人、为学，不矫饰、不敷衍，也不大计较个人利益。1947年，《围城》面世，作者钱锺书曾在联大任教，小说人物原型涉及许多联大教授——包括吴宓。其他人大肆抨击钱锺书，吴宓却不以为意，还说这部小说“百读不厌”。在教学上，吴宓具有比较文学的视野。他强调在希腊—罗马、基督教、佛教和中国儒家传统之间的相互比较。上课时，经常朗诵同一主题的英诗和唐诗，令学生很是佩服。

而今人们追忆联大，习惯将之理想化，视为一个自由思想的乌托邦，忽略这个乌托邦里的琐碎与庸常。王力教授在一篇叫《领薪水》的文章中发牢骚，一如而今白领的日常抱怨：“‘薪水’本来是一种客气的话，意思是说，你所得的俸给或报酬太菲薄了，只够你买薪买水。其实战前的公务员和教育界人员，小的薪水可以养活全家，大的薪水可以积起来买小汽车和大洋房，岂只买薪买水而已？但是，在抗战了七年的今日，‘薪水’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了——如果说名实不符的话，那就是反了过来，名为薪水，实则不够买薪买水。长此以往，我将提议把‘薪水’改称为‘茶水’，因为茶叶可多可少，我们现在的俸钱还买得起。等到连茶叶都买不起的时候，我又将提议改称为‘风水’，因为除了喝开水之外，只好喝喝西北风！”

沈从文也发出批评：“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习经济、习会计，都可说对于生命毫无高尚理想可言，目的只在毕业后入银行做事。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此情此景，可以说与当下社会并无分别。

然而，正如北大教授刘东在《西南联大国文课》的导言中写到的那样，现实的关照恰好反证了理想的难求：“进行这种反向的史实提醒，并不意味着要去否认西南联大确乎享有过难得的自由；刚好相反，进行这种谨慎的反向提醒，倒是更有可能来向大家演明，联大教授当年在这方面的坚持，是何等的顶住压力与难能可贵。另外，也只有意识中同时保留住这两个侧面，有关西南联大的两种历史形象，

才能在我们笔下再次融合与统一起来。”

通才教育

西南联大为人所景仰的，在其名师高徒，更在其学术自由。在行政上，联大推行“教授治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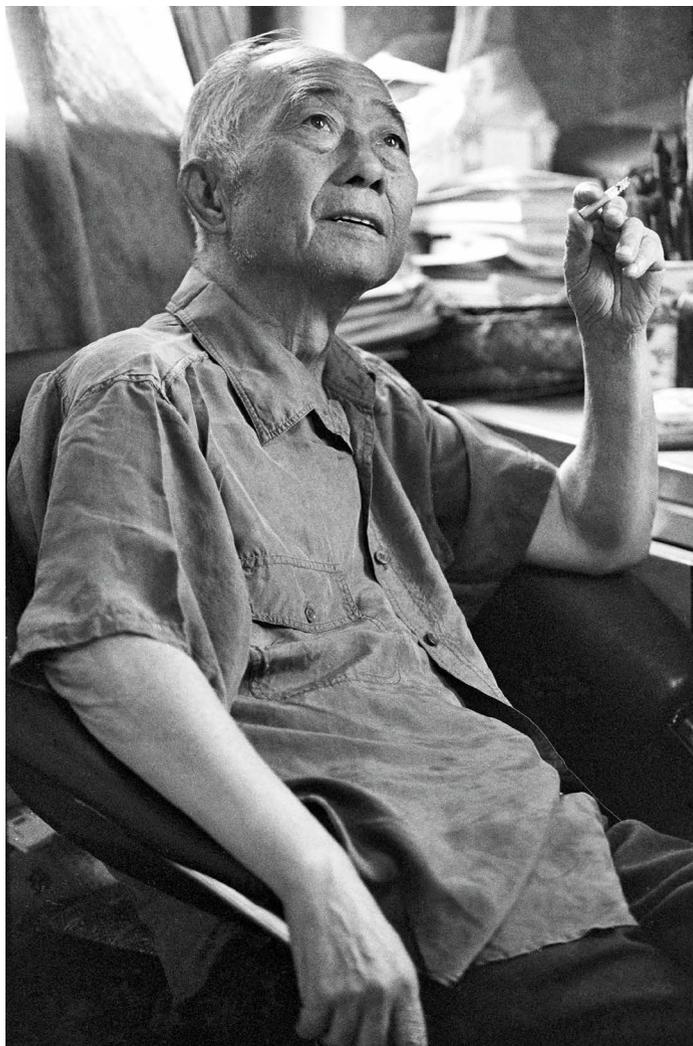
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议》中，说到了通才教育之益处：“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金岳霖则说：“如果我们回到教育本身，比如，追求新知、培养人格……那么，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过分强调一两个非常实用的方向，迫使青年转向这些学科，并不会给某些人带来他们想要的国民。”

杨振宁的回忆可为联大通才教育的一个成功佐证：“我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也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同黄昆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事业，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杨政宁将其今日的成就，归功于联大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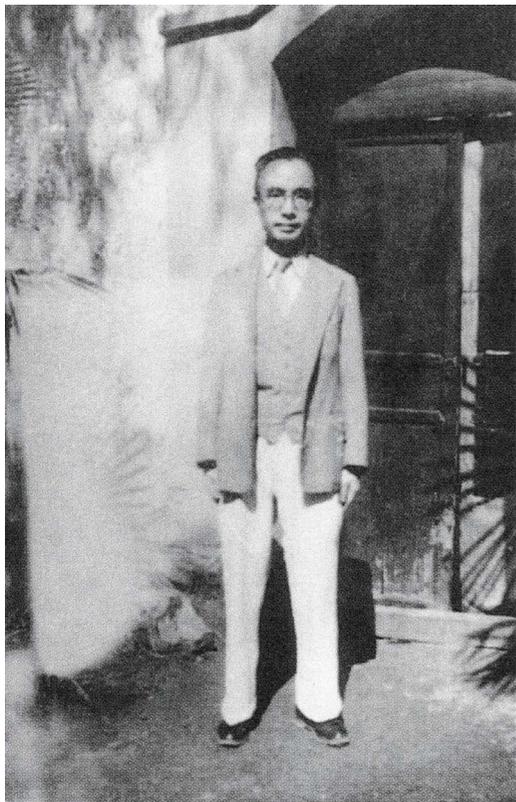
在学生比例上，西南联大学生以本科生居多。然而，教授传授的东西，不是千篇一律的统一文章，却均为各自研究成果。陈寅恪讲授隋唐史，第一堂课上便告诉学生：“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联大的“大一国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大教授许渊冲回忆说：“这一年度‘大一国文’真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十一时到十二时，地点在昆华农校三楼大教室。……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等等。”

“大一国文”为各系必修，从其选课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联大的倾向性。“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



(陆中秋摄/观中国)



(FOTOE供图)

左图：汪曾祺，1939年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右图：朱自清，1932年进入清华大学执教中国文学系，后南下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主任

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汪曾祺说，“大一国文”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书。

文言文部分，《诗经》选了“关关雎鸠”；《楚辞》选了《九歌》，而不是《离骚》。《论语》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重个性、轻功利的态度，对联大学生有着深远的潜在影响。魏晋时期不选庾信、鲍照，而选了陶渊明和《世说新语》，与此前选择有相通之处。唐代文章选柳宗元，弃韩愈。宋文依旧选李清照，选的却不是词，而是《金石录后序》，可谓独到，也影响了联大的文风。白话文部分，鲁迅入列，选择的却是一篇《示众》。选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并不意外，而选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颇为特别。

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联大教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大师上基础课。“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政宁的父亲杨武之教。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联大基础课的一个特点，是“大一、大二都要修国文和英文。”“不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

西南联大三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合作，因有许多好教授，更因教授之间能互相尊敬。因为学术水平相近，对于相互的能力认可，彼此心理上可接受。教授之间不会互论长短。“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胆，也无所谓。”玩笑和批评也是经常有的，但没有人会去“传小话”。朱自清的儿子朱乔生说，当时昆明很好的一个风气，是大家相互不嫉妒。联

大的教授们，甚至可以相互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在典型的学术环境里，这是非常罕见的。

联大的师生关系十分平等。陈省身教授回忆说：“西南联大就不分教授与学生，有的学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样，见面就随便谈谈，平起平坐的。”甚至有了“师生互教”的风气——学生的学问到了，也可以反过来教老师。教授大都爱才。罗常培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汪曾祺感慨地说，“夙慧”这种对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是不会出之于而今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对于学生，联大中文系教授要求有些散漫。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授）、声韵学（罗常培授）要按时听课，其余都较随便。朱自清的“宋诗”相对严格，他一首首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有定期的大小考。然而考试，也并不如何吓人，一般都只是在学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在这点上，北大的授课倒是一以贯之。

联大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重在有无独创性的见解，哪怕是怪论，也可以接纳。根据汪曾祺的回忆，一次某同学交了一篇李贺的报告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样天马行空的解读，令闻一多大为激赏。又有一次，一个同学在杨振声教授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的想象写了一篇报告《方车轮》。凭着这份报告，杨振声先生宣布该生期末可以免考。

潘光旦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可贵的“散漫”，实则是一种大智慧——“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自由主义是高悬在这座学府里的，看不见的精神旗帜。联大开设的课程、住宿、课外生活和实习工作，都鼓励自由选择。当其自由意志与中央权力发生碰撞，就产生了反抗。

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试图加强对全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控制。他领导下的教育部，规定国文和中国通史成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科学生要选修以中国导向的课程作为专业课。这个策略是使大学教育职业化。大学新设了三门必修课：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经过国民党的删减和修改，被设为课程的“三民主义”，已经成为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这门课的前身，实则是战前的“党义课”。

推崇欧洲教育体系的现代派学者认为，这纯粹是赤裸裸的“党化”教育，是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对此，联大师生大多表示了强烈反对，最后，这门

课变成了走过场。1942年，联大应蒋介石个人要求，又开设了一门伦理课。即使由冯友兰讲授，一度有人捧场，后来也门可罗雀，最终从课表上无声消失。1944年，联大还被迫举行过“总理纪念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方刻意把活动时间安排在学生午餐时间，会场上人影稀疏，校领导视而不见。

何兆武在年逾八十的时候说：“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那美好又在哪里呢？”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人前途是光明、美好的；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

他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所代表的价值是否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呢？学者易社强对此表示了否定。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之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是冯友兰。虽然冯也在西方受过教育，却是传统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之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

钱穆的一席话，亦可说明联大的通才教育，是对中国传统的传承——“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为学”实则“为人”：“中国传统，重视其人之为学，而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

联大最重要的特质是自由

——专访西南联大荣誉校友易社强

记者 刘周岩



易社强

易社强 (John Israel), 1935 年出生, 美国历史学家, 弗吉尼亚大学荣休教授。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 师从费正清 (J. K. Fairbank)。自 70 年代开始进行西南联大研究, 采访了数百位西南联大师生及相关亲历者。著有《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

大》(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被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校友何炳棣称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因易社强开创性的西南联大研究,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纽约校友会授予其“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称号。西南联大建校 80 周年之际, 易社强接受了本刊专访, 再度反思联大与诞生它的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 联大有当时中国最好的求学环境, 联大的学生日后也成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是好学生会聚在一起形成了好大学, 还是好大学培养出了好学生?

易社强: 正如陈岱孙曾说过的: “有人说, 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 是进步的, 是天才。这不见得, 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 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并不是独特的学生塑造了联大, 而是联大独特的教育环境培养出了最好的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有多所优秀的高校, 例如重庆的中央大学, 也拥有足以让其自豪的学术部门。如果说有一个因素让联大得以脱颖而出, 那就是自由——学术与政治上双重的自由。

三联生活周刊: 抗战时期的学生, 相比于他们前面的几代学生, 如“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 有什么特点? 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联大一代”吗?

易社强: 当谈到“一代学生”时, 这一代什

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边界是什么……都是难以完全界定清楚的。相当大的程度上, 学生的代际概念是相信代际存在者的一种人为构建。人们常说的“五四”一代和“一二·九”一代是以相应的两个学生运动定义的, 但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对“五四”一代而言, 因为“五四”最重要的参与者都出自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 所以不可能不把他们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对“一二·九”一代而言, 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斗争、思想潮流和学术发展对他们有着重要的影响, 尤其是日益加深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造成的威胁。

至于联大学生, 由北大、清华、南开迁至长沙、昆明的早期学生可以划归为“一二·九”一代。而到联大后期, 参与 1945 年“一二·一”运动时的学生则已完全不同, 他们被战争的这几年所塑造。由于云南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整个国家在抗战期间的政治经济形势, 1945 年的学生们在政治重心上要比 1937 年那一代更偏向于左翼。

我认为可以将联大八年划分为以下四段, 每一个时期的学生都生活在不同的氛围之中: 1938 ~ 1941 年, 联大同时也是抗战的最初岁月; 1941 ~ 1943 年, 1941 年皖南事变导致的压抑气氛使学生运动退潮; 1943 ~ 1945 年, 激进主义复苏; 1945 ~ 1946 年, 抗战胜利后国内问题成为重点。我不倾向于认为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联大一代”。

三联生活周刊: 在民国初年, 基本只有中上层家庭的孩子才能上大学, 但在西南联大时期, 很多人的生活都异常贫苦, 政府也出台了“贷金制”等资助措施使受教育成本下降。战争促使学生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吗?

易社强: 我得承认, 我没有对联大学生的家庭背景问题做过系统的研究, 无法下一个结论。但毫无疑问的是, 众多学生都深深体会到了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艰难和贫困。生活条件的变化会对思想和行为方式造成影响, 总的来讲, 战争使得学生们更能理解“无产阶级”的境况与观念。这些抗战时期的大学生或许可以和“文革”期间的“知青”做有趣的对比研究, 后者是我近期的一个研究课题。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今天人们如何总结西南联大的精神和气氛，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南联大内部的学生是多种多样的。《未央歌》《围城》《流星群》这些以联大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为我们呈现出来的联大生活图景是截然不同的。你怎么看待联大学生内部的多样性？

易社强：联大学生的亚生活圈子确实是极为多样的。有的学生无力负担一日三餐，有的则在滇缅公路上做生意成为富翁，政治上从三民主义青年团到地下党都有人参加。课余活动也是多样的，在联大这样一个没有艺术专业的学校里，戏剧、音乐、美术等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想指出的是，西南联大学生如此丰富多样的背后有两个深层的内驱力：抗战时期的大学生仅仅是清末民初中国传统文人之后的一代人，“通才”的概念在联大师生中仍被广泛认可；联大是一所自由

的大学，而自由正是一切多样性赖以存在的根基。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与美国的大学相比较的话，相比于那些研究型大学（University），西南联大是不是更像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它们都有学生少（每届几百人）、教学重过研究、以本科生为主等特点。

易社强：联大和美国文理学院形式上或许接近，但二者的内在逻辑并不相同。就联大而言，即便最终的研究产出难说有多突出，但研究本身仍具备重要意义，其价值在于战时情况下对研究的坚持。如果把联大和美国学校进行对比，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上万人规模的大学在美国也是“二战”后的产物，战时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规模也不大；联大和美国文理学院有一根本区别，那些美国学校是私立，而联大是公立——事实上是“国立”，这让它承担了全然不同的使命和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今天人们谈起西南联大，“通识教育”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即进行非功利的通识和人文（humanities）教育，以将学生培养成“人”。不过，在选系自由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偏好明显偏向于实用专业。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统计，1938～1946年间全校经济系毕业774人，哲学系毕业仅72人，很多校友在回忆中坦言这就是为了“好找工作”。西南联大进行了成功的通识教育实践吗？

易社强：这个问题触及“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一个核心困境。20世纪的通识教育实践，无论是在中国、美国或其他国家开展，都要尝试兼顾两个不同方向的问题：1. 如何给学生以知识和感知能力，使其能够在生活中拥有智识好奇心、审美感受力、道德自觉、自我实现；2. 如何让学生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西南联大的实践方法是，让学生主要在第一年接受一系列广泛的通识教育课程，同时通过自由的选修制度让学生随时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另外，学生中自由旁听的风气至关重要。由此，尽管选择经济系和哲学系的学生人数比例超过十比一，并不影响西南联大是通识教育方面的一个典范。

三联生活周刊：“五四”前后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和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是民国高等教育的两个突出代表。这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各有何特点？



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研究中国领域泰斗

易社强：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都是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章节。从北大到联大，既有传承，又有所发展。蔡元培在欧洲获得了对教育的理解，以此为基础在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了最具开创性的探索，是先锋式的人物。蔡元培所留下的众多遗产中，最宝贵的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联大延续了这一自由原则。就此而言，梅贻琦是蔡元培的直接继承者，二者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一致的。

然而两校当然也有差别。从教师构成上，蔡元培的北大既有帝制时期科举制度诞生的传统文人，也有受国外教育的西方博士。而到了联大，教师基本都是西方背景的学院知识分子。这种变化体现了这之间 20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总体趋向是和世界主流进一步接轨。总结起来，蔡元培北大意义在于“开创”，西南联大意义在于“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追求学术自由，一方面非常渴望国家强大，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所追求的这二者总是此消彼长，很难同时存在。西南联大的精神（自由与爱国）中是否有某种悖论性质？

易社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强盛国家的追求，我想以一句英文谚语作答：“Careful, you might get what you hope for.（许愿需谨慎——因为它可能真的会实现。）”你的这个观察是相当正确的，

即中国历史上很多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国家最动荡的时期（一个例外：盛唐兼具思想多元与国家强盛）。

回看最有生机的两段大学历史，蔡元培北大和西南联大，会发现前者处于虚弱的军阀政权之下，后者的环境是外敌入侵与地方割据，中央政府同样弱势。这两个学校都是在政治争斗的缝隙之中意外收获了学术上的自由，因为政治权力无暇或无力去控制他们。

中国的传统鼓励强力统治者去寻求统一，政治的同时也是思想上的统一。政治领袖竭力使自己成为道德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化身，而知识分子再去质疑权威思想时也就必然将自己置于险境，屈原和闻一多是两个突出的悲剧例子。这种模式下，学术机构很难源源不断生产批判性思想，而是常常变为政治势力的奴仆。1927～1949 年间的国民党政权并未完全使这种情况变为现实，这既出于国民党内部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也因为其虚弱无力而无法控制。

不过，这些历史过往并不表示一个强大且统一的中国就无法孕育出“北大—联大精神”的自由大学，或是说“联大模式”的大学就于国家无益。但要想实现二者的协调，定非易事。个人而言，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寻求国家强大和思想自由的志向充满敬意。■



松果

手作 演出 亲子 旅行 美酒 艺术

松果生活

与一万个生活家，一起创造美好生活！

松果是一个舞台，这里有：
有品质的文化活动
富含营养的生活知识
一万个迷人的生活家
有态度的生活方式

扫描二维码
扫描关注松果微信

扫描二维码
扫描下载松果 APP

（张幼斌 摄 / 新华社供图）



西南联大与战时中国高等教育

文 / 刘怡

西南联大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通过艰苦卓绝的“衣冠南渡”，完成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火种的保存；更在于其长达8年的探索和调试过程，始终不曾脱离对“北归之后”未来中国的深刻关切。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和挫折，都在西南联大的命运中有所折射；知识人对自身价值的再认知，也在非常环境中出现了嬗变。

烽火桃李劫

1938年5月19日之前，佟彦博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短暂一生中唯一一次亲眼看到日本九州岛的陆地，是从3500米高的夜空，在“马丁”139WC型轰炸机的座舱里。

锦州义县人佟彦博考入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的那个夏天，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刚刚完成，山海关外依旧是奉系军阀的割据地带。刚刚在皇姑屯事件中失去了父亲的新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张学良，于1928年8月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



以示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在当年9月14日的开学典礼上，面对包括佟彦博在内的1500多名师生，27岁的张学良慷慨陈词：“诸同学要专心研究，以图用之于来日，造成中国之人才、人民之中坚。求学事小，国家事大，如此才能不辜负国家兴学的本质，和职员教授的苦心。”

对这所建校刚满5年的大学的前景，新校长张学良和新学生佟彦博都是信心满满：坐拥四省财源的东北地方政权，每年为该校拨付160万银元的办学费，超出全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近八成。至1930年秋，东北大学已开设6个学院24个系8个专修科，在校学生约3000人，超过北大1000人之多；教职员工有400余人，其中不乏黄侃、章士钊、梁思成等知名人士。在沈阳北陵附近的新校区，张学良捐出父亲的私产180万银元，建造了德式风格的文、法两学院教学楼，藏书6.5万册的新图书馆，以及

可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使工科生佟彦博在书本学习之外，尚有实验室可操作仪器，有附属工厂可做全程实习。按照先前的惯例，倘若他在毕业时的成绩排在全系前列，便可获得校方的全额奖学金资助，前往日本、美国或欧洲做进一步深造。

然而1931年9月18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中国各高等学府中，东北大学第一个踏上了流亡之路。

“九一八”之夜，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甯恩承紧急唤醒校工，将200余名女学生转移到钢筋水泥结构的体育场更衣室内暂避。天亮之后，他召集全体学生和教职人员开会，发还此前暂存于会计处的膳食食，随后按照先妇孺，继而男性师生，再职工，最后校长的顺序分散离校。至9月24日，大部分教师已乘火车经北宁铁路南下平津，分散撤离的学生则夹杂在入关逃难的人群中，忍饥挨饿地挨向北平。

左图：1941年，日军随军画师冈本正二坐在已被占领的南开大学思源堂水泥栏杆上。背景中可见1937年7月天津之战中被日机炸毁的芝琴楼和秀山堂

右图：1937年11月15日，入侵上海的日军攻入私立复旦大学江湾校区

至当年10月，辗转抵达北平的东北大学学生仅有700余人，不足原在校生总数的1/3。他们中有300余人被临时安置到兵马司胡同原税务监督署旧址，于10月18日勉强复课，三餐只供给小米粥和咸菜。佟彦博便在这批流亡学生之列。

流寓北平的关外高校，尚不止东北大学一所。1932年2月，从锦州逃难入关的东北交通大学师生170余人，在暂厝北平彰仪门大街原国货陈馆所旧址后，被收纳为东北大学交通学院。加上1933年7月接收的原冯庸大学师生百余人，东北四省的流亡高校师生，最终齐集于东北大学旗下。自1933年9月起，更恢复从流亡至关内的东北籍青年中招考新生，在校学生逐步回升至1000余人。然而在丧失关外财源之后，这所寄人篱下的大学仅能从北平政务委员会、财政部和铁道部获得每月数千银元的资助，根本不敷使用。注册在东北大学名下的许多流亡学

生，平时须在清华、北大、南开等友校插班借读；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有生计无着者，则被转送不收学费的军校，弃文从武。1932年正式毕业的佟彦博，即于次年春天南下，考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

校舍沦陷、流离失所，仅是“七七事变”前夜中国大学蒙受的诸种早期磨难之一。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期间，在沪的中央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同济大学、劳动大学、中国公学等十余所高校的校舍大部分被日军炮弹击毁，经济损失超过660万银元。据战后视察一线的教育部参事陈泮藻汇报：“持志学院与上海法学院皆孤屹旷野，无战守之形势，而俱被轰炸，四壁徒立，足以见暴敌对文化机关有意毁坏之目的。”在日军重兵压境的背景下，大学并不因其地位特殊而可超然世外，相反已成为总体战之下的直接攻击目标。

但在文化、政治地位皆属特殊的华北，国民政府并无足够的舆论和组织资源说服各大高校提早做好应变准备。1928年“二次北伐”完成之后，华北在名义上虽已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范围，但实际控制权一直掌握在地方军事强人之手。1930年“中原大战”之时，反蒋各派曾在北平另立中央；张学良入关助蒋后，平津一带又为东北军所控制。待长城抗战后东北军主力渐次西移，南京中央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仍无法直接统合华北，只得默许由冯玉祥西北军旁支演变而来的第29军自领一方，充当对日“软抵抗”的缓冲。是故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前，华北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即使国民政府有提前搬迁高校的预案，实际上也难以推行。

华北尤其是北平在高等教育权重上的“倒挂”状态，同样给中央和各校之间的一致行动造成了阻碍。中国高等教育素以北方为发源地，1928年北伐胜利之时，仅北平一城就集中了28所国立大学的1/4。尽管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国立大学校长须“由国民政府任命之”，但在华北和东南的实施情况可谓大相径庭。1931年吴南轩经国务会议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后，遭到教授会和学生会的双重反对，甚至被护校学生拒之门外，实际到任不足三个月即挂冠而去。此后政府考虑到华北政治形势复杂，对北方各校的“教授治校”传统给予了更大尊重，基本没有实施与东南各校类似的“中央化”改造，遂使华北高校对南京的向心力变得愈发薄弱。1932年平津各大高校爆发索薪运动，教育部长朱家骅不得不亲自接见各校代表，承诺华北高校经费由

上图：1948年8月16日，已经返回北平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陪同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左）视察校园。西南联大时代，梅贻琦是三所学校事实上的最高负责人

下图：张学良出资为东北大学修建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化体育场——汉卿体育场



（视觉中国供图）



（新京报/视觉中国供图）



(Olive Archive 提供 / FOTOE)

1933年初，因关外日军向长城一线进逼，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文物紧急装箱南迁，暂存上海公共租界内

财政部天津海关直接拨付，并组建独立的委员会加以管理。各校人事与财政权既已自成一体，加之中央在政治、军事上对华北鞭长莫及，针对未来全面战争的应变机制，遂只有靠各校自行预判和准备。

身为流亡高校之始的东北大学，再度成为西迁事业的先行者。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平津形势风云诡谲，校秘书长王卓然开始在陕西华阴考察潜在的新校址，以备不时之需。自1936年2月起，包括工学院、补习班在内的部分院系和师生已提前乘火车转移至西安。“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由教育部接收，性质变为国立，此前留在北平的文、法两学院师生300余人自1937年1月起陆续迁移到中转站开封，在河南大学校园内挂牌复课。至当年6月第一学期结束后，这部分师生也转赴西安新校址，与第一批西迁人员会合。故东北大学的命运虽几经波折，但在抗战之初却得以获先行之利，保存了流寓北平之后的大部分火种。

而在平津诸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应变安排最有先见。“九一八”事变后，梅贻琦校长断定“未来能

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的读书，自不可知”，提前组织教授密商未来前途。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提出，“日本的侵略决不会远及湖南，且湖南生产稻谷，教职员和学生不致挨饿”，力主南迁长沙。1936年春，梅校长决定中止在北平建设文、法两学院新楼，将工程款40万元改在长沙建设农学院，并预留足够现有全体师生所用的校舍，以作战时机动之用。最初的选址地在韭菜园湖南圣经学院旧址，但对方索价60万元，超出预算。最后湖南省政府主动拨出岳麓山左家垅空地100余亩（今中南大学），无偿赠予校方，于同年起动工兴建理工馆、文法馆两处教学大楼，教职员、学生宿舍以及附属工厂和实验场。另外在1936年冬，清华还将校内所藏的部分图书、科学仪器打包装上货运列车，每节车皮40箱、每列10节车皮，乘夜间从清华园车站发出，转道平汉线运抵湖北汉口。日后待西南联大正式成立，这批教学设备被转运云南，在战时的艰苦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仿佛冥冥中注定，即使是已有应对计划

的清华，实际准备仍未能赶上时局的飞速变化。待1937年10月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辗转抵达长沙之时，左家垅新开工的校舍尚未建成。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的三校，最终选择了韭菜园圣经学院作为主校址，而这恰恰就是两年前梅贻琦最心仪的目的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

对平津两地大部分高校的师生来说，1937年7月在卢沟桥畔响起的枪声并不显得多么惊心动魄。这首先是由于华北最高军政负责人宋哲元独特的应变策略：直到7月下旬为止，他依然寄希望于事态能获得“和平解决”，第29军的准独立地位能得到尽可能长久的维持，因此一味息事宁人，释放和平空气。7月28日日军恢复大规模进攻后，第29军猝不及防，过早丢失阵地，更使北平提前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从“战事断不至于扩大”一说的流传，到北平实际陷落，其间仅经历了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足以完成内迁的前期准备。不妨与西迁过程相对顺利的南京中央大学做一对照：该校直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一个月的1937年9月中旬，才最终下定内迁的决心，并开始转移图书、仪器和师生。但由于淞沪和江浙战场为首都提供了缓冲，整个迁徙过程可根据前线战况灵活调配，故几乎未受到日军进击的影响。另外，中大校长罗家伦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匪浅，提前选定了未来的陪都重庆为内迁目的地，是故依旧可以延续“中央”规格的资源分配之利。而未来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校，在“天时”“地利”方面都处于下风，内迁过程自是远为艰辛，损失也更加惨重。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做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皆在现场聆听。然而对平津高校疏散一事，中央并无定见，仅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建议各省市教育厅局“于其辖区内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则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量加以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之用”。对鞭长莫及的华北，这仅是一纸空文；更何况在7月28日日军炮击南苑之前，北平是否属于“战区”都尚无统一意见。是故8月1日最后一支中国守军撤离北平之后，北大、清华两校的大部分教职人员和学生依然滞留在故都，进

退失据。南开大学在7月底的天津保卫战中，曾遭日机高空轰炸，秀山堂、琴楼和图书馆一部（一部分）被毁。7月30日天津陷落后，日军更遣骑兵在校内纵火，烧毁秀山堂、思源堂、西文图书馆、教授宿舍、南开中学及附近民房，使大部分校舍及图书馆所藏14.5万册中外文图书全部毁于一旦，损失高达法币663万元，占开战第一年全国高校经济损失总额的1/10。

校长与教职员分居南北两地，民间对战事的长期走向判断不明，直接延宕了三校师生内迁的进度。直至8月中旬，国民政府教育部才确定长沙、西安、湘潭等处为华北高校安置目的地，其中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北平大学、北师大、北洋工学堂、河北女师迁往西安，交通大学唐山分院、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迁往湘潭。此时日军已开始进驻各校校舍，举家逃难变得困难重重。加上部分教职人员存有不理解心理——1935年华北反日情绪高涨之时，青年学生和群众团体一度提出“西迁即是坐视华北沦亡”的口号，此时尚未彻底矫正过来——转移过程变得极为漫长。直到北平陷落两个月之后，仍有36位北大教授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沦陷区。嗣后校方又从长沙辗转送来一笔差旅津贴，这才为20多位单纯因家眷众多难以脱身的教师解了燃眉之急。当中文系教授郑天挺、心理学系教授陈雪屏等最后9人启程南下时，时间已经是当年11月17日了。

抗战爆发之际的中国，由于公共交通资源稀缺，一般民间人士的远程迁徙大体无法脱离有限的铁路干线。华北三校师生选择的路线亦是如此：无论出发时间是早是晚，他们都须先乘北宁线火车抵达天津，再做下一步打算。在8月提前上路的一批人尚可乘仍在通行的津浦路列车，抵达南京后再寻下一步去程；动身较晚者就只能在天津购买高价船票，乘坐尚未终止运行的外国邮轮去上海或香港，随后听天由命。11月才上路的郑天挺一行，抵达香港时粤汉铁路已被日机炸断，只得乘内河轮渡往广西梧州，再经公路入湘。待他们于12月14日最终抵达目的地长沙时，甚至连长沙临时大学也已经自顾不暇，准备向云南做进一步内迁了。

某种意义上，长沙临大是一所“临时”到连建校手续都带着匆忙痕迹的大学。1937年9月10日，在第一批内迁师生已经抵达湖南之后，教育部才以16696号令正式宣布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临大，并成立以三校校长为常委的筹备委员会，与教育部

代表杨振声共同主持办学事宜。临大首年开办费系自行政院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借出的法币 25 万元，仅相当于三校平时经费的 1/3 左右。而截止到 10 月 24 日三校学生报名时间的最后一天为止，仅有 1452 人到校，其中清华 631 人，北大 342 人，南开 147 人，在武汉招考到的大一新生 114 人，外校借读生 218 人。这个数字还不及北大一所学校战前在校人数的七成。第一批登记在册的 148 名教师中，清华占 73 人，北大 55 人，南开 20 人。另有近百名师生直至学期中途才抵达长沙入校。

11 月 1 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始上课。这一天也成为后来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所极尽简陋的战时学校——全校只设文、理、工、法商 4 个学院共 17 个系，法商学院、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和校委会在韭菜园圣经学院内，工学院另外 3 个系在岳麓书院，理学院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在更远的衡阳圣经学院分校。由于大部分教授将藏书和讲义丢在了北平，最初他们只能凭记忆和经验授课。但和其他许多大学比，他们又是幸运的：开战第一年，中国 108 所主要高校中有 10 所被彻底摧毁，91 所部分遭到破坏，25 所被迫停办，半数学生沦为难民。而在长沙临大，教授至少还能领到相当于战前七成水平的工资，学生也仅需缴纳象征性的学费，还有藏书 6000 册的简易图书馆可供使用。这已经是相当奢侈的待遇了。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直到 1938 年 4 月重新迁移至昆明时为止，联大学生的规模一直在持续缩减中。部分学生基于义愤，选择投身军旅或者参加抗战辅助机构；也有一部分经武汉转往延安，进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学期结束后，当湖南即将成为前线、学校需要继续向云南转移的消息传来时，将近 1500 名学生中只有 820 人愿意继续做长途跋涉。按照“以铁路线为纲”的传统策略，他们兵分三路：女学生、身体较弱者和教职员共 700 余人先乘粤汉路列车前往广州，再从香港乘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今属越南），最后称滇越铁路列车抵达昆明。清华大学经济系主任陈岱孙和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汤用彤、贺麟等十几人先从长沙经公路前往广西与当地政府做洽谈，随后由镇南关抵达法属安南，再乘滇越路列车往昆明。另有 244 名体质较好的男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跟随东北军将领黄师岳、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3 位军官和十几位教师，步行及乘船 1600 多公



抗战中期，在西南大后方参加军训的内迁女大学生

（视觉中国供图）

11 月 1 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始上课。这一天也成为后来西南联大的校庆日。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所极尽简陋的战时学校。

里，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直达昆明。这个“旅行团”的成员还包括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等人。途经湘西和贵州的荒凉地带时，他们曾多次遇险，但最终于 1938 年 4 月 28 日圆满抵达目的地，全程历时 68 天。

1938 年 5 月 4 日，即“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后一周，已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的长沙临大正式开始上课。学校理、工两大学院和行政机关设在昆明本校，文学、法商两学院在蒙自，自此开启了长达 8 年的云南生涯。同样是在这个月，1938 年 5 月 19 日深夜，前东北大学流亡学生佟彦博和他的战友徐焕昇各驾驶一架“马丁”139WC 型轰炸机，越洋飞抵日本九州岛上空，投下数千份反战传单，开创了外国军用飞机远征日本领空的历史。中国流亡大学及其学生的命运，从 1938 年的夏天开始同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新部长和新考验

选择发达程度较低、距离权力中心尚有一定距

左图：1938年5月，武汉各界热烈欢迎远征日本归来的英雄飞行员徐焕昇（右三）、佟彦博（左二）及机组人员。佟彦博最终于1944年在四川新繁县坠机殉职。

右图：1938~1944年出任国民政府战时教育部的陈立夫。



（秦风老照片馆 FOTOFE）

离的昆明，而不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陪都重庆作为西南联大的最终落脚点，依然反映了华北三校学人的现实政治“冷感”：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的前10年，他们始终抗拒“被中央化”的命运；关心国是，但避免卷入政府内部的复杂倾轧以及权力政治。如今亦复如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最初对接纳联大态度冷淡，但教育厅厅长龚自知表示了欢迎，并认为一所知名学府的到来不仅可以提高本地的高等教育水平，还有助于扩大云南在战时中国的影响力。有鉴于此，龙云最终在置办校舍、为师生提供生活便利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帮助，并为政治倾向激进的师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联大并无政治权势，但知识分子本身构成了一种舆论力量，并因为龙云的庇护，形成了一个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共同体。

但国民政府显然不可能容忍华北高等教育的准独立状态在大后方得到延续。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即有激进人士主张停办大部分“与战事无关”的学科，令学生改入军校或应征入伍；后方大学仅保留化学、机械工程、土木等可直接转用于军事的实用系科，以实现“教育体制战时化”。由于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坚决抵制，这项动议最终无

果而终。但王世杰也在1938年元旦因党内压力而辞职。6天后，蒋介石的亲信、长期担任国民党党务系统主管的陈立夫出掌教育部，自此开启了他和联大固有的自由教育风气之间的拉锯战。

作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陈立夫在30年代初就已经表达过他对华北高校教育模式的不满。他曾斥责清华模式为“美国殖民”“文化租界”，又认为北大的文、法两学院崇尚空谈，有害国是。最重要的是，陈立夫执掌教育部的思路，恰好与国民政府的战时总动员方针高度一致——1938年4月，国民党在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著名的《抗战建国纲领》，宣布将“团结全国力量，集中意志推行国策”，意在把未来的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发展方向统一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并以国民党作为战时唯一的权力中心。大会闭幕后不久，陈立夫即引用蒋介石的谈话“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开始颁行《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根据该纲要，各个国立大学必须推行统一的教师资格制度，设置统一的必修课程，使用统一的、“注重中国传统与现实”的教材，并实施统一的毕业考试。有违抗者将被剥夺获得国家拨款的资格。

1939年8月，陈立夫治下的教育部发布了战时第一份官方大学课程目录，历史、物理、化学、经济四个系的专业课程被削减了80%以上，同时增加了三门必修课：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为“节省师资”，国内研究生教育原则上不再提倡。联大校方尽管进行了抗争，但原则上依旧不得不采纳。毕业统考制则遭到了自始至终的抵制，以校委会常委的身份实际行使校长职权的梅贻琦拒绝上报学生毕业考试的成绩，最终教育部只得默许西南联大的应届毕业生自动通过该项考试。至于影响更大的“教师资格考核”，则在龙云的帮助下对付过去：教育部宣布西南联大聘用的171位正副教授中只有31人“资质合格”，可以按月获得薪酬；龙云则公开宣称，倘若政府不愿为文化人解决生计问题，云南省可以“代劳”。此事最终雷声大、雨点小地过去。

1939年12月，陈立夫在造访云南期间，特地前往联大发表演讲，大谈“礼义廉耻”与“国家至上”，但并未收获积极反响。事后他指派党务系统干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在《中央日报》上撰文，攻击“今日的青年思想的歧误，与其说是青年的思想问题，不如说是教师的思想问题”。但联大自有其继续抵抗的资本：教育部名义上掌握着国立大学的历年应拨经费，然而西南联大账面上的办学费用仅为每年120万法币，根本不敷使用，且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而日益缩水。联大校委会一直在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知名校友和外部声望，从金融界自行筹措资金。从1939年初到1946年联大结束，仅以清华大学名义举借的债务就高达1820万元，而联大在战时的总结款仅利息就累积到了1400余万元。财政既不受钳制，对陈立夫自也不必谄媚。

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大师生自我隔绝于抗战事业之外。实际上，在真正需要他们贡献才能的领域，无须政府的威逼利诱，他们也会全心投入。工学院设置了新的航空工程系和电讯专修科，以直接服务于抗战。1943年，工学院以清华大学校友的捐款为依托，组建了一家服务社，负责为新到昆明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其前身是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官兵修筑营房、制造气象和探空气球以及军民两用产品，所得的收入用以贴补教职员工的日常开销。当美国陆航开始在云南扩建和修筑机场、作为对日战略反攻和大规模空袭的基地时，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师生也提供了帮助。这不仅出于抽象的战争需要，也是对自身战时经历的

感同身受——从1938年9月开始，作为大后方的昆明就开始遭受进驻华中的日本海陆军航空兵的狂轰滥炸。1939年10月13日，师范学院校舍和多幢宿舍楼被空袭炸毁，许多学生无处栖身。1940年10月13日，27架日机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清华办事处、学生食堂以及一街之隔的云南大学礼堂夷为平地，以至于一个月后，校方不得不紧急将700多名大一新生转移到邻省四川的叙永县，在当地设分校教学，直至1941年8月方告迁回。1942年日军在东南亚战场连续获胜的几个月中，校委会甚至已经在做第三次内迁的打算。

1944年10月，刚刚经历豫湘桂惨败的国民政府发布《告知识青年书》，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鼓励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青年参军入伍，为可能的对日反攻做准备。此前联大会议已经通过决议，要求毕业班身体健康的男生投笔从戎，为第14航空队和驻缅美军担任翻译。最终，联大共有303位学生（包括28名女生）和5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上图：1943年2月，昆明巫家坝机场的中国地勤人员在为美国陆航第14航空队的一架P-40型战斗机清理机枪枪膛

下图：1947年11月1日，为庆祝西南联大建校十周年，清华大学周末摄影社在同方部举行彩色照片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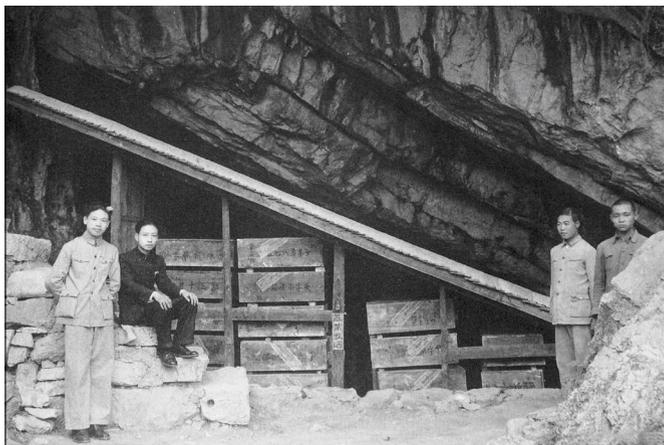
位教师报名参军，超过政府下达的指标，也足以印证他们对国家的责任。

但对大部分在校学生和教师来说，战时最具直接影响的考验乃是通货膨胀。联大抵达昆明之初，教育部批准每个月发放给每名学生4元到10元不等的津贴，但这一额度在物价疯涨之后并没有进行调整。1940年法国沦陷后，控制印度支那的维希政权与日本达成谅解，陆续关闭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昆明的物价在两年内暴涨500%以上。教育部决定将最高津贴增加到每月14元，但已经连支付食堂的伙食费都不够。经过训导长陈雪屏的争取，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津贴增加到每月32元，但多数学生依旧过着“三月不识肉味”的生活。

陈立夫甚至想到了通过控制津贴发放来推行“战时教育改革”的方法——1943年秋，教育部宣布为理、工、农各科的大部分在校学生加发生活补助，而文科、法科和商科学生只能领到基本的伙食费，比例还只有全体学生的40%。与此同时，昆明的物价正以火箭般的速度疯涨：到1944年3月，市面物价较战前已暴涨400倍，学校食堂向学生收取的最低伙食费为每月1000元，而教育部提供的津贴仅为614元。昆明的生活成本甚至超过了作为陪都的重庆。到抗战胜利前夕，联大学生每月最低的伙食费标准已经突破了3000元，而教育部的津贴只够对付一半。国民政府不得不借着“庆祝胜利”的名义，连续6个月每月发放1万元粮食补助，这才避免了饥饿与胜利同时到来的窘况。

“北归”前后

对联大师生、尤其是其中年龄较长者而言，“衣冠南渡”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意象。抗战胜利后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起草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即云：“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换言之，在传统知识分子看来，外族入寇之际，士大夫实有辗转流离、委曲求全以保存诗礼文明的道德义务。但东晋、南宋、南明纵然能求得一时偏安，最终仍不免亡于物质力量更强的对手，又使南渡之举天然地带有悲剧色彩。是否“南渡”者必不能“北归”？



1938年春，原藏杭州文澜阁的一套《四库全书》由浙江大学工作人员辗转运抵贵州，存放于贵阳北郊山中的地母洞

文化机构的迁移

抗战期间，除了大学的迁移，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文化机构的内迁也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页。中研院的迁移历史非常复杂，各个机关的转迁路线、时间并不一致。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体质人类研究所迁入的李庄，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

李庄是一座古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郊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抗战时期（主要从1941到1946年），国立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多家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内迁至此，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傅斯年、陶孟和、吴定良、梁思成、林徽因等云集李庄达六年之久。

李庄时期的中研院机构，会聚了一批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历史学家梁思永和劳干、语言学家李方桂等，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仍创造了丰厚的成果：傅斯年组织出版了《六同别录》学术论文集，收录了中研院16位专家在李庄的27篇研究成果；吴金鼎带领考古工作者，将抗战期间在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工作写成《云南苍洱考古报告》；社会所在陶孟和的领导下，完成了《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

抗战时期，李庄仅有人口3000人，是一个民风淳朴、民智不开的地方，人们孤陋寡闻、思想守旧。随着众多学府、文化学术机构迁入，人口猛增至1.5万人，市面也繁荣起来，常有菜农、勤杂小工出入。由于众多机关学校的迁入，李庄的风气逐渐开化，学术名流及其子女的生活方式，他们与当地女性的通婚，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许多陋习。

由此可见，这些文化机构、文化名流的迁入，对李庄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8年初抵昆明之际，并非所有人都能给出肯定的回答。然而俟中国一地的抗战发展为影响全亚洲的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的败亡，已经仅是时间问题。知识人的道德义务，也已不局限于感怀“南渡”，而是要为“北归”后民族精神的再造预备资源。这也是1943年之后诸多联大师生日益介入现实政治的动力。

同样是在1943年3月，蒋介石藉由文士陶希圣之笔，抛出了洋洋十万言的《中国之命运》。该书前四章大谈中国在不平等条约下遭遇的百年屈辱史，后四章则极言“革命建国”道路及其前景，既宣扬国民党作为领导者的正当性，又对“建国”的最终目标加以规划，与1938年的《抗战建国纲领》恰好形成逻辑上的闭环。按照蒋氏的说法，1943年初英美宣布废止对华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抗战建国”事业的重大胜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在抗战后半程，全国军民的最大任务，乃是以他本人为最高领袖，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完成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再统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不服从因素，都将在“建国”过程中被渐次压服和消弭，再无存身的空间。

素来倾向于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联大师生，曾认为《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不过是非常时期的特殊安排；无谓的政府考核和国民党团体的高调活动固然不为人所喜，但随着战争结束也将告一段落。但从蒋介石本人的公开陈词中，他们看出了“战时要当平时看”一语的不祥含义：国民党力图将对政治、财政和舆论的垄断永久化，逼迫知识分子站队，拒绝服从者将永无翻身之日。这显然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北归”之后的图景。以1944年的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为开端，“重估五四价值”的辩论开始在师生中热烈展开，参与者不仅有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也有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自由主

知识人的道德义务，也已不局限于感怀“南渡”，而是要为“北归”后民族精神的再造预备资源。这也是1943年之后诸多联大师生日益介入现实政治的动力。

义者。当年“双十节”庆典，5000余名师生在云南大学操场举行集会，并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吁召开国民大会、建立联合政府。以“政治冷感”著称的华北知识人群体，正在热烈地拥抱中国政治。

如果说蒋介石在1938年抛出《抗战建国纲领》之时，刚刚开启全面抗日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和知识人尚可以勉强说服自己，将注意力暂且集中于军事；那么在《中国之命运》出炉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专横本色已经与它的贪腐成风、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以及豫湘桂战场的惊人惨败暴露得同样充分。因此，在联大历史上就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反差：在颠沛流离、四处躲避日机轰炸的中前期，师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尚可转圜；反而是在胜利在望的中后期，双方的矛盾最终发展到无法纾解。而爆发的最顶点，则出现于抗战胜利之后。

1945年9月30日，驻昆明的中央军第五军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名，派兵包围五华山云南省政府。10月6日，长期扮演联大政治保护人角色的“云南王”龙云交卸省政府主席一职，转赴成都赋闲，自此再无人可以在联大师生与国民党暴力机关之间充当缓冲带。同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各校师生共6000余人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晚会，邀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位教授演讲，但被第五军驱散，并向报章放出“此系警匪冲突”的谰言，引发昆明全城罢课。12月1日，新五军士兵和便衣警察冲入校园，以棍棒和石头袭击学生，并向校门口的人群投掷手榴弹，造成一名中学教师、一名中学生和两位联大师范学院在读生遇难。积累近7年之久的矛盾，终于以最惨烈、也最令人悲愤的方式得到了彰显。

尽管还要过足足半年时间，到1946年5月4日，这所南渡的学校才会重新一分为三、再度沿着铁路线北归；尽管在纪念碑的碑文上，冯友兰发出了“神京复，还燕碣”的欣慰感慨。但在一代知识人心中，经历过“一二·一”惨案的震动，他们所获得的终究已不是最圆满的、寓于精神层面的“北归”。未能北归的还有经历过湘黔滇三千里之行的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是他亲手将1178个字的纪念碑碑文镌刻在联大旧校园内的石碑上，也是他在1946年7月15日最终被两名国民党军官暗杀于昆明，只余骨殖北返。华北知识人群体追求学术自由和精神独立的事业，在一场胜利的对日战争之后，最终以手榴弹爆炸声和枪声画上了复杂的句号。■

文物的迁移

发生在同样背景下的“古物南迁”和“古物西迁”，跋山涉水万余公里，辗转于十余个省市，为保护百万国宝历经千难万险。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7月进犯热河，北平（即北京）面临险恶局势。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率先提议“古物南迁”，并开始挑选、装箱，经媒体披露后，社会上形成压倒性的反对意见。诸如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名人起初对此质疑，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开始也持怀疑态度。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甚至发起组织了“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在太和门集会誓与国宝共存亡。

1933年1月，日本军队突破榆关（即山海关），北平岌岌可危。故宫博物院紧急呈请行政院并获准立即启动南迁计划。反对南迁的势力联络搬运工会抵制，直至2月5日晚，北平戒严，反对南迁的代表人物被拘禁，第一批南迁文物被运到前门西站装上专列。

文物存亡在此一举。

阶段一——南迁：

1933年2月5日到5月23日之间，从北京往上海共运送了五批古物，包括古物陈列所、中研院史语所、颐和园、国子监、先农坛和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等机构的古物和档案，总数为19816箱余72包15件13扎。1936年12月，大部分南迁古物正式迁入专门在南京朝天宫新建的文物库房收藏。

1935年底至1936年初，国立北平图书馆将376箱馆藏古籍（包括《永乐大典》）、146箱西文书刊和64箱梁启超寄存书籍，通过中国旅行社的渠道分批南运到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租赁库房内。

同期，河南博物馆开始南迁计划。河南博物馆68箱文物精品从当时的省会开封陆运至郑州，再经铁路南运武汉，存放在汉口法租界内。

阶段二——西迁：

南迁古物在南京刚安顿了半年，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南迁古物不得不从8月14日开始，紧急向西转移。

古物西迁先后分三路：

南路：1937年8月，第一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运到汉口，后转移至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接着经桂林转移到贵阳、安顺华严洞，直到1944年南路古物由15辆卡车于当年年底最终运抵四川巴县飞仙岩。

中路：1937年11月，第二批西迁古物由南京沿江先运到汉口，后运到宜昌，再分批运到重庆向家坡，后中路古物先被转移到宜宾，9月最终运抵乐山安谷乡大佛寺及六姓宗祠存放。

北路：1937年12月，第三批西迁古物用火车从南京

经郑州运往宝鸡，次年又运往汉中的文庙和褒城的祠堂，不久古物先转移到成都大慈寺，1939年最终运抵峨眉县的大佛寺和武庙存放。

其他：南京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前身）院藏文物分水陆两路，抵达四川宜宾的李庄；河南博物馆存放在武汉的68箱文物也西迁重庆，存入重庆的中央大学磁器口校舍；国立北平图书馆南迁到上海租界的古籍图书全部未来得及西迁，于1938年初就地化整为零，分散收藏在秘密租用的民房内，后战争扩大，被迫从南迁古籍图书中精选3万多册装成102箱，于“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以替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购新书的名义报关，于1942年6月全部运抵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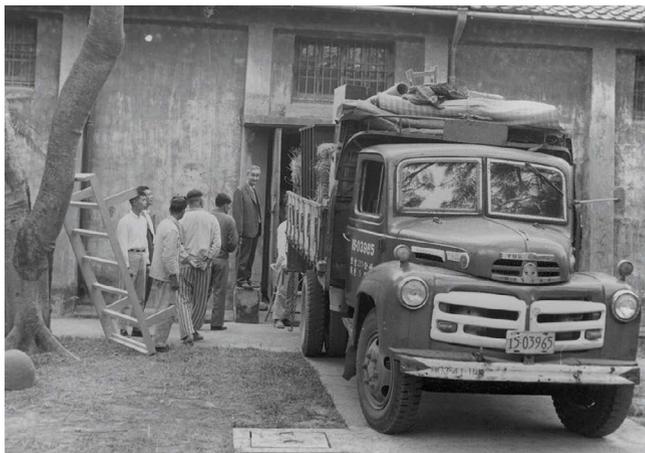
阶段三——回迁：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次年北平和南京的西迁古物全部集中到重庆，主要从水路东返，于1947年底全部运回南京。

内战旋即爆发，国民党败退台湾，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北平南迁古物中2972箱共约60万件古物（其中近40万件档案文献、15万件图书古籍、6万件铜瓷书画玉杂）分三批运往台湾，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主体。

剩下的北平南迁古物中，近20万件书画、铜器、瓷器、图书、档案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1953年和1958年分三次运回故宫博物院。至今仍有20多万件南迁古物（大部分是瓷器）留在南京。

河南博物馆存渝的部分文物于1949年11月运往台湾，成为1955年建馆的台北历史博物馆的藏品；留在大陆的文物后来分藏于河南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暂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古籍于1965年11月运到台湾，存入台湾“中央图书馆”。



1965年，抗战时期南迁四川、1948年底又转运至台湾的一批故宫文物被装车运往新建成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庄灵摄/新华社供图）



锡安重生之路：从《贝尔福宣言》到巴以分治

文 / 刘怡

犹太民族国家的诞生史，并非一部简单的热血传奇。阴谋与正义、勇气与狡计、残忍与牺牲，都可以从中窥见端倪。依靠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形势剧变，消失 1800 年之久的以色列国终于在巴勒斯坦重生，整个中东世界的发展轨迹自此出现了决定性变化。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2



(视觉中国供图)

1.1925年4月9日，英国前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戴墨镜者）在耶路撒冷与犹太地区专员斯托尔斯的陪同下造访耶路撒冷圣城。贝尔福在1917年11月2日签发的公开信是犹太人得以在巴勒斯坦建国的重要历史依据

2.1942年，一批匈牙利犹太人被运抵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灭绝营。整个“二战”期间，累计有超过110万平民在奥斯维辛被送入毒气室，其中90%是犹太人

3.1912年，一户从俄罗斯迁徙至巴勒斯坦的犹太农民家庭在基布兹内开垦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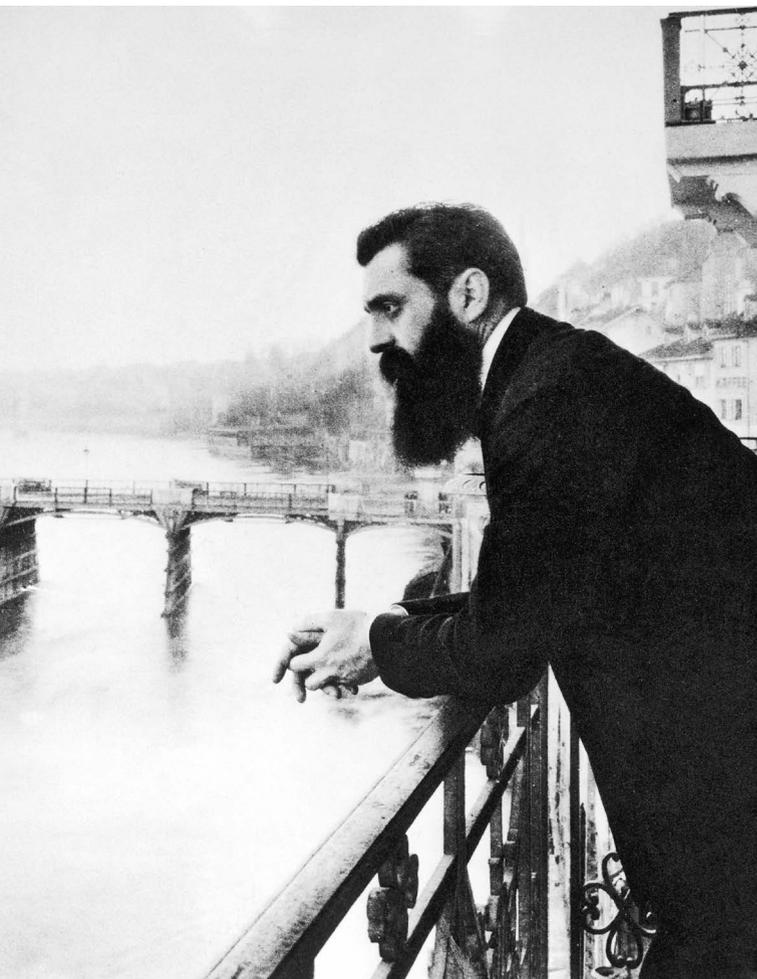
3

从来没有任何一封政府要员写给民间人士的信函，曾经引发过如此深远的影响和层出不穷的争议。以至于整整100年后，依旧会有人为之激动、愤怒和呐喊。

2017年11月2日，在《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发表满100周年之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全球巴裔人士发出倡议：在其所在国的英国使领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谴责伦敦当局对巴勒斯坦人“长达百年的放逐”。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

安拉，3000名抗议者聚集在英国领事馆门口，焚烧特蕾莎·梅首相和阿瑟·贝尔福伯爵的纸质人偶。在伯利恒著名的围墙酒店附近，抗议者头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面具，向一群巴勒斯坦小难民表示“忏悔”。在耶路撒冷，一位女性示威者拉瓦达·乌达的发言引起了广泛共鸣：“这片土地不属于贝尔福。我们巴勒斯坦人将继续常居于此，并抗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是的，在《贝尔福宣言》诞生的1917年11月，



（视觉中国供图）

1897年，正在瑞士出席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西奥多·赫茨尔。他撰写的《犹太国》一书被视为近代最早的犹太民族独立建国方案

巴勒斯坦并不属于英国或以色列，但阿拉伯人同样无法以这片土地的主人自居。直到1918年10月底土耳其与协约国签署《穆德洛斯停战协定》为止，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巴勒斯坦地区一直是奥斯曼帝国所辖的自治旗。《贝尔福宣言》并没有把巴勒斯坦的主权许诺给犹太人，甚至也没有给犹太民族国家的诞生设定时间表。倘若阿拉伯人愿意牺牲蝇头小利，他们在1937年就可以获得足够理想的领土分配方案。

然而把持阿拉伯社会公共舆论的权贵们显然缺乏审时度势的眼光。和犹太人一样，阿拉伯人以暴力抗争促使殖民当局提前结束了其政治托管，但他们同时还拒绝配合英国政府乃至联合国的一切调查

活动。相比之下，犹太人不仅懂得何时应当不遗余力地抵抗，更明白动员国际舆论、唤起普遍同情乃至适时做出让步的意义。

贝尔福勋爵并未预见到他那份简单信函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他在1930年3月病逝时，《泰晤士报》《卫报》和《每日先驱报》刊登的讣文甚至对宣言只字未提。在那个世人尚显懵懂的幽暗历史节点上，以色列的“国父”们捕捉到了节奏，顺势书写出了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100年后，876万人口的以色列国已经成为中东唯一的高度发达国家，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因此而改变了。

重回锡安山下

声名在外的《贝尔福宣言》，全称为《英国外交部致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锡安主义者联盟的公开信》，以时任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名义在1917年11月2日签发。彼时，中东英军进攻巴勒斯坦的战役即将进入关键阶段，伦敦当局希望通过向全球犹太人释放善意信号，来减少进军巴勒斯坦面临的困难，同时推动美国犹太政商精英为协约国提供更多支持。但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故地的浪潮却并非始于此时，它在19世纪80年代即已兴起。

“巴勒斯坦”（Palestine）一词的词源，来自罗马人对古犹太王国统治区（即《圣经》中记载的“应许之地”迦南）的误导性称谓“非利士丁”（Philistines）。136年第三次犹太—罗马战争结束后，聚居于迦南地区的犹太人被迫向全球各地迁徙，进入了“大流散”（Diaspora）时代；在其曾经居住的故土上，罗马帝国禁止其子民继续使用“犹太领土”的说法，转而讹称非利士人才是迦南的土著居民，巴勒斯坦之名即由此而来。而被剥夺家园和名谓，在犹太民族1800余年的飘零史上甚至已是最“温柔”的虐待：尽管犹太人凭借其商业头脑和文化、艺术才能，在暂时栖身的诸多国家取得过不俗的成就，但其形象总是被恶意地和“杀害耶稣之人”以及“爱财如命的夏洛克”联系在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驱逐和屠杀，每隔数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进入19世纪中叶，随着中东专制帝国陆续进入民族国家化转型，拒绝被同化的犹太人再度面临来势汹汹的迫害。1881年，俄国爆发受政府支持

的排犹运动，在短期内即有 200 多个犹太人村镇被夷为平地。自感已无法立足的犹太人自 1882 年起，即以各种形式逃离东欧。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为止，530 余万俄国犹太人有半数移民美国，另有 20 余万人进入法国和英帝国控制区。

在这波新的迁徙浪潮中，“热爱锡安运动”逐渐成为一股意义重大的力量。这一运动的发起者是一批受到早期社会主义思想感染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从根本上摒弃了融入欧洲民族国家的想法，主张返回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南郊）下的巴勒斯坦故地，通过建立定居点来为同胞营造避难所。财力雄厚的西欧犹太裔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为运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他们从奥斯曼帝国手中购下贫瘠的巴勒斯坦土地和荒漠，从东南欧迁来一系列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家庭，从零开始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辟农场和村庄。中文里的“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概念，其词源便是“锡安主义”（Zionism）。

1897 年，在匈牙利记者和律师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组织下，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会后成立了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当时英国提议在乌干达划出一片无主土地，作为未来的犹太人国家的疆域，但被来自俄国和东欧的锡安主义者拒绝。后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认为民族独立和自由只能靠自己争取、不能由外国政府恩赐。自 1909 年起，他们开始在巴勒斯坦北部建立一系列被称为“基布兹”（Kibbutz）的集体定居点，实行男女平等、财产公有、按需分配。日后成为以色列国领导人的本-古里安、梅厄夫人和贝京都曾早期的基布兹居民。到 1914 年，巴勒斯坦的犹太裔居民已经增加到 9 万人，相当于阿拉伯人口的 20%。

“一战”的爆发，使锡安主义者中的亲英人士得以异军突起。以曼彻斯特大学化学系教授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为首的英国锡安主义者认定，协约国必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并对巴勒斯坦未来的命运拥有最大话语权。倘若犹太人能对战争进程有所贡献，在战后的中东领土安排上也必能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他们纷纷以不同的形式投入大战：魏茨曼将自己发明的丙酮合成工艺赠送给了英国海军，使英国无烟火药的产量一举增加了 5 倍以上。来自俄国的移民作家雅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则在伦敦招募了一支下辖 5 个营的犹太军团，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巴勒斯坦战役。

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 年，在和魏茨曼、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等英国锡安主义者领导层进行过一系列协商后，贝尔福勋爵于 11 月 2 日签发了那封公开信，承诺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民族家园，并愿尽最大努力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但在当时，这很难说是一项一锤定音的承诺：在 1915 年的侯赛尼-麦克马洪通信中，英国曾经承诺巴勒斯坦东部将成为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尽管《贝尔福宣言》提出了关于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承诺，但并未就此设定时间表，更没有划出这一板块的地理边界。换言之，只要英国政府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通过增加新的补充条款，使独立的犹太国在诞生之前就变为泡影。

“犹太民族之家”

1922 年 7 月，国际联盟正式批准英国对伊拉克、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Mandate），其中巴勒斯坦的行政区划限定为约旦河以西。在这一地区，犹太人可以自由迁入并建立定居点。从那时起到 1939 年，陆续有三波 37 万余名犹太移民从全球各地到来。他们从阿拉伯人手中购买了大片荒地，将它们开垦成农庄和果园，继而以一系列相连的“伊舒夫”（Yishuv，意为社区）为基础，建立起拥有完善轻工业和交通设施的新城市。

这种趋势在维持了十余年之后，渐渐引起了本地阿拉伯裔居民的敌意。敌意并非基于经济原因——最赤贫的阿拉伯农民和手工业者恰恰欢迎犹太移民带来的工作机会和高收入——而是政治精英刻意操纵的结果。犹太社区创造的经济奇迹，侵蚀了阿拉伯寡头权贵和知识分子对巴勒斯坦土地、信贷乃至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从而使他们如坐针毡。这些人日益聚拢在新任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宗教法官兼释法学者）阿明·侯赛尼（Amin al-Husseini）周围，企图用暴力手段终止犹太人的移民进程。

敌意并非基于经济原因——最赤贫的阿拉伯农民和手工业者恰恰欢迎犹太移民带来的工作机会和高收入——而是政治精英刻意操纵的结果。



【视觉中国供图】

进入 1936 年，一场以侯赛尼领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HAC）为魁首、席卷整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大暴动终于爆发。阿拉伯武装人员频繁袭击犹太人基布兹和企业、学校，破坏巴勒斯坦的公路、铁路和输油管线，枪击英国警察和官员，一度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若干地方政权。1938 年，英方增派两个师正规军、空军分队和情报人员进入巴勒斯坦，与犹太人自卫武装“哈加纳”（Haganah）联手作战，在一年内将暴动彻底镇压下去。在历时 3 年的骚乱中，有超过 5000 名阿拉伯武装人员和平民被打死，1.5 万人受伤，犹太平民约 300 人死难，英国军警伤亡 800 余人。

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来说，这是一场因小失大的无谓冒险。1937 年初，英国一度已经考虑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并提出了相应的领土分配方案：耶路撒冷仍由英国控制，在加利利和西部沿海平原建立一个较小的犹太国，除此以外的巴勒斯坦

主体部分组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以侯赛尼为首的阿拉伯寡头不愿失去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耶路撒冷，对英方的一切接触都采取顽抗态度。结果在随后的冲突中，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治精英被一扫而空，直到 10 年后也未能恢复。待到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巴勒斯坦人已经沦为了伊拉克和约旦的附庸，彻底丧失了自主性。

但巴勒斯坦的动荡毕竟也让英国政府感到了由衷的担忧。为了在随后的对德战争中确保中东能源和运输航线的畅通，他们仍需要安抚阿拉伯人。1939 年 5 月，张伯伦内阁发布白皮书，宣布将逐步关闭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时间窗，其中在 1944 年底之前仅允许继续迁入 7.5 万人，随后除非经当地阿拉伯人许可，否则将不再接收新移民。这项政策的影响要到好几年之后才会浮现出来，而在 1939 年的春天，人们尚不知晓：当时欧洲的 900 万犹太人即将迎来何等可怕的命运。



左图：“二战”期间，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成员正在练习操作刘易斯式轻机枪。该组织后来演变为以色列国防军

右图：1946年7月22日，被“伊尔贡”炸毁的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南侧楼。这一事件极大地震撼了英属巴勒斯坦当局

大屠杀与大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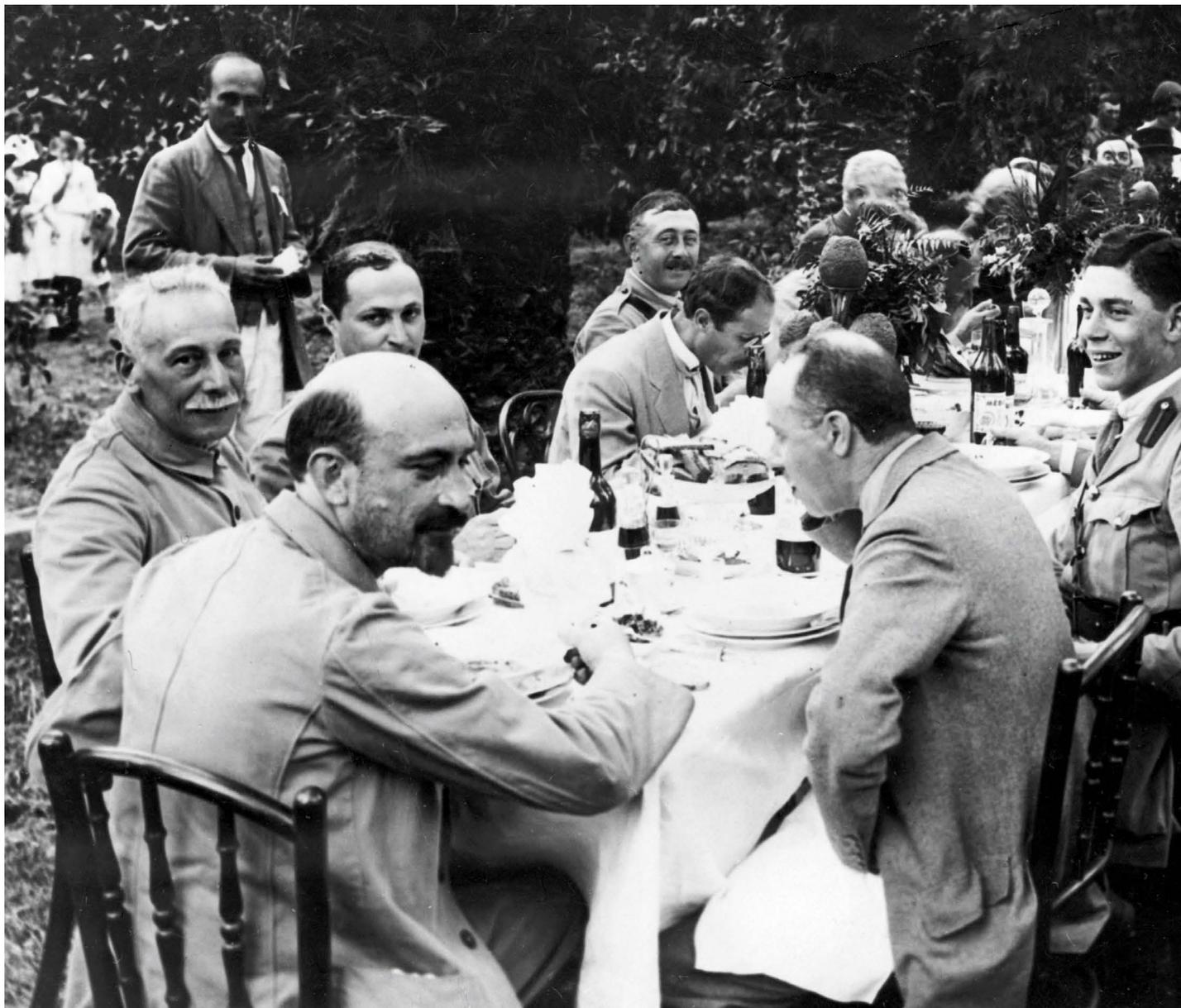
1942年初，总部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最早披露了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消息：在开设于波兰东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境内的“灭绝营”，纳粹德国正在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批屠杀犹太人，规模高达上百万之众。英美两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了这些消息，但为了避免承担繁重的义务，没有一方主动提出增加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的配额。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敌视态度，自1933年起就已经不是秘密。为了扫除这一公敌，巴勒斯坦犹太人以惊人的热忱配合英国投入对德战争：有3万名犹太人加入了英国殖民地军队，在北非和巴尔干战场表现出色。“哈加纳”下属的快速别动队“帕尔马赫”扩充到了1500人，在维希法国和德军占领区展开了活跃的侦察、爆破、情报搜集和宣传行动。但所有这些牺牲并未能感化伦敦的决策者，面对大屠杀的传闻，他们依旧秉持固有的僵硬态度。因此在1939年4月，“哈加纳”组织了自己的秘密情报

机关“摩萨德”（Mossad），专门负责从欧洲向巴勒斯坦偷运犹太移民。

受资金和人力的影响，“摩萨德”在组织偷渡行动时，只能采购最便宜的破旧旧商船；而驻海法港的英国军舰采取了严苛的封锁措施，一旦发现移民船，要么将其扣留、把船上的犹太人送到非洲拘禁，要么强迫其返回出发港口。1940年11月，1800名从刚刚沦陷的法国逃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被英军强行装上“帕特里亚号”客轮，准备驱逐到毛里求斯。混入船上的“摩萨德”特工为阻止这一行动，引爆了一枚炸弹，但由于操作不当造成客轮当场倾覆，超过260人遇难。1942年初，另一艘载有791名罗马尼亚犹太人的旧商船“斯特鲁马号”在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后，被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强制截停。“斯特鲁马号”在滞留几个星期后，最终被迫返回黑海，却在途中被一艘苏联潜艇误击沉没，全体乘客仅有一人幸存。

1944年11月6日，“帕特里亚号”惨案的目击者、19岁的埃利亚·胡哈基姆和一名同伴一起，在



开罗街头打死了英国中东事务大臣莫因男爵（Baron Moyné）。两名行刺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们骄傲地宣称：这不是一起英帝国的子民针对高级官员的个人报复行为，而是“犹太民族对外来压迫者实施的政治抵抗”。长期奉行严苛反移民政策的莫因是全世界犹太人的“公敌”，他们已经得报大仇，虽死犹荣。伦敦当局对此大感震怒，从《贝尔福宣言》开始延续已有 27 年之久的英国—犹太人合作关

系，至此濒临破裂。

对犹太人来说，随着战争临近结束，建国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德国人的残忍屠杀灭绝了战前欧洲 900 万犹太人的 2/3 以上，侥幸生还的幸存者也完全放弃了融入所在国的希望。只有一个独立的犹太民族国家能保护全世界犹太人免遭屠戮，然而英国政府的态度依旧暧昧不明。激进锡安主义者当即决定：开启一场全面内战。



(新华社中国供图)



(新华社中国供图)

左图：1917年，英国锡安主义者联盟领袖魏茨曼（左侧首座者）宴请印度事务大臣蒙太古等政府要员，为尚在酝酿中的《贝尔福宣言》争取支持。1949年，魏茨曼成为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统

右图：1947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巴以分治决议后，阿巴·埃班（右二）和另外两位犹太人代表在纽约联合国临时总部门前升起蓝色大卫星旗。一年后，这面旗帜被确定为以色列国旗

走向全面内战

1946年春天，身经百战的“帕尔马赫”开始对巴勒斯坦境内的英军营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接连炸毁了1座雷达站、3个机场和15架飞机。当年6月17日，海法周边的10座重要桥梁在一夜之间被炸药完全破坏。殖民地当局随即派空降兵和装甲部队进驻耶路撒冷，逮捕了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代表处

在当地的全部官员、犹太总工会领导人以及公开活动的“哈加纳”成员，并在巴勒斯坦全境实施戒严和宵禁。但这反过来刺激了最强硬的抵抗分子，他们决定直接袭击英国驻巴当局的中枢机关。

1946年7月22日中午11点，激进派武装“伊尔贡”（Irgun）的几名成员化装成服务员，从厨房入口处混进了耶路撒冷富丽堂皇的大卫王饭店（King David Hotel）。英属巴勒斯坦政府秘书处和英国空军驻巴勒斯坦—外约旦的司令部就设在这座饭店的南侧楼和主楼顶部。在平时盛放牛奶的7个金属大桶里，“伊尔贡”塞进了200多公斤TNT炸药和硝酸甘油。12点左右，他们把爆炸物安放在了饭店的地下室，随后打电话通知前台、英军司令部和隔壁的法国领事馆：“这里是希伯来抵抗运动。我们已经在饭店内安放了炸弹。这座大楼马上就要爆炸。你们接到警报后务必立即撤离。”但英国人对此置若罔闻。

12点37分，随着一声巨响，大卫王饭店南侧楼的西半边整个坍塌了。大火和浓烟弥漫在整条街道上，隆起的瓦砾堆用了2000车次的卡车才清理完

在“大流散”整整 1800 多年之后，犹太人通过不懈奋斗，终于在迦南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

毕。共有 91 人在爆炸中死亡，其中 21 人是英籍官员，16 人是军警，49 人是殖民当局雇用的本地文员以及酒店的工作人员，另有少量外国住客，还有 45 人不同程度受伤。著名女战地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 (Clare Hollingworth) 是爆炸案的幸存者之一，她后来回忆说：“在大卫王饭店爆炸之后的耶路撒冷，街头昂首阔步前进的是犹太人，而他们的英国统治者只敢贴着墙根前行。”

进入 1947 年，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已经陷入全面崩溃。妇女、儿童和普通居民已经分批撤走，只剩下必要的行政官员、财政负责人和技术人员。8 万名正规军和 1.8 万名警察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但他们只敢龟缩在门口架有机枪、墙顶伸出电网的坚固政府建筑内，犹太人称之为“贝文堡”（贝文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每名军官上街执勤或者去酒吧消遣都必须带上荷枪实弹的卫队，否则就有可能被“伊尔贡”绑架。

1947 年 5 月，“伊尔贡”炸毁了古老的阿克监狱，将其中关押的 131 名犹太政治活动家和 120 名阿拉伯犯人统统释放。在随后的搜捕中，有 3 名“伊尔贡”成员被捕，他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随后昂首走向绞刑架。作为回应，“伊尔贡”绑架了两名不帶武器上街的英军中士，将他们当众吊死。在那以后，甚至连对犹太抵抗分子的常规性搜捕也停止了：英国人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的统治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1947 年 2 月初，艾德礼首相在下院的演说中承认：鉴于英国政府已经负担不起在巴勒斯坦每年 3000 万英镑的“治安维持费”，切割在中东的义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当年 4 月 2 日，应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爵士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宣布组建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等 11 个国家参与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 (UNSCOP)，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方

案。特别会议还决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有权各任命两位联络官，配合委员会的工作。经历了一整年惨烈的内战，双方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

两个国家的诞生

领导过 30 年代巴勒斯坦暴动的阿明·侯赛尼、考克吉等人在“二战”期间流亡于纳粹德国，曾经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并帮助党卫军招募过阿拉伯裔士兵。德国战败后，他们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下重新打出了“阿拉伯最高委员会”的招牌，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和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接触中。不过与 10 年前相比，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基本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拒绝任何形式的犹太国—阿拉伯人国家分治方案，也拒不配合委员会的调查。而世界锡安主义者组织派出了他们最精明的两位说客担任联络官：一位是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银行行长的霍洛维茨 (David Horowitz)，另一位是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阿巴·埃班 (Abba Eban)。

1947 年春天，霍洛维茨和埃班陪伴 25 名联合国调查人员走遍了整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些来自欧洲、北美和印度的代表惊奇地注视着海法的炼油工厂、特拉维夫的现代化港口、内盖夫沙漠中的基布兹农场以及约旦河上的水力发电站，产生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不是简单的外来入侵者，他们一直在做长期在此地生活和繁衍的努力，他们的固有权利不应被剥夺。

1947 年 8 月 31 日，特别委员会起草好了两份备选方案：加拿大、捷克等七国提议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犹太国领土占整个巴勒斯坦的 62%，阿拉伯国占 38%。南斯拉夫、印度和伊朗提议建立一个松散的巴勒斯坦联邦，分为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前者面积稍大。但无论哪个方案，和 1937 年英国提出的第一份分治蓝图相比都出现了巨大变化，犹太人的利益诉求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尊重。

1947 年 9 月，联合国大会在纽约长岛的成功湖镇开幕，讨论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出人意料的是，苏联和东欧代表集体赞成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在斯大林看来，锡安主义者中的绝大部分都曾受过社会主义的影响，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与莫斯科立场一致，因此必须予以声援。反倒是拥

有最多海外犹太裔人口美国，一度出现了剧烈摇摆：石油大亨们担心以色列的出现可能带来国际油价的震荡，坚持要求把巴勒斯坦南部的内盖夫地区划给阿拉伯国家。关键时刻，11月20日，72岁高龄的魏茨曼亲自前往白宫拜会杜鲁门总统，以犹太人基布兹在内盖夫沙漠中的辛苦经营作为依据，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青年时代曾在密苏里州农场度过十年岁月的杜鲁门大为感动，立即表态将全力支持犹太人的立场。

11月25日，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以25票赞成、13票反对、1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将最终解决方案提交联合国大会表决的决议。但直到这时为止，究竟是采用两国模式还是联邦模式依然没有形成一致。一个以冰岛代表为首的三人委员会被紧急建立起来，向大会报告两种方案的可行性。阿巴·埃班将游说工作进行到了最后5分钟；仅有18万人的冰岛，在两国方案上做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裁决。

11月29日上午10点，联合国大会根据三人委员会的建议，开始就两国模式的分治方案进行表决。最终投票结果为33国赞成，13国反对，10国

弃权，1国（暹罗）缺席。法国出人意料地选择和美苏采取同一立场，阿拉伯国家齐齐表示反对，中国、英国和南斯拉夫投了弃权票。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大181(2)号决议，即《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以72%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根据这一决议，在巴勒斯坦地区的8块领土中，犹太国获得1.49万平方公里，占整个疆域的56.4%；阿拉伯国获得1.12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成为中立区。

当投票结果随着英国广播公司的电波传到巴勒斯坦之时，时间已是11月29日的深夜。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从海法的海滩到内盖夫的沙漠深处，礼花和信号弹腾空而起，齐唱《希望》的歌声回荡在每一个伊舒夫和基布兹上空。尽管还要再过5个多月，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才会真正结束，尽管还要经历无数浴血奋战的时刻，以色列国的独立才能获得保全，但在“大流散”整整1800多年之后，犹太人通过不懈奋斗，终于在迦南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5-6）

《读书》2017年第十二期目录

- | | |
|---|--|
| 赵益民 “二手空间”：反思《基多宣言》 | 章永乐 作为全球秩序思考者的康有为 |
| 陈言 在思想连锁中发现“北京” | 薛毅 浅谈李贽与鲁迅 |
| 魏斌 思想的圆丘 | 田天 座次的写法 |
| 王炎 特朗普很保守吗？ | |
| 陈伟 把种族隔离逆转为“平权法规” | 品书录 |
| 岳秀坤 如何讲述八百年前的犹太商人 | 殖民与“殖民”：法国在非洲的文化战略（陈振铎）· 麦高文与南中国（李静玮）· 农村治理中的农民与国家（王勇） |
| 短长书 | 贺桂梅 柳青的“三所学校” |
| 怀念英千里老师（郑培凯）· 凡·高的鞋踩出一个罗生门（彭锋）· 民族动物志的时代图谱（季红真） | 周林刚 魔鬼是上帝的模仿者 |
| | 史少秦 哲学，何以作为生活方式？ |
| 渠敬东 学术生活是一场赌博？ | 读书短札 |
| 徐晓宏 大时代有风暴眼 | 书法暗合前人（刘涛）· 说感动（月庵）· 《史记》有张材刊本？（孙利政） |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福建商人冤案：一个企业家的生死沉浮

记者 刘畅

一桩冤案，一个身家过亿的企业在数日内分崩离析。惊愕背后，是一个企业家生死沉浮的悲剧。

不断被回溯的一天

“2012年4月6日，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寝食难安。”很多时候，一个日子被看作一个人生命的转折点，乃是此人依据日后的经验，后知后觉的追溯。然而，当灾难迎面砸来，立时便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当事人将会徘徊于此日，不断叩问它的意义。厦门东妮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赵璟娅就是如此，那日的一场冲突，不仅导致她的丈夫江先路、丈夫的堂弟江先文蒙冤获罪，还致使一家资产数亿的龙头企业数日内轰然倒塌。

冲突稍有预兆。4月5日晚，时任东妮娅国际商务会馆仓储部副经理的陈禾接到供电局的一条短信，告知她，应房东要求，次日要给会馆断电。“当时我正在吃饭，赶快告诉我们的董事长江先路。”陈禾见到本刊记者时，已离开厦门多年，“我们与房东有纠纷，但没想到他们会用如此极端的方式。”

与一般的企业不同，供电对于东妮娅会馆尤为重要。2009年，东妮娅会馆由厦门市思明区政府招商引资而来。这个福建三明市休闲行业的龙头品牌成为当时厦门最大的休闲娱乐会馆。它坐落在厦门市中心一座九层的大楼内，楼内营业面积3万多平方米，集住宿、休闲、娱乐、水疗、餐饮项目于一身，能同时容纳5000人。“我们有巨大的演艺厅，每天都有魔术、杂技的演出，本地的市民和游客都会来。”赵璟娅告诉我，“自2011年元旦试营业以来，几乎每天都有企业在我们这里开会。”如此大型的场地、众多的游客，一旦突然停电，后果不堪设想。而事后的案件材料显示，东妮娅公司与房东厦门龙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纠纷集中在房租上。不过，房东先前已将东妮娅公司告上法庭，在法院已受理期间，江先路夫妇静候与房东对簿公堂。

他们等来的却是4月6日上午，龙得公司物管部主任林木成带人更换东妮娅会馆配电室门锁，并

轮流看管。下午2时许，拉闸断电。厦门中院的判决书显示，龙得公司负责人李鹏表示，他们与东妮娅公司的合同中约定，若欠房租两个月以上，可以强制拉闸断电。“当时还有客人在楼里洗浴，更衣间的门是电子的。断电后，客人的衣服取不出来。”陈禾当时在场，她向我回忆，“会馆大厅的中段很暗，我们点起蜡烛，还把桌布烧着了。”他们获知断电后，一边派一名副总经理与对方协商，一边报警，同时，劝导客人陆续离开。

判决书显示，警察随后赶到，将双方负责人带到派出所进行调解协商。此时，龙得公司物管部副主任邹玉林将事先准备的棍棒分发给看守配电室的员工。直到下午5时许，双方仍协商未果。此时，营业高峰来临，江先路同意几名前来商讨对策的部门经理结伴到配电房恢复送电。东妮娅工作人员张经理持铁锤砸配电室的门锁，龙得公司人员随即上前阻止、追打。

东妮娅会馆一方在下到地下一层的配电室之前，江先路便吩咐，只许谈判，不得动粗。他们为防止对方动武，还特意带上摄像机，一路取证。“打光头！”陈禾告诉我，面对棍棒，东妮娅公司人员始终没有还手，而他们知道东妮娅会馆的保安经理江先文是光头，在追打时被尤为“照顾”，另一位光头的技术总监也被殃及。他们被一路追打到了一楼停车场。最终，江先文身体多处被棍棒击伤，头部受伤，身上多处骨折。技术总监缪某也头部受伤。二人被送至医院，经鉴定，两人为轻伤，九级伤残。

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由此推倒。事发当晚，民警将殴打东妮娅公司的十余人带走。后经调查，这些人多有前科，在事发前两日刚刚被“招聘”。三日，东妮娅6名高管涉嫌聚众斗殴罪被警方带走。4月25日，江先路也因同样原因被刑事拘留。两天后，被打住院的江先文也被警方带走。赵璟娅也因受刺激过大，精神异常，被家人送入精神病院疗养数日。

群龙无首，员工人心涣散。4月30日，公司宣布倒闭。讨债的冲击波纷至沓来。员工游行，债权人、融资机构诉讼。为偿还贷款和债务，包括江先路夫妇在厦门、三明的所有房产在内，近2亿元资



索赔之路上的赵璟娅

产被法院拍卖、变卖。然而，这些资产却依然不够，赵璟娅至今仍背负上亿的债务，工人工资、债权人的债务仍无着落。

悲剧也并未结束。2013年11月16日，江先路、江先文被思明区法院以聚众斗殴罪，判刑15个月。江先路不服，坚持上诉，终在2015年11月，由厦门中院终审判定无罪。其间，他被诊断为肺癌晚期，昭雪后半年离开人世。而同被冤判的江先文因淋巴瘤，在宣判无罪时，已去世一年有余。

“我曾经见人就哭，也想过自杀。但后来发现只有自己扛。”我在福州见到赵璟娅时，她面容整肃、衣着干练，丝毫看不出精神神经受的折磨。她正准备向福建省高院上诉，自江先路被判无罪后，她便走上了索赔之路。但两年来，法院判定14.9万元的赔偿，与她要求的2.3亿元相差太远。今年11月9日，厦门中院的赔偿决定书发下来，她得知自己又失败了。“这些钱是为债权人讨的，终归他们是因为我才受的损失。”如今，赵璟娅居无定所，为了省钱，借住在朋友或亲戚家。“我有美容的手艺，现在有人找，我就和客人约到她家，上门绣眉。”

昔日荣光

“如果他们一直在三明发展，现在一定非常滋润。”我采访到的每个人都这么说。当江先路的妹妹江珊将东妮娅公司的三明旧址周边，与江先路有交往的酒店一一向我指出时，他们的叹惋最为真切。她望着几十层的酒店，“他的公司本来也能这样”。东妮娅公司曾在三明有多处产业，但从未放弃发家的地方。在这座福建小城中心的过街天桥旁，有一个小门脸，面冲天桥的楼梯。“门口进去很深，前面美发，后面美容。”陈禾告诉我，虽然一层看似不起眼，但这座小楼近百米长的二层全被包下，做洗头 and 护理的项目。“最初时，只有门口浅浅的一个房间。”

东妮娅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赵璟娅的父亲依此为她起的小名。江先路夫妇走上休闲娱乐产业之路，源于赵璟娅的一次“甜蜜”的失业。她从新疆来到福建，90年代初，与江先路相识。1995年，江先路在三明做记者时，二人结婚，赵璟娅随即面临失业。她考虑过做摄影，开花店，因自己从小爱打扮，又感觉追求美丽是趋势，遂赴



(摄影:陈亮)

上图：2015年11月终审被判无罪之后的江先路（右）及赵璟娅

下图：如今厦门的奥永大厦丝毫见不到曾经的气派，整体规划的会所被切割成小商铺分租出去，楼边的街树已亭亭如盖

上海学了半年皮肤护理，回来开了家美容院。她告诉我：“当时怕惹是非，只收女顾客。一开始只有三张床，我一个人既做店主，又做员工，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苦心经营一年后，他们推出的祛斑产品获得市场认可，美容院逐渐红火，雇用起几十名员工。

生意日隆，2003年江先路离岗创业，全心全意同妻子打理生意。那是他一直的心愿。他家出身沙县农村，没有家底。到厦门大学上学，江先路又学的美术专业，学费很贵。“他跟我说过，上学时他只有一条裤子，前一天洗了，第二天干了接着穿。”曾经资助过哥哥上学的江珊回忆，“日子太苦了，他一直希望以后能挣钱致富。”妻子美容院的起色，令他有朝一日一展宏图。他用赵璟娅的小名把美容院注册为公司，自己掌舵，为公司的发展方向做决策。

彼时，江先路的眼光已不局限于美容。“追求时尚已是大势，他觉得需要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于是，我们把美丽、健康当作目标，又吸收进足浴、美发，能够提供从头到脚的服务。”赵璟娅坦言，他

们知道，休闲美容的行业容易与“涉黄”扯上瓜葛，为了长远发展，他们不但极力避免，而且因江先路做过教师，令他自觉对员工有一份更重的责任。“他发现员工大多是农村的孩子，年纪很轻。我们不但要教技术，还要教育他们，避免他们走入歧路。”

“江先生不像老板，更像老师，不苟言笑，简直比父母还严厉。”陈禾初中毕业就经亲戚介绍，到美容院打工，员工们称江先路为先生，赵璟娅为老师。“赵老师教我们手艺，江先生负责培训、立规矩。”她向我回忆，“江先生要求我们不能给客人留电话，更不能跟客人出去。怕客人把我们带坏。”

员工规矩而不保守，江先路把时尚纳入规范。“我们当时的工作服是裙子，村里的姐妹应聘时看到，还觉得不正规，其实我们就是为了美。”陈禾向我介绍，“别的美容院员工还穿运动服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穿裙子了。”赵璟娅告诉我，江先路认为，他们本身做的是时尚生意，自己首先要美观、时尚。公司请礼仪老师为员工培训，又组织员工自建时装队、舞蹈队。至2006年时，公司已经做大，涉足房地产、酒店等领域，积累了上亿元的资产，有员工500多人。而主业已成为三明市的美容美发鉴定基地，当地的美发师都要到他们的美容院考试。

“同行业里，我们工资最高，每天都巴不得多做一个工。”陈禾向我讲述那时的快乐生活，公司组织郊游，他们把福建周边的景点玩儿遍了。“每年大年三十有联欢。我们的家都离得不远，但大家都喜欢热闹一晚再回家。”而那时，江先路夫妇在三明的名望达到顶峰，赵璟娅成为当地女企业家联合会的副会长，又被选为“三明市十大杰出女性”。“我当时吓得直哭，只想做好我自己的生意，不愿与外人交际。”赵璟娅告诉我，“但江先路坚决把我推出去。他告诉我，我从外地来，得能自己立足，要做女强人，从商人变成企业家。”

鼓励妻子自立的同时，江先路的雄心也没有局限在三明，他想把东妮娅打造成亚洲最大的休闲娱乐品牌。于是，他把目光锁定旅游城市厦门。从2006年开始，他们夫妇二人多次赴厦门考察。2009年，他们承租龙得公司的厦门奥永世界大楼，投资近3亿元，兴建厦门东妮娅国际商务会馆。

奏错地方的“狂想曲”

“以当时的架势，如果会馆没有倒。我已在厦

门落户，结婚生子了。”东妮娅会馆承载着像陈禾这样“元老”的期待。“他想让顾客在一栋楼里就把所有事情都办了。”赵璟娅说，江先路希望打造“一站式”的休闲服务。“除了购物，住宿、洗浴、餐饮、娱乐，都可以做。节约了大量的时间成本。”这需要完整、宽敞的场地。由此，他们相中龙得公司愿整栋出租的房子。虽然当时那栋楼还只是一个空壳，一砖一瓦都需从头装修。

在规划厦门的蓝图之初，赵璟娅有些担心。“异地投资，投资额又大，风险高。”可江先路笃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办。虽然已经经营生意十几年，重新开拓版图很疲惫，但赵璟娅毕竟认可丈夫的理念，会馆的布局和装修由江先路把关，融资的事由她来跑。

然而，事后看来，江先路理想主义的行为多少有些冒险。王璐也是三明的企业家，在联谊会上与赵璟娅相识，后来成为他们的债权人。她告诉我：“娱乐业水很深，贸然从外地进去，又一下投资那么多，步子迈得有些大。资产都被抵押进来，等于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只不过，鸡蛋是一个个被放进去的。东妮娅公司与龙得公司的租赁及合作合同书显示，按照双方约定，东妮娅公司应自2010年4月1日起，每60日支付租金和合作收益300多万元，10月10日后，需另交增加使用面积的租金13万余元。“当时我们的装修进度受阻严重，那栋楼一层的门厅等部分拖延了半年多才交付，后期的装修也随之顺延。”赵璟娅告诉我，他们本打算2010年6月开业，却直到2011年初才试营业。“我们按照原计划招人，上千号员工签了合同，每个月工资就要几十万。”装修一刻不能停，贷款一笔笔加进来。案件材料显示，会馆营业前，东妮娅向房东支付了两期的租金。陈禾向我回忆：“那时，普通员工的工资不变，我们和江总共渡难关。本来我的工资有五六千，拿到手只有一两千。”

据赵璟娅讲，开业后，因前期营销，会馆的生意还过得去，“每天有几万到十几万的流水”，电影、电视剧都曾在那里拍摄。不过，在王璐看来，会馆的服务还未磨合到位。“几千号员工都分散在一个个房间里，找不到人。在三明的店里，客人离开时，员工会把客人送到门口，非常温馨。”厦门的会馆还在蹒跚学步，而三明的业务虽运转正常，但相比于债务，它的营收着实杯水车薪。

2010年10月1日后，东妮娅公司无力支付租

金，2011年8月，房东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解除合同、收回物业。厦门市的一审判决书显示，龙得公司认为，截至2011年11月，东妮娅公司欠缴租金16万余元，且自他们起诉始，东妮娅公司多次承诺交付租金，但仍未缴纳，案件审理期间，也未给出具体解决意见，已构成根本违约。而东妮娅一方则认为，龙得公司交付租赁物违约，导致资金周转不开，他们多次签下交租承诺书，表示愿意交租。

当江先路被抓，艰难维持的平衡被瞬间打破。赵璟娅说：“我们连生意上试错的机会都没有，一切就提前结束了。”2012年4月30日，公司宣告倒闭，数百名员工至市政府游行，讨要工资。据思明区劳动仲裁委的裁决书显示，5月7日，253名东妮娅项目下属公司员工集体要求东妮娅公司支付拖欠工资221万余元。几乎同时，东妮娅公司的债权人及资金周转金融机构，向法院申请查封、冻结或扣押东妮娅会馆财产。

还债的负担落在赵璟娅一人肩上。“江先路性子直，即使当着外人，说到他不满意的地方，他也会急。但赵璟娅很能包容他。”王璐告诉我，相比于暴脾气的江先路，三明的企业家对和颜悦色的赵璟娅更加赞赏。“看到江先路蒙冤，我们不想上诉他们。是赵璟娅主动告诉我，法院要查封、变卖她的财产，为了我能参与分配，要我起诉她。”

那时，她从精神病院出来，头脑虽已清醒，但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时时想着自杀。不过，她没有因此推卸责任。“她主动召集债权人开会，通知我们债务的进度，把变卖的钱分给我们。”王璐在三明时与赵璟娅仅萍水之交，与她经济上深入往来后，虽然亏了钱，但打心眼里钦佩她。“她不逃也不躲，做事像个‘爷们儿’。虽然欠了债，但在三明有口皆碑。欠债不是她的问题，没人主动向她要债。”赵璟娅十分感念债权人的理解和帮助。“我现在回三明，他们见我没地方去，还邀我去他们家住。”在采访时，她多次向我诉说，“后来财产的官司继续上诉，但上诉需要钱，债权人又先后借给我70多万。”

赵璟娅自始至终设想，如果法院判决，要求赔偿龙得公司1800多万元，东妮娅公司不至于伤筋动骨。“当时我们有上亿的资产，变卖一些，补上缺口，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董事长和高管被抓后，公司一停业，资金周转不开，所有的债务一起涌来，我们的一切都被搭进去了。”不过，东妮娅公司与龙得公司的纠纷，最终上诉至福建省高院，根据双方合同，

仍宣判双方解除租赁合同，东妮娅公司偿还租金，由龙得公司将房屋的永久物和装修物收回。她只能暗自愤愤不平，“当时我们接手时，房子可几乎是烂尾楼啊。他们把装修完好的楼拿回去再出租，租金可以翻好几倍”。

而企业倒闭改变的，不只她一人的命运。为帮哥哥贷款，江珊将自家的三处房产都抵押出来。“我自己做小本生意，没和哥哥一起。但也攒了些钱，在厦门投资了一间房，想着以后价格翻番，再到更大的城市投资。但现在连自己住的地方都不属于我了。”而陈禾也对厦门充满抵触，“后来，我只是旅游时路过，再没想过来这里发展。”

被冤屈拖住的死亡

在赵璟娅变卖家产的同时，她还在焦急等待丈夫被释放。她告诉我，当时，6名高管已被关押多日。2012年4月25日一早，警方告知江先路去领人，当日便没出来。夫妻再次相见已是2013年7月24日，江先路被取保候审之时。“他佝偻得像猫头鹰一样，”江珊形容道，“脖子缩在肩膀里，面色蜡黄，皮包骨头。”一家人找到一家大排档为他“接风洗尘”。

从看守所出来，他的身体已经不好，经常会疼痛，但他的眼中只有冤案。“在看守所见到他，我就泪流不止。但他除了安慰我，就是询问公司的情况。让我说得详细一些。”赵璟娅回忆。自11月被判处聚众斗殴罪后，他向厦门中院提起上诉。直至一年后，他肚子腹水，已疼痛难忍，才到医院看病，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已扩散到肝脏。

那时，厦门中院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不久，案件将在思明区法院重审。“除了家人，他不敢让外人知道。怕法院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就不给他平反。”江珊告诉我，为了维持生计，赵璟娅赴深圳打工，江先路在厦门无人照顾，还要亲自出庭。“他和我谈，出庭时要站着，有时疼得实在想坐一下，却还得坚持。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而两个月后，经思明法院重新审理，决定维持一审判决，江先路再次上诉。赵璟娅告诉我，此时，江先路已极度虚弱，但又没钱看病。“为了活下来，他喝中药自救。中药太苦，他逼着自己喝下去。一吃饭就吐，吐出来再咽回去。”终于，2015年10月20日，厦门中院做出终审判决，根据冲突时双方的力量对比、冲突后的行为，以及江先路的主观心态，

认为一审判处聚众斗殴的证据不足，改判江先路等人无罪。

江先路总算可以洗刷冤屈，告慰自己堂弟江先文的亡灵。据赵璟娅说，保安部经理江先文在从看守所放出来后两个月，即查出淋巴癌晚期，而他被卷入冲突时，刚与新婚妻子度蜜月回来。查出癌症，妻子离他而去，一年后，他含冤而死。因重审时病重，无法出庭，被裁定诉讼中止，在江先路昭雪后，才重又上诉，恢复清白。而江先路也将走到自己人生的尽头，可他的职责还未完成。临终前，他与妻子签署权利委托书，把争取赔偿的责任交给她。

“我就骑个共享单车，车把上挂个黑塑料袋，装着上访的材料。”赵璟娅有一盒子的U盘，都是诉讼的材料，每天随身携带。2016年10月20日，她向思明区法院提出共计2.3亿元的国家赔偿申请，其中包括江先路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失费、企业倒闭的经济损失、律师费等7项。思明区法院的国家赔偿决定书中认定，江先路被羁押456天，应获得人身自由赔偿金，每日按2015年的日平均工资计算，而精神抚慰金原则上不超过人身自由赔偿金总额的35%，二者相加共14.9万元。赵璟娅不能接受，上诉至厦门中院。

但对于其中数额最大的2.2亿元索赔要求，思明区法院与厦门中院均认为，江先路的人身权被侵犯，财产权并未被侵犯，因他被羁押导致公司破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法院不予赔偿。

“决定书中没有提及律师费的要求，如果没有冤案，我们也不会请律师。”赵璟娅说，她将继续向福建省高院上诉。而她发现，在厦门中院将奥永大厦不可移动的设备与装修判给龙得公司后，当东妮娅公司打算拿回大厦中可移动的家具、艺术品时，却已经没有任何财产可收回。他们认为，这些损失乃是厦门中院违法保全所致。于是，她同时起诉厦门中院，提出1.2亿元的违法保全赔偿。“光纯木的椅子就有上百万元，后来都被龙得公司运走了。”近日，她得知北京的律师团队将全体过来帮她，她又看到一线希望，“也许这官司得打一辈子”。

在三明的旧门脸上，开着一家按摩店，生意萧索。而厦门的奥永大厦也丝毫见不到曾经的痕迹，整体规划的会所被切割成小商铺分租出去，楼边的街树已亭亭如盖。除了想到名著里的主人公，没有谁还能记起东妮娅的名字呢。■

（文中陈禾、江珊、王璐均为化名）

AUGUST STRINDBERG

11.29-12.03

北京保利剧院

12.06-12.10

上海美琪大戏院

主演 STARRING

赵立新 金星

导演 DIRECTOR

赵立新

出品人/制作人 PRODUCER

尤雅

出品方 PRODUCTION COMPANY

琨宁文化

精英娱乐

希肯琵琶

联合主办 CO-HOST

Mailive

The
Father

爱比恨，
更难。

父亲



大麦 damai
去现场 为所爱

10103721

damai.cn

Mailive

扫码购票

(东方IC供图)



1

(视觉中国供图)



2

(视觉中国供图)



3

尤里·米尔纳：亿万富翁的科学梦

文 / 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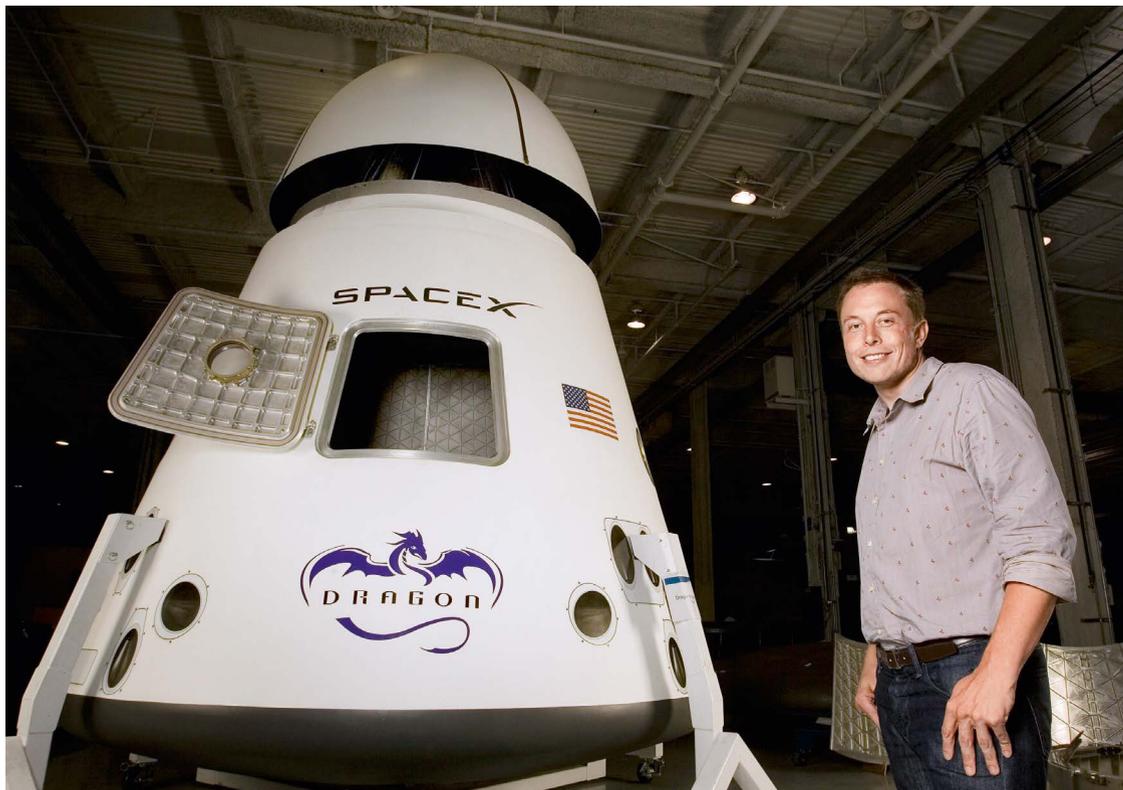
这位俄罗斯亿万富翁已是硅谷最成功和最重要的互联网投资人之一，他的到来颠覆了硅谷对“外来者”的看法。

在北京新开的宝格丽酒店第一次见到尤里·米尔纳，他带着冷面走来，不苟言笑，有一种俄罗斯人的冷峻。走在他身后的是比他高一头、穿着随和的太太茱莉亚，前超模，现在的摄影艺术家。他在饭桌对面坐下。说话间隙，他偶尔和坐在旁边的太太用俄语交谈。有一次不知耳语了什么，她像小孩

一样戳了戳他的胳膊，两个人都笑了。他的僵硬也就松弛了下来。

2011年11月，50岁的尤里·米尔纳在加州豪宅举办了与茱莉亚的婚礼。那天，硅谷互联网公司的很多CEO都来祝贺，包括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毫无疑问，这位俄罗斯亿万富翁已是硅谷最成功和最重要的互联网投资人之一，他的到来颠覆了硅谷对“外来者”的看法。他的投资也是全球性的。从Facebook、AirBnB、Spotify、推特(Twitter)到阿里巴巴，京东、滴滴和小米，他自成一个独立的“王国”，穿梭于各大洲的互联网公司之间，成为

(视觉中国供图)



4

1. 俄罗斯人尤里·米尔纳，硅谷最成功和最重要的互联网投资人之一

2. 米尔纳的互联网公司 Mail.ru，腾讯也是其重要投资人

3. 2014年1月17日，莫斯科天文博物馆里听向导讲解的游客

4. 埃隆·马斯克，通过将火箭发射民用化，进一步为人类移民火星做准备

它们的中间人和纽带。

而现在，他想用投资赚来的钱去实现科学宏愿。

源起加加林

晚饭时，当被问及他更愿意谈论普京，还是谈论特朗普时，米尔纳说，他谁也不愿意谈论。他与政治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当他聊起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晚餐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我们点头表示知道。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有很相似的历史，那场革命催生了中国的变革。”虽然他的生活重心早已转向硅谷，在桑托斯山地也购置了2000多平方米的豪宅，但俄罗斯的印记始终难以抹去。

2009年投资Facebook后，他在硅谷成名。和在俄罗斯低调赚钱不同，在美国，他学会了与媒体打交道。他曾邀请那些急切想了解他的美国记者到莫斯科，带他们去他父母的家中，把他父母那间外表晦暗、内部与曼哈顿上西区中产阶级并无多大差

异的公寓展示给外人。《连线》记者描述了他父母的那间公寓：“公寓里书堆满过道，他年迈的母亲给客人准备好热茶和糖果，他80多岁的老父亲喋喋不休唠叨着他当教授教美国企业管理时，认识美国某某大学的某某教授。”

米尔纳按照父亲的意愿学习了科学。父亲告诉他要远离政治，而科学显然是逃避政治最好的场所。不仅如此，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罗斯人来说，“科学是光荣的，科学家是社会最尊崇的职业，也是名流，每个人都想当科学家”。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选了粒子物理专业，在那栋新古典主义宏伟建筑里度过了四年时光。在第四年的末梢，他被父亲强行中断了在黑市卖电脑的生意，在国家科学院继续读研究生学习过一段时间。接着，也是父亲安排他去美国沃顿商学院学管理，父亲的一个美国朋友帮他写了推荐信——那是1990年，米尔纳是“冷战”结束后第一批去美国读大学的苏联人。

但他没有按照父亲的愿望拿到商学院的毕业证书，而是辍学去了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米尔纳告诉我：



(视觉中国供图)

“那时世界银行开始借钱给俄罗斯，特别需要会俄语、有俄罗斯生活经验的人来做事情。”他在世界银行的工作，是帮助俄罗斯建立健全的银行体系。

米尔纳的名字“尤里”是以他出生那年第一个完成太空飞行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的名字命名的。20世纪60年代，美苏的太空争霸正酣，“尤里”是对那位苏联英雄的纪念。今天，俄罗斯的小学生依然会去参观位于莫斯科市郊和平大街111号的天文博物馆。纪念碑似的博物馆内，加加林身着宇航服、面带笑容的巨幅头像俯瞰着到访者。俄罗斯人在这几拜谒苏联现代宇宙航行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观看20世纪60年代苏联宇航员登上“东方一号”飞船飞向太空的辉煌影像。齐奥尔科夫斯基在研究火箭理论后，曾研究过星际航行问题，详细地描述过载人宇宙飞船从发射到进入轨道的全过程；他也相信外星殖民，认为人类要永久存在下去，就不能被束缚在地球这个摇篮里。即使苏联解体，成长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人的太空情结并未终结，就像美国依然延续着“旅行者号”和阿波罗计划的外太空探索梦想一样——现在，硅谷和好莱坞亿万富翁及名流汇集的“太空俱乐部”继承了这股热情。

尤里·米尔纳告诉我，冥冥之中，他的这个名字好像是父母对他的一种期许，让他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想起太空来。米尔勒仍然相信，“人类的历史是由那些伟大的跃迁推进的”。56年前，加加林登上了月球，那是一次伟大的跨越。现在，“我们应该为下一步跨越——星际旅行做准备了”。

成为亿万富翁后，太空的梦想对米尔纳而言变成了一件有资本去做的事。2016年4月，他决定投入1亿美元启动“Breakthrough Starshot”项目，希望能以激光阵列驱动轻型探测器，20年内抵达与我们相邻的半人马座的阿尔法星。这一项目引起了人们对穿越太阳系可能性的广泛讨论。20世纪上半叶，穿越太阳系还只是科学文献和科幻小说里的课题。20世纪80年代后，摩尔定律使得激光的成本大大降低，新出现的互联网巨头对太空探索也有着非凡的眼界和强烈的兴趣。埃隆·马斯克通过将火箭发射民用化，降低了火箭的发射与回收成本，进一步为移民火星做准备；Google地图已经可以探索国际空间站的街景地图和太阳系的行星和卫星地形；“谷歌X”研发的“太空天梯”项目，还想建立一个从地球到外空轨道的通道，以让科学实验及商业项目轻松接近太空。



(视觉中国供图)

上图：火箭和太空旅行之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站在他的金属太空船模型前

下图：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

对于米尔纳的“Breakthrough Starshot”项目，一些专业人士粗略计算，其激光阵列一次激光发射试验的成本大概就需要100亿美元，耗费巨大。而按照2016年的市值计算，阿波罗登月计划的耗费是1500亿美元，这样来看，1亿美元作为可行性研究的初始资金，只是杯水车薪。即使不断有海量资金投入，激光阵列的一些技术难题也还未突破。然而，米尔纳重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就像美苏空间项目对于青少年时代的他的意义一样。物理系出身的米尔纳相信，太阳系的年龄大约是45亿年，而宇宙的年龄是130多亿年，宇宙的年龄比太阳系的年龄漫长得多，在太阳系之外存在着更古老文明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他在饭桌上极其认真地说，霍金告诉他，我们应该保持缄默，聆听别的、极有可能为更高级文明的声音，以保证我们不受到侵略。听起来，就像是一部科幻小说的构思。

从美国到全球

米尔纳在世界银行工作时，苏联解体了。一个国家解体为一些国家，很多人变得贫穷，很多人暴富。解体的痛苦影响了很多俄罗斯人。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他结识了亿万富翁、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后者当时在做很多商业银行。米尔纳说：“我参与的项目，就是从2000多个俄罗斯商业银行里选出一些来，给予帮助。”他在美国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对俄罗斯来说是全新的，“比如，投标报价”。米尔纳回国后，霍多尔科夫斯基邀请他成为一个联盟商业银行的主管。两年后，他不再做投资银行，而是投资建立了一个通心粉厂，并在传统行业获得成功。

在俄罗斯做生意，就像在看不见方向的水域里航行一样。很多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在这个时候兴起，第一波互联网潮来了，雅虎、eBay、亚马逊、谷歌等公司纷纷创立。1999年，米尔纳在摩根斯坦利的报告上读到了分析师梅里·米克（Mary Meeker）的报告，他决定涉足互联网，按照美国新兴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在俄语地区建立公司。俄语地区大概有3亿人，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机会上网。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很多公司的资金链断裂，都需要危机管理。那时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比例还不算高，米尔纳的公司Mail.ru也一下蒸发了95%的价值。那个时候生存下来是很难的。幸运的是，

米尔纳拿到了投资，在那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天使投资帮助他渡过了难关。2004年，美国机构投资者Tiger Global（这个机构在中国的投资很多）对Mail.ru做了投资。现在，Mail.ru的主要投资者是美国的Tiger Global、南非的Naspers（也是腾讯的大股东）、高盛、俄罗斯矿业大亨乌斯马诺夫，腾讯也是Mail.ru的重要股东之一。

2009年是一个转折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和俄罗斯都深受影响。“大部分投资人退而观望，我反而觉得是个机会，当时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正在酝酿之中，比如社交网络。”米尔纳说。他在俄罗斯的互联网公司Mail.ru紧跟美国的步伐，是最早接受社交网络的公司。从2006年开始，Mail.ru就在俄罗斯购买了一系列社交网络，米尔纳对社交网络的商业潜力逐渐积累了认识，这也让他很容易看到社交网络未来的趋势。在一次莫斯科聚会的餐桌上，一位高盛银行家在闲谈中提到，Facebook可能想做新一轮融资。那时，雷曼兄弟刚刚倒下几个月，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陷入了危机。米尔纳说：“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投资Facebook不仅是个机会，而且是可以实际去做的。”这位高盛银行家为米尔纳和Facebook牵了线。

米尔纳给Facebook的时任CFO吉迪恩·余打了电话，余并不感兴趣，直接拒绝了。米尔纳打了几次电话，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向他陈述自己对社交网络认识的机会，对方态度冷漠。米尔纳直接买了一张机票飞往硅谷，终于在硅谷的一个咖啡馆里见到了吉迪恩·余。米尔纳说，在那次短暂的谈话中，他告诉余：“Facebook在美国获得了成功，正在全球扩张中，比如欧洲。而我在俄语地区和欧洲经营社交网络的经验，可以帮助Facebook扩张。”财务总监这次觉得有点意思，把米尔纳引荐给了扎克伯格。这是他与扎克伯格友谊的开始。

米尔纳当然有一些投资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一些美国基金，但他成功说服了扎克伯格。不少分析认为，米尔纳是以很有利于公司创始人的独特投资策略赢得了扎克伯格的青睐：作为晚期投资者，他并未要求董事会的席位，传达出并不试图控制Facebook运营的信号。2009年，Facebook已创立5年，是一个相当成熟和有规模的公司了，米尔纳以2亿美元仅仅完成了2%的股权投资。但米尔纳告诉我，他说服扎克伯格的其实主要是他对社交网络流量变现的商业模式的观点与经验。“那个时候很少有

人对流量变现的商业模式有所察觉，硅谷的风险资本也没有全球范围社交网络变现的数据。我告诉他，俄罗斯和欧洲的一些社交网络公司已经成功地将用户与流量货币化，“正是基于对货币化商业模式的理解，我们对 Facebook 给出了比其他投资者更高的估价”。今天来看，这已是确凿无疑发生的事情。但在 1999 年，甚至在 2009 年初，清晰预见到这个趋势的人并不多。

金融危机下，米尔纳筹集巨额资金的能力非常不凡。他说，当时他的启动资金一部分来自于俄罗斯互联网公司 Mail.ru 的收支账户，更重要的资金来自于俄罗斯矿业大亨乌斯马诺夫。在此基础上，他从其他投资人，包括机构投资人那里筹到了款。2009 年，米尔纳完成了对 Facebook 的投资。但他对硅谷、硅谷对他来说依旧是陌生的。他几乎不认识纽约和硅谷的什么人，也几乎没有踏入过技术精英的社交圈，基本通不过美国媒体的“圈内人名字测验”，甚至根本不想假装自己认识什么人。硅谷依然是一个相对隔绝和封闭的地方，虽然它不断谈论创新，但它也排斥非主流的外来者。Facebook 这张耀眼的投资入场券，让米尔纳的基金公司赢得了人们的认可。2009 到 2011 年两年间，米尔纳又投资了社交媒体 Twitter、Spotify、AirBnB、京东、阿里巴巴。在米尔纳之前，拿着钱“买进”硅谷也是很难的事情。能拿到最好交易的资金，通常都有它的谱系。

我仍疑惑，对俄罗斯资金向来充满怀疑的硅谷，如何向米尔纳敞开了大门。投资策略当然是一回事，但仅仅是商业策略，打动人的说服力似乎又不够。随着采访的进行，初见米尔纳的那种冷感逐渐消失了，他不断露出笑容，不断询问着：“你觉得我的故事有趣吗？”让人感到他是个富有亲和力的人。采访结束，他站起来与我握手时，再次露出笑容说：“我也曾创办和管理过公司。2001 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时候，Mail.ru 陷入危机，我做过危机管理。可能正是这种经历，让我更容易得到公司创始人的信任。”对他来说，科技公司更是取决于创始人，很多互联网公司都起源于创始人的一个想法和几行代码。投资 Facebook 的时候，它已经有了非常强大的董事会，包括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吉姆·布雷耶（Jim Breyer）等，“我对现存的公司结构和扎克伯格的管理有着强烈的信任”。商业银行、通心粉厂这些传统行业给米尔纳的经验，并未阻碍他对新兴的互联网行业的认知；相反，给他提供了一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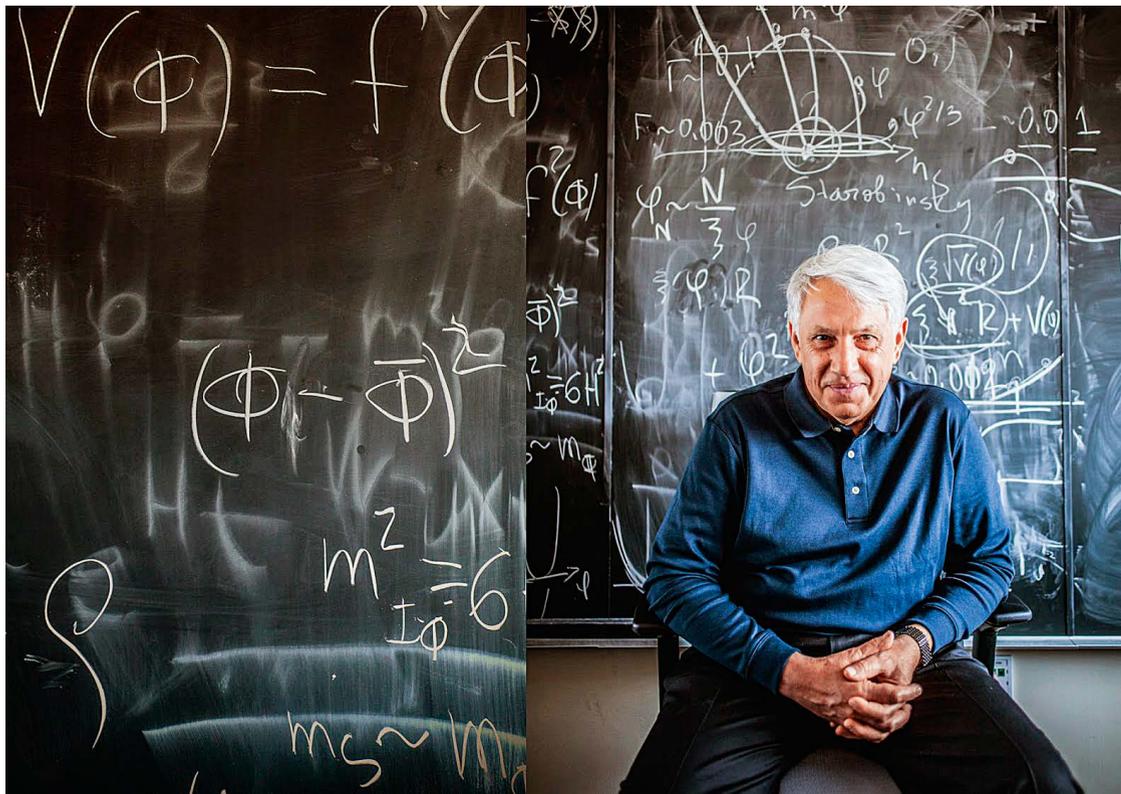
解互联网的多重维度。他告诉我：“传统行业通常有固定资产，比如厂房和设备，这些固定资产背后通常有复杂的担保条款，反而具有风险性。但互联网不同，它不需要任何担保，完全取决于人。”

米尔纳的生活与工作变得愈加“漂浮”。他开始不间断的全球飞行，他的投资不仅在美国，也在欧洲和亚洲。在中国，他投资了阿里巴巴、京东、小米、美团、滴滴、快手、OFO。中国已经成为他最重要的投资收益来源。2003 年，米尔纳认识了马云，那时“淘宝”刚刚问世。他在杭州参观了马云最初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十个人正在努力让淘宝上线”。与中国企业家的接触，让他有了很多关于互联网的新观点和新判断。比如，他告诉我：“正是腾讯教会了我游戏的重要性，让我看到游戏与社交网络是完美的结合。”腾讯后来也成为 Mail.ru 的重要投资人。如今，米尔纳设立的基金（DST），所有资金来源于北美的养老基金、亚洲及中东的主权基金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家族资金。

亿万富翁的宏愿：“突破”

见到米尔纳之前，我已在硅谷听人说起过他的名字。那是 2014 年在斯坦福大学采访，我的同事遇到一位宇宙科学家，叫安德雷·林德（Andre Linde）。他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别列捷夫研究院工作过，1989 年来到斯坦福。他是最早提出膨胀宇宙学的学者之一，对另一位宇宙学领袖人物阿兰·古斯（Alan Guth）的膨胀模型进行了修正。这位已经 60 多岁的美籍俄裔科学家当时神采奕奕，带着一些溢于言表的愉悦告诉我们，不久前他刚获得了一个叫“突破奖”（Breakthrough Prize）的科学奖，奖金高达 300 万美元，是诺贝尔奖奖金的三倍。他提到一个名字，“这是一位俄罗斯投资家设立的奖项，他叫尤里·米尔纳”。

在硅谷这样一个资本追逐创造市场的地方，安德雷·林德的宇宙学研究显得有一些落寂。这个奖项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他甚至有一点扬眉吐气的感觉。20 世纪中叶的宇宙学家和许多基础理论科学家一样，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有很高的社会声望，但这种声望现在大大衰落了。米尔纳告诉我，他设立这个科学奖的初衷，正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排在前十位的名人，都是演艺明星或体育明星，科学家没有得到应有的声望，聪明的大脑应该受到尊重”。



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宇宙科学家安德雷·林德，他是最早提出膨胀宇宙的学者之一，也是“突破奖”的获得者

这个奖项的设立人是三对硅谷的夫妇：米尔纳和茱莉亚，扎克伯格和普里西亚·陈，以及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他的前妻安妮·沃西基。

和诺贝尔奖绝对精英、流程严密和筛选过程不公开的提名和遴选方式不同，“突破奖”每年2月1日至5月30日在网络上开放提名，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提名数学、生命科学和基础物理学三个学科的科学家的。提名阶段之后，由前几任的获奖者来筛选获奖人。每年的“突破奖”颁奖典礼上好莱坞和硅谷名流云集，力求短小精干，通过社交网络媒体向全世界直播，目的是“让公众认识这些科学界的精英人物”。为什么科学家这么需要公众辨识度？米尔纳说，有一个很实际的考虑，“基础科学都极大依赖于公共资金的资助，公众声望意味着未来持续的研究资金资助”。过去，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私立研究机构也培养了不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但现在这些私人资金渐渐无力再资助那些资金规模越来越大的基础科学研究。

一百多年的时间，是诺贝尔奖声望不证自明的

原因，但“突破奖”是初生的新事物。“突破奖”对获奖标准的解释也是开放的：有一些人获奖是因为他们的成就，有一些则是因为研究的原创性或前景。2012年，基础物理学的九位获奖者大部分都是弦理论物理学家，不少人都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做研究；如果按照过去的获奖者遴选新的获奖者的“民主选举”规则，弦理论在“突破奖”中的主导地位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

见到米尔纳这天，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刚刚接收到了脉冲星的讯号。虽然所有正常运转的射电望远镜几乎都能捕捉到脉冲星的信号，但当听到来自深空脉冲星像胎儿心跳一样的声音时，还是忍不住令地球人激动。尤里·米尔纳告诉我，不久前，他的“聆听”项目与FAST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目前，他们已经联合加州汉密尔顿山顶上的利克天文台、澳大利亚的Parkes望远镜、西弗吉尼亚的“绿岸”望远镜等世界各地的大型射电望远镜，来接收和分析来自地外文明的信号。今年4月，“聆听”项目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份报告，通过对PB量级的数据

进行分析，他们列出了 11 个可能对发现地外文明很重要的事件，但还没有关于地外文明的确切信号。

尤里·米尔纳回到旧金山后，我们又通过一次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我，“聆听”有一个想法：射电望远镜每天都能接收到来自外太空的海量信号，但这些信号如何处理和分析，还没有相应的硬件服务器和软件。“聆听”项目希望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来储存和处理从未被注意到和分析过的信号。他们收集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射电和光学望远镜 10 年以来的数据，生成全天空（all-sky）信号监控，覆盖 10 倍的天空面积，每天收集到的数据比过去一年收集的数据还要多，无线电光谱范围是过去的 5 倍。

2016 年，在纽约世贸中心离地面 1776 英尺的楼顶观景天台上，米尔纳宣布了星际穿越计划 Starshot：把一批微型探测器送进离太阳系最近、4.37 光年的半人马座。半人马座是由半人马座 A、半人马座 B 和比邻星组成的星系。半人马座 A 和 B 围绕彼此运行，比邻星可能围绕另两颗星运行。近年来的宇宙学研究显示，半人马座 B 可能有一颗与地球差不多的绕行行星。“我们真的可以接近星星吗？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实现它吗？”米尔纳问。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他身边的是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30 多年前，他与米尔纳在一次物理学会

议上相识。霍金说：“我相信，让人类与众不同的正是对极限的超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极限，就是我们与星系之间的界限，但我们可以超越它。”足以驱动一艘太空船的巨型激光阵列，将驱动一支由几克重的微型探测器组成的穿越舰队，以高速公路上汽车上百万倍的速度向太空进发。按照这样的速度，这支舰队大约 20 年后可以抵达半人马座。到达那里后，这支探测器舰队将把拍摄到的照片发回地球。

这将是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项目。米尔纳和这个项目的科学家估计，正式落地执行、发射探测器大概需要 20 年，还有 20 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到达半人马座大概需要 20 年，探测器拍摄到的图片传回地球大约需要 4 年。它所花费的资金也将是巨大的，初步估计需要 100 亿美元。米尔纳希望以他 1 亿美元的初始可行性实验基金，吸引国际投资者们来持续资助这个项目。米尔纳已经 56 岁了。在一次采访中，他说希望能够看到星际航行舰队出发的那一天。“医学和长寿研究的进展，将决定我是否能活着看到最终的结果。”他并不是没有怀疑过星际试探的可能性，但纳米技术、激光技术的大发展和摩尔定律，都给了他尝试的信心。40 年前，“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如果要到达半人马座，大概需要 7 万年；今天，这个时间有可能缩短到 20 年。☑

古典画风穿越现代美学的雅趣

王赫 绘

生活历



【接受团购及广告定制，详情致电：010-846 81051】

《三联生活周刊》
天猫旗舰店

《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书店



绘画·阿裡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 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美国明星学校 AltSchool 关闭风波

主笔 / 曹玲



(视觉中国供图)

被扎克伯格等众多明星投资人青睐的 AltSchool 宣布要关闭一些分校，这个消息让众多支持者愕然。AltSchool 融资 2 亿美元，被誉为美国教育改革风向标，它的关闭究竟是个性化教育的失败，还是拐点？

关闭学校

近日，AltSchool 的创始人马克斯·温迪拉（Max Ventilla）宣布，AltSchool 将会在今年年底关闭位于硅谷帕罗奥图的校区，未来将会陆续关闭其他一些校区，有可能只保留纽约和旧金山两个点，作为实验学校（Lab Schools）运营。今后，学校将会把更多的重心转向“个性化学习平台”的开发维护，以及在其他公立学校的推广。温迪拉在给家长的邮件中写道：“我感到非常抱歉。”

消息对所有的家长、老师都是一个晴天霹雳。帕罗奥图校区的家长们在网上请愿，希望能保住这所学校。有家长表示，当初他们冒着风险选择支持 AltSchool，今天只想让这些孩子和他们的老师继续在一起。

AltSchool 是一家实验性的学校，著名投资机构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乔布斯遗孀劳伦·鲍威尔·乔布斯都是它的支持者。AltSchool 曾于今年 5 月获得 4000 万美元的 C2 轮融资，C 轮融资总金额为 8000 万美元，目前公司估值 45 亿美元。据统计，该校融资总金额已超过 2 亿美元，成为硅谷新兴的教育独角兽。

这家学校看似风头正劲，从 2013 年成立以来一共开办了 9 家分校。“Alt”作为电脑上的功能键，有改变的意思；“Alt-”在德语里是“旧”的意思，代表摆脱旧的教育制度。AltSchool 以此命名，改革的意味不言而喻。

据美国媒体报道，问题很可能就出在钱上。AltSchool 的学费、教学软件费和其他费用近 3 万美元一年，这意味着一个家庭要花费税前 5 万美元的资金才能进入该学校。虽然学费高昂，但 AltSchool 每年每个分校的花费大概在 4000 万美元，没有办法让学校的运维保持收支平衡。除了学费之外，AltSchool 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收入。

为了满足为每个学生定制学习的需要，AltSchool 的工程师团队和老师的比例几乎达到 1 : 1，这些来自 Facebook、Uber 等 IT 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硅谷的起薪至少十几到二十万美元不等，再加上老师的聘用费用，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AltSchool 短期内在寸土寸金的旧金山和纽约迅速扩张，使得运营成本急剧增加，加剧了收支不平衡的困境，而这样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向资本证明自己的能力。从某种角度来说，教育是不计成本的，而资本则对成本高度敏感，教育与资本的貌合神离使得这所创新型学校没有沿着最初的道路走下去。

创立和转型

AltSchool 的创始人温迪拉是纽约人，在耶鲁大学主修数学和物理，获得 MBA 学位后曾短期就职于谷歌，辞职后创办了搜索初创公司 Aardvark。2010 年，他将公司以 5000 万美元的价格卖给谷歌，并重新加入谷歌，担任集团产品经理一职。他的主要业务内



容是提高用户的产品个性化体验，例如通过用户的 Youtube 视频网站订阅记录，寻找用户的喜好。

2013 年春天，温迪拉和同为谷歌员工的妻子为 2 岁的女儿挑选幼儿园。他们发现，所有他们认为比较好的学校，尽管收费不菲，但报名人数几乎都是录取人数的百倍。在实地参观这些昂贵的私立学校时，他发现如今 3 岁孩子的教育和自己 30 多年前所接受的教育几乎没有差别。

之后，温迪拉越想越觉得是时候该做什么来改变现状了。目前的大多数学校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公共需求，只提供大众化教育而不是针对每个孩子提供个性化教育，他将这样的状况称为“多数人的暴政”。

他认为，学校的教学只针对中等程度的学生，而非针对每一个人。“如果我让你去教 20 名 9 岁的学生，其中一些人不想去课堂，所有人都有不同的兴趣和需求，并且在一天内不断变化。现在的教育是把一天分为若干个 45 分钟的片段，你会催促孩子们前行，如果有人不听话，你会警告他，如果他们走神或者厌倦了，你会继续进行下去，等待着每一次的下课铃声。”他说。

他不希望重演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他想到了

蒙特梭利教育法：让孩子们通过独立的任务完成学习，最大化地追求对孩子人格的培养和塑造。他试图利用科技和数据建立一个教育“生态系统”，准确对应每一个孩子的兴趣和未来发展诉求。

温迪拉希望学生们学习的时候能够更加专注于发展职场工作所需要的实用技能，而不只是机械重复前人的经验，因为它们终将被科技取代。他的父母是匈牙利人，幼年时期他在英语及匈牙利语双语环境下成长，在学校又学习了拉丁语及法语。之后他学习了波斯语，终于在晚餐时能听懂丈母娘说的话了。但他并没有强迫自己的女儿像他一样学习多门语言，在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采访时，他曾举例说：“比如我自己会三门语言，因此可以和说法语的妻子家人交谈。但是以后如果仅仅是想让孩子和外国人沟通，今天学那么多语言其实就没什么必要了，以后大家都随身携带翻译软件。”

2013 年，温迪拉又一次离开谷歌，决心颠覆美国的教育体系。当年 9 月，第一家 AltSchool 正式成立，地址位于硅谷温迪拉家附近一个普通的小楼中，全部学生大概只有 20 人左右，年龄为 5 ~ 15 岁不等。

这所全新的学校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为了

左图：AltSchool 创始人马克斯·温迪拉

右图：AltSchool 的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平板电脑，一个教室里大家可以同时学习不同的内容

不像传统学校那样变得越来越臃肿和官僚，温迪拉要建立的是微型学校。AltSchool 只有几个房间，可以在几个月内就开办起来。学校并不自建配套设施，体育馆、餐厅都没有，主要利用城市资源，比如活动空间是附近的公园。AltSchool 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年级划分，只是简单地分为低龄小学生、大龄小学生以及中学生三组，覆盖普通学校从学前班到中学 8 年級的年齡群。这里没有校长和管理员，没有报告卡，也没有铃声，没有标准化测试，没有指定的成绩。在每个班级中，孩子们不只和自己的同龄人接触，有些任务需要大小孩子共同合作完成，因此大孩子很多时候既是学生也是老师。

AltSchool 的课程内容大致遵守了国家共同核心标准，即提供每个阶段的学生应该掌握的课程，学生在课程最后应该进行考核，通过才允许升学。至于科目学习的顺序，则完全由学生自己决定。它在教学过程中把进度相同、兴趣相同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上课。如果这个学生在某一学科上学习速度较快，可跟高年级同学一起学高阶课程，但其他学科仍旧跟同龄人一起上。

孩子们每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是通过安装了 AltSchool 应用程序的特制 iPad 签到，然后查看学校为自己定制的“任务清单”上推送的任务，这些任务分为个人任务和团队任务。具体的学习任务包罗万象，例如利用数学和科学知识用步数测量金门大桥的长度、利用 3D 打印技术为班级中的小宠物设计游乐场等等。孩子们完成手工作品或者绘画之后用 iPad 进行拍照记录，并更新自己的任务列表完成情况。教室中到处摆放的摄像头则让老师们可以重复收看比较成功的课程，对于低龄幼儿，老师们还会拍下他们学习新词汇及动作的瞬间，成为他们成长的重要记录。

记录的数据将会被上传至一个名为 My. AltSchool 的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软件平台。这个平台囊括多款产品，既有帮助老师把学生根据兴趣分组的软件，也有帮助老师制定课程、帮助家长追踪学生成长进度的软件。这样，学生的每一点进步和成果都有可追溯的电子档案。老师们每天的任务除了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和这些程序员精诚合作，将每一个孩子的信息及时更新反馈，并制定下一轮的任务和目标。

最初，温迪拉规划的 AltSchool 的发展步骤是，首先建立创新型的小型学校，然后开发和完善技术软件提供给教育者，让其开办自己的学校；然后将

完善的教学技术提供给全美各地的公立学校，他计划未来 3~5 年实现这个目标；之后进军海外，把服装行业里“高级定制”的概念带入教育行业中，并充分利用科技产品，对每一个学生做针对性的教育，培养孩子们的好奇心。

温迪拉的愿望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想法一拍即合，中产阶级近些年的教育思潮是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让他们自主学习，发展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而非墨守成规，每年 3 万美元的学费也无法阻挡家长们的报名热情。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4~2015 学年，共有 677 名学生申请 150~200 个 AltSchool 的名额，而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有 2000 多名教师投递简历申请 25 个教职，可谓百里挑一。在这里，工程师和教师的数量基本是 1:1。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前员工透露，学校内部一直有两股相互较劲的力量：一方面是开设和运营学校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打造能够出售给美国教育工作者的技术。这两项举措都非常昂贵，最终软件一方赢了。2016 年，该校开始通过削减员工、在人员离职后不填补空缺岗位等方式收缩学校运营团队。旧金山的几所学校被整合，原定在芝加哥建校的计划被撤销。

AltSchool 这次战略上的转型其实早有预告。在 2016 年全球最大教育科技峰会之一的 SXSW 教育大会上，AltSchool 宣布其正在开发一套 AltOS 系统，将 AltSchool 实体学校的经验变成可以规模化的教学管理软件，在全美范围的不同学校中推广。今年年初，该校为此专门聘请了几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开展游说活动，其中包括南加州 Vista Unified 学区前学监德文·沃迪卡（Devin Vodicka）。

温迪拉表示，需求出人意料地强烈。下学期，AltSchool 预计将有 12 个合作伙伴，服务数千名学生，其中大多数学生将在公立学校就读。“这比我们预期的要早，而且它要求我们尽快适应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对于那些要面对这件事的孩子和家庭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当我们能够提供最多的支持时，他们就有兴趣去面对它。”至少到目前为止，对于那些孩子们在明年突然没有学校上的家长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小小的安慰。

硅谷大佬能否改变教育？

诸如 AltSchool 这种科技加教育的形式曾在

硅谷科技圈中得到众多大佬青睐，这些投资者希望 AltSchool 能重建美国教育，希望将此教育模式运用到私立学校、公共学校和政府特许学校。数百万孩子成为他们的教育理念的测试者，如何通过学习平台的完善，提升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在近几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教育，包括数字工具和个性化学习的研究。乔布斯的遗孀劳伦·鲍威尔创建的非营利性公司 (Emerson Collective) 同样以教育为先，捐献了 5000 万美元用于高中教育创新。2015 年 12 月 1 日，扎克伯格和妻子普莉希拉的女儿麦克斯诞生，扎克伯格发布公开信称，将捐出他们 99% 的 Facebook 股份，价值约 450 亿美元，其中一个投资方向便是个性化教育。

扎克伯格曾描述未来教育的面貌：即使没有住在一所好学校的旁边，全世界的学生仍然可以在互联网上运用个性化的工具，在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个性化学习确实给所有孩子一个可行的方法来实现更好的教育和更公平的机会”。

扎克伯格个人参与的非营利性基金创办了“Startup: Education”，支持学校和非营利性机构。除了 AltSchool，他还投资了 Mastery Connect、Newsela 等一些教育科技初创公司，并给连锁特许学校顶峰公立学校 (Summit Public Schools) 提供技术代码支持，支持其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软件开发，帮助 Summit 把这个新的教学模式推广到全美其他公立学校。如果扎克伯格如愿以偿的话，全世界的孩子不久之后都将使用他的公司帮助打造的软件自学。这是一个颠覆长久以来的教学模式的概念，通过软件让儿童自学，将教师的角色改变为辅助者和导师。

扎克伯格对于该项目有着宏大的计划。他指出，美国只有大约 2.5 万所公立中学。“我们希望，未来 10 年我们能够帮助美国大多数公立中学升级到个性化学习模式，然后开始将它推广到全球各地的学校。为 10 亿名学生提供个性化教育，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并不是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认同这样的教学模式。四位曾供职于顶峰公立学校的教师匿名表示，他们觉得该系统有问题。在顶峰公立学校，他们被要求教学生一些认知技巧，比如如何构建、论证，同时让学生自学基础的课程材料，比如不同的植物和动物是如何共存的。但部分学生只是匆忙学完课程，实际上没有完全理解基本的事实，因此他们难以帮助这些学

生就诸如气候变化等特定话题进行构建、论证。

然而，顶峰公立学校的支持者认为，那样恰恰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没有学好基础知识是无法做好应用项目的。学生们自己会想：“噢，我必须得再回头学一下，去深入理解课程。”这可能会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学习过程。

还有资深教师说，如今人们在力求颠覆和削弱教师作为专家的角色，但是算法比资深教师更善于根据学生的能力调整课程的想法真是荒谬可笑。

持质疑态度的评论家认为，那些认为学校可以改造的人，似乎对学校的理解非常有限，甚至不怎么考虑学生。他们认为学习是一个内容传递的问题，而不理解学习是一个社会过程，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尽管 AltSchool 竭力宣扬技术的魔力，但依然有学生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从好老师的更多关注和小班教学中获益更多：每个班有多名教师，学校高度重视跨学科项目，比如建造一个可抵御不同天气的样板房，这是一项将当前事件、科学、工程和预算等问题完美融合的任务。

温迪拉自己也明白，其他学校并不会全面采用 AltSchool 的方法。“但是有些部分会显得很有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它能够节省教师时间，改善教学质量，给予他们从未有过的灵活度，他们会采取开放的态度，尝试一下这样的附加产品。这件事情非常困难，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幻想，不过我们要做的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如果我们在 20 年内能够真正改进美国大区的公共学校教育，那就是不错的结果了，那就是成功。我们不需要推进很快，但是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

温迪拉的谨慎不无道理。虽然个性化教育很诱人，但是许多试图改变现有教育弊病的科技公司并未收到太好的效果，很多教育改革都失败了。当这些努力失败后，学校就更不愿意去冒险了。

还有学者认为，个性化教育能否走得更远更多取决于教育评价制度和教育管理体系是否能够改革成功。互联网技术+教育，表面上可以推进教育个性化，但很大程度上服务的还是功利目标：能否提高考试成绩，能否获得学位、证书等。

这并不是说学校不应该经历一个变化的过程。事实恰恰相反，变化是一个漫长而混乱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不可预见的事情。AltSchool 终将何去何从，谁也不知道，它也在自我学习的路上不断探索。☑

可转债的机会与风险

主笔 / 谢九



(视觉中国供图)

11月8日，江苏省南京市股民在某证券营业部关注着行情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可转债在证券市场急剧升温，几乎成为当前最火爆的投资品种，尤其是对中小散户，申购可转债更是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掘金之路。

可转债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其“零成本”的申购方式，再加上上市之后20%以上的收益，使得申购可转债几乎成为一种无风险投资，尤其是对于没有资金优势的中小散户而言，可转债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投资途径。

可转债在中国股市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投资品种，在A股市场，最近几年可转债的品种逐年萎缩所剩无几，几乎已经快成为一个即将消失的品种。但是今年9月份，证监会修改了《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大幅降低了可转债的投资门槛，可转债开始从过去主要以机构为主的市场，迎来了更多的中小散户。

证监会的新规主要是将可转债的资金申购方式改为信用申购，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无须预缴申购资金，待确认获得配售后再按实际获配金额缴款，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无须预缴申购资金。

在目前新股申购的规则下，投资者参与网上申购需要一定的股票市值，股票市值越多，中签新股的概率越大，这种市值申购的规则使得中小散户分

享新股红利的机会相对较小，很多散户可能一年也中不了一签新股。但是可转债的信用申购规则，使得每个投资者都可以顶格申购，既不需要投资者账户上有股票市值，也不需要投资者有现金，只要有一个投资账户就可以，这就使得中小散户和大资金处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

可转债从资金申购转为信用申购，使得这种几乎已经快消失的品种突然一夜之间爆红，在为投资者提供了一条投资途径的同时，也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更丰富的融资渠道。去年全年仅有十多家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融资规模大约200多亿元，而今年截至11月中旬，拟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超过120家，融资规模接近3000亿元，可转债发行开始呈现井喷之势。对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具备条件，也乐于采用可转债这种融资模式。今年上半年以来，证监会收紧上市公司定增等融资方式，同时对大股东减持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比如设定18个月的时间间隔、限定再融资发行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总股本的20%、明确定价基准日为非公开发行期的首日等等。相比之下，可转债这种模式的融资成本相对较低，表面上看是一种债券融资，需要承担一定的利息成本，但是可转债的利息成本一般很低，可转债的存续期一般只有6年，到期之后，这部分债券将转为股权，上市公司将不再承担利息支出，从长期来看，可转债其实是一种股权融资模式。更重要的是，对大股东而言，可转债的减持并没有定增那么严格，对大股东也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套现机会，比如雨虹转债和林洋转债，上市后几个交易日，大股东很快就大幅减持套现。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目前参与可转债基本上还是机会远远大于风险。所谓可转债，全称是“可转换公司债券”，是上市公司发行的一种含权债券，兼具债券和股权的双重属性。投资者购买可转债之后，既可以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卖，也可以在规定时间内转为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持有期间还可以享有一定的利息收入，当然利率水平较低，以最近发行的东方雨虹为例，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3%，第五年1.5%，第六年1.8%。

对于大部分中小散户而言，参与可转债最主要的模式还是“打新”申购。在现有信用申购模式下，散户可以全额申购，以雨虹转债为例，全额申购的上限为1000万元。当然，投资者不用担心中签之后资金不够的问题，因为可转债是零门槛申购，所以中签率很低，雨虹转债的中签率仅为十万分之一，比打新股还要低。在这样的中签率之下，基本上不用担心中签之后资金不足的问题，如果投资者中一签也就是10张，每张可转债面值100元，意味着投资者中一签只需要准备1000元的申购资金即可。对于大多数中小散户而言，如果有幸中签，选择在第一个交易日卖出是最简单稳妥的办法。以申购新规执行以来的第一只可转债雨虹转债来看，上市首日雨虹转债最高涨幅24%，以1000元的面值来计算，意味着每签最高可赚取240元。第二只信用申购的可转债林洋转债上市首日最高涨幅34%，意味着每签可赚取340元。这种操作模式基本上属于“傻瓜式”操作，投资者不需要对可转债有太深入的了解，完全是博取中签的运气。

从历史上来看，可转债上市首日破发的概率极低。在目前市场下，可转债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行业，因为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门槛相对较高，要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不低于6%、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不超过净资产的40%、净资产低于15亿元时需要追加进行担保等，在这些门槛面前，很多上市公司都不具备发行可转债的条件。而今年可转债的申购规则改为信用申购之后，中小散户对于可转债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市场供给之下，可转债出现上市破发还是小概率事件，从历史上来看，只有2010年中行转债上市首日出现了轻微破发。

除了通过“打新”参与可转债之外，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的第二种方式是，如果自己持有的股票刚好发行可转债，投资者尽量不要放弃配售的机会。因为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都会向老股东优先配售，对于面值100元一张的可转债，上市之后基本上都可以收获一定的无风险收益，上市破发还是极小概率事件。以东方雨虹为例，按照发行方案，发行的可转债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2.0865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老股东如果持有的股票越多，可配售的可转债也就越多。

对于激进的投资者而言，如果哪家上市公司有发行可转债的计划，甚至可以提前买入公司的正股，

通过正股来获得优先配售可转债的机会。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可转债上市之后可能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正股价格会面临波动风险，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投资者获得“股债双赢”，但也可能出现“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结果，可转债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正股价格损失更多。从最近发行可转债的公司来看，由于近期可转债普遍受到追捧，所以大多数计划发行可转债的公司股价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但是随着未来可转债发行规模扩容，供需关系改善之后，发行可转债公司股价受追捧的程度可能会有所下降，通过买正股获得可转债配售权，需要更高的操作技巧。

对于更加积极进取型的投资者而言，在二级市场直接参与可转债投资，其实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投资途径，从历史上来看，可转债在很多时候的涨幅也是相当可观的。可转债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投资品种。可转债对于投资者而言类似一种期权选择，上市公司设定一个转股权，当公司正股价格上涨，高于转股价时，意味着持有可转债的投资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对于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而言，最终肯定希望将公司的债券转为股权，这样可以减少公司的融资成本，所以，从大股东的角度来看，有足够的动力促进公司股价上涨，比如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尽可能美化公司业绩、释放利好等等。按照可转债的规则，可转债上市6个月之后就可以进入转股期，投资者随时可以将可转债转为公司股权，可转债的存续期一般是6年，所以，对于一些即将进入存续期末期的上市公司，可能更有动力来释放利好，这种公司的正股和可转债都值得投资者予以关注。

如果公司股价出现下跌，可转债的交易条款也对投资者提出了一些保护性措施，比如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这个条款的含义是，如果公司正股价格低于转股价格，意味着可转债的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实施转股，因为在二级市场直接买入公司股价的成本已经低于转股成本。而公司董事会可以向下修正转股价，也就意味着重新赋予了可转债的投资者更多的套利空间，转股价向下调整之后，投资者转股依然有利可图。另外，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进入最后两个年度之后，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债

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上市公司回售。

投资可转债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公司正股价格大幅上涨，有可能会触发上市公司的提前强制赎回，这时候投资者需要及时卖出可转债，避免被上市公司低价赎回。按照交易规则，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如果触发了强制赎回的条款，投资者应该及时卖出可转债或者是实施转股，而不是等待被上市公司低价赎回。通常而言，公司股价如果大幅上涨，可转债价格也会随之联动，公司股价如果超过转股价格的130%，可转债的价格正常也应该在130元左右，如果按照上市公司强制赎回的价格——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大概对应每张价格只有101元左右，投资者如果没有及时卖出或者转股，而是被强制赎回将会遭遇较大的损失，可转债市场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例。这种条款的设计其实也是为了促使投资者及时转股，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投资者都乐见这种局面，投资者在二级市场获得了较好的收益，上市公司如愿以偿实现了转股，过去几年可转债市场规模逐年萎缩，

其实很多就是因为最终在强制赎回的条款下提前转股所致，而没有等到可转债最后6年到期。

目前可转债虽然备受投资者追捧，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毫无风险。从“打新”的角度来看，可转债虽然破发的概率很低，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破发的可能，2010年中行转债上市首日曾经出现过轻度破发，这次破发事件也可算是可转债历史上的一次警钟。另外，目前可转债受到追捧很大程度上在于供需不足，投资者对于可转债产生了较大的配置需求，但是市场供给还是相对有限，随着未来市场供给量越来越大，可转债的稀缺性得到缓解，估值溢价也会随之下降。

可转债面临的另外一大风险在于大股东减持。由于证监会对于定向增发的减持出台了较严格的限制，但是对于可转债减持并无相关规定，这就使得可转债成为大股东套现的一条新的捷径。比如信用申购新规下最先上市的两只可转债——雨虹转债和林洋转债，上市后不久，两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就宣布大幅减持可转债，在上市首日大涨之后，这两只转债随后的价格就开始掉头向下，雨虹转债从最高124元跌至114元，林洋转债从最高135元跌至125元。预计随着可转债市场逐步扩大，相关制度逐步完善，可转债会慢慢从一个小众投资品种变得更加普及。☑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爱乐》2017年第十一期要目

封面话题

“要创作有调性的音乐”：再访德穆斯
德穆斯谈艺术歌曲及其他

恒常变奏 四声部碎片：影片《晚期四重奏》中的音乐美学拼图
斑狐说乐 在音乐里，所有熟悉的路标都消失了：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下）
话题 从萌生到繁盛：马勒交响曲在日本的演奏历程

爱乐笔记 希曼诺夫斯基八十年祭
是曲子创造了我：马勒访谈
乐冬二拍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五）
20世纪音乐 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阿多诺-韦伯恩：一个复杂的心理群（中）
乐史空间 1890年爱德华·施特劳斯在美国（上）
浮生碎乐 廿年不听海菲茨
作曲家与作品 对罗德里戈《阿兰胡埃兹协奏曲》、雅维《三角帽》和维拉-罗伯斯《巴赫风格巴西组曲》的解读

人物 当代澳大利亚作曲家林瑞玲访谈
歌剧物语 鲁塞尔的芭蕾《蜘蛛的盛宴》和《巴克斯与阿里阿德涅》
音乐之旅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二）

作品精读 前卫创新的普罗旺斯艾克斯音乐节
唱片说明书 富尼埃在Archiv录制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书店 《古典音乐那些人》和《古典音乐那些事》书评
资料库 舒伯特与施莱格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十）
听歌 拉赫玛尼诺夫《音画练习曲》版本集赏（上）
专题 真实的托斯卡尼尼：众多艺术家的回忆（九）
爱乐往事 北大爱乐故事（七）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8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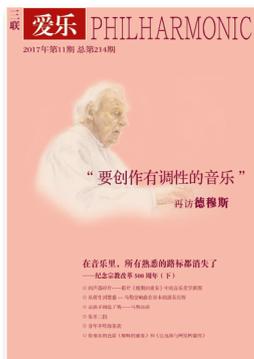
邮局汇款：

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去世界尽头 唠嗑和欢歌

#趁年轻 去南极#



LIFE+演讲南极专场

时间：2018.1.16-1.31

地点：南极飞猪号

演讲嘉宾

胡德夫：台湾民谣教父，代表作《匆匆》

张悦然：作家，著有《茧》《我循着火光而来》

谷岳：环球旅行者，著有《搭车去柏林》

郝景芳：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获得者

扫码参加



[视觉中国供图]

“战火”烧到了办公室：无人货架的厮杀

记者 王梓辉

过去几年，曾经发生在团购行业的“百团大战”成为中国创业竞争环境的一个代名词，后来者不管是O2O、出行还是共享单车，它们在资本的助推之下都以惊人的速度从萌芽成长为一个被主流创业者和资本瓜分的大蛋糕。而同样的故事正在一个新场景中又一次上演，这次的战场换到了办公室内。

办公室内的便利店

金静是一家百人左右创业公司的行政负责人，她所在的公司位于北京市四环与五环之间一个产业园内。每个工作日下午，她都有一项日常工作，那就是给公司的同事们购置用于消遣、放松以及充饥之用的水果。这项工作说复杂不复杂，也就是找到一家水果供应商，他们每天会选几样水果送过来，金静检查完毕之后分类摆到公司的公共区域提醒同事们来享用就可以了。说简单却也没那么简单，毕竟众口难调，送多了浪费，送少了不够吃，还得时刻检查供应商是否在质量上开了小差。

今年过完年回来之后，她很快摆脱了这项需要

她每天花一点精力和时间的工作，成本是零。起因是她自己加的一个行政 HR 群里看到有人转了一个 H5 广告，里面推荐了一种新型的办公室零食货架，这种货架完全公开，无需监控或管理，购买者可以直接拿走商品，只需记得用手机扫描架子或食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在微信上付钱即可，有些还会在零食货架之外提供一台放置饮料和水果的立式冷藏柜。金静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意思，就约了那家公司来聊聊，人家第二天就亲自上门讲解说明了这个东西的运营规则，金静当场就决定引入这款“办公室无人货架”。

之所以这么快就能决定下来是因为金静的公司在这个生意中完全是“零投入”，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公司内提供一块大约 5 平方米左右的场地用以摆放货架和冷藏柜，他们既不掏钱，也不收钱，员工消费的金额归那家提供服务的公司所有。用金静的话说是“纯粹把这当作一项员工福利”。在此之前，因为公司只会在下午提供水果，酷爱喝可乐的杨潇每天下午都会走出办公楼，来回花大约 20 分钟的时间到最近的便利店 7-11 买两罐冰镇可乐。而当公司引进了这个无人货架及冷藏柜的服务之后，他基本再也没有在工作时间去过那家 7-11。

杨潇不是个例。在当今中国，广义上的“白领”已然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相关报道，在主要的一、二线城市职业人群中，白领占比超过 50%，已成为城市主体人群。他们工作的区域大多集中在写字楼、工业园等封闭式楼宇内，而每天他们都要在“办公室”这个封闭的空间内待上 8 小时。工作压力、体力与精力的支出，同事之间社交的需要，种种因素让白领们在办公室内有对零食与水果的需求。在问答社区“知乎”上，“最适合在办公室吃的零食是什么？”这个问题下已经有了多达 1200 个回答，最热门回答的赞同数超过 1 万个。根据生鲜电商“每日优鲜”透露的数据，他们每天有两三成的订单来自企业的办公室。

不管是个人经验还是数据，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白领们在办公室内有对零食、水果等食品的需求。但在此之前，他们的解决之道要么是下楼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购买，要么是自己在上班时随身带过来，只有少数一些“土豪”公司会准备相对丰富的员工福利。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逐渐有一些人发现了这个商机。

上门为金静的公司提供服务的是“即刻零食”

这家创立刚满一年的小公司。去年 10 月之前，其创始人陶坤都在北京从事企业福利生意，也就是帮金静这样的企业行政人员解决每天下午员工“下午茶”的服务。但随着去年下半年经济形势的走低，陶坤发现部分企业开始削减员工福利的支出，客户流失率比较严重，无奈之下只好选择转型。这时，他恰好发现了办公室无人货架这个新形态的生意，正好跟他之前做的事比较像，于是就带着十几个人的小团队转行到了这个全新的领域，现在他们大概在 50 多家公司设立了 100 多个点位，大部分集中在北京。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生意只是由一两个摆满了零食的货架组成。但都市白领们下午茶的需求是极为旺盛的，很快，两个货架配搭一个冷藏柜就成了标配。人数较多、消费能力较强的企业还会在夏天引入有冰淇淋的冷柜，在冬天则换成热饮柜。事实上，只要入驻企业有消费需求和能力，陶坤们都能变着法儿地满足。

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白领集中的一、二线城市，这种无人零食货架“入侵”办公室的场景正发生在越来越多的写字楼内。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海就有 1200 个写字楼，潜在网点的容量超过 10 万个。看上去，不管它是否属于“新零售”的范畴，一种全新的消费形态正在办公室中诞生。

这个生意真的可行吗？

“我们跟美国的同事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没办法理解，说这不就是一个无人售货机吗？而且还是开着的！”说这句话的是刘元，他是风险投资机构真格基金的投资管理副总裁，这家机构也投资了两家相似的无人货架创业公司。

美国投资人的疑惑代表了许多普通人对这个生意的第一反应：在公共区域摆上一个无人看管的货架，不会有人把里面的东西都拿光吗？即使在已经投资了两家公司之后，刘元自己都说这种“自主拿完之后付钱”的商业模式即便是在美国、日本这种非常发达，国民素质非常高的地方也难以见到。

陶坤在创业伊始也有这样的不确定，为此，他从去年 12 月开始在 6 家公司做了两个月的试验，来试一试这个生意到底可不可行。最后发现几个关键指标数据“还行”，于是他们才决定投入到这个事情中。

小 e 微店是另一家在北京做同样生意的公司，



左图：真格基金投资管理副总裁刘元

右图：IDG 资本董事楼军

其总经理荣光为我们总结了 this 生意在安全性上的两大要素：封闭的场所，固定的人群。封闭的场所要求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这样他们才能自己租下一层楼或是至少拥有一块有较大空间的办公区域；固定的人群则将一些人员流动性非常强的创业公司排除在外。

“51 零食”创始人张渊斐将商品“盗损率”的标准定在 10%，一旦超过 10% 他们就会撤出该点位。据他透露，这种点位一百个里面有五六个，而他们也会进行相关的人工运营。“如果说出现了严重的破损，我们会去跟那家公司的行政人员交涉，然后我们遇到的很多情况都是他们自己买单，老板也愿意补贴，因为我们要撤走，他们也不愿意。”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他们会直接排除一些像 P2P 这样流动人员很大的公司，“一进去就是 20% 的盗损率，我们直接撤走”。

将货架摆在一个封闭空间内、拥有稳定人群的公共区域是几乎所有此类生意运营者的共识。道德

的力量一方面体现在不会有人轻易去白拿，但在荣光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传播扩散性，“毕竟谁也不会白拿了商品之后到处炫耀”。同时，另一家业内创业公司果小美的创始人阎利珉则更强调人工运营的重要性。“它不是说你把这个货架往那儿一装就可以走了的事，你如果不闻不问的话，那你在与人性的 PK 中肯定是处于下风的。”

在我们采访的四五家无人货架企业中，他们都表示自己的商品盗损率在 5% 以下，不过这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公关数字，陶坤就对我们表示，“这个数据是行业统一的，对外都是 5%”。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是，经历了一轮轮各种消费场景的打磨之后，都市白领们面对新事物时需要的适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教育用户的成本几乎为零。”张渊斐对本刊说道。而在办公室这样的熟人环境中，虽然商品的盗损不可避免，但通过合理的布局与人工运营，想象中那种大家都不付钱白拿的场景不太会出现。

事实上，联合办公空间也许是观察办公室无人货架最好的场景。一方面，其中汇聚的大量年轻人非常符合无人货架的消费特征；而一旦获得像优客工场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布局的联合办公空间的进入许可，就意味着你一下就能占据超过100个网点。

作为优客工场的创始人，毛大庆觉得这种零售服务在联合办公空间内就是一个“必需品”，是“基础设施”。他的论断有充分的事实基础。优客工场酒仙桥社区是今年7月才开放的一个联合办公空间，现在这个能容纳800个工位的空间内一共摆了三家不同公司提供的无人货架。这个社区的运营专员武新影对本刊表示，他们从7月开业之后就陆陆续续收到了市场上各家此类公司的合作申请，最终他们结合优客工场其他社区的经验，从中选择了现在使用的三家，结果目前颇受欢迎，“每天都要补货”。优客工场望京社区的负责人蔡加印也表示其社区内白领们通过无人货架的购买频次“挺高的”，甚至“还得催他们来补货”。在上述两家联合办公空间内采访时，我们发现大概每5分钟就会有一两个人去挑选无人货架上的商品。

这场办公室的争夺战非常残酷。“我们其实是有淘汰机制的。”蔡加印说道。之前他们就淘汰了一家补货速度不够及时的无人货架公司。而一旦确立了现在使用的三家之后，后来者们就基本没有了进入的机会。不过优客工场正在改变自己的策略，此前他们在无人货架的服务上由社区自己决定，但随着这个领域的极速发展，他们已经决定将由总部指定一家服务商在全国提供统一的服务，这背后的争夺战可能会非常激烈。

很快又被焦虑的资本们吹成了一个风口

自从雷军的“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理论火了之后，所有的创业者与投资人都在寻找所谓的“风口”，大家都怕错过下一个风口的机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2016年下半年融资额超30亿元人民币的共享单车和40天时间融资12亿元的共享充电宝，而今年下半年几乎每一家优秀的人工智能公司的融资金额都在1亿美元以上。最新的弄潮儿则是办公室无人货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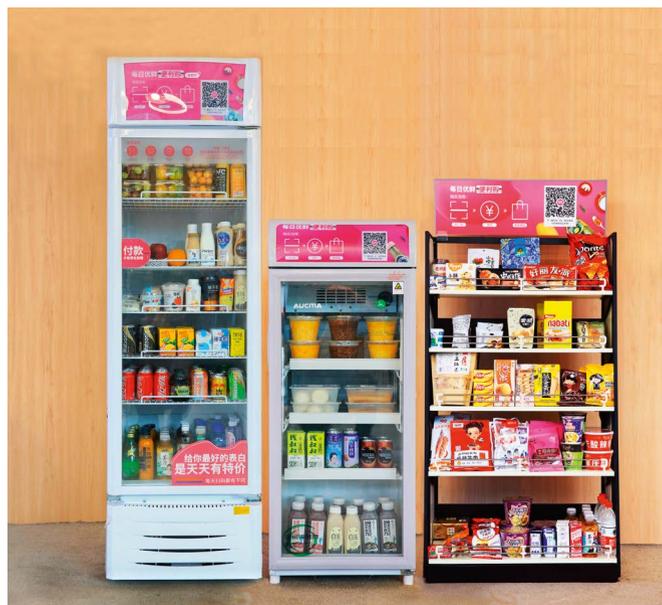
刘元觉得这体现了投资者们普遍的焦虑感。“每年有前景的投资项目是很少的，可能就两三个，但光是一线的主流美元基金就有30个，再加上二线

的美元资金和人民币基金，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大家都很害怕自己错过了一个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项目，因为错过一两个伟大项目，很可能就被时代抛弃了。”

不同于移动互联网诞生前几年时的创业高峰期，对手握大量资金的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狼多肉少”的时代，所以刘元说他们并不介意用10块钱买一个现在只值1块钱的东西，如果它未来有可能赚回来100块钱的话。

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办公室无人货架”这个行业从刚刚诞生的萌芽迅速成长为一个目前炙手可热的投资风口。今年6月，由前阿里资深员工组建的“果小美”刚刚在成都注册成立，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完成四轮累计达1亿美元的融资。同在今年6月，由前大众点评高管创立的“猩便利”在上海起家，他们在11月初已经完成了3.8亿元的A1轮融资。中商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无人货架市场前景研究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已经有至少16家无人货架公司获得投资，最高的达到3.3亿元，融资总额超过25亿元。

事实上，你很难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风口还是它被资本催化成了一个“人造风口”。果小美的创始人阎利珉就曾经对媒体表示，“天使轮的钱还没到账，



办公室无人货架的“标配”样式

就被资本追着开了B轮”。

资本的流入为这个行业踩下了油门，它在帮助这个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显露了自己的嗜血性。合并与收购甚至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9月，成都的果小美与上海的“番茄便利”就合并了，此时这两家公司都才刚刚成立两个月左右。促成这次合并的是双方共同的投资方——IDG资本董事楼军。因为觉得自己投的这两家公司比较“互补”，一家主攻零食，另一家偏重生鲜，因此在9月中旬的一天，他在成都的一家酒店订了一个房间，将果小美的创始人阎利珉与番茄便利的创始人殷志华引荐给对方。“他们单独聊了大概有两三个小时，”楼军说道，“基本上一下子就谈好了，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如合并一起来做这件事。”

两个公司之间的合并是否真如楼军所说的那么“温情脉脉”我们不得而知，但竞争的激烈性不容许他们有停下来“回首创业路”的时间。合并敲定当天，新公司就确定了统一沿用“果小美”的品牌，由阎利珉出任合并后新公司的CEO，殷志华担任总裁。“番茄便利”成了往事。

张渊斐的51零食也成了“过去式”，他的公司在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被资本实力更为强大的猩便利直接收购。他在采访中对此倒看得很开，表示“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才更有意义”。被收购之后，他也离开了过去的大本营重庆，前往上海负责猩便利在全国范围内的扩张，而51零食之前在川渝地区积累的近1000个网点也逐渐被猩便利接收。

资本的实力成为决定创业者收购与被收购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而决定资本走向的则是创业者过去的背景履历。刘元就表示“我们投的是人而不是事”，楼军也表示最初被果小美吸引的原因就是阎利珉过去担任阿里聚“划算团”队负责人的背景。事实上，目前拿到大额融资的公司，团队背景普遍雄厚：猩便利的创始人是原大众点评COO吕广渝，投资人囊括了美团大众点评系的王兴、张涛和王慧文等人；从便利店切入的“便利蜂”背后主导者是庄辰超；杭州的领蛙团队也有多位高管来自阿里集团。

像陶坤这样缺少“光鲜背景”的草根创业者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很难看到获胜的可能，尽管他们可能是全国最早做这件事的团队之一。在去年10月成立之后，他们在今年4月才开始了融资的步伐，“基本上国内叫得上名的机构我们都去过”，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投资机构的青睐。缺少资金

的支持，他们只能以“稳扎稳打”的形式缓慢地开展业务，这让他们即使在被收购的谈判中也缺少话语权。10月份，他们也和行业内几家规模较大的公司谈了相关的事宜，但都无一成功。陶坤谈到这里时有些激动：“我觉得从2015年以后我们从来没有成长，我们的商业竞争态势就是打价格战，所有东西都在钱上面较劲，我觉得这就很有问题。”但他无可奈何。

“我个人判断之后会有一个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的过程。”楼军说道。在他看来，渠道拓展是这个产业目前发展的首要因素，因为一段时期之后自然形成的规模效应就会衍生出大吃小、快吃慢的局面，而以烧钱为代价的价格战终究难以避免。根据相关媒体报道，目前猩便利已经调整了策略，每布局一个货架就会发放1800元的零食优惠券补贴。甚至还有更激进的公司选择向入驻的办公室直接支付成百上千元的“入场费”。要知道此前这种合作都是免费的。

当然，领蛙和小e微店等公司都向本刊表示不认同这样的竞争策略，他们自己都表示他们目前还没有采取这种“付费入场”的方式。“我们不会为了点位的扩张用补贴的方式去做。”大本营在杭州的领蛙公司COO桂强军对本刊表示，他们目前的重心还是放在精细化运营的体系与供应链的整合上。但他们是否能逃离这种烧钱的竞争模式也许要打一个问号。

这到底是零售还是互联网？

另一个惹人怀疑的地方则是：这真的是一个能赚钱的生意吗？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大部分便利店的毛利率在20%左右，实际上的净利润只有3~4个点。而根据桂强军透露的数据，他们一个网点的毛利率在35%左右，而净利润则需要扣除掉8~10%的物流、5%的运营以及5%的商品损耗。在被收购前拥有近1000个网点的51零食表示他们大概算是“基本不亏”，而荣光则表示一个城市要做到1000个网点以上才能盈亏平衡。如同所有的零售产业一样，这其实是一个利润率不高，需要规模效应才能真正赚钱的生意。

“这是一个搬箱子的活儿，又苦又累的小生意，一年只有几百亿，还很多人争。”果小美的阎利珉此前对媒体说道。他的想法代表了这个行业一种对

未来的思考方向。尽管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将这个行业的规模数字调整到了“3000亿”，但在在他看来，这个“低门槛、容易被复制”的模式背后蕴藏的机会其实是在线上。“我当年在阿里一个小团队一年的KPI（关键绩效指标）都超过这个数字了。”他对本刊说道，“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一年过万亿的市场，我们是不会进来的。”

阎利珉的想法代表一种从互联网出发的思考角度。有业内人士向我们透露，目前京东想要获取一个有效用户的成本已经达到了80~100元。当整个互联网线上流量红利几乎枯竭时，办公室货架能带来的是新的入口。“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交换理论，就是我们以满足白领在工作时间里的刚性消费需求去交换了他们掏出手机之后的流量。”至于要用这些流量去做什么，阎利珉只是说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实践了。“这条路已经走通了。”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IDG资本董事楼军是果小美的主要投资人之一。初见类似的生意模式时，楼军并不看好，但果小美创始人阎利珉从流量视角的解读改变了他的想法。“我们每个人每天在办公室要待8小时，占一天时间的三分之一，而无人货架面对的又是同一批用户，非常稳定。如果能把这些流量利用好的话，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分众传媒似乎成为这中间一个可能的关键模板。根据益普索、艺恩等咨询机构的报告，分众传媒在楼宇视频广告、电梯框架广告及影院广告三大市场的份额分别为95%、70%和55%。除了在发展过程中通过规模优势相继完成了60多次并购之外，对受众与商业模式的精准把握也许更值得借鉴。2003年，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在公司成立不久后的一次采访中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缺少一种新的传媒方式触及到城市中一个新的阶层，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方向。”

此前就有媒体表示分众只是电梯里的一个框，无人货架只是办公室内的一个货架，除了有限的SKU（库存量单位）之外，本质上两者做的都是流量生意。小e微店的荣光就认同这个观点，在他看来，电梯内的广告一天只会被白领们看两次，但在企业的茶水间里，信息到达的频率和精准度会远远高于电梯，所以这一块未来应该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互联网式的线上流量观点。总部在上海的猩便利就觉得“无人值守

便利架生意本质还是零售”，他们现在除了继续拓展无人货架的市场之外，也开始在上海开设实体便利店了。

而以生鲜电商起家的“每日优鲜”也许算是这些参与者中基础最好的一家了，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过去几年的生鲜电商生意搭建了不错的供应链系统。在他们看来，在成本不会增加很多的基础上通过将供应链前置的无人货架来完成对办公室场景的覆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他们专门成立了负责这项业务的“便利购”子品牌。其负责人李漾对本刊表示，长期来看，用户购买产品一定是多场景的，其中就包括家里、办公室、路上、公共场所这四个最典型的场景。“我们过去用了两年多时间在做‘到家’这个场景，在供应链、物流、用户运营等方面有了很多的积累，现在铺第二个场景就比较顺。”

但无论是从互联网还是从零售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所有人都认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供应链和精细化运营的能力。楼军就表示大家在比拼拓展速度的过程中，还要确保整个运营和供应链这些“内功”方面的事情不能崩盘。

而在这种既要高速扩张，又要保证全部链条稳定运营的激烈竞争中，一个基本共识是，最迟到明年的冬季，无人货架的竞争局面就会见分晓，尽管现在场内的众多公司规模最大的也才刚刚超过1万个网点，还没有哪家能覆盖超过10个城市。有人觉得会剩下三四家，有人觉得也就一两家，还没有定论，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必然将发生大量的收购与合并。“我能给你透露的就是现在已经有地方诸侯来找我们，要不就是求加入，要不就是求收购。”阎利珉在采访中不无得意地说道。

而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正推着这个行业将过去几年发生在团购、出行以及共享单车等领域的惨烈大战再次上演一番，那些如陶坤一样缺少光鲜背景的草根玩家们最终只能是“炮灰”。

在这种既要高速扩张，又要保证全部链条稳定运营的激烈竞争中，一个基本共识是，最迟到明年的冬季，无人货架的竞争局面就会见分晓。

以“家”为本的一汽 - 大众

——专访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范希军

文 / 李三 邢宇

俾斯麦对工业的扶持奠定了现代德国工业基础，很大程度上，企业内部的协调和管理是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早期德国工业所产生的工会是一个趋近完美的范本。在整个工业运作过程中，工会起着纽带作用，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员工在企业中的权益。一汽 - 大众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汽车合资企业之一，延承了德国大众的管理思路，在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的浪潮里始终保持平稳发展，不仅创造了中国汽车史上的一个个“第一”，甚至对整个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随进口车热潮的降温，国外品牌陆续进驻中国，设厂生产，一汽 - 大众也成为国内第一家按经济规模建设的中外合资现代化乘用车生产企业，落户长春。作为伴随了近一代中国人成长的汽车品牌，一汽 - 大众给许多中国人留下了“经典”、“踏实”的美好回忆，同时也占据了国内乘用车市场的重要份额。如今，在迈入中国的第26个年头，一汽 - 大众已经设立了长春、成都和佛山三大主要基地。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和国内经济的提速，中国汽车市场在经历了平稳发展的21世纪前十年，迎来了振荡期。面对汽车市场格局的变化，一汽 - 大众选择将企业发展的重点做出“回溯”，以中国传统思想——“家”为核心理念，重塑工会的作用，从单纯的生产效能转移到员工的情绪关怀和管理上。

转型与颠覆，当代迷局

9月26日，刚刚结束德国大众工会全球协调委员会会议的一汽 - 大众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的范希军，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范希军在采访中强调，人的因素在企业发展中至关重要。他表示，“在德国，大众集团更重视两点，首先是工会的作用；其次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我们怎么重视人性的问题。在通过更深地思考以后，我们发现包括人员的比重，特别是妇女的比重，人员的稳定性等都是企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关键点。”

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结束平稳发展后，中国经济突然提速冲刺，踏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一侧指向转型，一侧指向颠覆，这无疑是一个全新的“风险时代”的开始，“不确定性”成为市场中的主要催化剂。对汽车行业而言，诸多传统优势正在失去或已经不复存在，快速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经济的结构性摩擦，引发了一连串连锁



反应。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布局促成了半数以上的企业震动，人员的流失成了各行各业面临的难题，高人才流失率的问题急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变化。一汽 - 大众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自己的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范希军指出，颠覆，意味着从理念、知识，到过去的产业优势和企业的管理思路都要随之改变，过去的经验无法复制到当下，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已经成为汽车行业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要求企业从原材料到上游都需要重新整合资源，从过去简单粗放的合作到深层次的战略联盟，以联邦式的企业群体应对市场竞争。而联邦式合作是颠覆带来的直接影响，它要求企业既要保持各自的“个性”，又要掌握利用自己的个性配合其他“联邦成员”的个性，将合作变得更紧密。

早在2014年12月，一汽 - 大众正式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以打造“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典范”为目标，致力于在“运营、行业、产品、员工、生产环境和社会公益等”6个维度实现全面提升，建设高品质的全体系企业社会责任。范希军表示，过去一汽 - 大众的传统是人工成本低、制造基地的优势、网络的优势，依托政府支持获得市场优势，但随着传统优势的失去，企业需要重新衡量自己的优势利弊，在传统优势因市场经济结构调整而逐步丧失的时候，人才去留就成了企业应对局势变化的主动措施。除了靠“感情留人”，首要还得解决人才的资本需求，“确实要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生存问题，只有生存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物质生活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这时候对于企业家们来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强大的愿景是什么’”。

人人都是宣传队，人人都是播种机

范希军指出，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员工责任也是一汽-大众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责任之一。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和工会主席的多重身份让范希军的思考带着极强的思辨性，他提出在员工管理上，要以“家文化”为圆心，坚持“一个家，一个桥，一个点”。

“家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积淀，深耕“家文化”，是加强员工凝聚力的基础。首先，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一汽-大众借助工会和党委的工作，对员工的关怀建立了一套张弛有度的联邦式家庭模式。这个“家庭”内部，从思维和技术上模拟了无数小群体，就相当于一个企业里面包含了若干小群体。每个群体都承担着不同且固定的使命，每个群体都承担一个任务或项目，各司其职，各有所长。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自己的产业价值链，在深耕“家文化”的同时，用“内引外连”的方式加强了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粘度。“内引”是员工之间的互助、坚持和自我，即“小家有自我，大家有互助”。范希军援引了极具代入感的解释，“毛泽东讲把组织建在连上，这是在井冈山的时候讲的，这个时候讲互助，是组织的行为，组织活力上的互助。我们现在的组织活力和员工队伍的活力不足，不足并不表现在个体上，是表现在组织整体上。”把整体当做“家”用心经营，便能提升凝聚力；“外连”则意味着发掘资源，将资源分类整合。一汽-大众把资源分为战略型、经营型和生存型三种。对战略型资源要坚持不断创新，经营型和生存型资源则注重在企业这个“大家庭”内互助共享。

“桥”即平台，“点”即为员工提供的技能指导。为员工提供良好发展前景的平台，也是一汽-大众着力落实的工作，而创新正好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载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让每一个人都有为之骄傲的一技之长，从长远来看，也是促成

员工爱“家”的重要因素。在这个有机的群体中，“人人都是宣传队，人人都是播种机”。把“一个家，一个桥，一个点”有机结合，进而推动整个群体快速适应时代的波动，向前发展。

一汽-大众秉承的人本管理，既需要员工有危机意识，同时又对发展前景抱有希望，“求快，求实，求新”，“敢管，敢干，敢想”。这要求每一个员工都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个性”，认定自己在一个群体中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才能激发员工的自主性。工会或党委不仅要关心员工的工作，更要在生活中做到为员工职业晋升和“小家”考虑周详。一汽-大众致力于从各个方面为员工提供完善的保障，努力提升员工满意度，增强员工凝聚力。范希军将其概括为“战略引领未来、干事搭好平台、身心关怀备至、家庭和谐友爱”。

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深耕“家文化”、鼓励员工开放学习、集体担责创新是一汽-大众提出的人本思想核心。“中国虽然在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讲人本管理，我们首先要不忘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范希军说道。一汽-大众近期对外发布了面向未来的2025战略，将企业愿景更新为“中国最优秀的汽车企业，员工和伙伴心中最具活力的公司”，“有竞争力的薪酬机制加上完善的员工保障体系”，一汽-大众已连续六年获得国内汽车行业“最佳雇主”第一名，并连续八年获得由荷兰Top Employer Institute颁发的“中国杰出雇主”称号。

一汽-大众在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内部管理上所播种下的努力，已经逐步开花结果。未来，范希军表示“如何在‘以家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基础上求新”将是塑造一汽-大众新形象的重要任务，“让员工和社会看到，一汽-大众是一个真正负责任、风清气正的企业，只有这样，我们一汽-大众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未来我们的愿景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





《暴雪将至》：被一场凶杀案改变的命运

记者 / 宋诗婷

年近不惑，导演董越完成了处女作《暴雪将至》。在刚刚结束的东京电影节上，这部电影拿到最佳艺术贡献和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将 90 年代的社会背景融入一桩连环凶杀案，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呈现一代人的命运，这是董越为犯罪类型片找到的新出口。

1997，一桩谋杀案

刚读完《暴雪将至》的剧本，段奕宏就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小学时，学校鼓励同学利用课余时间捡煤块、煤渣，捡个一桶半桶，老师就在墙上给贴一两枚小红花。段奕宏的集体荣誉感就这样被培养起来了。

一开始，大家上学放学路上都低着头，专心为集体做贡献，但没过多久，煤渣就都被捡光了。怎么办呢？段奕宏渴望得到小红花，于是做了弊。他开始从家里的煤库里一簸箕一簸箕地偷煤，再假装是捡来的，上交给学校。“余国伟对荣誉、对体制的追求一下子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这段经历，我们在追求什么？怎么就走拧了呢？”段奕宏问大家，也问他自己。

段奕宏口中的“余国伟”就是他饰演的电影男主角，一个国有工厂的保卫科科长，一个被时代留在过去的小人物。

2013 年，导演、编剧董越开始构思《暴雪将至》的剧本大纲。他想写一个以上世纪 90 年代为背景的小人物故事。因为对犯罪类型片感兴趣，一开始他想以警察的视角来写，以一个处于灰色地带的警察



2



3



4

《暴雪将至》剧照：

1. 段奕宏凭男主角余国伟一角，得到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2. 电影中即将整体爆破的国有工厂
3. 20世纪90年代的炼钢厂工人
4. 在《暴雪将至》里，江一燕与段奕宏有一段半真半假的感情戏

为男主角，“但把握起来难度太大”。董越曾再三权衡，“首先，我对警察这个职业没那么了解；其二，写这样一个灰色状态的警察，对整个项目来说，风险太大了，搞不好电影就夭折了，不能冒这个险”。放弃警察后，董越开始寻找一个能与刑事案件相关联，又不是警察身份的人。来来去去，就想到了保卫科。

保卫科科长，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职业几乎是第一次以主角面貌出现在华语电影里。“这是一个尴尬的职业，有些小权力，但又不是真正的权力拥有者和执法者。”作为电影的导演和编剧，董越捕捉到了这个职业所能赋予角色的独特性。

有了核心人物，故事便徐徐展开。湖南小城，人称“余神探”的保卫科科长余国伟有个秘密——想挤进体制内，成为真正的警察。一起连环凶杀案让他看到了机会。他所在的工厂附近，四名女性接连被杀，作案手法一致，凶手指向同一个人。余国伟积极帮警察破案，他用自己的野路子，一度揪出凶手。随着离真相越来越近，余国伟心中“转正”

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欲望让他动了歪脑筋，他想利用与自己相好的风尘女子燕子做诱饵，引凶手露面。可惜计划败露，燕子含恨而去，余国伟也将愤怒发泄在他心中的疑凶身上。最终，命运与余国伟开了个玩笑，他终于走进了梦想中的警察局，却是以嫌疑犯的身份。

《暴雪将至》的故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凶杀案本身，另一个是大的时代背景。写一个犯罪故事，这是董越擅长的。在主线故事上，他用犯罪类型片的方式展开情节，参考了很多真实案件，再将它们糅合在一起。

但真正赋予这个故事新意的却是剧本中关于时代背景的描摹。1997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波及的工厂越来越多。一个个“以厂为家”的普通工人被挡在了工厂大门外。工厂机器被变卖，厂里发不出工资，用物资和产品抵债。曾经打算抱着“铁饭碗”吃一辈子的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也失去了生活保障。焦虑和空虚默不作声，却在每个失去支撑的个



导演董越工作照

体和家庭中蔓延。

《暴雪将至》的故事就发生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呈现这一背景，董越不仅营造了真实的工厂环境和生活氛围，还在主线故事之外安插了一些突显时代特质的故事和元素。除了连环凶杀案，电影还用两场戏呈现了另一场凶杀案，男人错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并非有深仇大恨，只是男人失业后郁郁不得志，夫妻俩常年争吵，一怒之下动了刀子。在当年，这类事件并不稀奇。那场余国伟和同事一起被工厂弃之门外的戏也很真实。大门里，领导在点名，门外，全厂职工安静等待。名字念了十来个，开门迎人，除了点到的，所有人都失去了工作。在这些失去工作中的人中，余国伟的故事也显得没那么特别了。如果出现在社会新闻里，他的行为和结局与杀妻的男人无异，而他们内心的理想与情感理所当然地将被时代遗忘。这两场凶杀案，一主一次，恰好能彼此映射。

阴郁的凶杀案，心惶惶的年月，董越用阴暗的影调和下个不停的大雨来制造氛围和渲染情绪。他是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却一直警惕一种倾向——形式先行。“没有具体空间，没有环境描写，没有氛围，只有故事构架，一个一万多字的详细故事大纲。”董越说，《暴雪将至》的剧本是在勘景之后才完成的，影像上的风格和调性也是根据拍摄地的特质建立起来的。

他为电影选择的拍摄地是湖南省衡阳市，那里也是《暴雪将至》的制片人肖乾操的老家。肖乾操告诉董越，老家或许有可用的工厂场景。一到工厂，董越就果断确定了拍摄地：“一看就觉得可以用，没有明显地被当代元素干扰过，基本设施还停留在90年代，还是当年的风貌。”

勘景的过程中，董越和当地人聊了很多，希望从他们那得到些本地信息。“我们去时还是10月份，秋天，但当地人说，衡阳冬天很湿冷，雨水多。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条件很好，《暴雪将至》故事本身气质就比较冷，如果影像上可以强化它，那就更好了。寒冷的氛围也会给人不安全感，人在那种环境里，心理动机就变得更合理了。”董越说，看完景他就决定，把电影的开机时间定在冬天。

虽然，最终电影没有在冬天开机，但董越还是制造了冬天的环境，用“湿冷”来渲染氛围。雨几乎贯穿整部电影，暴雪作为声音元素，一直出现在电影里的各类广播中，暗示着危险。

作为最重要的隐喻，“雪”只在电影中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余国伟作为劳模上台领奖，舞台道具故障，下了一场假雪。另一次是10年之后，余国伟出狱，坐在公共汽车上准备远走他乡，迟到10年的大雪终于来了。

片名《暴雪将至》在影像上找到了对应，它不仅指向现实层面的一场大雪，也暗示着急转直下的人物命运。董越说：“我希望呈现一种荒诞感，荒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它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

新导演与大演员

《暴雪将至》是董越作为导演的处女作。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这部电影得到最佳艺术贡献奖，男主角段奕宏也凭余国伟这个角色获得东京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与一位处女作导演合作，对于经验丰富的段奕宏来说是个冒险的事，相应的，与一位大演员合作，对导演董越来说，也是把双刃剑。

“初出茅庐的导演没有保险系数。”段奕宏当然知道，在今天的电影环境下，决定一部电影品质的因素很多，导演的技术和审美是一方面，他的判断、控制力甚至是情商都能影响电影最终的效果。虽然一拿到剧本，他就从余国伟身上找到了共鸣，但在决定接下这个角色之前，他还是与导演见了两次，长谈几个小时。“我感受到年轻导演身上那种挣扎感，那种不是很笃定的感觉。创作上的不安全感能带来更多可能性。当然，即便如此，这个选择依然是冒了很大风险。”段奕宏回忆自己当初的判断。

第一部作品就有段奕宏这样的演员挑大梁，董越当然很兴奋。但演员名气大、资历深，可控性就

不太好估计，很多年轻导演都栽在与演员的沟通上。董越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所以，两次与段奕宏见面，也是他对对方的评估：“好演员能带给你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这非常难得，是个好机会。表演和创作上的分歧不会困扰我，我唯一要把握的就是确定这个人的人格，如果真不是一路人，再有名气也要换掉，这点上，我还是有坚持的态度。但接触后我发现，段奕宏很纯粹，有了这个基础，其他创作上的探讨就不是问题了。”

董越的判断没错，段奕宏的确是赋予这部电影灵魂的演员。他把余国伟的复杂性诠释得精准到位。作为保卫科的大人物，作为劳模，余国伟有正义和睿智的一面，作为一个想挤进体制内的小人物，他又有卑微的一面。面对感情和欲望，他挣扎前行，这些他拼命遮掩的挣扎都体现在细微的动作和表情里。

“对于演员来说，如何建立信念很重要，你要相信你演的角色，这样表演上才能有代入感。”段奕宏说，虽然自己没在大厂里生活或工作过，但小时候，家附近有个纺织厂，几万人，就像一个城市，外面的人都想进去，那种荣誉感他能理解和捕捉到。

有了信念，还需要抓住细节，这样才能让观众也相信。和演《白鹿原》《烈日灼心》时一样，进组前，段奕宏依然去体验了生活。热心的保卫科干事带他在工厂里走一走，还原了很多破案场景。“通过他们，我能去感受一个大厂工人的精神状态。对于余国伟这个角色来说，把握住那个精神状态和90年代的时代气质，这个是最重要的。”段奕宏说。

《暴雪将至》在东京电影节首映后，有当时的群众演员在网上写影评，回忆了他参与拍摄的一场餐馆戏。那是余国伟第一次与他心中的嫌疑犯面对面，他拿出雨中追凶时对方留下的一只胶鞋，让眼前的嫌疑犯试穿。董越和段奕宏对这场戏的拍法有分歧，按照两人不同的理解，这场戏拍了四五种呈现方式。一场几分钟的戏，拍了大半天。

“现场的交流 and 调整太多了，随时都在变。”董越说，他尊重段奕宏的想法，也坚持自己的理念，他需要在这中间找到平衡。导演和演员，一个从整体上把握故事和视觉，一个从人物出发，两人出发点不同，但可以互为补充。

刚看剧本时，段奕宏有种担忧，怕电影最终的呈现更像一个高级的电视剧。“一开始剧本里有很多解释性的台词和表达，很怕观众看不明白余国伟和真正的警察之间那种身份的差别，但其实不需要，

这些可以用视觉化的东西，靠表演去体现。”段奕宏提到了一场戏，电影一开始，余国伟在案发现场掏出相机拍照，一个警察走上来，冲他屁股踢了一脚，让他该干吗干吗去。“这么早就直接体现这种地位的差别，太外露了。”他更倾向内敛的表演，用余国伟战战兢兢要给老警察点烟，警察局里一边自我表现一边讨好的姿态来体现这种差别。

“拍还是拍了，而且要拍好，最终决定权当然在导演。”让段奕宏欣慰的是，后来在东京看电影首映时，他发现，导演把那场戏剪掉了，“这说明大家的审美还是一致的。”

董越也是个敏感的人，他知道，段奕宏一度对他持怀疑态度，但这种对新导演的谨慎也是他能理解的。“电影的气质取决于什么？导演的品位和审美，但在这方面，段老师没有办法判断我。我知道，直到电影拍摄结束，他也是抱着不知道最终会怎样的心态离开。直到看完电影首映，他大概才觉得，坐在他边上的这个菜鸟，电影品位不差。那时起，他可能对我有一些新的认识。”董越说。

年近不惑才完成自己的导演处女作，董越等待了很多年。事实证明，他多年的摄影师和广告拍摄经历并非荒废时间，那些经验让他比大多数处女作导演更有控制力和执行力，这些优势都体现在《暴雪将至》的影像呈现上。

在电影筹备阶段，制片人曾帮忙把《暴雪将至》的剧本递给很多业内人士看。香港一位很出名的制作人看了剧本，约董越聊一聊。“一见面他就和我说，这个剧本很多地方可以删掉，没有意义，提到的第一场戏就是10年后余国伟重返领奖礼堂的那场戏。”董越很意外，那场戏他自己很喜欢，那种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感觉，暗示着人与真相之间的距离，也有种人走茶凉的沧桑感。“第一反应是郁闷，回家后想了很久，突然兴奋起来，因为这个例子恰巧证明，我与香港电影人是完全不同的，我的独特性就来源于这里。这是宝贵的东西，我自己必须珍惜。”

处女作没有遗憾是不可能的。采访时，董越不止一次提到，电影里三厂交汇处的小街戏份可以拍得更好，但时间和物力都有限，感情戏也可以拍得更从容一些，作为新导演，有些创作之外的事他还需要积累经验。

如今，《暴雪将至》为董越带来的赞美与批评都将成为过去，他唯一看重的是，这部电影之后，他再也不用担心没有电影可拍了。■

《心灵猎人》，罪案美剧的学术范儿

文 / 悦涵



美剧《心灵猎人》剧照

《心灵猎人》(Mind Hunter) 由电影大导演大卫·芬奇执导了10集中的4集，被称为“Netflix 史上最值得一鼓作气连续看完的剧”。

最近网上口碑高涨的美剧《心灵猎人》根据《读心神探》改编。原著是前 FBI 探员约翰·道格拉斯 (John Douglas) 以自己的经历为主线讲述的非虚构故事，背景为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社会。警方在 60 年代一度高达 90% 的破案率，进入 70 年代却形势变化，过往依赖动机寻找杀人凶手的老方法不再适用。29 岁的 FBI 探员霍尔登对“行为科学”产生了兴趣，开始研究 70 年代罪案的新变化，即陌生人犯罪，通过对犯罪行为 and 嫌疑人的心理侧写，追溯变态连环杀手的心理动因。剧中，霍尔登和搭档兼上司比尔大量走访关押在联邦监狱内具有代表性的杀人犯，试图通过对他们的行为分析和深度交谈，推测犯罪动机，“将行为方式研究发展成罪犯个性侧写、犯罪研究和起诉策略”。

《心灵猎人》对原著结构进行了重新梳理，将书中的纷杂案例分为两条线索平行讲述，第一条线主要是霍尔登和比尔走访监狱的故事，他们和那些已定罪的连环杀人犯对话、录音、采访，完成自己的学术研究；另一条线是他们在各地讲学，过程中接触到当地的警察、案件，这些人向他们求教，请

求帮助侦破疑难杂案。

剧中出场的第一个杀手，是艾德·肯珀 (Ed Kemper)。这个角色的原型埃德蒙·肯珀 (Edmund Kemper) 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女大学生杀手”。他在 1972 年 5 月到 1973 年 2 月间，绑架搭便车的女大学生到偏僻地，杀人、奸尸。探员霍尔登选择这个杀手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切入点，是因为听说他“非常善于言谈”。和肯珀会面的这场戏，大卫·芬奇为了找到那种紧张又松弛的特殊气氛，一共拍了两天才完成。第一次会面结束，霍尔登完全被艾德所“征服”，惊讶于他的词汇量、思维的缜密度。艾德在描述自己杀人的行为时，用到“使命”这个词，这让霍尔登觉得奇异又难忘。回去后他和女朋友约会时仍在谈论艾德，正攻读社会学硕士的女朋友提醒他：不要每句话都相信艾德说的，因为听上去他是“别人想听什么就说什么的那种人”。她教了霍尔登一些心理学方面可以给人增添好感的小技巧，以求打破艾德的“友好屏障”，让他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剧中充满了这种运用心理学常识精心构造问话、审讯的细节。如《卫报》评论，《心灵猎人》“带

人们进入了现代心理学经典理论诞生的瞬间，包括“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这个最终流传世界的词，当时是怎样出现的”。

和艾德的第二次会面，霍尔登变得像个久未见面的朋友，与艾德分享自己的私生活、新交的女朋友。艾德开始回答霍尔登的问题，说起自己的童年：母亲因为和他父亲婚姻失败，有仇男情结，而艾德长得和他父亲十分相像，所以母亲从小就对他不好。艾德选择女大学生作为自己的猎物，是因为他母亲在一所大学做管理员，整天无微不至地照顾那些女生，并认为艾德永远配不上那些女孩子。可是，在即将到达问题的核心前，艾德又一次将自己封闭，第二次探访结束。

《心灵猎人》获“神剧”之称的地方也即在此：就在观众以为第二次见面卓有成效之时，编剧却再一次采用“学术批判”的方法，利用霍尔登的搭档、拥有丰富心理学理论的比尔，质疑他这次对话的有效性。比尔指出艾德非常善于和人搞好关系，所以他是根据霍尔登讲述的关于自身的经历，精心裁剪了一个和性有关的、霍尔登想听的杀人动机版本。

第三次访问艾德时，霍尔登说服比尔加入。他认为从小有父权崇拜的艾德，肯定会对年纪稍长的比尔产生反应。果不其然，这一老一少的搭档在监狱探访室形成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艾德开始曝出大量心理细节：从小喜欢残杀虐待小动物、肢解玩具娃娃、对女性身体有莫名幻想……这些在今天为人熟知的变态杀人狂特质，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全新发现。最终，艾德暴露了连环杀手的重大心理症结：一个母亲不应长期鄙视、羞辱自己的儿子，否则他有可能会变得暴力，有敌意，仇视女性。

第三次探访后得出的结论被霍尔登迅速用于最新接触的一个案件。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地区，接连有年长女性被殴打致死案件，并显示有侮辱和猥亵痕迹；且每次虐杀，凶手都将她们的狗一并杀害，陈列在尸体旁。霍尔登推测，凶手或许也是一个在家长期受母亲鄙视或羞辱的儿子，才会选择从年长女性下手。并且他母亲的家里，肯定养着一只狗，她长期对狗呵护有加，却对自己充满鄙视、辱骂。

这就是后来约翰·道格拉斯在原著中阐述的“行为反映个性”，也是最初雏形的“用心理侧写方式找出凶手”。

但是，这种方法或研究果真如此精准有效吗？《连环杀手：非人性的方法和疯狂》的作者彼特·沃

伦斯基（Peter Vronsky）认为，对于连环杀手的研究发现，无论他们的谋杀行为多么具有延续性，研究都无法真正准确预测。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多么仔细监测一个人的心理状况、精神状态，都无法百分之百预测他（她）是否会成为杀手。比如犯罪心理学理论中著名的“麦克唐纳三症状”，即童年时“尿床、虐杀动物、纵火”是连环杀手的三元素，但之后已经有很多心理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不能认定具备此三个症状的人，长大后就一定成为连环杀手。

类似质疑在《心灵猎人》中也被放入剧情。因为长期接触连环杀手，霍尔登认为有必要在犯罪之前阻止其萌芽。在一次去小学的演讲后，学校里有不止一名老师和家长向他反映校长的怪异行为：总是邀请小朋友去他办公室，让他们脱下袜子，对他们的脚挠痒痒，之后给每个孩子一些零花钱。

这个行为无疑是诡异的，但是，它是否意味着校长一定是变态、会实施犯罪？霍尔登在这里采用了激进的宁枉勿纵方法，校长最终被校董会辞退并且几乎再难找到教育类工作。剧中以校长妻子上门流泪控诉的情节，质疑了霍尔登的这个举动。

这种研究方法同样会对研究者本身产生负面影响。原著作者约翰·道格拉斯在作品中说，有时，捕获这些连环杀人狂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像他们一样思考。但一个正常人如果长久钻研在这种变态的领域里，也会发生变化。在剧集里，霍尔登对于连环杀手的着迷研究，已经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他的思维方式开始越来越像他们，和女友的关系最终告失败。最后一集他终于崩溃倒在医院里。

现实生活中，霍尔登的原型约翰·道格拉斯也曾经历一次大崩溃，据称他做过一个长达一星期的噩梦——“我的四肢正被某种利刃肢解，身体的每一个洞孔都被戳穿。”在他自己的描述里，职业生涯中所有被他送进监狱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在噩梦中将他折磨至死。这场持续时间很长的噩梦造成他连日昏迷不醒，脑内出血，身体仅靠外部生命维持系统支撑……最终他幸运地被抢救了过来。但是，恢复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辛、缓慢。

《心灵猎人》对学术范儿的追求已经超出了一般罪案剧集，它记录了一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端的对连环杀手最早的系统性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质疑了这种研究手法的局限性，包括它对研究者本身的反噬。■



1

弗兰克·斯特拉作品：

1. 2014年9月22日，伦敦佳士得埃瑟儿专拍会上弗兰克·斯特拉的作品《6. 混杂：提升黄色的价值/降序谱系图》（右）以及《D. 混杂：提升绿色的价值/升序谱系图》
2. 《拉梅魔鬼》，1984年 3. 《K.144》，2013年
4. 劳德代尔堡NSU艺术博物馆陈列的《福尔廷德拉斯弗洛雷斯》
5. 《论聋哑者书信集II》，1974年
6. 《Hiraqla 衍变II》，1968年



（劳德代尔堡NSU艺术博物馆供图）

2



（劳德代尔堡NSU艺术博物馆供图）

3

“艺术至少为终极自由提供了一种错觉”

文 / 虞凡 (发自纽约)

2017年11月，战后抽象艺术代表人物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的新展“试验与变化”在美国佛州NSU艺术博物馆开幕。横跨其职业生涯60年的近300件绘画和雕塑，“其中有很多作品此前没有展出此后也不会再展，因为它们是我自己的收藏——不好意思，它们是太太的收藏”。斯特拉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

弗兰克·斯特拉今年81岁。在美国几乎任何一座重要艺术博物馆的现当代收藏中，都会和他的画作迎面相见。在上世纪60年代的极简主义运动中，斯特拉开拓性地以“黑色绘画”(Black Paintings)先声夺人，之后从立体画布到拼贴与浮雕画的结合，从极简跨向极繁(Maximalism)……他近60年来的探索实践，正是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一个缩影。

斯特拉成名很早。1959年，刚刚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毕业一年，他就凭借作品“理性与污秽的联姻II”(The Marriage of Reason and Squalor II)入选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群展“十六个美国人”。这个展被视为60年代美国极简运动的开端之一，大胆的创作在受到争议的同时也收获了

很多艺术评论人的肯定：“毫无疑问他们在‘进行创新’，旧的形式已经不再能够承载他们的想法”。

斯特拉的画作在展览结束后就被纳入了MOMA永久馆藏，他的创举鲜明有力：在对称构图的大尺幅油画布上，使用普通家居涂饰的刷子和瓷漆，与笔刷等宽的黑色在背景上平行铺展而开留出画布原色细线的间隔。他拒绝笔触的表现力，而强调将画布识别为一种二维平面融合于三维物体之中的整体结构，这种技法以返璞归真之感让人联想到工厂劳作的方式——用纯然的结构和抽象的视觉表现绘画行为本身。几年后他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说出了那句名言，“你所看见的即是你的所见”，这在日后成为他自己的作品以及整个极简运动最为人们熟知的注脚。创作于1961年的“本杰明·摩尔”(Benjamin Moore)系列被安迪·沃霍尔全数收藏，这套简洁的单色方块画对沃霍尔的波普系列有着直接启发。

给予后来者深刻影响的斯特拉，也谈到自己从经典大师那里受到的影响。他是随着现代主义成长起来的，在学校学习了有关20世纪的绘画，从19世纪60年代的马奈直到他自己成名的20世纪60年代。斯特拉说“过去是真实的”，但“什么是真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真实”这个词转化到艺术中也有许多问题。



4

(劳德代尔堡 NSU 艺术博物馆供图)



5

(劳德代尔堡 NSU 艺术博物馆供图)



6

(劳德代尔堡 NSU 艺术博物馆供图)



(东方IC供图)

战后抽象艺术代表人物弗兰克·斯特拉

23岁成名、34岁就迎来第一次个人回顾展的斯特拉，始终实践于艺术前沿。开始于1971年的系列“波兰乡村”(Polish Village)有着不规则的几何形体和明快色彩，其所指是毁于希特勒时期的波兰犹太教堂，也是从这个系列开始，斯特拉实验用电脑辅助构图和画板切割。三年后，他以“巴西”系列在视觉上强调了趋近手作的痕迹，留白与笔触随处可见，但事实上这却是艺术家个人手作的反面，是他第一次完全使用金属材质并且外包给工厂加工完成的系列。70年代末，从“异域鸟类”(Exotic Bird)开始，不再是早年那种线条极简的方块或几何抽象，他通过鸟类观察感受到自然的灵动，在创作中大量运用金属和多种材质的浮雕画形式来表现丰富的曲线，逐渐向“极繁”过渡。到了90年代初，斯特拉的画布延展到了城市建筑的外立面，他具有表现力的视觉风格在壁画创作中得以放大，像是为洛杉矶的太平洋钟楼(Pacific Bell Building)所作的“黄昏(Dusk)”。与此同时，斯特拉开始用3D制图程序创作图像效果图，并且由此更多转向雕塑。

斯特拉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明星。他被雕塑家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称为“雕塑家的画家”，也被《纽约时报》戏称为“高智商艺术”(high-I.Q. art)。他在绘画和雕塑中常对音乐、文学、哲学进行指涉，为抽象的作品注入耐人寻味的含义。比如1974年的“狄德罗”(Diderot)系列以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命名；2006年的“斯卡拉蒂”(Scarlatti)系列，每件作品的取名都来自这位意大利音乐家创作于18世纪的键盘奏鸣曲。

新展期间，我们在纽约对弗兰克·斯特拉进行了专访。老先生幽默而谦逊有度。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食指缺少一截，最后问道：“可不可以知道你的左手发生过什么？”斯特拉笑了，说这是童年时候的意外。“很遗憾，它不是那种一个沉迷于艺术的画家，画画时忘乎所以，甚至伤到了自己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我之前读到过你对马蒂斯、毕加索和米罗的评述，你说“他们很幸运，他们有一个平面”，而在你自己的绘画中，最为关注的始终是表现空间。怎么理解这种平面和空间的相对？

弗兰克·斯特拉：毕加索、马蒂斯和米罗有什么幸运可言呐，除了他们极具天赋而且真的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不过一个战后抽象艺术家肯定跟马蒂斯他们大不相同，尤其对于美国的抽象艺术家来说，创作驱动力更多来自马列维奇、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这是我们可以切实向前回溯的一条主线。毕加索和马列维奇好像分别处于南极和北极，所有人合在一起事情才完整，才诞生了后来的许多事。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你个人来说，为什么表达空间如此重要？

弗兰克·斯特拉：我觉得有这么多显而易见的方式去描绘空间，而且有许多方式去描绘基本的视觉术语。翻翻艺术史就会发现，我们有过透视性空间、吸收性空间、描述性几何空间、立体主义的空间等等。我感兴趣的是对绘画能发挥功效的那种空间的体验。空间是你的所见所感，而绘画本身确实只是一个平面，不管它是光滑平坦的还是堆满了东西，平面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我对平面感到自信，所以想要在其中寻找对我有效的空间。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都有建筑性的思考，比如很像赛马场跑道的作品“多维尔”(Deauville)，你觉得怎样能使绘画中的空间与实际的空间共存？

弗兰克·斯特拉：作为一个画家，你所做的事无非两种：要么留下标记(make marks)，要么挥洒姿态(make gestures)。那么多的画家，无论各自在干吗，他们都是两者之一，或者在平面上创作，或者就自己创造出一个平面。而建筑空间是既定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用途。

三联生活周刊：90年代你就开始用3D打印来创作小件作品了，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些尝试？

弗兰克·斯特拉：其实在创作常规绘画的同时，我就饶有兴趣地一直在做浮雕画。我逐渐产生兴趣

的并不是去绘画一幅画，而是去建造一幅画（build a painting），这么说是有点建筑。从作品“波兰乡村”（Polish Village Paintings）开始，我想把自己感知中的东西建造出来，把想要画上去的东西设计出来。大概到了80年代晚期，我们当时在玩摄影和烟雾屏幕，想做出一些全然含糊的非结晶的形式，创造一种固态的烟雾屏幕——这想法真是愚蠢——我想捕捉烟雾和氛围性的举止姿态，就像是在风景绘画中描绘云朵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你的很多尝试都非常前沿，用到了Photoshop和Auto CAD这些技术手段的辅助。

弗兰克·斯特拉：我并不用Photoshop，我只是把它交给其他会用Photoshop的人来做。我们的方式仍旧是以拼贴（collage）为主，把不同的东西很有趣地放到一起，这和Photoshop里的图层相似，但我不觉得自己在用它创作。你看墙上这些雕塑都是用3D打印的小物件组合起来的，但我也觉得是在用技术创作。我仍旧只是个做雕塑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经在《纽约时报》上读到文章，把你的作品描述为“高智商艺术”。

弗兰克·斯特拉：《纽约时报》才不会这么说，我的智商可远远不够。他们过去说过一些现在他们不太喜欢的话，比如他们以前总说，哦，这件作品让人毫无感觉，或者这件作品非常学术。但好像这些都过时了。我觉得你们这代人已经不再这样思考问题了。据我的观察来看，至少上次在惠特尼的展览里，我注意到人们似乎更倾向于和作品进行直接的、身体上的、参与式的沟通，而不像过去人们更喜欢在作品前沉思。

三联生活周刊：好像是，可能因为现在的作品都太难理解了吧。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至少你很多作品的标题就已经非常难于理解了。

弗兰克·斯特拉：好吧，那大概只是我在装模作样罢了。有些标题是德语的，有些是法语——但我既看不懂法语也看不懂德语，只是我在看的书是这些德语、法语的译本，我就用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经常在作品和标题中指涉文学作品，比如“白鲸”（Moby Dick）系列。

弗兰克·斯特拉：是的。那个系列是刻意为之，因为《白鲸》这部作品本身就有关自我意识。我当时的想法是——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最终成功了没有——能够让作品在使用抽象的形式和姿态的同时又富有叙述性，这样它们就能产生感觉和反应。当时的想法就是可以在作品中“闪现抽象”（flash

out that abstraction）。

三联生活周刊：“闪现抽象”这想法很有意思。那么请问你如何看待视觉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比如文学、音乐还有建筑……它们多少都出现在你的艺术中。

弗兰克·斯特拉：我觉得它们就是各自独立的。我猜它们对那些特别有才华的人来说确实可以有交叉，但是我不行。比如我所听见的，也许那是音乐，但我永远无法得知对一个音乐家来说那些声音意味着什么。我也听过做音乐的人评价我的作品，说色彩丰富，但他们说的那种音乐意义上的色彩丰富我其实无从想象。永远无法知道每个人的感受，不过我觉得这些也并不重要。很多人有能力去做很多事，不过我只是困在自己的角落里。

三联生活周刊：策展人在文章中提到你认为“艺术至少为终极自由提供了一种错觉”。这句话对我来说很触动，一方面，好像你仍然认为艺术是值得被追求的，但另一方面，好像你也认为必须做出不少妥协。

弗兰克·斯特拉：我觉得你有点高估我了。因为，如果没有关于自我的意识，没有那种要做什么以及终极的自由究竟为何物的意识，你可能一开始就不会从事艺术。而且，这样的想法穿插在自由这种社会性的规范和另一个终极——可能是意识——这两者之间。而意识可能比自由更加问题重重。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们，你有什么建议吗？

弗兰克·斯特拉：很有可能会忍不住说很多建议，但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别变老！请永远做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别在年轻的时候想象自己变成老艺术家。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你对中国的艺术有什么了解吗？

弗兰克·斯特拉：我唯一知道的中国艺术家是蔡国强，25年前我在日本一个美术馆看过他的作品，好的东西就是好啊，我当时从没听说过他，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人。另外，大约25年或30年前，我当时在香港，他们开始展示来自内地的艺术，非常热闹，我觉得自己见证到了开端，中国当代艺术的很多事情就是从那之后发展起来的。虽然我不太了解中国的当代艺术，但是我对中国艺术中观看空间的视角感兴趣。古典中国艺术对于如何描绘氛围性的空间来说是绝佳例子，没有所谓透视，所以展示的空间与西方完全不同。这让我想起达·芬奇不少作品中风景的质感，也属于氛围性的空间描绘，而并非强调透视。☑

恐怖鬼才伊藤润二

记者 黑麦

伊藤润二的漫画有一种诡异的诱人，他画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不安与惶恐，也是人性的扭曲和软弱不堪。

北京开了他的漫画展，伊藤润二特意飞过来亲自看一看。如果没见过伊藤的相片，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漫画界中的恐怖大王。他竟然挺爱笑，也很认真地听人讲话，即便是中文。他穿着格子西装，牛仔裤和运动鞋，透露着一种拒绝成年的“未满足感”，这身打扮让他看起来有点“宅”，也像个默默无闻的公司职员。

中国网友觉得他“呆萌”，在网上叫他“二子”。他讲话时很腼腆，也羞涩，像大多数日本人那样，在寒暄时会含蓄地低下头，尽量避免与人的目光接触，一旦触碰，他会缓慢且自然地望向别处，这或许是他给人留下的唯一神秘感。

1963年伊藤润二出生于日本岐阜县，是个心思缜密的巨蟹座。从小便开始阅读姐姐的恐怖漫画，那时候，古贺新一和椋图一雄笔下的故事在日本正流行，他开始迷恋于这些光怪陆离的神奇故事。80年代，他考上医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试图成为一名齿模医师，不久，他的投稿漫画《富江》改变了他的命运。

伊藤润二的成名作是《富江》。富江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她是充满神秘感的少女，没有人说得清她的来历，她拥有让所有男人为之痴狂的美貌，她的复制人物被人接二连三地杀害。此时的伊藤尚没有放弃医学，学校的学习场景、去世友人和记忆中的校园成为了他最初的素材。没过多久，《富江》问世，拿下恐怖漫画奖项“椋图一雄奖”第一名，并在1987年刊载于《万圣节月刊》。

直到今天，富江都是恐怖电影和漫画中最为经典的角色，伊藤润二觉得她的存在代表了一种人性的缺陷——人们的占有欲和它所演变成的癫狂。从1999年开始，《富江》被及川中、清水崇、井口升、久保朝洋等导演接二连三地改编成各种影视作品，然而，始终没有得到较高的评价，可能是太过于渲染惊悚的场景，而忽略了作品本身的表达，对于电影，漫迷只是觉得要忠于原著，而伊藤觉得，那些都是

富江的又一次分裂，是他人对于富江的想象和加工。

伊藤的想象力，是“无厘头”式的。1973年威廉·弗里德金执导的电影《大法师》中有一处被附体的情景，小时候的伊藤看过这部电影后总觉得人的身体会长出奇怪的触角。在画《鱼》的时候，伊藤让鱼长出了长腿，入侵城市，他还利用人类对于幽闭空间的恐惧，画出“阿弥壳断层之怪”。

伊藤曾经希望用漫画来治愈自己对事物的恐惧，但是画久了，他仍旧不能摆脱对事物的固有印象，比如蟑螂。但是，情感却在他的抒发中，得到了某种慰藉。《缓慢的告别》是他最为温柔的表达，他利用“残像”——意念力制造出来的已故人的虚拟影像，弥补内心的伤痛，整个故事浸在一股关于生死、家庭、关系的网中。很多人在他的漫画书评中写道，这是他们唯一一部看哭的恐怖故事。

伊藤懂牙齿，也觉得眼睛会说话，因此他笔下的人物都长着不同的牙齿，也带着不同的眼光。他觉得眼睛是直通大脑的嘴，也是观察和窥视的工具，更是形成观念的最主要器官。在《无街之城市》中，他画出了多眼怪人，他尝试描写偷窥之欲与隐私危机，他把血腥猎奇变成一种极端化的处理，指出当时他所认为的最被争议的日本社会矛盾。

伊藤润二画的是人性的扭曲和软弱不堪。最近他将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画成了连载漫画。由此可见一个当代漫画家对于过去作家的某种了解和审视。此前，古地朔弥、古屋兔丸两位日本漫画家也曾把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改编成漫画，然而，伊藤的漫画充满了他对太宰治的多面理解，从温情到戾气，命运、生活如梦泡影。伊藤仿佛能读懂那个作家小心翼翼的自卑，然而关于忠诚和杀气，以及那些铺天盖地的阴郁和怯懦，则大多被隐藏在了他写实的画风之中。

“我的小孩看完我的漫画觉得很恶心。”伊藤有些失望地说，虽然他不想让孩子过早地看到这些故事，但是仍旧对这个年轻人的反应有些失望。“他们在手机上接触到的带有刺激的语言、文字、图片、视频越来越多了，恐怖漫画现在带给人的不光是一种恐惧。”他补充道，“人们的内心都有恐惧感，那是一种被隐藏起来的记忆。”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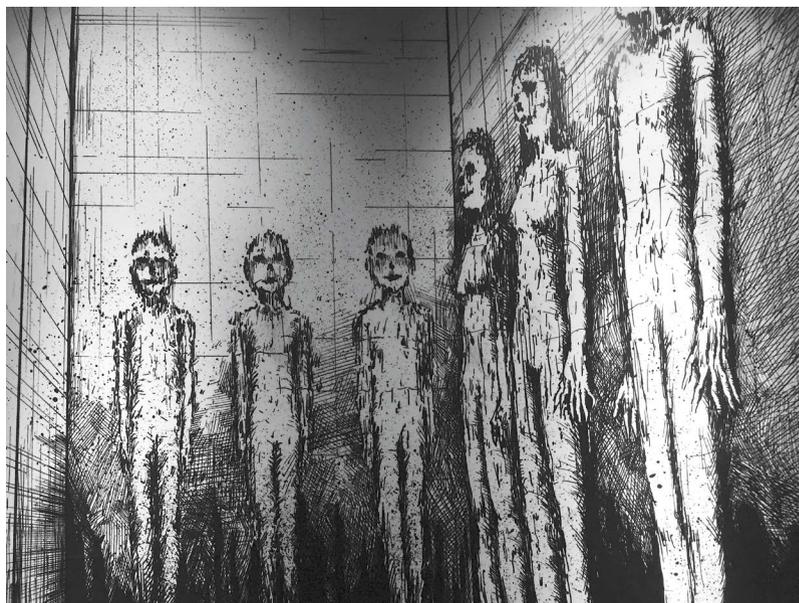
(本组图片: 刘喻 摄)

伊藤润二作品:

1. “富江”
2. 漫画《富江》内页
3. 漫画《蛞蝓少女》内页
4. 漫画《鬼巷》内页



3



4

“人最害怕的事……”

——专访伊藤润二



日本恐怖漫画家伊藤润二

三联生活周刊：你小时候说《木乃伊老师》启发了你的恐怖之路，能否跟我们谈谈这位作者？

伊藤润二：我看过很多楳图一雄的漫画，比如《绝食》《猫目小僧》《蝇》，他的作品里讲了很多人性的黑暗一面，但是这些角色的本质都是善良的。可以说他的漫画启发了我，我觉得我应该算是楳图一雄的弟子。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当年你看过《木乃伊老师》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记忆吗？

伊藤润二：在那个作品里，恐怖故事发生的场景大多是在教室，那个木乃伊就藏在女生的身后，这个场面，对于小时候的我而言，影响很大，使我受到了惊吓。

三联生活周刊：网上说姐姐对你的影响很大，

具体在什么方面呢？

伊藤润二：我的大姐是个恐怖漫画迷，她总收集楳图一雄的作品，而且都是第一时间购买，所以我有机会阅读这些作品。另外，我过生日的时候她都会送我《婴儿少女》之类的恐怖读物，还有日野日出志、古贺新一的恐怖漫画。

三联生活周刊：在名古屋齿科的读书时期，你有没有觉得医校的环境会有恐怖的感觉？

伊藤润二：其实医校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恐怖，我读的又是齿科，专门制作牙齿模型的。我之前是在乡下长大的，第一次到名古屋这样的大城市，内心自然会生出一种孤独感，那个时候的我对很多事物都存有一些恐惧。

三联生活周刊：能讲讲当时画《富江》时的一些想法吗？

伊藤润二：《富江》是在一次漫画比赛中被楳图一雄选中的作品，然后，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连载创作，前后大概两年左右，我的创作灵感是我的中学好朋友，他因为车祸过世，那时候她是我最近的朋友之一，所以我觉得她可能随时会突现在自己面前，这个想法到现在都会有。

三联生活周刊：《富江》被多次改编成电影，你最喜欢的版本是哪个？

伊藤润二：是第一个版本，因为是印象最深的，我很喜欢菅野美穗这个女演员来扮演富江。

三联生活周刊：在漫画里，富江有个特征是吃鱼子酱，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伊藤润二：鱼子酱、鹅肝这些是曾经风靡日本的食物，但是很昂贵，都是富人们才消费得起的食物，它出现在漫画里，对于富江这个女孩来说，可能就是一种欲望的象征。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富江》之后你就决定成为专职的漫画家？

伊藤润二：其实我在22岁就决定了，用漫画的方式来开阔自己的眼界，我小时候还有过很多愿望，比如希望世界和平什么的，谁知道自己会成为恐怖漫画家呢？

三联生活周刊：齿模师的经历有没有影响过你

的创作，或者成为你的创作素材和灵感？

伊藤润二：没有直接的作品，但是我画画时喜欢把人物的牙画得很清晰，我了解牙齿的形状，我觉得那是一个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我上学的时候也学过解剖学，那些记忆也形成了我对恐怖的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你每次决定要创作一个新作品时，都是怎么展开题材的？

伊藤润二：一般我都是从日常生活中着手，举个例子吧，比如《蛞蝓少女》，有天我对着镜子伸出舌头，觉得这个画面很有趣，因为舌头是人体最常用到的一块肌肉，却常常被人遗忘，所以我就画了像舌头一样柔软并且黏湿的蛞蝓；在画《至死不渝的爱》之前，我一直在翻看百科全书，看到日本曾经的民俗文化，算命师经常出现在路口给人占卜……

三联生活周刊：再说说你的画风吧。

伊藤润二：其实我觉得我的画风不是那么典型的日本漫画，我的写实感更强一些，我画漫画的风格也是黑色幽默的，在严肃的画风里有些搞笑的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你的画风是否决定了你只能画恐怖漫画？

伊藤润二：其实我有想过画一些爱情喜剧，或是比较阳光和爽朗的漫画，但是我很担心我的粉丝和出版社不接受。这就很麻烦了，想想就很难的样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恐怖漫画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都经历了什么变化？

伊藤润二：话说30年很长，但我觉得日本漫画好像没有发生特别的变化，可能是我身处其中的缘故吧。但是今天的网络很发达，人们在网上寻找新的刺激，在网上有很多现实的恐怖状况发生，我们还能看到图片、视频，比起这些杀人的惨剧，漫画肯定不及现实的恐惧程度吧。但是漫画家是有想象力的，有时候我们脑海里想象的事情也很恐怖呢。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有个新词叫“细思极恐”。

伊藤润二：（听完翻译后）对，我赞同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什么时候是阅读恐怖漫画的最好时机？

伊藤润二：睡前吧，如果做个噩梦，说不定还能换来一些灵感。我现在很少做梦了，而且醒来之后很难记住那些故事。之前创作《人头气球》时的灵感就是我的梦境，我站在一个空场中央，一个只有上半身的女人下面是一根长长的绳子，不断向我靠近。

三联生活周刊：你内心相信神仙鬼怪吗？

伊藤润二：日本有妖怪文化，我上小学的时候觉得是有鬼神的。我的小学附近有一片坟地，那时候我们都很顽皮，有同学曾经挖出过人的骨头，村子里总会有些口口相传的鬼故事传说。后来长大了我就不再相信这些了，但有时候还会莫名的害怕，可能是对未知的恐惧吧。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日本的年轻人最怕什么？

伊藤润二：我觉得和中国一样吧，都是些生活方面的事情，比如社会、工作的压力，老板、家人、老师、长辈，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感到恐惧。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没有画笔，你觉得如何让一个人感到恐惧？

伊藤润二：五官能感知的，都能让人觉得恐惧，音乐、声音、雕塑、颜色，再比如动作、眼神。你觉得呢？

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什么都不做就会让人猜疑，猜疑产生恐惧。

伊藤润二：（笑）。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有什么小嗜好？

伊藤润二：我是一个不能没有画笔的人，所以画画一直都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我喜欢音乐，摇滚、古典、爵士我都喜欢，我是披头士和中古汽车模型的爱好者。■

其实我在22岁就决定了，用漫画的方式来开阔自己的眼界，我小时候还有过很多愿望，比如希望世界和平什么的，谁知道自己会成为恐怖漫画家呢？



卡巴科夫装置艺术作品《从他的公寓飞进太空的人》，1985年



卡巴科夫夫妇在他们的画室中（摄于 2013 年）

不是每个人都将进入未来

文 / 钟和晏 图片版权 © Ilya&Emilia Kabak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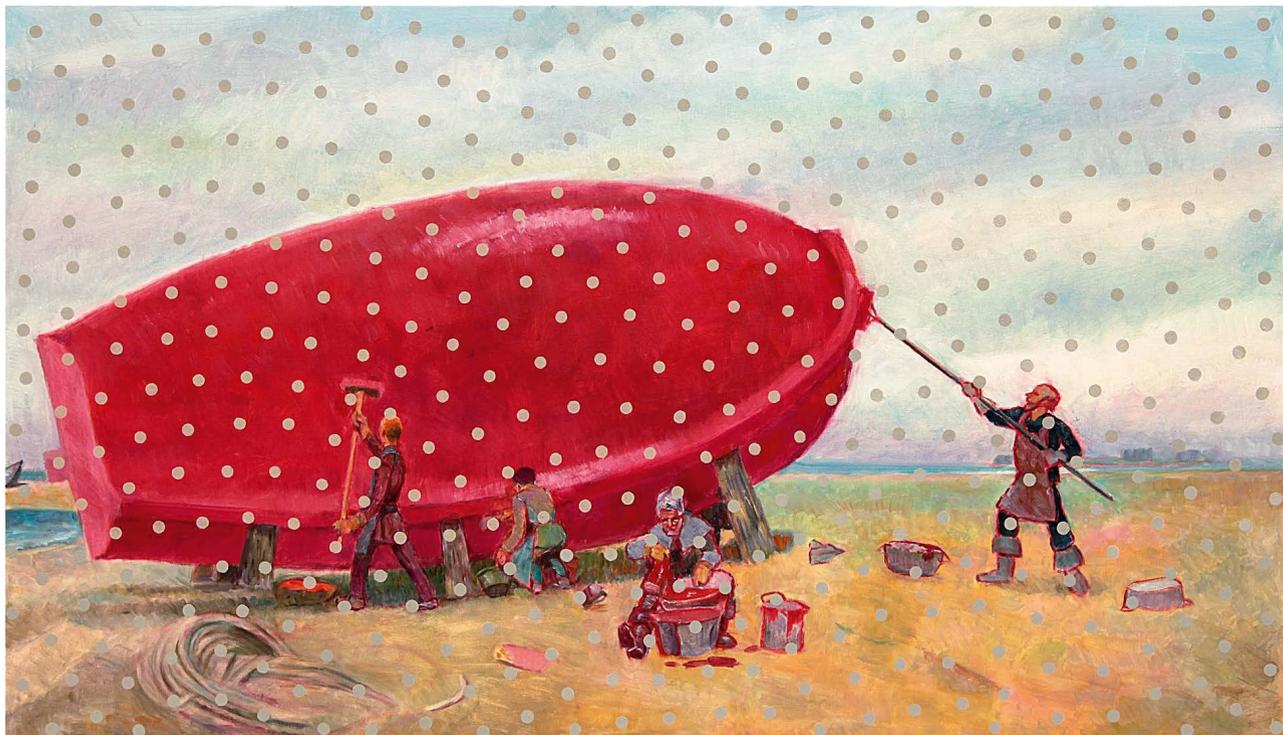
卡巴科夫夫妇一再强调，他们的作品不是关于苏联，而是关于人的状况，对乌托邦的欲望以及实现的不可能性。

当画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在 55 岁离开苏联移居西方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绘画这一媒介本身。他觉得一幅画不足以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氛围，开始建造占据整个房间的“整体装置”（Total Installation）。虽然达利和杜尚经常被认为是装置艺术媒介的开创者，但是在卡巴科夫的手中，整个房间成为观众可以感受到的沉浸式艺术品，让他们相信正身处某个不同的世界，某个不同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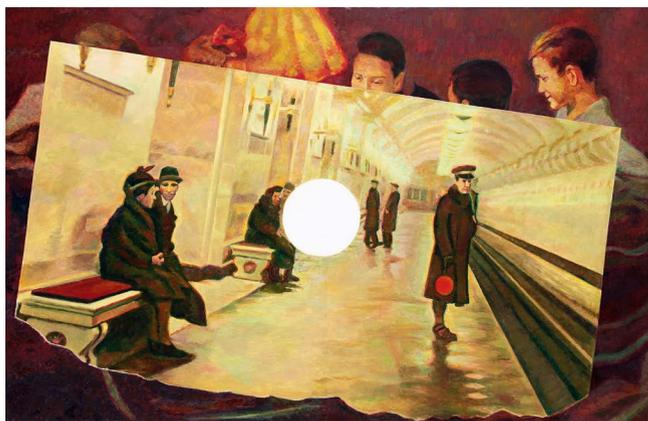
他 1985 年的整体装置《从他的公寓飞进太空

的人》就是这样的例子，目前正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与其他五个“整体装置”一起展出。作品重建了一个大概 3 米见方的小房间，里面极其凌乱：地板上的碎石瓦砾和一双破旧的男鞋，一张没有床垫的单人钢丝床靠着墙壁，黄色条纹被子胡乱地摊在床上。墙上有一幅画，描绘了“东方一号”宇宙飞船从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基塔上空飞进太空的庄严时刻。其实观众想要进入这个房间是不可能的，匆匆钉在一起的墙板挡在面前，只能从墙上狭窄的缝隙看到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除了这幅画，乐观的、精神蓬勃的苏维埃宣传海报贴满房间的三面墙壁，一种红色的基调弥漫其中。正中央有一个奇怪的弹簧和皮带装置从屋顶悬挂下来，像是凑合做出来的飞行弹射器，下面一块木板搁在两把椅子上。弹射器上方的天花板上开着一个大洞，让人意识到这间卧室的主人已经被发射



1



2



3

进入太空，他已经消失了。

这件作品的诞生来自伊利亚·卡巴科夫居住过的莫斯科集体公寓，一座四层楼房的顶层。他这样叙述他的邻居、建筑工人尼古拉耶夫的故事：“两年前，他在我们的集体公寓里被分配了一间房间，他的房间在我右边。我不太认识他，不知道他具体在哪里工作，他总是独自生活，也不太情愿让别人进入他的房间。他生活非常糟糕，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睡在没有床单的折叠床上。他用海报而不是壁纸贴

满墙壁，他说这样会便宜些。”

“有次我去拜访他，他的房间里到处是散乱的图纸，其中一些粘在墙上。我以为它们是用在他的建筑工地的。拐角处的桌子上摆着一个我们的街道和公寓的模型，我问他为什么有一条金属带附在模型上，并从公寓屋顶向上指引着。他突然说，这就是他未来飞行的轨迹……”

可以说《从他的公寓飞进太空的人》讲述了一个关于公寓生活的寓言，作为发射的必要条件，主



4



5

卡巴科夫夫妇作品：

1. 《视力暂时丧失的六幅画》，2015年

2. 《关于阳光的四幅画》作品二号，2013年

3. 《拼贴的外观》作品四号，2011年

4. 2005年的装置作品《宽容船》从埃及西瓦绿洲的咸水湖上起航

5. 装置作品《在公共厨房中》，1991年

人公为自己设定出逃离这种生活的技术解决方案，不是到任何地方，而是直接通向天堂。就如伊利亚·卡巴科夫自己的阐释：“这是对逃避、恐惧和飞翔的普遍性隐喻，一个人不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但是可以让救赎成为可能，把自己从孤独中拯救出来。”

卡巴科夫夫妇的许多作品都涉及类似希望的概念，希望寻找更好的东西。他们一再强调，他们的作品不是关于苏联，而是关于人的状况，对乌托邦的欲望以及实现的不可能性。可以说，每个社会都在努力达成乌托邦，苏联只是迄今为止最显著的例子之一，试图从公寓房间飞进太空是徒然的尝试，对乌托邦的寻找也许也是如此。

卡巴科夫夫妇是他们这一代中最著名的俄罗斯艺术家之一，也是被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作品的第一批在世艺术家。从10月中旬开始，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与莫斯科国立冬宫博物馆、莫斯科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等合作，为伊利亚和艾米莉娅·卡

巴科夫夫妇举办第一个在英国的大型展览“不是每个人都将进入未来”。展览总共展出了大约100件作品，包括绘画、素描、模型和装置等，来探讨这对开创性的夫妇在国际观念艺术中的地位。

伊利亚和艾米莉娅·卡巴科夫分别于1933年和1945年出生于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市(Dnipropetrovsk)，他们是远房表亲。1973年艾米莉娅迁往以色列，随后又去纽约定居。1987年伊利亚也搬到了西方，先是奥地利，后来也到了纽约。两人从1989年开始共同创作，1992年结婚。从那时起，他们一起合作了大约700幅画作和200多件装置。

在苏联的时候，伊利亚·卡巴科夫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他是1965年“艺术家联盟”的成员，作为一名儿童图书插画家和官方艺术家，在他的官方工作室里制作他的“私人”作品，向居住在斯雷腾斯基(Sretensky)大道上的艺术家朋友作展示。

移居纽约之后，卡巴科夫夫妇的整体装置仍然

借鉴了苏联的视觉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叙事传统，涉及被操纵的空间、讲故事的想法以及乌托邦、梦想、恐惧等普遍主题。他们的做法像是一种炼金术：把悲伤、内疚和愤怒等情感变成虚构的情节和叙述，通过艺术来表达心灵的嬗变，比一般的西方观念作品更具隐喻性。

展览的标题“不是每个人都将进入未来”来自伊利亚·卡巴科夫对俄罗斯抽象艺术家卡齐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的研究，文章发表在《A-YA》杂志1983年的某一期上。卡巴科夫在隐喻式的写作中想象马列维奇是学校校长，选择前往夏令营的学生，只有少数最好的人将被带入，只有马列维奇知道是谁。

艺术家及其作品在不远的将来会发生什么？它们如何被未来的新观众、新艺术评论家、新收藏家和新策展人接受和理解？这对每一位艺术家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是让你的作品在今天被理解和接受，还是希望它们能够生活在明天，其中的区别又是什么？

展出的总共六个“整体装置”中，1990年创作的《迷宫 / 我母亲的专辑》属于伊利亚·卡巴科夫最具自传性的个人化作品。装置的基础是一条迷宫般回传的昏暗走廊，裸露的灯泡从天花板悬挂下来。走廊和天花板的上半部分呈灰色，下半部分覆盖着红褐色的涂料。一些明信片、照片和文字挂在没有玻璃的镜框中，挂在走廊墙壁上，外观看起来都一样。照片是伊利亚的叔叔、一位专业摄影师拍摄的，拍的是亚述海边小城市贝尔丹斯克的风光，公园、花园或绿叶林荫大道等。每张照片下面一段文字，叙述了伊利亚母亲的生活故事。

他的母亲贝莎·索罗杜克哈娜（Bertha Solodukhina）是犹太人，出生于1902年，1987年去世。她的一生跨越了苏联自1917年革命一直到解体前的社会变革动荡时期，从俄罗斯革命、内战、1921至1922年的饥荒，然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他们的做法像是一种炼金术：把悲伤、内疚和愤怒等情感变成虚构的情节和叙述，通过艺术来表达心灵的嬗变。

最后是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性和重建政策。

她一直作为女佣来谋生，努力抚养儿子长大，忍受着反犹太人虐待、无家可归和不稳定工作等种种不幸境遇，只是为了生存下来而苦苦挣扎。在她去世前几年，伊利亚说服她写下了自己的生活回忆录。

在《迷宫》装置中，单调的布置、走廊的状态、微弱的光线、一个沉闷省会城市的照片，所有这一切都在以无言的形式表达出严峻的现实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生存的苦难和绝望的气氛已经包含在其中，被昏暗走廊的浓厚氛围加强着。

伊利亚·卡巴科夫曾经说过：“当我回头看我去过的生活，一个最基本的图像就是大量的走廊：笔直的、悠长的、短小的、狭窄的、转折的等等。在我的记忆中，它们的光线都很差，总是没有窗户，两边是关闭或者半开的门。我敲门，门打开了，我问了一些问题——‘好的，等一下。’门又关上了。我站在走廊里等待，不能离开。这种一动不动的状态不会结束，好像永远会继续，好像时间已经停止了，我生活中的所有走廊都与这种无尽的折磨时刻有关。”

这是他萦绕于怀、不断重复的生活回忆：年少时在学校里，他站在走廊等待学术委员会对他“恶作剧行为”的惩罚决定。成为画家之后，他在出版社等待主管人分配工作。在贝尔丹斯克城市执行委员会的走廊上，他等待与主席会面，让他们允许他母亲进入合作社……当然也有“好的、快乐的”走廊，比如艺术学院宿舍里的宽阔走廊，还有集体公寓里温暖美好的走廊。

在《迷宫》装置中，重要的是观众通过走廊的过程。他进入迷宫中，只身留在那里，他的移动速度取决于他是否愿意阅读画框中的文字。走廊形成两个螺旋形：一个从入口处开始朝向中心移动，另一个从中心向外展开，迷宫中心处是一个面积只有1平方米的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里安装了一台磁带录音机，伊利亚·卡巴科夫正以低沉的嗓音演唱着俄罗斯的浪漫歌曲。观众刚开始进入迷宫时听不到什么声音，随着向中心移动，它变得越来越清晰。观众也许会期望看到唱歌的人，但他看到只是一个小房间，那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除了垃圾和忧郁的歌声之外，迷宫的中心什么也没有。■

大国盛世 用建筑讲好“中国故事”

世茂家国梦 重塑意境新著

将山林的自然带入城市的起居，曾是中国古人建造理想居所的宗旨。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中：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段池水，画面留白；近处树下有亭，四根细柱，顶覆茅草。《容膝斋图》要传达的是，如果人可以生活在这幅画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

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人对房子迥异于西方人的情感寄托：造房子，其实是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世界，它亦物质，亦精神。造房之人不仅有匠人之巧，更要有文人之思，一方天地中安放中国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精神世界。

不过宋人杨万里就提出过理想生活的两难——“城市山林难两兼”，人们只能把对“自然之道”的理解，转化为在建筑和城市制造各种“自然地形”。以建筑的方式，通过对自然法则的学习，经过内心智性和诗意的转化，建成与自然对话的半人工半自然之物。但是如果直接把城市生活安放于山林绿野呢？在一个“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群山环抱中，居住在介于幻梦与真实之间的自然园林，这可是被福柯称为最古老的“异托邦”了。以大自然本身为园，山川流水吐纳胸中，田园中的自然景物无不触发生命感受，恐怕是古代文人都艳羡的理想居所——它不仅是诗意世界的重建，更是在延续和激活一种文化传统，一种“外儒内道”的中国精神。

世茂集团在2017年11月10日发布的“国风系”产品线，正是将城市生活的舒适性安放于山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对居所的寄托呈现出来。中国既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之后又具备了成熟的西学技艺，如何将思想和技艺“为我所用”，建造中国人文化自信之后的新居所，这既是新命题、新挑战，也是契合时代需求的新机遇。它需要建筑设计语言的转变和突围，更需要对理想居所的文化重塑。

福州鼓岭是一个距离市中心仅十几公里的避暑胜地，世茂集团的国风鼓岭项目吸取当地民居聚落布局、装饰特点，又据山地地形，随山就势排布庭院和建筑。巍巍的鼓岭山间，国风鼓岭项目耸立山头，悬鱼、对景、照壁等，营造出充满闽系风情的生活氛围。外面的山林几近葱郁而原始，中式建筑通透古朴，精致小



世茂国风龙湾传承江南园林精粹，相地制宜萃取风华

庭院对着四野青山。森林的气味、颜色和湿润，让居所焕发出一种舒服的姿态。世茂研究每一块土地的独特性，从自然环境到人文气质进行梳理，背后体现的不仅是专心一意的匠人精神，更是穿透物质直达心境的对建筑的重新理解。在悠然闲适的中式山居环境中，建筑与人彼此依存，匠心与文化互相彰显。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我们再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给养和自信时，一个显著的问题难以回避：我们如何通过理想居所的打造，再次激起中国人内心隐逸的文化传统？住宅呈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生活环境和个人修为紧密结合，田园山林成为人们主动追求的目标，它既是建筑的再造，也是中国人内心对诗意世界的重构，对曾经失去的关于生活价值自主判断的重新回归。

“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提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种对中国故事的讲述，自然也离不开建筑这种“凝固的艺术”。中国文化自信回归的种种表述当中，专注于符合中国人文化特征的理想居所的再造，尊重土地与历史人文，创造式地融合技艺与精神，正是世茂集团在文化创新中体现的活力。

世茂国风鼓岭提取盛唐风韵及在地文化，重塑意境新著





法国调酒师艾弗雷德·君度

鸡尾酒的行走地图

记者 / 杨聃

“我只需要听摇壶里冰块碰撞所发出来的音乐，就能判断我是否在一个好酒吧。”

在没见到艾弗雷德·君度 (Alfred Cointreau) 之前，我猜测他会像其他法国家族传人那样穿着剪裁修身的西装，精致得一丝不苟，或者留着中长发，一副艺术家气质。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当他身着单

宁衬衫打着有点丑的橘配蓝波点领结出现在眼前时，那头短短的卷发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爱。

艾弗雷德这次来到北京一方面是出席当天举办的第五届“君度女王”调酒师总决赛，另一方面是介绍他的新书《酒徒夜行》(Night-time Walks)。自从2011年回到家族企业担任君度品牌传承经理，艾弗雷德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飞机上度过，因为要到世界各地与经销商、调酒师和鸡尾酒爱好者会面。

书名《酒徒夜行》描述的就是他“偶遇”书中



2017“君度女王”刘舒婷及其团队的作品 La Mousson（雨后）



上·鸡尾酒“草莓玛格丽特”

中·经典鸡尾酒 highball

下·调酒器及酒具



这些目的地的状态：出差旅途中忙完一天，放松徘徊在夜晚不那么热闹的道路上，从一间酒吧到另一间，误打误撞发现了好地方。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找酒喝”。“品尝鸡尾酒要先从你的双眼开始。”艾弗雷德谈道，“调动起所有的感官以及丰富的直觉。”

未成年前的“禁酒令”对艾弗雷德来说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毕竟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祖父在洗礼那天的奶瓶里就加了一滴君度橙酒，他说这是家族传统。童年的回忆里充满了橙子的香味和蒸馏器散发的温暖，他记得祖父皮埃尔·君度直到90岁，每周都会拜访蒸馏厂，祖母伊丽沙白在拉博勒（La Baule）的房子里精心准备的家庭晚餐是橙香烤鸭和皇后米布丁。

“她是一位很酷的祖母，没有多少祖母能手把

手教外孙们调酒。”艾弗雷德记得7岁那年，家里来了很多客人，祖母让他帮忙准备饮品，那也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尝到酒的滋味，当天祖母教他调制的是玛格丽特。虽然成分并不复杂——3厘升橙酒，5厘升龙舌兰，2厘升鲜柠檬汁加上半边盐边——但对于第一次调酒的艾弗雷德来说还是错漏百出。

“每年夏日假期家族里的所有人都会在老房子里住上个把星期，客厅里放着一架大钢琴，然而，这架钢琴并不是用来弹的，它是个长得跟钢琴一样的酒吧，一掀开里面都是酒。”在祖母过世之后，艾弗雷德接手了这项站在钢琴吧里面为家庭聚会调酒的任务。

出生在这样的橙味力娇酒家族，我八卦地问道他酒量是不是特别好。艾弗雷德谦虚地笑道：“我通常是理性饮酒，不过酒量应该还不错。”至于到底是



挑战性的鸡尾酒呈现方式

“几两的量”，他也没正经算过。他觉得喝鸡尾酒是一件分享的事情，很多时候一杯酒大家每人尝一口就喝完了，然后再试下一杯，即便再好喝的鸡尾酒，他都不会整杯喝完。“喝水是减缓醉意的秘诀，”艾弗雷德说，不过他在喝酒时穿插饮水有一个更功利的目的，“如此一来才能准确地尝出下一杯鸡尾酒的成分。”

巴黎的 Calbar 酒吧、墨西哥的 El Limantour 酒吧一直在艾弗雷德心里占据着特别的位置。但是新年伊始，他更喜欢去阿姆斯特丹，因为那是烟花的季节。对大部分人来说去阿姆斯特丹必游安妮·弗兰克故居和伦勃朗博物馆，艾弗雷德还有一个目的地是 Reguliersdwaer 大街 74 号。这个小酒馆墨绿色的门面很低调，可能不经意就走过了。

一进门是衣帽间，它主张每一位进店的客人都能“把外套和忧虑一并留在门外”。虽然那位守在衣帽间，留着一头过时发型的服务人员对手机的响声极其不耐烦，但里面酒吧女领班带领的一身黑色套装服务生会对你照顾有加。总调酒师提莫（Timo）

把所有鸡尾酒都当作实验来尝试，据说是受其化学家父母的影响。

艾弗雷德透露道，如果门童对你说“里面满了，请去别家”的时候，可能真的如此，也可能是他看你不顺眼。这时你可以有两个选择，要么甩给他一句“是艾弗雷德介绍我来的”，要么转身继续往前走，去街角的费约果(Feijoa)酒吧找调酒师里克(Rick)，那儿的另一番景象同样不会让你失望。

要想来一杯有仪式感的鸡尾酒就要去伦敦萨沃伊(The Savoy)酒店里的美国吧(the American Bar)，它是历史上经典酒吧的缩影。服务生都穿着白西装打着黑色领带，优雅地踱来踱去。这座重新改造的美式酒吧也成了 20 世纪初在伦敦兴起的大西洋彼岸风格饮酒场所的见证。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保留下来的酒吧，它的鸡尾酒服务还延续着彼时的特点。据说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头牌调酒师哈利·克拉多克(Harry Craddock)在酒店的某个地方藏了一个摇壶，里放着他鸡尾酒的特殊配方。但至未被人发现。

全球各地的酒吧都反映着当地的生活哲学。比如，在伦敦萨沃伊美国吧调出来的白美人（White Lady）就和波特兰的克莱德·科曼（Clyde Common）酒吧喝到的白美人味道完全不同。“两者都很好喝，但他们有不同的做法，而我很喜欢去探索与思考这些差异的由来。”艾弗雷德笑着补充道，“很幸运，我能够在世界上最棒的酒吧喝上免费的酒。”

不过，最让他有历史羁绊的目的地是旧金山，因为在禁酒令期间其曾祖父曾在那设法走私瓶装酒，这为之后的市场开拓奠定了基础。当时的烈酒通过大邮轮运往美国，再分装到小船上，得益于蓝筹公司（Blue Chip company）流通于市面。在世界各地流行的鸡尾酒“全世界”（Cosmopolitan）也诞生于此，这款最初被称为“Stealth Martini”的粉红色的混合物是嬉皮士时代的一大特色，拉近了女士们跟酒精的关系。

如何判断一个酒吧的好坏？艾弗雷德的标准非常简单，第一就是看人。如无意外，艾弗雷德不会选择酒吧里的包间或是角落里的沙发，而是挑一个离调酒师最近的吧台位置坐下。他也不看酒单，而是通过跟调酒师交流和当天的心情来决定喝什么，也许最终呈上来的鸡尾酒并不在酒单上，而是出于他们的突发奇想。

其次就是听声音，“我只需要听摇壶里冰块碰撞所发出来的音乐，就能判断我是否在一个好酒吧”。冰块之于调酒师就像炊火之于厨师。“质量好的冰块晶莹剔透，内部没有小气泡和线状物。如果摇壶里发出的声音不对，就是冰块的问题，它有可能化了太多水。”艾弗雷德解释道。毕竟冰块的形状和质量会直接稀释酒的比例，因为每种鸡尾酒都有自己的制冷方式，同时也会影响口感。

即便在出差的时候，他也会在随身行李里备上巴黎摇壶、几件酒吧工具和小瓶装的橙酒。“有了它们可以即兴展开一个快速的试饮，向不懂君度的人介绍如何品鉴净饮和加冰的橙酒。”这位31岁的享乐主义者一碰到喜欢的酒具，就会把它买回去陈列在家里一大面墙的酒柜上。在他收藏中数量最多的是调酒用的量杯（Jigger），就是在吧台上常见的两头呈倒三角状的金属器具，一边大一边小，为了精确地掌控用量，调酒师每混合一种饮料都要通过它来折进酒杯。另一件对他来说“毫无抵抗力”的酒器就是摇壶（Hand Shaker）。

冰块之于调酒师就像炊火之于厨师。其形状和质量会直接稀释酒的比例，因为每种鸡尾酒都有自己的制冷方式，进而也会影响口感。

他曾在多伦多试图与售货员为一个酒杯讨价还价，杯子的手柄部分饰有穿着草裙的波利尼西亚舞者，结果那是一件非卖品，徒劳一场。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他就买了另一个提基神像酒杯。艾弗雷德开玩笑地说，因为总是不惜重金在世界各地“淘”酒器，每次出差回家总要遭到太太的质问这次又花了多少钱。

这场“酒徒夜行”的旅程也让他结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比如探访北欧设计圣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定制旅行导游唐基·奥托莫（Tanguy Ottomer）。他不仅对城中最新最好玩的资讯如数家珍，每次出现的模样都是闪闪发亮——当下最新款式的定制西装、纹章丝绒鞋，实打实的潮人。艾弗雷德认为他可以被授予安特卫普“最佳胡子”的封号。

还有香港的安托尼奥，他身为五间酒吧的老板却对酒精过敏。所以安托尼奥不能像其他调酒师那样用舌头试酒，他只需把调好的酒滴在手上，就能辨别是否“成功”。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多感官调酒师，把牙膏管当酒具，或是在万圣节那天把成色深红的鸡尾酒倒进输血包似的包装袋里售卖。

“我不得不承认食物的吸引力真的很大，比如说毛蟹，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国橙酒可以跟任何味道混在一起，无论是苏打水、啤酒还是他不熟悉的黄酒。哪怕是一顿简单的晚餐也可以倒下不计其数的瓶子。

相比之下，艾弗雷德习惯在不同时刻搭配不同的鸡尾酒。“这取决于心情和当下的情境。如果是和妻子一起享受浪漫的晚餐，我会调一杯‘全世界’（Cosmopolitan）。如果是和朋友在派对前小聚，我会做‘边车’（Side-Car）。如果是在夏日午后的游泳池畔，那么就是‘君度菲丝’（Cointreau Fizz）。只需在盛满冰块的杯中倒入5厘升君度橙酒、2厘升新鲜青柠汁，然后加上气泡水就可以了。”对艾弗雷德来说，鸡尾酒的乐趣就是把不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并把每个看似平凡的东西变得不可替代。☑



新高尔夫携庞大的家族阵容诚意上市

售价 12.19 万~ 23.99 万元 一汽 - 大众新高尔夫家族诚意上市

11月4日，新高尔夫家族上市发布会在一汽 - 大众华南基地拉开帷幕，新高尔夫、新高尔夫 R-Line、新高尔夫 GTI 三款重磅产品的 11 款车型同时上市，售价 12.19 万~ 23.99 万元；

以“燃 就现在”为主题的新高尔夫上市发布会打破常规，通过更具互动性和娱乐性的粉丝嘉年华形式，把高尔夫独特的“燃”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国内 A 级两厢车市场的领导者，此次焕新而来的新高尔夫家族外观更加犀利，内饰更加精致，配置更加豪华，将继续引领 A 级两厢车的发展方向。

11月4日，在一汽 - 大众华南基地，以“燃 就现在”为主题的 2017 一汽 - 大众高尔夫嘉年华暨新高尔夫家族上市发布会拉开帷幕。此次发布会上，一汽 - 大众带来了新高尔夫家族庞大的产品阵营，新高尔夫、新高尔夫 R-Line、新高尔夫 GTI 三款重磅产品的 11 款车型同时上市，售价 12.19 万~ 23.99 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可谓惊喜不断、诚意满满。

上市发布会现场，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亦功对到场的粉丝表达了衷心感谢，同时也对新高尔夫家族寄予厚望：“作为一汽 - 大众创新与品质的标杆、运动与活力的代表，相信新高尔夫家族的

到来，将再次点燃所有高尔夫粉丝的激情，继续谱写其两厢车的传奇历史。”

此次新高尔夫上市发布会一改常态，发布会现场搭建了多个以高尔夫“燃”文化为主题的互动体验区，赛车、改装、魔术、篮球、街舞、音乐、游戏一应俱全，同时 PG One、袁娅维等实力唱将悉数到场，为广大车迷带来了一场火爆的粉丝嘉年华，将高尔夫的“燃”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说到新高尔夫家族的产品变化，作为 A 级两厢车市场的领导者，此次焕新而来的新高尔夫家族在外观、内饰、配置、性能等方面都有升级，新车外观更加动感、时尚，内饰更加简约、精致，配置更加科技、豪华，可谓全面进阶，趋近完美。

天生运动派，动力性能稳定而出众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 1.6L、180TSI、230TSI、280TSI、380TSI 五款发动机，与之配合的是 5 速手挡、6 速手自一体、7 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新车继承了高尔夫家族的运动基因，动力性能依旧稳定而出众。值得一提的是，新高尔夫 180TSI 车型的功率从 81 千瓦提升到了 85 千瓦；同时，230TSI 和 280TSI 车型搭

载了多连杆独立后悬架，让追求性能极致的“发烧粉”可以更加肆意、从容地在赛道上释放激情、驾驭自由。

新增卡库金，外观犀利又不失时尚

外观方面，新车首次将时尚、活力的“卡库金”（Kurkuma）车身颜色引入国内，采用全新的“X”型前脸造型及“双L”型LED日间行车灯；而新高尔夫的尾部线条更加流畅，LED尾灯内部采用全新的矩阵造型，并且采用流水式后转向灯，搭配连贯的镀铬双排气尾管造型和全新的轮毂方案，使整车看起来更加犀利，又不失时尚气息。

质感再次提升，内饰简约而精致

内饰方面，保持了简约而精致的设计风格，采用全新的IMD质感装饰条，同时升级Clean air 2.0车内空气质量管理方案。R-Line车型增加一键启动功能，时尚型也增加前排中扶手，而最大的惊喜莫过于新高尔夫GTI的Clark格子布座椅强势回归，致敬43年的经典传奇，也是对狂热的高尔夫粉丝最真情的告白。

黑科技加持，彰显“高尔夫级别”的科技与豪华

配置上，新高尔夫家族搭载了诸多B级车甚至豪华车才有的越级配置，极大提升了驾控乐趣及舒适性——12.3英寸FPK数字液晶仪表与9.2英寸带手势控制功能的MIB High Navi导航系统，多种驾驶模式选择、电动座椅新增座椅记忆功能等等，再次彰显“高尔夫级别”的科技与豪华；ACC3.0自适应巡航系统可以实现“跟停-起步”功能，搭配车道保持、盲点监测等功能，让新高尔夫具备了自动驾驶的雏形。

同时，众多高阶安全配备也出现在新高尔夫身上——全系标配预防多重碰撞制动系统，配合预碰撞紧急制动、疲劳监测等多项主动安全功能，为驾乘者打造了更加安全的出行体验。

除此之外，更是推出多达8种的选装方案，最大程度地满足车迷的日常使用和个性化需求。都说每一位Golfer都拥有一台独一无二的Golf，我们也希望每位Golfer都能拥有一台自己心满意的Golf。

从1974年高尔夫诞生至今，历经七代更迭，高尔夫的创新与传承从未停止，独特而包容的高尔夫文化也枝繁叶茂。如今，作为大众汽车的“皇冠”，高尔夫紧随欧洲市场的脚步焕新而来，在外观、性能、配置等方面全面进阶，进一步趋近完美，也将继续肩负着引领两厢车市场发展的使命。

新高尔夫的进阶之路，是再一次的自我革新，更是对车迷最长情的告白。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亦功现场致辞



新车继承了高尔夫家族的运动基因，动力性能依旧稳定而出众



新高尔夫GTI的Clark格子布座椅强势回归



9.2英寸带手势控制功能的中控，再次彰显“高尔夫级别”的科技与豪华

穷碳水，富蛋白

文 / 袁越

农业国家有个普遍规律，那就是一个人的富裕程度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成反比，和蛋白质的摄入量成正比。换句话说，人越穷，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就越高，蛋白质的比例就越低，反之亦然。

从环保角度讲，蛋白质的生产过程往往要比碳水化合物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更大，如果地球上每个人都放弃碳水化合物改吃蛋白质的话，地球环境恐怕就要吃不消了。

但是，很少有人会为了环保而改变自己的饮食结构，大家更看重的肯定是自己的健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人开始研究蛋白质到底吃多少才算够。

学过生物化学的人都知道，蛋白质既可以用于人体组织的构建，又可以作为燃料为生命提供能量。虽然人体组织中含有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更新，但这个需求毕竟是有限的，多吃下去的蛋白质只能作为燃料使用，和廉价的碳水化合物功能相似，这就有点不划算了。

那么，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每天最多需要多少克蛋白质用于组织更新呢？2009年发表的两篇重要论文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思路。其中一篇论文研究的是正在健身的青壮年，他们需要长肌肉，对于蛋白质的需求量应该是最大的，但是研究表明，这些人每次健身后只需吃下20克蛋白质就可以让肌肉的增长速度达到峰值了，如果每次锻炼后吃下40克蛋白质的话，肌肉增速并不会因此而增加。换句话说，这些人的肌肉组织每天只能有效利用20克左右的蛋白质，其余的都被当作燃料消耗掉了。

另一篇论文研究了不同年龄段的普通人对于蛋白质的利用情况，结果发现每顿吃下30克蛋白质的受试者其肌肉蛋白合成速率的增幅便已达到最高值了，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是如此。如果这些人每顿吃下90克蛋白质的话，其肌肉蛋白质合成速度并不会继续增加，而是维持在同一水平。

综合两项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一个正常人从每顿饭中摄取的蛋白质最多只有大约30克可以被用于肌肉组织的更新，多出来的部分没法被肌肉组织利用，只能作为燃料被消耗掉。

因为这两篇论文，很多相关机构修改了自己的健康饮食指南，把每顿饭的蛋白质摄入量控制在30克

以下。但是这个思路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蛋白质不光可以作为构建人体组织的原材料，还有很多其他功能，比如免疫系统就是由蛋白质组成的，需要不断更新。

关于蛋白质的健康功效，最近还有很多其他案例可供参考。比如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科学家在2015年8月27日出版的《营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高蛋白饮食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研究人员通过对2000名志愿者所做的研究发现，植物蛋白有助于降低血压，动物蛋白则有助于增加血管壁弹性，两者都对心血管系统的健康有帮助。

再比如，2017年8月3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撰写的一篇文章，发现高蛋白饮食有助于减少肠道炎症反应。原来，哺乳动物肠道免疫系统有两类功能完全不同的细胞，第一类是杀手型免疫细胞，负责清除食物中的有害病菌，但这一过程会导致肠道炎症反应；第二类是平衡型免疫细胞，它们会提高肠道免疫系统对外来细菌的忍耐力，从而减少炎症反应。

研究人员在实验小鼠中发现了一种肠道菌群，能够促进第二类免疫细胞的生长。这种肠道菌群最喜欢高蛋白饮食，如果小鼠吃了高蛋白食物，那么这种菌群就会更加活跃，从而抑制肠道炎症的发生。

人类的肠道免疫系统和小鼠的非常相似，也能发现这种菌群，因此科学家建议那些患有肠道炎的人多吃蛋白质，兴许可以减轻症状。

总之，每顿饭30克蛋白质的上限并不一定正确，多吃点蛋白质确实是有好处的。☑



阿布卡迈勒的“三国杀”

文 / 宋晓军

11月17日，在美、俄代表在安理会相互否决了对方有关调查叙利亚化武问题提案的同时，BBC驻叙利亚记者盖拉尼（Feras Kilani）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在叙利亚与伊拉克接壤的边境城市阿布卡迈勒（Albu Kamal）的感受。他写道：刚刚从阿布卡迈勒回来，这是打击“伊斯兰国”最艰难的战役之一，所有的外国武装分子都聚集在这里。而什叶派武装、叙政府军和俄军却难以前进。看到这两则消息后，我就想到了这期专栏的标题：阿布卡迈勒的“三国杀”。

先说美、俄两国因阿布卡迈勒引发的“口水战”。11月9日，叙政府军、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俄空军的配合下，宣布解放了2014年7月就被“伊斯兰国”占领的阿布卡迈勒。可就在“轻松”拿下“伊斯兰国”在叙占据的最后城市的第二天，大量“伊斯兰国”武装突然从北部向阿布卡迈勒发起猛烈反击，并再次夺回了阿布卡迈勒部分城区。随后俄国防部马上出示证据指控突然出现的“伊斯兰国”武装是由美军故意“放水”的，而美国国防部马上指出俄方出示的照片是游戏截图。接着，俄国防部在撤掉了“误发”的照片后，不仅指责美防长说美军会继续在叙部署没有法理依据，而且从11月15日开始再次派出轰炸机对阿布卡迈勒的“伊斯兰国”武装实施了打击。

说完美、俄两国，再说与阿布卡迈勒相关的第三个国家：伊朗。事实上，就在叙政府军宣布解放了阿布卡迈勒后，伊朗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人民动员部队”（PMU）士兵已经通过社交媒体展示了在叙、伊边境小镇卡伊姆（al-Qaim）与攻打阿布卡迈勒的黎巴嫩真主党会师的照片。而当“伊斯兰国”开始逆袭阿布卡迈勒后，一部分“人民动员部队”对其实施了炮击，另一部分则再掉头向西与伊拉克政府军一起攻打“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拉瓦（Rawa）。11月17日，在伊拉克政府军宣布解放了拉瓦后，黎巴嫩真主党和叙什叶派民兵与叙政府军一起再次进入阿布卡迈勒对“伊斯兰国”发起进攻。有消息称，9月18日在俄罗斯空军打击的配合下阿布卡迈勒80%的城区又再次易手。

说完上述信息后，再梳理一下美国、俄罗斯和伊朗围绕着阿布卡迈勒“三国杀”的态势。美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攻打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阿布卡迈勒，但美军支持的叙库尔德民主军（SDF）正沿着东岸从北向南逐步接近阿布卡迈勒。同时，在靠近阿布卡迈勒的伊拉克一侧还有美军作为顾问的伊拉克政府军特种部队。俄军不仅是唯一参与空袭阿布卡迈勒的空中力量，而且也在地面进攻的叙政府军提供了军事顾问和大量装备弹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和什叶派民兵不仅直接参与了攻打阿布卡迈勒，同时其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人民动员部队”还在离阿布卡迈勒“近在咫尺”的卡伊姆战斗。换句话说，美、俄、伊三国在军事上都对阿布卡迈勒这个叙、伊边境的“重镇”保有实施控制的潜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目前美、俄、伊三国围绕阿布卡迈勒上演的这场“三国杀”，无疑给“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局势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眼下可以预测的是，即使阿布卡迈勒几天后被叙政府军和伊朗支持的武装所解放，起始于阿布卡迈勒的这场“三国杀”不仅不会落幕，反而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剧情”。同时，也不能排除曾一度游离于阿布卡迈勒收复战之外的土耳其、沙特、以色列等这些“角色”会伺机在叙利亚登场。☑



11月17日，在叙利亚代尔伊佐尔省阿布卡迈勒镇附近，Tu-22M3战略轰炸机打击“伊斯兰国”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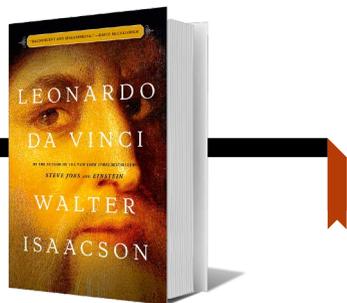
技术时代的人文学科

主笔 / 薛巍

一向鄙视人文学科的硅谷现在开始招收文科生了，许多学者强调的技术和人文的互补好像终于被落实了。



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和他的著作《达·芬奇传》



人文学科开始扬眉吐气

多年来，美国的科技公司都不招文科生。2012年一位风险资本家说，英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只能去鞋店上班。但现在硅谷意识到，对世界的认识不

只跟字节、比特、数学和机器学习有关。现在文科生正在涌入科技行业，2010～2013年之间，进入科技行业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多10%。有人解释说，网络公司经常面对真实世界的挑战，如侦测恐怖分子的宣传、帮助遭遇自然灾害的用户，所以现在他们热衷于招聘文科生。

统计显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起薪较高，但他们的优势会逐渐降低。工科生毕业五年内的年薪大概是8万到10万美元，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后，年收入仍是10万美元出头。而普林斯顿大学英语、哲学或外语专业的文科生刚毕业时年薪为6万美元，工作十多年之后，平均达到13万美元。常春藤学校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专业的毕业生刚上班时收入一般不到7万美元，毕业十年后将达到17万美元。这是因为文科能让学成到成功的职业生涯所需的一切：写作、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语言沟通。

风险投资家斯科特·哈特利说，懂得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对建立成功的公司是有帮助的。虽然硅谷崇拜工程师，但许多科技公司的总经理都受益于更广泛的教育：YouTube的苏珊·沃西基是学历史和文学的，爱彼迎的布莱恩·切斯基是学美术的，脸书的扎克伯格也学过心理学。

2011年，哲学家达蒙·霍洛维茨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对听众说：“你应该辞去你在技术行业的工作，去读一个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本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文科，到二年级时转去学计算机，毕业后研究人工智能，但他发现他建造的人工智能体系一点也不智能，它们能够很好地完成特定任务，可是一旦环境有任何变化，它们就无法运行了。他觉得他要先搞清一些哲学问题：思想的本质、语言的结构、意义的基础。为此他辞去工作去学习哲学，知道了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探索思想和语言的不同进路，知道了修辞学、解释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思想家阐述的创造意义和认识世界的各个方面，意识到了他之前作为技术专家的世界观是多么有限。他说，不用担心拿到人文学科的博士后找不到好工作，主导技术产业领导

权的不再是工程师了，因为计算机不再神秘到只有工程师才能弄明白；技术产业正在转向产品思维，要理解产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产品要吸引人，面对这一挑战，严格培训出来的人文主义的感受力是重要的资产。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维克·瓦德瓦说，人文专业能够培养出最好的项目经理、最好的产品经理和最有远见的技术领袖。原因很简单，技术专业和工程师只关注一些特征，往往会陷入让极客们觉得很酷、大部分人觉得无用的东西之中。相比之下，人文专业更容易以人、以人与技术的互动为中心。研究启蒙运动或者罗马帝国兴衰的历史系学生更有可能认识到技术的人性因素、易用性和设计将决定一种技术只是历史的脚注，还是会改变世界。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明白如何鼓动人、理解用户的需求。

人文不是有钱人的专属

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不停地要为他们自己的专业或事业做辩护——2010年，女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出版了《告别功利：为什么民主需要人文教育》一书；2015年，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出版了《为人文教育辩护》；新一期《纽约书评》刊登了美国作家玛丽莲·罗宾逊关于人文学科的文章，“为什么要教授人文学科？为什么研究它们？它们有什么用处？如果我们把人文主义者运动追溯到1500年，那么西方在人文主义发挥影响的时期取得了物质和文化上的繁荣”。她引用了托克维尔的一段话：“诗才、口才、记忆力、心灵美、想象力、思考力——上天随意降下的这一切资质，都在促进民主……文学则成为对一切人开放的武库，弱者和穷人每天都可从中取用武器。”

美国国父之一约翰·亚当斯认为，审美活动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们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就是为了让我的孩子们能自由地研究数学和哲学。我的孩子们应当研究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历史、造船学、航海、商业和农业，目的是让他们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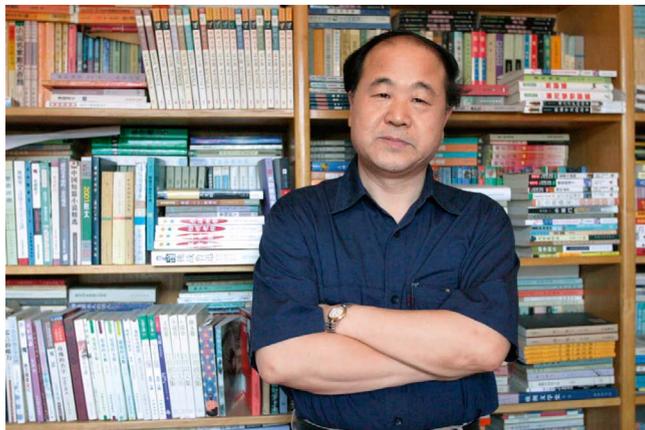
有权利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编织和陶瓷。”但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认为，把人文学科归为奢侈品反而对它自身不利。1985年，他在一场讲座中指出，有一种为人文学科辩护的方式说，人文学科是在文明社会教化出来的。这种辩护的问题在于，它接受了人文学科的奢侈品地位，把人文学科吸纳到昂贵地教化出来的生活，把它等同于有人陪同的远足，认为它具有充足的美学内容。它的一个版本是炫耀性消费，它更高眉的版本更多地聚焦于培养良好的品位。但是把人文学科跟高级奢侈品或优雅生活联系起来，会轻易地毁掉它要为之辩护的东西。攻击人文学科的人说，人文学科是奢侈品，在日子艰难的时刻，社会就负担不起这些学科。这种方式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把人文研究当作有教养的个体值得拥有的品质。

威廉斯说，人文学科研究的是最基本的问题。“高更有一幅画叫《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所有人都会对最后一个问题感到困惑，无论他是一位圣人，是政治家还是商业分析师。只有回答了前两个问题，才有希望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即使我们得出结论说，我们永远也无法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对前两个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人文学科最基本的辩护是，深入了解前两个问题需要领会人文学科，尤其是第二个问题涉及第一个问题。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要以理解其历史为基础，不了解它的文化产品和其他时代的文化产品，就解读不了它的历史。”

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在《达·芬奇传》中说，达·芬奇证明，能够跨越艺术和科学、人文和技术等学科制作出连接，是创新、想象力和天才的关键。“爱因斯坦在研究相对论陷入困境时，会拿出小提琴拉莫扎特的曲子。乔布斯在产品发布会的高潮部分，用一个路标的图说明人文和技术的交会。达·芬奇是他的偶像，他说达·芬奇在艺术和工程中都能看见美，他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能力使他成了天才。达·芬奇几乎没上过学，几乎不认识拉丁文、不会长除法。他的天才是我们能理解的，甚至可以学的。”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6）

文 / 朱伟



莫言

《酒国》是莫言的第三部长篇，从1989年那个多事之秋后，拖了两年才写完。这不是莫言唯一一部非一气呵成的长篇，他自己的说法，《蛙》也是写了几万字就放下，然后另起炉灶再写成的。优秀作家的预知力真是了不得。我记得1997年《三联生活周刊》才做了一期《酒神疯了》的封面故事，说山东疯狂的酿酒业；2003年才做《一年吃掉5000个亿》，深度报道全国各地的奢侈吃喝。也就是说，莫言在90年代初就锐利地割到了十年后才让我们都感触到的黑色肿瘤。更令人惊奇的是，小说中种种五花八门的吃法，被象征为侏儒的“余一尺”与各种名流女性的荒唐事，居然都成了二十多年后被披露的贪官丑闻。这叫什么样的批判现实主义呢？——我感觉是，莫言写了一部《提前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用极其锋利的手段，提前撕开了这血淋淋的黑色病灶。很难用概念对他的创作形态作一个归结。我只能说，莫言的批判现实主义超越了以往我们熟悉的概念，说它“魔幻”其实不准确，因为他只不过习惯了夸张，令你感觉到荒诞。他憎恶分明，嫉恶如仇，他的心在流血，他超脱不了，冷酷不了，刻骨着嬉笑怒骂，心却是软的，暖的，多情的。这强烈的爱憎、冷暖交织的态度，爆发出夺目的，令人震撼的色彩迸溅。

如他自己所说，这部小说的构思，其实只因一

篇随意读到的文章《我曾是个陪酒员》而产生的触动。牛的是它的套装结构——外面包的故事是由小说中人物“莫言”，根据“酒国酿造学院勾兑专业”博士“李一斗”寄给他的小说，产生灵感而创作的。这个外面包着的故事是，省检察院收到一封举报信，举报“酒国”市以宣传部长“金刚钻”为首的官员吃婴儿，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因此奉命前往调查的过程。这个外面包着的故事是第三人称，里面套着文学青年“李一斗”以第一人称与“莫言”的通信，每一封信都附他写的一个短篇。这些短篇从《酒精》到《酒城》，共九篇，彼此连贯成实际的故事，其实是内核，写得都特别精彩。这个套装结构里外一直对应，了不起的是，套在外面的故事是里面故事的想象；里面的故事似乎是“李一斗”亲历，其实也是他写的小说；是小说，却又像现实，这就构成了似幻似假似真。

莫言回忆这部小说的创作时说，小说写完后，余华回海盐，他托余华将小说给了浙江的《江南》杂志。《江南》为难，没敢发。幸好，199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甄别了一下，食婴是假，就出版了。

小说外壳中，举报信是“李一斗”在“酒国烹饪学院”任教授的岳母在精神失常后写的。“李一斗”在他的第二篇小说《肉孩》中，描写了肉孩的买卖过程；第三篇《神童》描写了“小妖精”率领肉孩们的暴动。这个“小妖精”后来变成在《驴街》上开“一尺酒店”，腰缠万贯，左右着酒国经济命脉的“余一尺”，其发家，是因投其所好的一对双胞胎侏儒的父亲乃京城大官。“红烧婴儿”本是《烹饪课》中，“李一斗”描写他岳母在精神正常时研发的一道大菜。他岳母在讲授这道大菜时，特别强调：“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不是人，它们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厢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它们本质上与鸭嘴兽没有区别。”

这是“李一斗”，而不是“莫言”的小说。医院里，人工流产的胎盘被当作补品是现实。“莫言”的小说中，描写“丁钩儿”到矿上，矿长书记给他接风的第一顿饭，在轮番的劝酒轰炸，使他的意识被酒牵

引出躯体后，“金刚钻”出场，豪饮三十杯，压台大菜就是“红烧婴儿”——“那男孩盘腿坐在镀金的大盘里，周身金黄”。令我想到“金发婴儿”的意象。在这场戏中，“金刚钻”告诉已经喝得神魂颠倒的“丁钩儿”，这其实是“酒国”烹饪的创新发明：婴儿的胳膊是藕，腿是火腿肠，身体是烤乳猪基础上加工的，头颅是银白瓜，头发是发菜。小说中也是真幻难辨，“莫言”是这么表达的：“明知盘里是，可怎么看都不是；明知盘里不是，但怎么看也是。”

这部小说，“莫言”所写外面套着的部分是荒诞——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在去矿山的路上，就经不住女卡车司机的勾引。进了矿山，就像泡在了酒缸里，酩酊大醉如死狗；然后又被情色牵引，怀疑女司机是“金刚钻”所设圈套，幻觉“金刚钻”以捉奸与他交易。这部分写得最精彩的是，酒色导致的躯壳分离，意识如脱茧飘飞的蝴蝶，能悬在空中；在袅袅香雾中，又能任意附着；视觉能任意放大、缩小，改变物体的形状。这是志怪小说里的常用伎俩，莫言用现代想象，将其夸张到令你大呼过瘾的程度。在这个外壳小说中，“丁钩儿”是个悲剧角色，他一上卡车就不由自主；到了“酒国”，就如堕入酒色之海，神不守舍、浑浑噩噩、狼狈不堪、个体尽无，一直如在五里雾中，最后掉进粪坑淹死了。小说扉页，他的墓志铭是：“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兄弟。”我理解，莫言以这个外壳，是要写腐败这个毒瘤中，公务员们的身不由己。身不由己构成了生态链，或者说，生态链使无数人身不由己。墓志铭中的“兄弟”，应该就指这根链上的无数有血肉者。这恰恰构成了酒池肉林的繁华腐败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外面套着的故事，又成了内核；里面“李一斗”那些小说，又变成外壳了。我其实不喜欢莫言小说中必然要写到的残酷。“李一斗”小说中的残酷是不断升级的，从驴街上的杀戮，这条街上“每一块石头都浸透了驴的鲜血，每一个厕所都蓬勃着驴的灵魂”，到《烹饪课》上杀鸭嘴兽、给肉孩放血，《采燕》中不忍卒读的屠牛与洞中群燕的泣血啼血，正是这些残酷杀戮绽放了“酒国”的美

味佳肴。这当然是全国各地，当街杀羊杀狗杀驴杀牛，在动物凄厉告别声中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缩影。按“李一斗”岳母未疯前的理解，既然饲养的牛羊猪驴狗都可肆意用各种残酷方式宰杀，那么，饲养的婴儿亦是动物的一种，只要褪去“人”的标识，就不必再有道德压力了。这“肉孩”形成一个供人追问的惊叹号，这是“李一斗”那些短篇更刺激我神经处。

莫言小说中，经常有一个咒骂与厉声责问者，这小说里，他是那个鄙夷、痛骂“丁钩儿”的，用双筒猎枪守卫烈士陵园的老革命。这个老革命脸上的器官，后来被饿鼠全部啃光，“丁钩儿”开枪打鼠，又将他的脸打成“千疮百孔”。

这个套装结构的结尾，“李一斗”迎接“莫言”到酒国，“金刚钻”又出现在酒席上，“莫言”又开始重蹈“丁钩儿”的覆辙。这小说1993年出版时，莫言在后记里说，被《我曾是个陪酒员》触动，他本来就想单纯地写“酒中自有黄金屋，酒中自有颜如玉”，但真进酒场，就入了奥秘社会。读完这小说，我想到：一是，优秀小说的警示、警醒作用，其实乃极重要的社会保健品，粉饰的甜点反而破坏健康；二是，当年这小说问世，若党的干部们都能读到而有所触动，之后的众多悲剧大约可减少许多。我这当然是一厢情愿、自以为是。中国文学之可悲就在，要不被斥为“利用小说反党”，夸大了其作用，要不被鄙为“小说家者流，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太不把反映社会脉动的小说当回事了。☑（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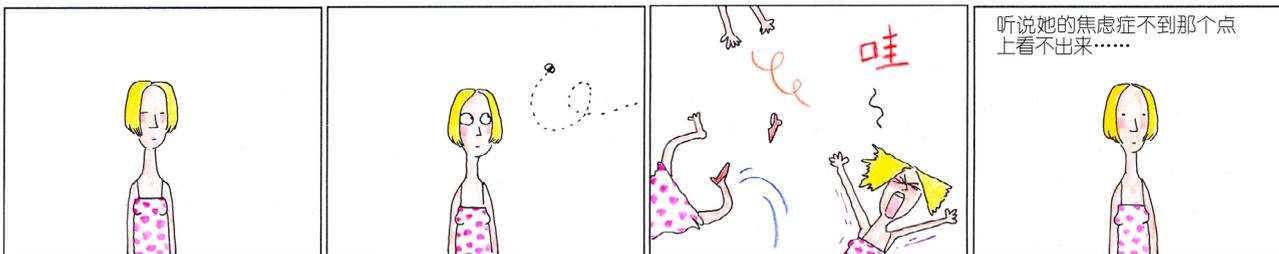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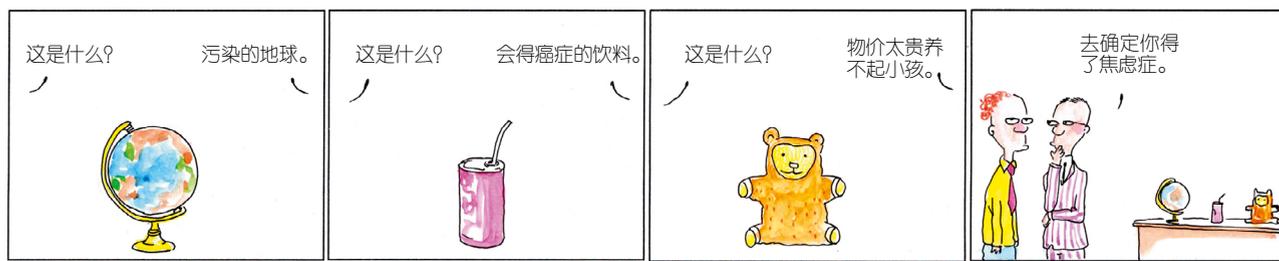


莫言的《酒国》1993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图为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的新版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我的哲学生活

文 / 卡尔 图 / 陈曦



自从进入哲学系，跟我熟识的人看我的眼神变得都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人赞叹，说我如何了不得，竟学起高深的哲学，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不过更多的人则是诧异，比如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他曾在班上告诫我们以后千万不要学哲学，因为很容易精神分裂，还拿尼采、阿尔都塞举例，到头来我还是没有听他的话。之前看过一则新闻，说的是从名校出家的僧人大多读哲学系。作为一个哲学入门者，我目前既没有疯掉，也没有遁入空门的想法。至于未来如何，且看造化安排了。我想像我这种囿于世俗之人，也许只是如大多数人一样循规蹈矩地走完这一生吧。

为什么要学哲学？就我而言，大概只是想从无聊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突围，寻求所谓存在的意义。在这个物欲横流拒斥崇高的年代，学哲学的人常常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自己时常觉得真理在握，看透世间种种，张口就是叔本华、尼采、萨特等人。而在大多数人看来，哲学显得空洞玄虚，大话连篇，对实际生活毫无作用。既不能让你赚钱还房贷，又会让人陷入虚无主义的危险。有这样一则对话，有人问哲学家：你为什么这么幼稚，不去追求一些实际的目标呢？哲学家反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幼稚，让自己停留在表象的世界里，却不去审查自己追求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勉强。追求名利并不可耻，淡泊名利并非高尚，只不过每个人的价值选择不同罢了。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随心活着或许更好。

回想刚上大学那会儿，意气风发，对一切都充满不可名状的信心，以为只要踏出校园，前途一片光明，拥有想要的生活和事业。毕业后才发现完全

不是那么一回事，找工作、租房子并不顺利，住过地下室，被中介骗过。生活还有那么多无力抵抗的东西，渐渐相信存在着所谓的命运。看着飞涨的房价和物价，再想想自己的工资，只能无语凝噎，一声叹息。整天忙忙碌碌，为着生存奔波劳累，最后却惊讶地发现早已在坚硬的现实世界渐渐迷失自我，仿佛一眼已经看见五年十年后的自己，就像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有句台词说的那样：“小时候，谁都觉得自己的未来闪闪发光，不是吗？但是一旦长大，没有一件事会遂自己心愿。”理想和梦想在现实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我是谁？我该做什么？我希望什么？在无数个夜晚我一遍遍问自己这样的哲学问题。终于，工作两年后，我决心辞职考研，并且选择了哲学作为研究方向。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考上了研究生，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

生命原本是流动、复杂和丰盛的，如果一味地安于现状，害怕改变，那跟“活死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命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哪怕一切都在无可避免地走向平庸，但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高于日常世俗的神性之物，如一道亮光照耀着未来崎岖不平的道路。我想去领略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含义的丰富，而不愿面对人生长吁短叹或者沉醉于悲伤中或者草草地了结一生又或者笑着搪塞过去。☑